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扩展版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维普网全文收录期刊

东方论坛

EASTERN FORUM

1988年创刊 双月刊
2023年第2期
(总第180期)

编辑委员会

主任：胡金焱

委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卞建华	蔡颖雯	陈德球	陈洪连	陈瑞华
董志勇	窦秀艳	方雷	何云峰	侯传文
胡金焱	黄速建	姜异新	姜振昌	刘东方
刘京希	刘喜华	刘跃进	吕周聚	马斗成
孟天运	孙百才	孙继国	谭好哲	王立胜
王庆金	王绍波	王兆胜	王子今	尉利工
魏建	吴义勤	肖建红	钟永光	周潇

主编：孙继国

副主编：冯济平 侯德彤

1988 年创刊

2023

东方论坛

2

双月刊

总第 180 期

□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话语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向度

李立景 李玉琼 · 1 ·

四个主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逻辑

吴玉敏 孙万兵 · 17 ·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新世纪以来老舍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研究动向考察

石兴泽 · 26 ·

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

杨超高 · 39 ·

□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从侨土嬗代到吴会之争：孙吴文学本土化与世族文学兴起

徐昌盛 · 48 ·

论北朝歌诗的创作与表演

——以同题横吹曲、相和挽歌、杂曲本事歌为例

宋亚莉 石飞飞 · 60 ·

□ 历史研究

秦王朝皇帝理论的政治伦理缺陷及其后果 张师伟 · 71 ·

清代州县治理的区域特色、实施路径与基本策略

——基于顺天府宝坻县的考察 王洪兵 马风民 · 81 ·

何以为家：新国家与旧礼制和解中的民族复兴 钟艳艳 · 94 ·

□ 普惠金融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制度性困境与对策建议 张 珩 · 106 ·

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运行效率研究 石宝峰 刘 磊 王瑞琪 · 120 ·

□ 美学研究

杜夫海纳情感先验与存在的现象学阐释 张云鹏 · 135 ·

罗杰·弗莱与英国现代主义运动中的中国风话语建构 谢雅卿 · 147 ·

THE EASTERN FORUM

The Contents of the 2nd Issue for 2023

- Discourse Community: Forging a New Dimension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 Li Lijing Li Yuqiong(1)
- Four Initiatives: Practical Logic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 Wu Yumin Sun Wanbing(17)
- Study on the Trends of Research on Lao She's Love and Marriage Narrative and Female
Images since the New CenturyShi Xingze(26)
- On the Legendary Narrative Tendency of Local Novels in the New Century..... Yang Chaogao(39)
- Localization of Literature of Wu and the Rise of Aristocratic Literature: from the Shift between Settlers
and Natives to the Contest between Wujun and Kuaiji Xu Changsheng(48)
- On the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Northern Dynasty Song Poems..... Song Yali Shi Feifei(60)
- Political Ethical Defect of the Emperor Theory of the Qin Dynasty and Its Consequences
..... Zhang Shiwei(71)
-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mplementation Paths and Basic Strategies of County and Prefecture
Governance in the Qing Dynasty Wang Hongbing Ma Fengmin(81)
- What Makes Home: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New State and Old Rites
..... Zhong Yanyan(94)
- Institutional Dilemma of China's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Zhang Heng(106)
- Research on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Policy-based Agricultural Financing Guarantee Companies
.....Shi Baofeng Liu Lei Wang Ruiqi(120)
-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Dufrenne's Affective A Priori and Presence Zhang Yunpeng(135)
- Roger Fry and the Discourse of "Chinoiserie" in British ModernismXie Yaqing(147)

英文翻译：岳玉庆

话语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向度

李立景 李玉琼

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中长期忽视了话语共同体的视角,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向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所需与话语共同体的功能优势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驱动力。话语共同体以语言文字共同体为基础,社会结构交融为前提,共同的话语体系为核心而逐步形成。面对法律保障缺失、民族交流困难等现状,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要从六个方面着手:将构建话语共同体纳入法治轨道以实现法治保障;广泛传播中华文化以增强文化认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以提高治理效能;推动各民族话语融通以形成精神核心;落实媒介化统战以汇聚民族力量;建设学术话语体系以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构建;话语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2-0001-16

一、话语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一个被忽略的视角

(一)国内相关研究

自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以来,众多学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路径展开研究,但从话语共同体的视角来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少之又少。本文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是否涉及“话语共同体”、“话语共同体”的研究有无提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的研究是否涉及“话语”三个方面梳理相关文献^①。

首先,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是否涉及“话语共同体”的相关研究。本文通过检索篇名包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关文献,检索得出3021篇相关文献。2014年,吕岩以西藏民族学院为例,详细论述了公共媒体迅速普及的新形势下通过讲究策略和有效引导促成中华文化认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②。2015年,张立辉、许华峰以西南民族大学团结教育为例,主张坚持马

基金项目: 本文系广西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融媒体ADR: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媒介化多元协同治理研究”(20FXW007)和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民族院校法学‘创新创业’人才分类协同培养模式研究”(2020JGB18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立景,男,辽宁大连人,法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广西民族大学广西法治与传播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法学与传播学研究;李玉琼,广西民族大学民族法与区域治理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法学与社会治理研究。

^① 相关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检索日期截止至2022年11月19日。

^② 吕岩:《异地办学促进培养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西藏民族学院为例》,《民族论坛》2014年12期。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途径推动发展民族团结工作,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①。该时期,学者们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初步探究。2020年,胡艳霞提出增强语言文化认同是加强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②。2021年,邹阳阳提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加强语言文字法律保障,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③。2022年,夏文贵提出应当充分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以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④。2020年至今,诸多学者开始关注语言文字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并就如何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开探索。显而易见,已有的研究多是从文化、价值观念以及语言文字层面上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展开研究,并对后续的研究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但在篇名包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3021篇文献中将检索条件设置为关键词包含“话语共同体”,最终未检索出相关文献。可见,当前诸多学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还停留在单一层面,即主张加强文化认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然而,只有将其整合融通,上升到话语共同体的高度,才能更加全面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次,对于“话语共同体”的研究是否提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中国知网检索,篇名包含“话语共同体”的相关文献共计284篇。1999年,施敏发表了《话语共同体和ESP的理论本质》一文,也是中国知网收录的国内最早的对于话语共同体的研究,施敏详细论述了有关话语共同体的概念及特点,并以商务英语为例展开相关论证^⑤;2009年,严明从起源与发展、概念及特征三个方面对话语共同体展开详细论述^⑥。该时期国内话语共同体的研究推动了话语共同体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但是该时期的相关研究只是借鉴西方研究成果,欠缺批判与创新。2017年,张庆林、肖燕怜主张将话语共同体与新媒体网络传播相结合,论述了多元网民话语共同体的形成^⑦;同年,双传学提出了构建新闻话语共同体,以提升舆论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重要观点^⑧;2022年,柯贤兵、向波阳主张推动话语共同体与法庭调解相结合,旨在构建法庭调解话语共同体^⑨。该时期学者的研究开始趋向于话语共同体的跨学科研究,并以话语共同体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话语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打下重要

① 张立辉、许华峰:《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探析——以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团结教育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5期。

② 胡艳霞:《增强语言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③ 邹阳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④ 夏文贵、秦秋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基础性工程》,《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夏文贵、秦国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进路——基于政治符号的视角》,《东方论坛》2022年第6期。

⑤ 施敏:《话语共同体和ESP的理论本质》,《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9期。

⑥ 严明:《话语分析的基础:话语共同体》,《外语学刊》2009年第4期。

⑦ 张庆林、肖燕怜:《新媒体空间网民话语共同体的构建与消解》,《东南传播》2017年第8期。

⑧ 双传学:《构建话语共同体提升舆论引领力》,《新闻战线》2017年第10期。

⑨ 柯贤兵、向波阳:《话语共同体视域下法庭调解话语趋近研究》,《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基石。话语共同体作为集语言文字与意识形态为一体的概念,其理论贡献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且全新的视角,这也正是当前研究中所欠缺的视角和高度,话语共同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至今为止,尚未有学者将话语共同体的理论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结合,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研究少有涉及,可见,当前学界对此并未足够重视。

最后,对于“共同体”的研究是否涉及“话语”,我国有关“共同体”系列话语多用于政治生活,反映政治思想,现有的学术研究也集中于政治领域反映政治思想。经中国知网检索后发现,自1958年开始,“共同体”开始出现在学术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太平洋共同体”,例如周建平就经济危机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形势、经济发展缓慢原因以及发展趋势展开分析^①,张碧清探讨了日本提出“太平洋共同体”的目的和原因,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②。1980年伊始,由于改革开放的成果逐渐显现,“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开始出现在学术文章中,如林建珍就企业“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部分问题展开初步探讨^③。2007年开始,“东盟共同体”广泛出现在学术论文中,例如张锡镇探讨了东盟共同体在未来改革中发展趋势及东盟核心国对推动东盟发展的作用^④。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如曲星围绕国家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深入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内容^⑤。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共同体”的研究紧紧跟随政治发展的脚步,与国内外政治变迁紧密互动。在有关“共同体”的检索结果中将检索条件设置为关键词包含“话语”,最终检索得出33篇相关文献。且已有的文献综述或是一笔带过,或是泛泛而谈,其中聚焦论述“话语”的文献近乎为零,可见,当前我国“共同体”的研究并未涉及“话语”,学术研究上仍然存在着漏洞与空白。

(二) 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对话语共同体研究较早,并最早来源于语言学、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本文将从话语共同体的概念研究和话语共同体的跨学科研究两个方面进行梳理。

首先,对于话语共同体概念的研究,不同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986年,Herzberg提出教育学正使用“话语共同体”的概念来表示一组观点:群体语言的使用是一种社会行为,话语不仅是保留和扩展群体知识的方式,也是介绍新成员进入该群体的方式,是对群体知识的认知和构建^⑥。但该观点引起了诸多学者的争论,普遍认为Herzberg的观点并不是建立和识别话语共同体的标准,Herzberg承认话语共同体的概念并未得到很好的定义,他所提出的观点具有启发性,但不是一个固定概念。同时,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话语共同体的概念虽然实用且权威,但也带来许多的问题,例如,

① 周建平:《欧洲经济共同体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展望》,《世界经济》1979年第6期。

② 张碧清:《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及其前景》,《世界知识》1983年第8期。

③ 林建珍:《企业“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初探》,《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0年第12期。

④ 张锡镇:《东盟共同体发展趋势及其主要推动者》,《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1期。

⑤ 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求是》2013年第4期。

⑥ Herzberg Bruce,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Communiti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CCC Convention", New Orleans, La, 1986.

Porter 对此提出“话语共同体是否应当被共同的研究对象、共同的研究方法、交流的机会和频率,流派和体裁惯例来决定呢?”^①Fennell 指出当前对话语共同体的定义较为模糊导致不能准确地识别话语共同体,过分强调“话语”和“共同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定义,只会陷入无限循环^②。学者们认为明确话语共同体的概念,确立界定话语共同体的标准对避免不同概念的模糊,推动话语共同体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但是,该时期的研究者提出的有关话语共同体的定义过于片面,并不能用以判断话语共同体。1990年,Swales 在 *Genre Analysis* 中主张话语共同体是一个由具有公共的目标和参与机制、能够进行信息交换,使用特定的体裁和专用词汇,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成员组成的团体,并详细介绍了话语共同体的六个特征:(1)广泛认同的公共目标;(2)成员间的相互交流机制;(3)共同体使用参与机制主要是为了提供信息和反馈;(4)共同体使用一种或多种体裁,以促使其交际目的的实现;(5)话语共同体使用特定的词语;(6)成员要有一定程度的相关内容和话语专业知识^③。Swales 提出的话语共同体的定义是目前认可度最高的,为后续话语共同体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当然,也有学者结合自然、社会科学领域来阐述话语共同体的概念。譬如,2003年, Little、Jordan 和 Sayer 以卫生保健和医疗领域为例对话语共同体展开研究,提出话语共同体是一群有足够共同兴趣的人,他们使用同一个词汇和概念,该词汇和概念的含义被大家所接受,并对话语的主体产生影响,并指出话语共同体在帮助成员建立身份,带来归属感的同时也会丧失思想的多样性,甚至殖民化话语共同体的成员,通过意识形态的手段掌管思想领域,并通过叙事者的医疗经历进行相关论证与分析^④。此时,学者已经将话语共同体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并且开始辩证看待话语共同体的作用。

其次,西方有关话语共同体的跨学科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学者们利用话语共同体的理论对社会现实问题展开分析和探讨,从话语共同体的向度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例如,2007年,Dieter Plehwe 系统分析综合性跨国话语共同体所带来的潜在理论和实证进步^⑤;又如,Agbaria 于2011年描述和刻画了社会研究教育的话语共同体,并探讨了其中的政策、概念框架等,旨在更好的让学生为全球化做好准备^⑥;再如,2014年,Elizabeth Lewis 等人提出利用科学课堂话语共同体探讨职前教师的初步学习^⑦。可见,近来西方高度重视话语共同体的跨学科研究,旨在用话语共同体的概念解决社会问

① Porter, James E. , "The problem of defining discourse communiti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CCC Convention", St. Louis,1988.

② Fennell, Barbara,Carl Herndon, Carolyn Miller, "Mapping discourse communiti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CCC Convention",Atlanta,Ga, 1987.

③ John M. Swales, *Genre Analysis : 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0,p.24.

④ Little Miles, Jordens Christopher F C, Sayers EmmaJane, et al. , "Discourse Communities and the Discourse of Experience",*Journal of bioethical inquiry*, 2022, 19(1):pp.61-69.

⑤ PlehweD. , "The making of a comprehensive transnational discourse community: the Mont P è lerin society of neoliberal intellectuals", Berlin: WZB, 2007.

⑥ Ayman K. Agbaria, "The Social Studies Education Discourse Community on Globalization: Exploring the Agenda of Preparing Citizens for the Global Age",*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1, 15(1): pp.57-74.

⑦ Elizabeth Lewis, Dena Harshbarger, Oxana Dema, et al. , "Preparation for Practice: Elementary Preservice Teachers Learning and Using Scientific Classroom Discourse Community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School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2014, 114(4): pp.154-165.

题,对我国话语共同体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当前,西方学者对话语共同体的研究较为全面,以跨学科研究为主导而不单纯局限于单一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更关注于话语共同体的实践意义而不仅仅是学术价值。相反,中国话语共同体的研究多局限于单一学科的壁垒,更是忽视了各个领域内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参考西方话语共同体研究的优势,我国对话语共同体的研究一方面应当将学术价值和现实问题相结合,以话语共同体的学术研究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现实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推动跨学科研究,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与对话,以话语共同体的研究推动其他领域的发展和进步。

综上所述,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以来便是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已有的研究从语言、文化、价值观念等多个视角就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and 启发意义的观点。但当前研究忽略了以话语共同体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要视角,如何站在新的理论高度,正确理解话语共同体的结构层次,探索构建话语共同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问题的提出：话语共同体缘何需要构建

话语共同体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向度,其构建一方面是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便是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功能优势,主要表现在对文化传播、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

(一)现实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话语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在于增强“五个认同”。而话语共同体是以“五个认同”为核心内容和思想基础不断完善和整合形成。因此,构建话语共同体,是凝聚民族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措施和必然要求。

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着双重阻碍,一方面,由于各民族语言文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差异,各民族之间存在思想文化差异以及交流障碍,较难达成精神共识。另一方面,各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偏僻地区存在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设施不齐、思想文化落后等问题,难以实现民族地区协同发展,各民族之间因落差感易产生敌视心理。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迫切需要构建话语共同体,唯此,才能保障各民族之间信息沟通的顺畅,推动“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功能优势：构建话语共同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石

话语共同体的概念最初来源于哲学、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对话语共同体的定义各抒己见,故其定义在学术界历来备受争议。目前权威性较高的是 Swales 提出的“话语共同体是

^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内蒙古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人民日报》2022年3月6日,第2版。

一个由具有公共的目标、相互的交流机制、使用特定的体裁和专用词汇的成员组成的团体。”^①本文中话语共同体的含义是基于我国目前存在的现实问题而确定的,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的普及度不高,各民族沟通交流困难,文化传播混乱,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层层阻碍。因而在建立语言文字共同体的基础上,加强文化传播,增强“五个认同”,形成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共同的话语体系,实现意识形态共同体与语言文字共同体相统一,进而构建话语共同体。话语共同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提出不仅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加强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利益的维护,更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方案、新路径。

第一,话语共同体是构筑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增进各族人民归属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有效措施。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其本质是“中华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②话语共同体对整合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实现各族人民的中华文化和政治认同意识,以及增强各族人民的民族归属感、国家归属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话语共同体以语言文字共同体为前提,语言文字本身是人类文化和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构建话语共同体为中华文化传播提供了媒介和载体,广泛传播了中华文化以推动文化融合,是加强各民族文化认同,最终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构建话语共同体保障少数民族各项基本权利,实现民族团结,民族平等。话语共同体能够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劳动权和受教育权的实现。话语共同体不仅能拓宽少数民族群众的就业路径,增加就业人数,还能保障少数民族公民受教育的权利,话语共同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础,而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内外科学发展最新动态和优秀文化成果的重要载体,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够更好的保障少数民族公民学习科学知识,掌握文化成果,提高民族地区受教育权保障水平。保障少数民族各项权利,坚持各民族平等,增强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对构筑身份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刻影响。

第二,话语共同体是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现价值认同的必要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③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是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话语作为蕴含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语言文字,不仅仅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更有着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价值认同的建构功能。话语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建构者,具有现实的建构功能。构建话语共同体,一方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效能,话语以语言文字为载体,通过词语的整合、使用和传播,最大程度地提升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有效地遏制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入侵以及不良价值观对全国各族人民的影响,抑制思想领域的不良倾向,充分发挥其规范和建构功能。

① 严明:《话语共同体理论建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页。

② 谷禾:《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

第三,话语共同体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治理基础。社会治理是由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等多个主体平等协商,以满足社会治理需求,解决社会实践问题^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立是提高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无可回避的问题和重要切入点。没有微观话语制度技术的建构刻画与规训,所谓社会治理共同体诸种大词只能是一种宏大叙事想象的概念世界和理想愿景。话语共同体的构建能够更好推动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协商,进而达到社会治理的预期成效。例如矛盾纠纷的解决即产生矛盾纠纷的双方就矛盾纠纷进行协商沟通的过程,其离不开通用的语言文字以及建立在通用语言文字基础之上的共同的话语体系。构建话语共同体对矛盾纠纷的解决、社会治理效能的提高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和维系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语言文字共同体到话语共同体：话语共同体的形成条件

语言是人类沟通交流的符号系统,经人类有意识地使用而成为话语。换言之,话语以声音或文字的形式存在,且包含着使用者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其内涵比语言丰富的多,它体现着意识和传播的交互过程和最终结果。

话语共同体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向度,其内蕴早已超越了通用语言文字,而是建立在语言文字共同体的基础之上,以社会结构交融为客观前提,以共同的话语体系为核心要义而形成。

(一)语言文字共同体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语言文字是社会得以维系和存在的媒介与基础,语言文字事业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关涉全局性的基础性工作。共同体最初是广泛应用于哲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的一个概念,起源于“共同”或者“公共”,诸多古希腊哲学家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他们的思考主要沿着两条道路前进:其一是哲学伦理学的道路,其二是政治学的道路^②。近代以来,斐迪南·滕尼斯第一次对“共同体”展开系统研究,提出“‘共同体’是基于自然意志而形成的一种具有共同价值和融洽情感的社会有机体。”同时,滕尼斯认为共同体包括血缘、地缘、精神三种形式。“精神共同体也是最高形式的共同体”^③。

语言文字共同体是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体,汉族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有机组成部分的统一整体。语言文字共同体的内部关系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现条件,其所具备的工具与文化功能既关乎各族人民的族际交往,又涉及群体情感的凝聚,是实现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二是对构建话语共同体起着重要作用,构建话语共同体,需要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载体,向各民族传播中华文化文明,增强“五个认同”,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筑牢各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进而建立各民族统一的话语体系。因而可知,话语共同体以语言文字的形式存在,语言文字共同体的工具性和媒介

① 刘伟、翁俊芳:《“社会治理共同体”话语的生成脉络与演化逻辑》,《浙江学刊》2022年第2期。

② 李志华、王晓朝:《论共同体观念的语词生成与理论建构》,《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③ 张国芳:《滕尼斯“共同体/社会”分类的类型学意义》,《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

性对构建话语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

(二) 社会结构交融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客观前提

社会结构交融即“嵌入式”社会结构,是党中央客观把握民族发展趋势提出的新思想,是指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相互嵌入,从而形成结构相融、互惠互补、情感相通的多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嵌入不仅仅是空间上的嵌入,更是指各民族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深层嵌合,这是民族交融的必然趋势,也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重要前提。

社会结构交融是在居住格局、经济发展以及制度建设多方面实现各民族融合。推动社会结构交融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重要条件,首先,社会结构交融强调各民族实现嵌入式居住生活,各民族成员参与到统一的社会结构之中,与社会整体产生联系,从而打破少数民族居住空间的封闭性和边缘化,为构建话语共同体提供了便利的地理条件;其次,社会结构交融表征社会资源平等分配,各民族群体平等地享有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通过社会结构融合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距,为话语共同体创造了平等的发展条件;最后,社会结构交融强调各民族心理互融,通过参与社会结构从而获得社会归属感,实现各民族间的团结稳定,消除了各民族群体间的疏离与偏见,为话语共同体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心理条件。

(三) 共同的话语体系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核心要义

话语体系是指在长期生活发展中不断蕴蓄的某一学科或范畴的专门表达方式和话语规范,涵盖了文化背景、发展逻辑、知识框架等多个要素^①。本文中所指的话语体系是各个民族在掌握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基础上,增强“五个认同”,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形成中华民族共有的相对稳定的表达形式和言语体系。

话语体系的建设要依托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加强对国家、党和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建设共同的话语体系是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重中之重,共同话语体系的背后是思想和价值观的一致,是各族人民对其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对中华文化和共同价值目标的认同,更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符号,更是集文化、思想、价值理念于一体的精神凝练。话语共同体不仅仅要求语言文字的统一,更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取向,也就是共同的话语体系。共同的话语体系是语言文字共同体发展成为话语共同体的关键,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核心要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键一步。

话语共同体即人、语言、意识形态和谐统一的“多元一体格局”,^②其作为政治话语广泛使用而成为共同体话语。因此,共同体话语是指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等形式出现的政治话语,以“共同体”为根词,为紧密联系之意,在政治生活中频繁运用而形成了政治话语体系。

^① 李敬:《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教育话语体系建设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31期。

^② 费孝通:《费孝通九十新语》,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124页。

四、现状分析：构建话语共同体的困境与问题

构建话语共同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民心相通、文化融通,扫除各族人民交流障碍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当前构建话语共同体仍然存在立法模糊,基层执法现状堪忧等诸多问题,本文将从立法、执法、中华文化传播以及学术研究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语言立法现状：构建话语共同体的法律保障缺失

当前,我国的语言立法主要集中在《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规范。《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规定的内容具有根本性和概括性。对于实践性问题并无明确规定,如“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推广的范围、推广的程度以及如何推广,并未作出规定具体的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规章作为下位法,其规定的内容应当与宪法的规定及精神保持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化和明确化。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一些条文的表述不准确,甚至采取了回避和模糊的规定,如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而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又是怎么规定的呢?作为专门立法应当更为具体明确,而不应将立法的皮球踢来踢去。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网络语言、外国语言以及新兴语言的管理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出现法律空白现象;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并未涉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相关规定^①,可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方面仍然存在立法缺陷与漏洞,对正确处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方面仍然需要加强立法。

对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是基本语言文字立法的重中之重,不容模糊回避,在立法上应当明确立场规定,倡导统一习惯解读,反对分裂式解读。如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我市各少数民族享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这里表示,实际上隐含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双轨性分裂式发展取向。建议倡导性规定,以表明立法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倡导双语制发展,有利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铸牢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 语言执法现状：构建话语共同体执法力度不足

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我国于2001年实施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作为第一部语言文字专项立法,它对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定是我国语言史上的里程碑,然而如何执行法律仍是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难题。

当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执行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少数民族群众,特别是基层干部、相关执法人员对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不重视,贯彻执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工作力度仍需

^① 卢干奇:《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几个问题》,见周庆生编:《语言与法律研究的新视野——语言与法律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68—79页。

加强;其次,语言执法工作的进程不平衡,汉族地区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普及度较高,广播电视、广告宣传以及公共场所的用语用字较为规范,而农村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存在大规模使用汉字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影响了我国语言执法的整体水平;最后,语言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不足,语言执法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工作能力较弱,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不能有效地督促语言执法工作的顺利推进。

(三) 中华文化传播现状: 构建话语共同体的共同思想基础难以夯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①五千年文明,长风浩荡。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各民族团结与繁荣发展的根基,是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力量之源。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是维护民族地区安全与稳定、构建话语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②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华文化传播现状存在诸多问题,中华文化传播在现代化、区别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呈现出混乱状态。譬如多元文化冲击,新兴文化、外来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选择,弱化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认同^③,无法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群众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影响;再如,文化传播过程中将中华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割裂,否认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破坏各民族团结进步,各民族群众难以建立共鸣,影响中华文化传播成效,文化认同难以形成;此外,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资源配置不平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中华文化在民族地区的传播面临重重障碍,致使各地区难以形成文化认同,造成了文化分裂等不利影响。

(四) 话语共同体研究现状: 构建话语共同体的学术话语体系尚未充实

话语共同体的构建不仅仅需要具体实践和传播,也需要自洽完善的理论提供依据和指导。形成具有自己特色和强有力的学术话语体系,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学理依据和基础,也是话语共同体理论和思想的外在表达。话语共同体学术话语体系指学术主体依托话语共同体为研究对象形成的新概念、新命题、新观点所型构的理论体系。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一环,也是以话语共同体的向度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支撑。

首先,学术话语体系的跨学科研究亟待完善。近年来,以“话语共同体”为关键词的文献逐渐变多,但是大多数停留在话语共同体在语言学领域的研究,从跨学科视角并以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仍然很少。其次,当前话语共同体的学术话语创新不足。目前,国内学者对话语共同体的研究多是依附于西方理论成果,这种诉诸权威式的研究方式难以实现批判和创新,只能在他们圈定的范式内固步自封。最后,话语共同体的学术话语体系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任何理论不

① 《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进步重要论述综述》,《人民日报》2021年8月25日,第20版。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

③ 邓秋实:《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认同困境和提升策略探析》,《大学》2021年第41期。

能囿于学术,而是要用以指导实践,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学理与实践的交叉和融合。

五、何以构建：构建话语共同体的路径探索

话语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从秦始皇时期推行的“书同文”政策,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开展的“正音运动”,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20世纪50年代的文字改革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普通话”作为通用语言称呼,到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①,都可以看出语言文字及共同的话语体系对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加强文化认同起着重要的作用,话语共同体的路径探索古往今来,从未停歇。在互联网飞速发展、文化繁荣昌盛的今天,构建话语共同体的路径更加多样,本文将立足于现实问题,从法治保障、思想基础、交往规则、话语融通、媒介化统战以及学术话语体系六个方面展开路径探索。

(一)法治建设：铸牢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法治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②构建话语共同体,必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铸牢话语共同体的法治保障,应当从以下层面分别进行完善和推进。

一是推动语言文字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全面增强语言文字立法的系统性,保障话语共同体不仅有法可依,更要有良法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滞后性和片面性迫切呼唤语言文字立法的完善。语言立法是构建话语共同体最重要的保障,其立法应当从以下两个维度展开:一方面对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出详细规定,明确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范围,程度以及推广方式,充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交际功能;另一方面完善网络语言文字、新兴语言文字的法律规定,明确网络语言文字的使用要求,使语言立法适应时代要求。其二,建议加快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立法。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加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国际上普遍的法定主旨确认语言为文化遗产^③。科学地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立法能够实现少数民族群众在学习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同时传承本民族语言文字,在构建语言文字共同体的同时保护语言文字的多样性,倡导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双语、多语能力。

二是严格规范语言文字公正文明执法,完善执法程序,强化执法能力建设,为构建话语共同体扫清执法障碍。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当前,由于执法人员对语言执法工作的不重视、语言执法监督机制的缺失等诸多因素,语言执法现状仍不容乐观。贯彻执行语言立法是形成语言文字共同体和构建话语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应采取多种方式,为构建话语共同体扫清执法障碍。其一,将

① 尤陈俊:《国家能力视角下的当代中国语言规划与语言立法——从文字改革运动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思想战线》2021年第1期。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

③ 刘红婴:《当代语言立法价值取向探旨》,《语言文字应用》2009年第1期。

语言文字工作纳入行政机关常态化工作,保证各地语言文字工作均衡发展。执法机关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学校、公共服务行业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使用情况开展相关评估,并对偏远地区教师和公职人员开展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在各行各业工作中广泛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其二,贯彻落实“一法一办法”,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精准执法。各民族地区情况不同,当地执法机关应当联合当地语言委员会针对本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情况制定具体的工作实施办法,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提高全国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普及程度。

三是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对网络空间乱象进行法律规范,实现网络空间井然有序,为构建话语共同体提供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进形成良好网络生态。”^①网络空间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阵地,其清朗与否对话语共同体的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网络空间的兴起也必然带来网络谣言、隐私泄露、网络暴力、泛娱乐化等多种乱象。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一方面,完善网络空间立法,通过法律规范对网络空间进行规范和制约,对网民进行强制性的引导和约束,并提升网络空间法规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使法律能够解决网络空间存在的现实问题,从而提高网络空间的法治化程度;另一方面,实现网络空间严格有效执法,对网络空间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监管,并实现对其中的违法言论处理公开化透明化,使网络空间的执法既能强化网民的法律意识又能实现公开透明,保障网民权利。

四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各族人民的法治意识,为构建话语共同体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一方面提高各民族人民法治素养,推动形成躬体力行的法治价值观,为构建话语共同体奠基较强的法治意识并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另一方面,法治本身就是一种共同体的制度建构,体现了共同体的意志与价值,推动法治宣传教育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选择。其一,拓宽法治宣传方式,通过报刊、广播以及电视栏目普法,并设立普法网站,开通普法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其二,加强重点人群的法制宣传教育,不仅仅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少数关键”,更要重视面向青少年群体的法治宣传,实现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对于领导干部,积极开展法治教育培训,设立相应评估考核机制;对于青少年,要讲法治宣传融入学科教育,设立法治教育课程并开展法治教育活动,推动法治知识和法治意识融入青少年的价值观念之中。

(二)文化认同:筑牢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共同思想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②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千年历史的传承,是实现民族复兴、建设文化强国的精神力量。文化认同以语言文字认同为前提,以文化身份认同为基础,其内核在于文化主体对文化价值的认识 and 选择。文化认同是凝聚各族人民价值共识,铸牢中华民族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

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首先,加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力度,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文化和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不仅能搭建各民族交流沟通的桥梁,还为传播中华区域文化助力,对各民族文化融通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例如藏族的《格萨尔史诗》、蒙古族的《蒙古秘史》和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①,都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财富;其次,广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共同的价值观及价值选择引领文化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心聚力的重要精神动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各民族思想教育相融,构建各民族统一的话语体系,为文化认同奠定思想基础;最后,创新中华文化传播方式和内容,利用新媒体方式传播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实现中华文化认同,促进各族人民在语言文字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形成统一的话语体系,为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筑牢共同思想基础。

(三) 社会治理: 创新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治理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②探索多种社会治理方式是提高社会治理效能重要举措,更是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对各族群众而言,首先,坚持非暴力沟通的交往方式。非暴力沟通是马歇尔·卢森堡提出的以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为基础的一种沟通方式^③。在日常人际交往中,运用非暴力沟通的交往规则,能够有效地减少分歧与争议,助力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构建;在矛盾产生后,双方当事人能够充分考虑对方的需要,转变交流和倾听的方式,有意识地使用语言,能够以和谐方式解决矛盾冲突,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其次,坚持培养良好的协商素养。协商素养是公民进行平等交流和商榷的综合素质,协商素养的养成能够实现双方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平等对话、理性交往,从而达成意志一致。培养协商素养能够推动公民更好的沟通交往,为话语共同体的构建助力添翼,同时,也能以平和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避免冲突,达成共识。坚持非暴力沟通的交往方式和培养协商素养能够更好的发挥诉源治理的功能以及预防和化解纠纷,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平和而有效的沟通,不仅能健全社会治理方式,还为话语共同体的构建创造良好的条件。

当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不仅仅是对各民族群众的号召,更是对政府的要求。对政府而言,首先,健全制度化协商平台,推动各政党、社会组织以及各族人民充分表达意见,积极参与协商,进而推动协商民主建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加强协商民主建设,能够更好地增进团结,凝聚共识,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其次,推进组织化建设。组织化是指通过组织之间相互协作,促进社会整合向着结构化程度和有序程度发展。政府通过推动社会团体、社区等多个组织的组织化建设,将组织整合进入统一的共同体之中,凝聚组织间的集体力量,进而推动建设社

① 徐黎丽、许浩东:《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文化作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

③ [美]马歇尔·卢森堡:《非暴力沟通》,阮胤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6页。

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

(四) 话语融合: 打造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精神内核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①,构建话语共同体以语言文字共同体为前提,以共同的话语体系为核心。而构建共同的话语体系,需要积极的推动话语融合,实现话语融合可以多种方式。

其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建设语言文字共同体。一方面,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融入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大力推行国家统编教材,加强教科书体系建设,规范教师队伍使用普通话进行教学,提高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在民族地区普及度;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新媒体拓宽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传播渠道,通过网络、电视等方式积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高民族地区群众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能力,为实现话语融合打下坚实基础。

其二,坚持融通各族,语言传播要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角度,避免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对立,两者并行不悖。正确厘清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实现话语融通至关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可见两者之间的价值位阶、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还是不尽相同的。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我国第一性的语言文字原则。宪法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定体现了积极能动的国家基本立场。但在积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应始终维护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权,并且创造条件利于他们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让他们在掌握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基础上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双语制发展,实现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

其三,加强意识形态治理,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相结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在整合县域内报刊、广播电视、新型媒体等资源,开展政务服务、媒体服务、公共服务等业务的融合媒体平台。它是集政务中心、服务中心、新闻中心为一体的平台,是各级政策的传播者和基层治理的参与者,更是连接政府与基层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实现话语融通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把握县域舆论空间话语权,增强主流话语的影响力,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社会意识形态,帮助县域群众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和判断,从而实现各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助力;另一方面,推动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协调统一,对民间舆论场进行引导和规范,实现民间舆论场对接主流声音,以两大舆论场共同推动意识形态建设,增进社会共识。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

（五）媒介化统战：凝聚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发展合力

《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第二条规定：“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新时代，统一战线也是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战略方针和经验法宝。媒介化统战，不同于传统的宣传教育统战话语与理念，而以电视节目、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为媒介，引导基层群众广泛参与，实现高程度、高范围大团结大融合，提高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实效。这种新兴的统战模式能够最大程度地引导各民族参与，集聚各民族力量，对话语共同体的构建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媒介化统战推动话语共同体发展，应当从多种方式展开探索。

譬如，推动政治协商制度媒介化，创新协商民主制度，通过“圆桌会”“电视问政”等多种形式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实现深度协商互动，为构建话语共同体凝聚各族群众共识，汇聚中华民族力量，如广西电视台《桂在协商》节目、湖北经视《提案追踪》栏目。再如，推动各族群众利益表达机制媒介化，落实网络利益表达机制。“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22年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①可见，互联网普及基础较广，因此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媒介作用，落实网络利益表达机制，能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有效扩大政治参与，凝聚共识，为构建话语共同体服务，如国务院办公厅开通的“互联网+督查”平台。最后，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媒介化统战效能。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对媒介信息所具备的选择能力、评估能力以及应对能力，以媒介化统战推动话语共同体的发展，首要的便是提高群众的媒介素养，增加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辨别能力和认知能力是每一位网络使用者的必修课，更是以媒介化统战助力构建话语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媒介化统战，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格局和新转向，不仅仅强化各民族群众思想政治共识，更是为话语共同体凝心聚力，汇聚构建话语共同体的强大力量。

（六）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理论指南

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理论创新、学术兴盛的重要举措。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学术话语体系的助力，需要以逻辑自洽的学术话语体系为指南。因此，在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构建中，探求其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应需之举，更是先务之急。

一方面，建设学术话语共同体，打破学科界限，实现学术话语体系多学科多领域对话^②。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不仅要推进理论体系的完善，更要形成开放包容的学术话语共同体，以解决学术问题为目标，实现多学科的聚焦。单一学科的纵深研究难以取得突破，理论成果的创新常常是多学科交流协作的结果。有关话语共同体的学术话语体系往往只关注语言层面的研究，而忽视对其非语言属性进行深入探讨。推动话语共同体的学术话语体系与其他学科的碰撞与交融，建构学术话语共同体，以不同学科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作为提高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内驱力。

另一方面，推动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理论创新扩散，即促进理论的大众化传播，以实现话语共同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专家解读》，2022年8月31日，<http://www.cnnic.cn/n4/2022/0916/c135-10595.html>。

^② 何国梅：《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中国出版》2022年第7期。

体学术话语体系的完善与推广。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理论大众化传播是指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实现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理论向公众的传播与普及,譬如各地颁布施行的《社会科学普及条例》。推动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理论大众化传播,一是必然推动人们对该理论产生心理认同,为其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提供深厚的群众基础;二是理论的大众化传播是实现理论立足于现实世界的重要方式,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最终用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通过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理论的传播为构建话语共同体、凝聚民族共识增添助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构建,话语共同体是团结发展的前提,也是行动共同体的根基。在话语共同体的作用下广泛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合作,才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全国各族人民行动共同体,真正实现知行合一,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侯德彤

Discourse Community: Forging a New Dimension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Li Lijing Li Yuqiong

College of Law,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as ignored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course commun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nation discourse community is a new dimension to forge. The practical needs of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func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discourse community are the driving force to build a discourse community. A discourse community is gradually formed with the language community as its basis,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s as the premise, and the common discourse system as its core. For lack of legal protection and difficulty of ethnic exchang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discourse community should start from six aspects: integrating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community into the track of the rule of law for legal guarantee; disseminating Chinese culture widely to enhance cultural identity; innovating social governance methods to improve governance efficienc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ethnic discourses to form an ideological core; establishing a media-based united front to pool national forces; and building an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Key words: construction; discourse community; forgi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四个主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逻辑

吴玉敏 孙万兵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1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在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之上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朝着更高的奋斗目标迈进,要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逻辑,坚持以理论主动为引领、以政治主动为保证、以历史主动为基础、以战略主动为支撑,不断凝聚起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在新征程上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关键词:四个主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2-0017-09

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如何正确理解并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以理论主动为引领、以政治主动为保证、以历史主动为基础、以战略主动为支撑,从四个主动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实践逻辑,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不断将中国式现代化推向新阶段和新高度。

一、坚持以理论主动为引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①而之所以“能、好、行”,关键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理论主动,高度重视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使理论始终保持强大生命力。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主动,必须坚持“两个结合”、深化认识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文化与现代实践转换研究”(17XSH017)和中共青海省委党校2022年度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专项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内涵及规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吴玉敏,女,青海西宁人,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院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孙万兵,男,甘肃天祝人,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①《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4页。

“三大规律”、科学回答“四个之问”,以新的理论创新指导新的伟大实践。

(一)坚持“两个结合”是坚持理论主动的根本前提

“两个结合”是新时代党中央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十九届六中全会将“两个结合”正式写入第三个历史决议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命题的重大创新作了更进一步的阐释。“两个结合”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持理论主动,必须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加强党的理论创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科学方法,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所面对的实践是纷繁复杂的、所开创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没有也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增强理论主动必须始终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从而作出符合我国国情、符合时代要求、能够指导实践发展的科学回答。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与辉煌发展,这其中所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成为凝聚中国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迈上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坚持“两个结合”必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根基和推进理论创新的丰厚沃土,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开创未来。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①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创造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为我们当下深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规律性认识提供了重要历史镜鉴,始终坚持“两个结合”,加强理论创新,才能不断夯实解读中国实践的思想理论根基。

(二)深化“三大规律”是坚持理论主动的根本要求

规律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在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以规律为遵循,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规律的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党以全新视野深化认识“三大规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深化认识“三大规律”是在新时代条件下坚持理论主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根本要求。

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所反映的是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执政理念、执政使命、执政方略。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不断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执政理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创造性地提出坚持治国理政与治党建党有机统一,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重要理论,在实践发展中不断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揭示的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规律性认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一系列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以全新视野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

^①《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5页。

决定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将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把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相联系,围绕“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世界”等问题进行探索,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构建国际秩序新原则和人类社会关系新愿景。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智慧,不断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三)回答“四个之问”是坚持理论主动的根本目标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着眼于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①“四个之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坚持理论主动要在实践创新基础上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对“四个之问”作出科学回应与解答。

以“中国之治”回答“中国之问”,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挑战新考验接踵而至,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正确道路。迈上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更是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新路,以“中国之治”回答“中国之问”,必须牢牢把握“五个重大原则”,不断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壮丽篇章。以“中国方案”回答“世界之问”,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全球视野和天下情怀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世界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予以解答,为世界发展给出“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在统筹“两个大局”中引领世界大变局正向发展,矢志不渝致力于人类进步事业,使人类社会向着更加光明、文明的方向前行。以“初心使命”回答“人民之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实际问题。明确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党领导人民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这一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以“初心使命”回答“人民之问”,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伟大理论”回答“时代之问”,“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②时代是出卷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重大时代课题,能否正确解答“时代之问”关键在于是否有科学理论的指引。面向新征程,我们党提出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事关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创新突破,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坚持以政治主动为保证

政治属性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正确坚定的政治立场是掌握政治主动

^①《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页。

的根本前提。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增强政治主动,“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①。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提升政治领悟力、强化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政治上赢得主动。

(一) 提高政治判断力是坚持政治主动的首要基础

历史经验深刻表明,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坚持政治主动要始终坚持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自觉运用政治思维把握大局,不断提高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的能力、精准识别现象本质的能力、清醒明辨行为是非的能力、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以“四种能力”的提升确保始终坚定政治立场、把准正确政治方向。

提高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的能力,要善于从政治的高度认识和判断当前形势发展。自觉加强对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认识,从而科学把握形势发展与变化,积极发挥主动性,在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深入思考、加强谋划。提高精准识别现象本质的能力,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基本原理与重要方法。精准识别现象本质,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各类矛盾关系与政治现象中把握其核心与本质,深刻理解其中所蕴含的政治逻辑,提高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容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提高清醒明辨行为是非的能力,不断增强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政治优势,牢牢站稳正确政治立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清醒明辨行为是非,坚决同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等错误行为作斗争。提高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要深刻认识发展中面临的风险挑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从优势中积胜势,有效抵御风险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充分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以不断深化改革积极防范化解风险,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

(二) 提升政治领悟力是坚持政治主动的重要保障

掌握政治主动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的坚实基础,坚持政治主动必须提升政治领悟力。政治领悟力源于思想领悟力,主要体现为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领悟能力、对新时代党的重要政治成果的领悟能力、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领悟能力等方面,提升政治领悟力是提高自身政治能力的核心和关键。

提升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领悟能力,政治领悟力的核心是思想领悟力。提升政治领悟力,必须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上下功夫,把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将学习领悟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提高政治觉悟、增强党性修养的“必修课”。始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充分运用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推进工作指导实践。提升对党的重要政治成果的领悟能力,党的百年历史告诉我们,拥有坚强的领导核心、科学的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创造百年辉煌的成功密码。“两个确立”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要政治成果,提升政治领悟力必须深刻把握这一党的重大政治成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从而不断强化自身思想武装,增强政治自觉和政治担当。提升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领悟能力,学习、领会和落实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3页。

命运与人民福祉的重大政治问题。提升政治领悟力要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国之大者”从本质上而言是个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重大命题。提升政治领悟力要坚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重大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

（三）强化政治执行力是坚持政治主动的关键所在

政治执行力是一个政党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具体体现，是政治判断力和政治领悟力的最终展现与实际检验。强化政治执行力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切实做到增强政治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责任担当，始终坚持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不折不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到位，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首先要增强政治意识，政治执行力是否到位关键在于能否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决策部署。强化政治执行力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政治任务。守正方能致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坚持方向之正，遵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明的政治方向，把握正确发展道路。其次要坚持底线思维，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但总体而言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强化政治执行力，必须站在政治和全局高度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从而不断增强坚守底线的坚定性与自觉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勇于担当作为，在攻坚克难中开创新局面，牢牢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主动权。再次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政治执行力，要深刻理解并正确把握政治执行其中所蕴含的逻辑与方法。政治执行不是机械僵化的执行，而是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强化政治执行力，要将党中央精神与工作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创造性地高质量执行，形成与党中央保持高度自觉一致的主动执行。最后要强化责任担当，提高政治执行力，要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发展形势，而形势越是复杂、任务越是艰巨，就越需铸就强大的政治执行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要强化责任担当，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三、坚持以历史主动为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同志要“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① 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和使命担当，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站在新的起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需要不断增强历史主动，在把握历史大势中续写历史发展新篇章。

（一）尊重历史客观规律是坚持历史主动的根本前提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能否始终保持在历史发展潮流之中，其关键就在于能否牢牢把握时代脉搏，抓住历史发展机遇。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在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准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重点在于准确把握“两个大局”这一历史时代、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阶段、准确把握“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

^①《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页。

准确把握“两个大局”这一历史时代,大变局带来大挑战但同时也带来发展大机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是“两个大局”中的最大变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两个大局”中的宏观环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要以全面的历史观、科学的世界观看待时代发展,充分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与历史智慧,在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中探明历史发展趋势,推动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准确把握“初级阶段”这一历史阶段,正确认识和理解新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关乎我们能否在发展进程中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奋斗目标这一根本性问题。只有更为全面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新发展阶段,才能够正确认识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正确认识新发展阶段的奋斗目标,进而正确分析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朝着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迈进。要准确把握“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对中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辨方位而正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集中体现为“三件大事”,新时代十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明确历史方位必将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与历史主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坚持历史主动的内在要求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中、对历史进程的全面认识中、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中,不断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当前站在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不断增强历史自信、充分彰显历史自觉,确保我们党始终立于时代发展潮头。

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中坚持历史主动,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是以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为基础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历史演进规律的自觉认同,对党的百年奋斗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自觉认同。增强历史主动,一方面要深刻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人类社会发展固有的一般规律和必然性趋势;另一方面要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与成就,理清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中铸就坚定的历史自信与历史主动。在对历史进程的全面认识中坚持历史主动,“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史智慧越丰富,对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动。”^①经过党的百年艰辛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唯有不断增强对历史进程的全面认识,才能更好地彰显历史自觉,认清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从而更加自觉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与责任。在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中坚持历史主动,尊重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历史发展经验是探索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要求,历史发展进程始终都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历史经验总结,在百年发展中形成了总结历史经验的优良传统,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更加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三)科学把握主要矛盾是坚持历史主动的坚实根基

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因此社会发展必然会出现诸多难以预料的新问题与新矛盾。科学回答历史之问是坚持历史主动的重要体现,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545页。

题。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在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中明确奋斗目标,在不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回答历史之问,从而更好地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向前。

要在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中明确奋斗目标,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时代转换的重要标志,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明确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奋斗目标与中心任务的必然要求。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面对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发展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始终坚持在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中明确奋斗目标,带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业。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时代发展新特征,从而进一步明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与奋斗目标。要在不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回答历史之问,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揭示了认识和解决矛盾的思路与方法,为我们党不断开辟前进道路注入了强大动力。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更离不开对新的历史之问的回答。因此,必须以更强的历史主动观察时代发展逻辑,科学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及时发现并解决实践中存在的矛盾问题,在不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回答历史之问。

四、坚持以战略主动为支撑

战略问题关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发展进步与前途命运,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有着深刻的时代内涵和深远的战略考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①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主动,更要坚持以战略主动为支撑,积极加强战略谋划、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牢牢把握事业发展主动权。

(一) 积极加强战略谋划是坚持战略主动的根本前提

“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战略谋划这一概念不仅应用于军事,更广泛应用于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积极加强战略谋划,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主动,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和有力保证,也是解决时代问题、应对风险挑战的根本所在。

首先要准确判断战略机遇,战略机遇关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和事业全局,当前国际环境日趋错综复杂,世界格局也在发生着显著变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能否在这一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判断准、利用好战略机遇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前途命运。面对仍然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增强机遇意识、风险意识,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在战略上赢得主动。其次要明确战略发展阶段,战略发展阶段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与坐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作出重要战略判断、明确了战略阶段,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新“三步走”战略部署与“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纲领。再次要科学把握战略要求,战略要求是社会主要矛盾外化的结果,是实现

^① 习近平:《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求是》2022年第13期。

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科学把握战略要求,要对“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发展格局”有更为清晰明确的认识,准确把握战略要求、积极加强战略谋划,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牢牢把握事业发展主动权。最后要严格落实战略决策,加强战略谋划、增强战略主动、提高战略能力最终必然要以落实战略决策为路径和抓手。落实战略决策,加强战略谋划必须全面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作出的各项战略部署,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二) 不断提高战略思维是坚持战略主动的内在要求

战略思维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智慧、源于党百年奋斗的实践经验,不断提高战略思维要注重提高全局思维、系统思维、预见思维、创新思维。强化战略思维能力要善于从根本、全局、长远的角度把握事物本质关系,进而制定战略目标并找出有效的实现路径,从战略全局的高度牢牢掌握发展主动。

不断提高全局思维,全局由每一个局部组成,而某些局部的和具体的问题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提高全局性思维关键在于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中普遍联系的观点,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看问题,不断提高正确分析判断大势的能力、统筹处理全局与局部的能力。不断提高系统思维,系统思维体现的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是科学的思想方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一个社会关联度和系统性日益加深的环境中进行的,这更加要求我们必须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系统的而不是零散的、普遍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分析当下所面临的复杂变化的发展环境,全面协调推动各项工作。不断提高预见思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事物的发生和发展都有一定预兆或迹象,提高预见思维要具备见微知著的敏锐洞察力,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前景趋势。预见性是系统性的必然结果,是创造性的根本前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新路,面对新的发展环境,必须坚持提高战略思维的预见性。不断提高创新思维,唯物辩证法指出,一切事物都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加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创新思维能力,提高创新思维关键在于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开拓创新,培养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能力,以思想认识的新飞跃不断调整、完善、发展战略布局,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三) 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是增强战略主动的根本目标

战略定力是对于战略目标、战略方向的高度自信和坚定认同,是确保道路、方向、立场等重大原则问题不偏不变的根本保障。中国的发展强大必然带来国际格局调整,也必然遭到守成大国遏制,面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面对新的风险挑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具有强大稳健的战略定力,始终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政治定力、保持思想定力、坚守初心使命。

坚定战略自信,没有强大的战略自信,就不可能有坚定的战略定力,这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战略自信体现的是党团结带领人民迈进新征程的意志和决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唯有具备坚定的战略自信才能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战略主动,更加坚定信心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保持政治定力,保持政治定力关键在于在事关党和国家发展根本利益的问题上站稳政治立场,在道路、方向、立场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动摇,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犯颠覆性错误,牢牢把握正确前进道路和政治方向。保持政治定力必须始终坚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各领域各

方面,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正确。保持思想定力,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保持思想定力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这是我们保持战略定力的根本遵循和力量源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思想定力,要始终遵循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以理论的清醒确保政治的坚定。坚守初心使命,人民是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是战略主动背后的价值立场所在,是战略定力背后的信念意志所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战略思维、战略布局、战略规划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这一根本目标。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人民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总而言之,要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逻辑,坚持以理论主动为引领,始终坚持“两个结合”、深化认识“三大规律”、科学回答“四个之问”,以新的理论创新指导新的伟大实践;坚持以政治主动为保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提升政治领悟力、强化政治执行力,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坚持以历史主动为基础,尊重历史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科学把握主要矛盾,在把握历史大势中续写历史发展新篇章;坚持以战略主动为支撑,积极加强战略谋划、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以“四个主动”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逻辑,不断凝聚起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形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在新征程上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责任编辑:潘文竹

Four Initiatives: Practical Logic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u Yumin Sun Wanbing

School of Marxism, Party School of Qingha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PC, Xining 810001,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s out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gone through a hundred years of struggle, and has successfully promoted and expanded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long-term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and found the correct path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is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and is moving towards a higher goal.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vigorously promot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e must firmly grasp the practical logic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dhere to the theoretical initiative as the guide, the political initiative as the guarantee,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as the foundation, and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as the support. We will continue to gather more active mental strength and open up new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on the new journey.

Key words: four initiative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ractical logic

新世纪以来老舍婚恋叙事及女性 形象研究动向考察

石兴泽

聊城大学 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老舍创作的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是新世纪以来老舍研究的重要内容。考察婚恋类型及内涵特点,有“民间性”“传统性”“清醒理性”诸说;分析各类女性形象,对悍妇尤其是虎妞形象做了有新意的阐释。从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出发,发掘所表现的文化社会学内涵,探究老舍婚恋观和女性观的传统倾向和男权意识,刷新乃至深化了此前的认识,拓展了研究空间。某些论述重复旧议,是“泛学术”时代很难避免的弊端。老舍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研究昭示了新世纪老舍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诸多值得注意的信息。

关键词:老舍创作;婚恋叙事;女性形象;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2-0026-13

婚恋是人生的基本问题,也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古今中外文学大都离不开婚恋内容。老舍以独具特色的婚恋叙事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表现了对婚恋及女性问题异乎寻常的思考,给研究提供了阔大空间。新世纪前相关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新世纪以来研究者在既有基础上努力开掘,收获颇丰。考察婚恋叙事模式,分析女性形象,阐释婚恋观和女性观,探究老舍文化心理构成及文化批判特点……抽样分析与散点透视并举,整体考察和具体分析交织,将老舍的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研究推向更广领域和更深层面。在此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新世纪以来老舍创作的婚恋叙事研究动向

中国现代文学的婚恋叙事是在个性解放思潮影响下开始的,老舍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编织出与五四文学新潮有颇多差异的婚恋模式。研究者将其置于五四文化和文学语境中分析考察,论及婚恋叙事的诸多项面。有的纵横结合做宏观的整体考察,有的抽象概括聚焦某种类型,有的择选作品进行具体分析,还有的在比较中阐释个性特点,选题立意、材料论述、背景参照和阐释评价各有蹊径,但通过研究突出叙事特点、探究价值意义和成因,藉此走进老舍创作和文化心理深处,则是比较常见的

作者简介:石兴泽,男,山东茌平人,山东省社会科学名家,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聊城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逻辑思路。

老舍创作的婚恋叙事丰富多彩,研究者归类概括,分析内涵特点,显示出刷新既往、整体把握的努力。《略论老舍笔下的婚恋描写》归纳了“发泄原始欲望型”“追逐升官发财型”“维护自身身份型”和“构建家庭模式型”^①等四种类型,囊括了老舍婚恋描写的绝大多数。《国民婚恋状态及其精神世界的重新映现:试论老舍小说的两性书写》也将婚恋叙事分作四种类型:“病态的爱情工具论”“传统知识分子‘士’的包办婚姻”“城市贫民的圣洁之爱”和“爱情理想范式:平等的‘革命+恋爱’”,类型“命名”显示出与上文不同的理论参照和阐释研判。而说“老舍通过对北京城里众多各阶层人物的两性书写,为我们了解中国三十年代国民婚恋状态和精神状态树立了一面镜子”^②,则道出了老舍“两性书写”的文学社会学价值。张小虎认为老舍笔下的婚恋模式有“物质利益享受型”“‘纳妾’维护身份型”和“传统家庭模式型”^③,概括或许不够齐全,但主要几种没有落下。张炜炜分析《四世同堂》的婚姻模式^④,归纳了四种类型,分别是“老中国儿女”的传统婚姻,如祁天佑夫妇、钱默吟夫妇、李四爷夫妇等;新时代的“旧派”婚姻,如瑞宣夫妇、小崔夫妇、长顺夫妇等;新时代的“自由”婚恋,如瑞丰夫妇、瑞全与招弟的恋爱,瑞全与高第的结合等;功利式婚姻的媾和,如大赤包与冠晓荷的财富交换式婚姻,招弟与李空山的欲望交易、胖菊子与蓝东阳的利益交换式婚姻等。文本选择和模式界定均显示出细敏的眼光——就老舍而言,《四世同堂》的婚恋叙事具有“百科全书”般的意义,论者概括齐全,分析到位。其所谓老舍婚姻模式具有“民间性”,评价不高但富有意味,值得深入研究。

老舍婚恋模式的成因探究和性价研判是众多研究者思路的自然伸延,但论述深浅不等,认知有所区别。如前,任梦华说老舍创作的几种婚恋模式都是“扭曲”的,而所以“扭曲”,源于老舍的婚恋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以及由此形成的悲观认识。他理想的婚恋女性是有经济基础的“贤淑宽容的女性”,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女性根本不存在,故中国的婚姻和恋爱是割裂的。张小虎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认为老舍“把爱情摒弃到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落”,虽则“扭曲”,但“展示了他对婚恋的深刻思考,同时也多少昭示了传统思想在他头脑中烙下的印痕”^⑤。“扭曲”是基于婚恋理想的表述。老舍是现实主义者,其婚姻理想是女性要符合结婚生子、柴米油盐的生活需求。对此,他显得有些理性和执著,其书写也高蹈不多少——张炜炜说老舍的婚姻模式具有“民间性”,道出了某种质性特征。

石秋仙分析老舍婚恋叙事看重他近十年的海外生活经历,说老舍对西方婚恋有较多了解,在中西比较中形成的婚恋观对创作产生了影响,“在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既保守又叛逆的婚姻观”^⑥。西方婚恋形态对老舍婚恋观及其书写有多大以及怎样的

① 参见任梦华:《略论老舍笔下的婚恋描写》,《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② 参见杨亚芳:《国民婚恋状态及其精神世界的重新映现:试论老舍小说的两性书写》,《南昌高专学报》2011年第1期。

③ 参见张小虎:《老舍、张爱玲小说婚恋模式对照及其探源》,《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④ 参见张炜炜:《〈四世同堂〉:老舍民间世界里的婚姻模式》,《名作欣赏》2006年第1期。

⑤ 参见张小虎:《老舍、张爱玲小说婚恋模式对照及其探源》,《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⑥ 参见石秋仙:《浅谈中西婚姻观对老舍作品的影响》,《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影响有待研究,但石文昭示了老舍婚恋叙事研究的另一思路:由婚恋叙事引申到对老舍婚恋观、伦理观的研判,由两性书写引申到对老舍文化心理及妇女解放问题思考的探究。这既是研究深化的表现,也是诸多研究者的追求。老舍婚恋叙事辐射无际,牵连着各种问题,从任何地方切入都会引发连锁反应,文学社会学研究更容易触及这个话题的核心区域。程丽红认为,老舍在此问题上的鲜明个性在于对当时文坛上流行的“冲出家庭——走向社会——实现爱情婚姻理想”的创作模式“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的审视态度”,他从全新的角度去写新与旧的冲突,写觉醒女性反叛后的悲惨遭遇、痛苦历程,显示出强烈的道德批判色彩。“老舍的价值不在于对‘妇女解放’、‘婚恋自由’进行指导性的探索,而在于他客观地揭示了现有秩序下女性真实处境,用真切的事实述说了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妇女解放’和‘婚恋自由’的实现不仅有赖于成熟的社会历史条件,还有赖于人的必要的精神素质”^①,这是有宽度的见解,很容易联想到鲁迅“娜拉走后”的思考。但老舍不是鲁迅,他对婚恋及女性问题有独到的认识。何云贵认为,老舍“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敏锐关注,对婚姻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及对性别压迫现象的尖锐批判和生动的文学表达,已达到了同时代其他作家所没有达到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其“对两性问题的思考既闪烁着五四启蒙主义的精神光芒,也包蕴着深刻的社会人类学的思想批判力量,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都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意义”^②。论者视野开阔,评价也显示出一定的理论高度。

老舍婚恋叙事研究隐含着“两难”:基于理论观察应该做出有高度的研判,但容易阐释过度,观点悬空;实事求是分析固然有说服力,但解读评判缺少高深度,显得寡淡。两者都为研究所忌惮,但多数研究者“宁高忌淡”,因为文章发表需要高深度。与某些虚高的过度阐释相比,如下研判似乎更接近老舍创作心理实际。《老舍笔下的封建婚姻模式及女性人格现象》分析“买卖婚姻”和“纳妾妾小”两种婚姻模式,直言老舍创作的男性中心观念^③。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无论分析婚恋叙事还是女性形象,都有不少研究者持这种意见,甚至直言其观念的传统性和保守性。《从女性形象看老舍的婚恋观》指出:“老舍一再强调贫穷没有爱情,爱情只产生在富贵之家,穷人们必须为生计奔波,贤妻良母是普通生活、普通家庭所必需的,这是生存的抉择。”^④他的婚恋观是世俗生活中男性话语的产物,“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也是为普通人准备的观念”,因而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⑤。“民间色彩”无关深刻锐利,但更属于老舍——前述张炜也持此说。曹书文则直言老舍婚恋叙事及女性意识存在“伦理观”局限,认为受传统伦理观念影响,老舍质疑自由恋爱,在传统妇女与知识女性之间厚此薄彼。这种局限“制约了老舍创作思想深度的超越,同时又影响着叙事态度上性别立场的传统选择”^⑥。这是值得

① 程丽红:《反映社会矛盾的深刻性和人性悲剧的真实性:谈老舍对妇女解放、婚恋自由的价值思考》,《松辽学刊》2000年第2期。

② 何云贵:《老舍小说中的“两性问题”》,《当代文坛》2016年第3期。

③ 罗雪松、区艳霞:《老舍笔下的封建婚姻模式及女性人格现象》,《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④ 钱晓红:《从女性形象看老舍的婚恋观》,《理论建设》2008年第2期。

⑤ 参见钱晓红:《从女性形象看老舍的婚恋观》,《理论建设》2008年第2期。

⑥ 曹书文:《论老舍文学创作中伦理观的历史局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讨论的话题,可惜跟者稀。

谢昭新兼顾理论和实际对老舍理想爱情叙事进行客观分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徘徊:论老舍小说的理想爱情叙事》的关键词有三:初恋情结和原型、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和理想爱情探寻。其中说,老舍将早年的初恋情结融入小说创作,以“传统”与“现代”的徘徊为中线,形成了一条理想爱情叙事线索。“早期三章”以爱情为“副线”完成了理想爱情的追求与消解,1930年代的“女性三部曲”是理想爱情毁灭的整体叙事。在他看来,老舍的理想爱情叙事始终围绕初恋“原型”展开,且将历史文化想象与现实批判精神结合起来。“他既没有完全书写女性对传统的叛逆、对禁忌的反抗,又没有作充分展示女性肉体 and 性心理的欲望化书写。他用女性追求个性、自由恋爱而最终发出的自我否定、自我悲叹,又消解了他在‘五四’时期所崇尚的个性解放思潮。”^① 谢文从老舍对传统“静美”的归恋、对个性主义的消解质疑出发探寻其爱情婚姻观念,指出“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既要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静美’、‘和谐’,又要在思想上作个性、自由之追求,但在行为方式上又不能太欲望化、西方化……这就是老舍爱情婚姻观念的东方乌托邦”^②。三个关键词和具体论述,均显示出分析概括的全面、系统和深度,而“中线”“徘徊”等尤其值得重视。

老舍的婚恋叙事是直面现实还是基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而“扭曲”?是老舍思想和创作的局限性还是深刻理性?如何研判其“民间色彩”?老舍的婚恋观是“保守”“传统”还是比起同时代的描写“格调更高”?阐释和评价见仁见智,出发点和观察镜不同,分析评价也不相同。出现差异可以争论商榷,在争论辩难中深化认识,寻求接近鹄的的途径。但老舍研究缺少商榷论争的学术风气,虽然在很多问题上出现过分歧,但很少正面的商榷和激烈的争论,多数情况是自说自话,即使有意识地“修正”别人的见解也显得“含蓄委婉”。中国老舍研究界没有其他领域常见的学术内外的矛盾纠纷,业内人士恒引以自豪;但没有争论商榷也会影响向前推进的契机和动力。老舍创作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虽然有逼近深层的认识,但终究没有得到有深度和创获的开掘,与缺乏论争不无关系。

二、新世纪以来老舍创作的女性形象研究动向

老舍说他“怕写女性”,但文学的“人学”性质和婚恋叙事的基本建构决定了他绕不开女性。几笔尝试之后,索性放开来写,甚至用女性的口吻叙述女性生活及其心理世界。女性形象是老舍人物画舫的主要构成部分,其成员遍及社会尤其是京华市民社会的各个阶层——老太太,小媳妇,女学生,说书的,唱戏的,娼妓,贵妇人,官太太,逃难女,童养媳,家庭妇女,茶馆招待,售货员,女代表……据统计,各类女性形象二百多个,占老舍塑造的所有人物形象的五分之二强。庞大而复杂的女性群像关乎着老舍文学世界的风格特色,影响着创作质地和成败得失。从朱自清、李长之开始,中经 1950

^① 谢昭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徘徊:论老舍小说的理想爱情叙事》,《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② 谢昭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徘徊:论老舍小说的理想爱情叙事》,《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年代再到新时期,众多研究者进入这个多彩世界,或者分析个体形象的性格特征,或者分类考察发掘社会文化内涵,或者整体研究进而探究老舍创作及思想个性,取得了丰硕成果,也垫高了新世纪研究的门槛。新世纪研究者在新的学术文化语境中解读,其研判,既有对前研究的刷新和颠覆,也有故作惊人的拾晒牙慧。下面拟分整体、类别和个体三种研究情况进行考察。

面对庞杂的女性群体,整体研究是有难度的选题。知难而“选”需要勇气,整体研判缺少策略,但困于选题只好冒险。《从女性形像塑造看老舍文化心理的传统走向》将女性形象分为“家庭独裁者”“风尘女子”“普通老太太”“贤妻良母”“有知识的摩登女性”等五种类型,对各类女性的生活、思想、家庭(社会)地位及其命运进行具体分析,指出老舍赞赏“贤妻良母”,同情风尘女子,理解守旧的普通老太太,而对“家庭独裁者”和摩登的知识女性表现出极大厌恶。他虽然深受现代文化和文明影响,但从女性形象塑造看,其文化心理的许多方面停留在传统层面,“无论情感倾向还是思想认同都缺乏明显的现代内容,都散发出浓厚的传统气息”^①。五种类型几乎囊括了女性形象全部,虽然缺乏足够的研判深度,但类型划分和论述均产生了较广影响。其后的研究虽有“选象”、切口、命名和研判的差异,但思路框架大致相同。

整体研究有难度,具体分析“不过瘾”,遂有类别研究、散点透视、阶段性考察等“次”整体研究。类别分小说和戏剧,后者中的女性形象常被忽略,新世纪其被推到前台,聚焦审视,意味着老舍研究触角伸向更宽广的领域。杨启平分析《残雾》中的冼老太太、《龙须沟》中的王大妈和《红大院》的方大妈,说她们反映了老舍女性意识的发展变化以及“对新社会兴奋的期待”^②。《论老舍抗战话剧中的“女性出走”模式》聚焦“上层官太太”和“下层劳动妇女”两类形象,说前者恪守传统的封建家庭习俗,是“被物质化”的新时代旧女性;后者是勇于反抗的新女性,她们有独立意识,敢于冲破封建习俗,“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表现出可贵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意识。老舍歌颂了下层“出走”女性,表现了新的女性观^③。“出走”女性是老舍女性形象群落中的“另类”,唯民族生死存亡背景中的“出走”才赢得他的同情和赞美;其所表现的新的女性观虽然延续到1950年代,塑造了数量可观的社会女性,但她们的自我意识比较浅简,既非老舍女性形象的翘楚,也非女性意识的深层表现。这类形象值得研究,但阐释评价不宜过满过高。

比较而言,老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更引人注目。分类考察是常规性选题,借此探究老舍女性意识则是比较普遍的逻辑思路。《男权世界中的女性命运:解读老舍早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认为,老舍早期小说塑造了四种女性形象:忍辱负重而难逃厄运的女性、强悍粗暴无法主宰命运的女性、在传统意识和个性解放之间挣扎的女性及冲破传统枷锁却找不到出路的新女性^④。张炜炜分析“传统女

① 参见石兴泽:《从女性形像塑造看老舍文化心理的传统走向》,《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② 参见[马来西亚]杨启平:《老太太构图:老舍剧作中女性意识衍化探微》,《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③ 参见孟蛟:《论老舍抗战话剧中的“女性出走”模式》,《戏剧之家》2016年第3期(下)。

④ 参见马双:《男权世界中的女性命运:解读老舍早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性”“知识女性”和“悍妇”三个形象类别,指出老舍赞颂了传统女性善良、柔韧的品格,但对她们的因循守旧等落后思想进行批判;肯定知识女性追求身心自由的精神,但对她们追求享受和放纵的行为给予无情鞭挞;认同悍妇的生命欲求和为争取自己利益而做出的努力,但对她们贪欲予以批判^①。张金凤认为老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承载着批判传统文化、暴露国民劣根性的丰富内涵,显示出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老舍的文化心理倾向——“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尤其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西方文化的怀疑和排斥”^②。张治安考察老舍塑造女性形象的艺术策略,概括了“与时代风云的密切联系、丰富复杂的性格内涵、人物出场的对照模式”等三大基本特征^③,算得上有新意的探寻。

老舍塑造的女性形象中,关注度较高的是传统女性和“家庭独裁者”,尤其是后者,因为性情泼悍而“雄立”家庭,因性格鲜明而“魔力”四射,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罗惜春“泛论”泼妇,说她们“丑陋、贪图享受、性格粗暴而又妖媚惑众”,缺少传统女性的柔美和娇艳,有时“像男子一般的强悍”。老舍对这类形象深感厌恶,嘲讽挖苦乃至否定,从而显示出男权中心的传统文化心理^④。李珍由虎妞论及大赤包、“柳屯的”,她们的身份教养有别,撒泼的形式和原因不同,但都“强悍,凌驾于男人之上”,也都透露出老舍的“男权意识”^⑤。《老舍作品中“悍妇”形象的创作心理探析》认为,“悍妇”形象在老舍小说世界中“占有独特而光辉的艺术地位”——这是符合老舍创作实际的说法;而“老舍先生对于传统文化的恪守以及精神上的失衡和追求是其创作‘悍妇’形象的重要心理动因”则具有启示意义^⑥。“选象”和切口有异,分析评价大致相同,既源于这类形象特点突出、老舍情感倾向鲜明,也与诸论相因、创意匮乏有关。

在老舍塑造的悍妇形象中,虎妞的关注度最高。新世纪前就有专文分析,且因聚讼纷纭影响老舍研究内外,新世纪以来关注度仍居高不下,但研判趋于平静。与前相比,区别在于理解之论渐众,既对虎妞表示理解,也对老舍的审美创造心理给予理解,理由是虎妞的所欲所求是正常的,老舍那样写她没有明显的“男权痕迹”。陈思和认为,虎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有光彩的形象。她没有经过男性眼光的过滤,是一个血肉分明、活力四射的生命的原生态”^⑦。冯庆堂发挥了这一观点,结合虎妞论述老舍女性观的“两难”,很多见解迥异于以前。如说“虎妞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另类,这一形象体现了对男权意识的挑战和反叛,是对男权意识重压下女性地位的颠覆和超越”^⑧;虎妞“没有美丽的容貌,也没有温柔、贤惠的性格,但她却有男性的阳刚美。她身材高大而粗壮有力、聪明智慧、泼辣大胆、

① 参见张炜炜:《论老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② 参见张金凤:《老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甘肃科技信息》2013年第5期。

③ 参见张治安:《京华烟云里的市民女性群像:老舍小说构建的女性世界探微》,《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④ 参见罗惜春:《试论老舍小说中的泼妇形象》,《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⑤ 参见李珍:《老舍笔下泼妇形象谈:从虎妞说起》,《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⑥ 参见贺雨涵:《老舍作品中“悍妇”形象的创作心理探析》,《晋中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⑦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⑧ 冯庆堂:《从虎妞的颠覆性看老舍女性观的两难》,《社科纵横》2009年第4期。

遇事果断。她有女性少有的侠义之美。她有卓越的管理才能和非凡的领导能力。她对爱情积极主动,体现了两性平等意识”^①;“虎妞是集恶妇、伟男子、传统女性、现代女性于一身的复杂混合体”,“老舍先生也许是在无意之中写出了虎妞形象的悖论:古典美与现代美的冲突,温柔美与阳刚美的矛盾”^②;虎妞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她是一个大写的立体人,写出了人的复杂性……”^③。其论述,超出了老舍的审美情感认知,也颠覆了学界多年形成的研判认知。

老舍创造的女性形象中,与悍妇“媲美”争辉的是传统女性。这是老舍倾情塑造的形象,也是老舍艺术世界极富魅力的存在,但分析评价既不如“悍妇”热烈有深度,也不如“新女性”受关注。新世纪前后均然。抛开散见于著作中的论述,专门的研究文章只有《老舍笔下优秀传统女性形象之现实意义》^④和《论老舍笔下的传统女性形象》^⑤两篇,且稍显简单粗疏。“新女性”指老舍创作中的“摩登女性”“知识女性”以及有人生觉悟、曾经追求爱情、向往自由、试图决定自己命运的女性,老舍不太欣赏她们的觉悟和追求,但投入了较多笔墨,确有引人注目处。《论老舍小说中新女性形象缺失的原委》按说属于“伪问题”——既然存在就无所谓“缺失”;所谓“缺失”其实是指老舍的肯定性描写。在老舍塑造的女性世界里,“家庭独裁者”“有知识的摩登女性”“家庭老太太”“风尘女子”“传统女性”出风头占上风,“有人生觉悟”的女性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还没走几步就遭遇打击,跌进命运低谷,多数沦为风尘女子。她们的人生是两截的,出场是“新女性”,受挫后沦为“旧女性”。老舍的笔墨集中在沉沦后,其悲惨命运掩盖了新生活追求,且悲剧命运源于觉醒后的冒险追求。这样写源于老舍女性意识的传统性,很容易给人以新女性“缺失”的错觉。论者探讨“缺失原委”,认为“这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切入社会人生的方式以及主体的情感体验与怀旧情愫所导致的特殊审美心理有关”^⑥。概括显示出阅读的深切和思考的全面,具体论述也透着严实周密。其中说:“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偏好,老舍尤为突出,在传统与现代的取舍之间,在新女性和旧女性的情感认同上,老舍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有着明显的不同。他看到了传统文化中的腐败,又对其留念不已,他热情拥抱‘五四’,向往现代文明,又对西方文化心存戒备。过于现实的思维方式和特殊的审美心理,决定老舍最终成不了时代的先锋。新女性形象的缺失,不免留下了一些遗憾,但它却在意外中为我们打开一扇窗户,为我们能够透视作者心灵深处提供了一种媒介。”^⑦——应该说,这是有新意和深度的阐释。

整体上看,老舍创作的女性形象研究不温不火。数量不少,但创新者稀,文章的切口、材料和题目有差别,而思路、阐释和判断无大异。众声喧哗般的陈因,乃“泛学术”时代的投影。

① 冯庆堂:《从虎妞的颠覆性看老舍女性观的两难》,《社科纵横》2009年第4期。

② 冯庆堂:《从虎妞的颠覆性看老舍女性观的两难》,《社科纵横》2009年第4期。

③ 冯庆堂:《从虎妞的颠覆性看老舍女性观的两难》,《社科纵横》2009年第4期。

④ 杨丽彬、张宏武:《老舍笔下优秀传统女性形象之现实意义》,《科技视界》2017年第6期。

⑤ 王星:《论老舍笔下的传统女性形象》,《湘潮》(下半月)2011年第2期。

⑥ 王永兵:《论老舍小说中新女性形象缺失的原委》,《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⑦ 王永兵:《论老舍小说中新女性形象缺失的原委》,《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三、新世纪以来老舍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的文化心理研究动向

老舍研究走到新世纪,多数研究笔触不再止步于对老舍婚恋题材处理和女性形象塑造的论析,有的将思路延至老舍的人道主义情怀,更多研究者将目光转向老舍创作心理。婚恋叙事和女性形象被视为载体,研究者探究其承载的内涵,并且“由文及人”探究老舍的文化心理。

借助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探究老舍创作的文学社会学意义,是研究思维推进的必然程序,女性形象研究中这个程序占位更突出。如《悲剧的女性与女性的悲剧:兼论老舍的三篇小说》分析《月牙儿》《也是三角》和《柳家大院》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悲剧命运,肯定了老舍对黑暗世界的揭露和对下层女性的深切同情^①。《走向毁灭的女性:老舍小说女性命运探寻》说老舍描写善良女性的毁灭是对“社会存在进行批判性认识和否定性评价”^②。《论老舍小说中女性的悲剧命运》分析两千年古老中国铸造出的“老中国的女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受时代浪潮熏染的“新女性”和“出身剥削阶级和上层社会的女性”,认为老舍通过她们的命运遭际“生动揭示了那个黑暗而畸形的社会荼毒和摧残妇女的罪恶本质,引发了人们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思考”^③。有些文章题目就显示出从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推进”到文学社会学意义阐释的意图。如《简论老舍女性观的时代精神》认为老舍对女性命运的展示和女性心理的深入挖掘,抨击了封建伦理意识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意在“唤醒女性‘人性’的复归和人的意识的张扬”^④。《倾斜的天平:试论老舍笔下女性形象自我意识与他物意识的失衡》则借助叔本华的“自我意识与他物意识”理论,将老舍笔下的女性形象分为“自我意识屈从于他物意识”“自我意识扭曲、膨胀凌驾于他物意识”“自我意识消融于他物意识”等三种类型^⑤,归类有新意。按照叔氏理论,自我意识和他物意识平衡人的精神层面方才处于稳态,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女性荷载的道德、世俗、伦理的压力使其人之为人的自我意识萎缩、消亡,即使偶尔泛起星火,也被社会习惯势力所吞没”,“自我意识与他物意识的失衡使其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怪圈中备受蹂躏、挤压的畸形儿”,她们无一例外地走向悲惨的结局。老舍以饱含血泪的笔触塑造了众多旧中国女性形象,将批判笔锋“指向了文化过熟的生存环境中中国人的精神层面”^⑥。

考察老舍的女性意识/女性观,也是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研究的必然程序,前述相关研究多数包含着这个程序;在此要说的是,有的标题便显示出“从女性形像塑造看老舍女性意识”的意图,而探究老舍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对西方个性主义思想的审慎所表现的女性意识,既是题中应有之

① 参见李广琼:《悲剧的女性与女性的悲剧:兼论老舍的三篇小说》,《怀化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② 参见韦易:《走向毁灭的女性:老舍小说女性命运探寻》,《职大学报》2011年第2期。

③ 参见温蕾:《论老舍小说中女性的悲剧命运》,《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④ 参见柏文猛:《简论老舍女性观的时代精神》,《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⑤ 参见余国秀:《倾斜的天平:试论老舍笔下女性形象自我意识与他物意识的失衡》,《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⑥ 参见余国秀:《倾斜的天平:试论老舍笔下女性形象自我意识与他物意识的失衡》,《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义,也是思维逻辑的自然推进。即使在“原型”研究中也要“拐进”这个程序,探究老舍的女性观。如王体辉在考察老舍女性形象的现实原型后说:“老舍在对符合传统道德伦理规范的理想女性的赞美中体现了相对保守的女性观,但又认为女性不仅应对家庭承担责任,对国家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在对传统女性进行赞扬的同时,又因为她们不能摆脱封建旧观念而给她们安排了悲惨的命运;对于知识女性,老舍期望她们独立坚强,并看到她们人性的觉醒,对她们觉醒后毫无出路的迷茫彷徨表示嘲讽。”^① 据此指出:“老舍的女性观具有传统与现代兼具的特点,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相碰撞造成了老舍女性形象塑造矛盾的现象。老舍女性形象的塑造对于挖掘那个时期女性的深层心理具有重要意义,在对传统美德真诚的赞美中,暴露出封建制度对于女性的压制与奴役,他对施暴女性与新女性追求独立自由的辛辣的嘲讽,也会引发如今我们对于女性出路新的理性思考。”^②

从某种程度上说,从文本到人本,通过女性形象考察老舍的女性意识是众多研究者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在此类研究中,分析形成原因,研判长短得失,体现着新世纪以来老舍研究的深度和研究者的学术理性。我们拟对直接剖析老舍的思想倾向和女性意识者略作考察。

先看具体作品分析。《女性浪漫神话的颠覆与衍异:试论老舍小说〈月牙儿〉中的女性意识》认为,老舍以女性视角的叙述“对千百年传统的女性浪漫神话进行了颠覆”,表现出的“另类女性意识”便是“对整个男性中心主义等级专制制度的挑衅”^③。但怎样颠覆又如何挑衅?尚需更有说服力的论述。《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意识:老舍〈月牙儿〉与〈阳光〉又解》则认为,两部作品均系“男性话语”的产物。“老舍潜在的男性视角与市民阶层功利的生存观,使其体现出的愤世嫉俗心态,无法从根本上与故事中主人公女性的心理体验在深层次上达成共识。”两作品“在其表面的现代意味的叙述模式下,所表现的精神却更接近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男性文化教育的心态”;“女性的生存只是吃饭前提下的交易买卖,爱情和浪漫是本能的伪善的代名词,女性的自我实现及价值意义也就只是通过性别特征换取生存权利”^④。——话说得有些重,分析有待加强。《从〈四世同堂〉的女性形象看老舍文化选择的多样性》指出:“对韵梅等一类贤妻良母型妇女与大赤包一类家庭恶毒型妇女形象的态度,折射出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对胖菊、招第等摩登女性的嘲讽,表现出老舍对外来资本主义文化的怀疑与排拒;而对日本老太太的描写反映出老舍文化选择的开放性与世界性。”^⑤——《四世同堂》的女性形象的确显示了老舍文化选择的多样性,但说老舍“对韵梅等一类贤妻良母型妇女……折射出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却值得商榷。事实上,老舍对“韵梅类”和“大赤包类”的态度及折射的文化心理迥然有别——对后者及其折射的文化是扬弃,对前者及其折射内容却欣赏有加,即

① 王体辉:《浅谈老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现实原型》,《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5年第5期。

② 王体辉:《浅谈老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现实原型》,《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5年第5期。

③ 参见郭文元:《女性浪漫神话的颠覆与衍异:试论老舍小说〈月牙儿〉中的女性意识》,《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④ 参见甘春枝:《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意识:老舍〈月牙儿〉与〈阳光〉又解》,《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⑤ 孙颖:《从〈四世同堂〉的女性形象看老舍文化选择的多样性》,《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便是对其所表现的传统文化内容有所批判,也不可与后者同日而语。

再看综合性论述。荆云波和罗惜春都指向老舍创作的女性观。前者认为老舍用许多女性的悲剧表达了他的女性观,“一方面他对男权至上的传统伦理道德给予了痛击和嘲讽,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因袭也使老舍思想中自觉不自觉地残存着男权意识。在妇女解放问题上,老舍有着自己独特的理性思考,女性要获得独立与解放,不仅应克服自身弱点,还应与社会进步一起考虑,盲目趋从时尚,只会酿成更大悲剧”^①。后者说老舍同情妇女,却没有摆脱旧观念,其思想深处的小市民意识和生活信条“使他认为妇女应该担负起家庭的责任”,他过多地强调了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义务,而对她们“作为‘人’的自我权利却无形中被埋没”;“在女性角色的塑造上,老舍有时还是无法达到对内自审的客观”,其传统女性意识“比同期的现代作家们要厚重得多”^②。两者所言略有差异,但“残存”也好,“没有摆脱”也罢,都是说老舍女性观有守旧意识,也都符合老舍文化心理实际。

王俊虎凭借对老舍创作的深入研究撰写了两篇探讨老舍女性意识的文章。《老舍文学创作中的女性观》分析老舍对旧中国妇女悲剧命运的思考,指出“在绝大多数作家为中国妇女在20世纪初接受西方新思潮熏陶而欢呼雀跃之际,老舍以自己如椽巨笔写下了自己对中国女性的冷静思考,尤其对西方自由、民主能否短时期内在中国扎根结果表示出深深的怀疑,同时对西方文明裹挟下的思想糟粕有着先验的忧虑,这是老舍关于新潮女性艺术形象塑造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③。《论老舍文学创作中的男性视角》从女性形象塑造中读出“隐匿在老舍文学作品深处的男性视角和男性中心主义立场”,并且指出“视角”和“立场”形成的原因有“老北平传统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独特生活经历的深刻影响”“生活环境的局限性”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相对隔绝”等几个方面^④。知识丰富,思考全面,但需进一步探究:诸多因素谁主沉浮?老舍的男性中心立场是否有发展变化?论者面对的是老舍创作整体,长达四十余年,涵盖前后两个迥然相异的时期,在此期间,他的“视角”和“立场”以及致因机制都有明显变化,即便是横向论述也应该注意这个重要事实,从而给予客观准确的研判。

《从老舍小说女性形象分析其女性观的“现代内容”》明显带有争鸣和商榷之意,表现出拒绝平庸、标新立异的勇气。在论者看来,多数研究者认为老舍的女性观“始终停留在封建传统的市民社会层面上”,对其现代内容忽略不提。她认同老舍塑造女性形象是“从传统伦理角度出发”,但主旨则是说“从传统伦理角度出发”并不意味着“老舍的女性观念没有‘现代内容’”。她对“风尘女子、悍妇、贤妻良母、摩登女子”等四类女性进行具体分析,发掘她们身上“体现出的老舍女性观的‘现代内容’”,表现出知难奋进的艰辛,但也达到了预期效果——“现代内容”在各类形象分析中均得到正面阐释。譬如,老舍同情风尘女子意在“唤醒女性‘人性’的复归”,彰显了“老舍女性观的‘五四’时代精神”;《月牙儿》中女主人公的向往和追求表现了“现代女性所具备的特征”;“悍妇”如虎妞身上有“现

① 荆云波:《老舍小说创作的女性观》,《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② 参见罗惜春:《从老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探讨其女性观》,《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③ 王俊虎:《老舍文学创作中的女性观》,《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④ 参见王俊虎:《论老舍文学创作中的男性视角》,《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代美的特征”；老舍在贤妻良母塑造中体现了男女平等；摩登女子虽非现代女性，也从反面说明老舍女性意识的现代内容。“总之，不论是描写哪种类型的女性，老舍都是从传统伦理角度入手的，但在其文章的字里行间中，却时时体现着老舍女性观的现代内容。”^①老舍是现代作家，女性形象塑造中当然包含着现代内容——对此，学界并无多少异议，关注度不够的是“现代内容”在创作中的表现。论者对此做了强调分析，显示出挑战定论的勇气，但阐述的艰难和强硬也清晰可感——“定论”基础的坚实要求“推翻”研究有更宏大的理论视野和知识力量。

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是老舍艺术世界富有魅力的内容，也是最能体现老舍创作个性特点、表现文化心理和显示生命本真的话题之一，对其进行探究有助于深化对老舍的认识。新世纪相关研究有不少收获，但还存在“再深化”的空间。

四、结语

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是老舍创作的“核心区”内容，几乎关联了他创作的所有方面和层面，相关研究虽有选题疆界限制，但话题本身的辐射性和包容性决定了论述的开放性和杂乱性。上述几方面是简单而拘谨的分类考察，限于分类标准，有些研究无法进入考察视野；有些成果，虽系“类外”，却因选题新异、阐释带有创新性值得特别注意——丰富了以往研究成果，更启示着未来研究的思路乃至出路。

先看两篇讨论“性别”问题的文章。张逸颀认为《离婚》中隐含着老舍的性别立场——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婚恋叙事分析还是女性形象研究都论及性别“立场”问题，而“男权意识”“男性话语”以及观念保守似乎是比较一致的认知。论者运用性别理论进行分析，得出与之前不尽相同的结论，“即隐含作者并不能定性为男性中心立场，因为在小说文本中其立场处于摇摆和变动之中，而非恒定的状态”。作者认为，文本分析既要摒弃静止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不能以对男性或女性关怀的“量”的多少作为衡量标准，而是要“关注其变动的可能性以及变化的过程”。通过分析，论者提出《离婚》隐含的作者性别立场既非“男性中心”也非“女性中心”，而是“无中心”^②。“无中心”反映了老舍叙事立场的游移，表现了复杂矛盾的性别心理，较之传统守旧及其辩难也许更接近老舍性别立场的实情。刘鸣讨论男性人物和男权话语也属于“性别”研究，他分析指出“男性在压迫女性的同时其实也不能幸免于等级制内部的压迫和损害。在男人压迫女人之上，两性有着共同的敌人——父权制——等级制压迫，这才是我们需要继续加以追问的所在”^③。固然如是，但窃以为论者对所谈问题作了“普泛化”理解。老舍创作中的夫妻关系，男性常常是“受压迫者”，如柳屯的、牛太太、虎妞、大赤包、胖菊就

① 参见郭凤萍：《从老舍小说女性形象分析其女性观的“现代内容”》，《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年第9期。

② 参见张逸颀：《男性中心？女性中心？——对老舍〈离婚〉中隐含作者性别立场的再探讨》，《襄樊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③ 刘鸣：《灵与肉的叛离：老舍笔下的男性人物和性别话语》，《职大学报》2016年第3期。

是地道的“压迫者”，在她们压迫下男人们窝窝囊囊地活着。“阴盛阳衰”虽不普遍，却是很重要组合模式，是老舍创作中值得思考的问题。老舍并非逆向思维严重的作家，却是创新意识很强的作家；独特的生活体验成就了创作个性，他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简单地写“男人压迫女人”，也没有随和流行的观念写女性在男性压迫下悲惨地活着，进而抨击男权社会，对女性进行启蒙。老舍创作中虽有男强女弱的夫妻组合，有男人压迫女人的描写，但这不是他的创作特色和独特贡献，即便是用来作为核心证据的《离婚》，也少见“压迫女人”的男人，更缺少受男人压迫无法生活的女人。“男权话语”在老舍那里是独特而复杂的问题，选题立论应该从创作实际出发。

再看探讨“生育”和“互文”叙事的文章。郭聪的《论老舍小说的生育叙事》选题颇有新意。所谓生育叙事，既指涉女性“生育”书写，也包括对生育现象背后社会文化问题及生育主体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生育’是一个有价值的窗口，它蕴含着对女性、传统，甚至是家国的态度与思考。通过‘生育’叙事，我们可以于细微之处了解并体认一个立体多面的老舍。”^①基于此，文章分析《骆驼祥子》《鼓书艺人》《四世同堂》《我这一辈子》《抱孙》《生灭》《一筒炮台烟》等与生育相关的书写，说老舍把“生育”当作重要关口和试剂，推动情节发展，考验人物灵魂，既是艺术策略，也是民族性格和文化审视的需要。生育关乎生死，其背后是别具一格的文化启蒙，堪称认识老舍的“好望角”。易华考察《月牙儿》《阳光》的互文叙事和老舍小说的女性构建，认为两作品具有深密的“互文关系”。老舍“在互文叙事中共同构建出作者所理解的‘女性类型’与‘女性世界’，以及女性在两个世界中的三重‘抗争’形态”，并且据此探讨“对人的生存、发展及自由等根本性问题思考，以及女性在男性中心社会中的必然选择”^②。《月牙儿》与《阳光》是老舍十分看重的两部作品，所写女性生活在贫富两个不同的场域，反映了老舍女性思考的全面性。互文是老舍创作中常见的现象，出现在相同或者不同的体裁中，出现在不同时段创作中，细密梳理可以看到老舍创作思维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也可以从重复和变化中考察老舍思想和艺术追求的发展变化，从而达到对老舍创作心理的深层认识。这是一个空间宽阔的研究区域，需要丰富的知识和细心的研读。

同样有偌大研究空间的是“原型”研究。较早进入这个空间的是柳一斌，其《难逃的劫数：老舍小说中少女命运主体探源》结合老舍早年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分析少女形象及其命运，解析她们境遇不同而性格和命运相似的原因，探究“原型”具有可信性^③。前述谢昭新论述老舍的理想爱情叙事也含有“原型”研究的成分。王体辉对老舍小说中的女性原型做了较为全面的探究。“原型”研究于新世纪前后引介到中国学术界进而成为热点，其实也是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乾嘉学派热衷于此，索隐派走进死胡同受到非议，但既然成为“显学”就有其合理性。作家创作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原型”发挥着很大作用，很多描写都有作家身影和现实依据，不仅启发研究者“按图索骥”从文本看人

① 郭聪：《论老舍小说的生育叙事》，《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② 易华：《互文叙事与老舍小说中的女性构建：以〈月牙儿〉〈阳光〉为例》，《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③ 参见柳一斌：《难逃的劫数：老舍小说中少女命运主体探源》，《大众文艺》2010年第15期。

本,而且扩展开去形成“以文治史”传统,直到现代仍有学者“以文解史”并取得卓异成就。但新世纪前后兴起的“原型”研究源于国外理论和方法的引介,这既是中国学术传统的悲哀,也是治中国现代文学者国学知识短缺和崇洋心理作祟。老舍笔下的女性形象很多有现实生活的影子,这为“原型”研究夯实了基础。王文用“原型”理论和方法考索,将老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划分四类:“源于现实生活中母亲、大姐的贤妻良母型”“源于姑母、大姐婆婆的悍妇型”“源于初恋刘小姐的沦落风尘型”和“源于发妻胡絮青和红颜知己赵清阁的新女性型”。对号解读或许有些“冒险”,但“对于解读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系列以及老舍女性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①却是无异议的。

几篇文章论及几个重要话题——“原型”“性别”“互文”“生育”等,意味着老舍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其无法归类,或者因“跟进者”稀,还没有成“类”,或许考察分类存在问题。新话题迭次出现说明,老舍研究——不止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研究,整个老舍研究都存在海阔的挖掘空间。几篇论文或许存在问题,如作家研究从文本出发还是从理论和问题出发?传统理论方法如何运用和继承?都值得认真思考和重视。而拒绝“泛学术”风气侵袭,深切阅读、敏于发现和求真创新,更是未来研究不可稀缺的。

责任编辑:冯济平

Study on the Trends of Research on Lao She's Love and Marriage Narrative and Female Images since the New Century

Shi Xingz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Lao She's love and marriage narrative and female image creation have been the important subjects of research on Lao She since the new century. An investigation is made of the types and connotation of love and marriage from "folk", "traditional" and "sober rationality" perspectives. An analysis is made of all kinds of female images, with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shrews, especially Tigress in *Rickshaw Boy*. Starting from the narrative of love and marriage and female imag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vealed cultural and sociological connotation, probes into the traditional tendency and male power consciousness of Lao She's view of love and marriage and females, refreshes and even deepens previous understandings, and expands the research space. In the "pan-academic" era, it is difficult to avoid the repetition of some discussion that has been done before. The study on Lao She's love and marriage narrative and female image creation reveals a lot of information worth noting in the study of Lao She in the new century and even in tha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Lao She's creation; love and marriage narrative; female image; research review

^① 参见王体辉:《浅谈老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现实原型》,《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5年第5期。

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

杨 超 高

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 乡土小说与传奇的关系素来密切,新世纪以来更形成一种传奇叙事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它们较多运用巧合、偶然与神秘因素,或“超现实”的叙事方法,由此书写个人传奇、“怪力乱神”以及其他“陌生化”的传奇内容。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缘于小说、乡土与传奇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与近年来的文学、文化环境以及乡土现实书写的困境有关。传奇叙事可以增强乡土小说的故事性,开拓乡土书写与现实主义的边界;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最主要就是过分追求传奇效果,导致故事情节失实与人物形象失真,同时,在情感与思想表达方面也有所欠缺。

关键词: 传奇叙事; 乡土小说; 现实主义;《山本》;《文城》;《金谷银山》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2-0039-09

传奇是一个意旨丰富的概念。从字义上理解,“传”是传录的意思;“奇”意为奇特、怪异,代指奇闻异事怪谈。“传奇”也就是对奇闻异事怪谈的传录。从文学的角度看,传奇也特指一种小说文体,它发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又以“唐传奇”为典型形态,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作意好奇”。当然,在今天,传奇的概念进一步泛化,还可以包括那些情节曲折离奇或人物行为、命运极不寻常的故事。实际上,传奇不仅属于中国古典小说的一脉,而且它在中国新文学、尤其是乡土小说中也相当常见。

一、20世纪乡土小说传奇叙事的演变

乡土小说与传奇的关系素来密切。这种关系,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虽然新文学反对通俗文学过分追求娱乐性、传奇性(如言情、狭邪、黑幕、冒险、侦探、武侠等类型小说),但传奇在新文学中依然可见,并以“转型”的方式融入新形态的近现代小说^①。比如《狂人日记》通过“狂人”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关于“吃人”的故事;《阿Q正传》以“传记”体形式来塑造人物,写出了阿Q既悲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乡土小说中的科技书写与现代想象研究”(22CZW052)的阶段
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超高,男,江西抚州人,文学博士,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 薛洪勳:《传奇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67页。

剧又传奇的人生。稍后的“五四”乡土小说也是如此,尤其是《柚子》《菊英的出嫁》《赌徒吉顺》《水葬》《惨雾》等作品,写到杀头、冥婚、典妻、“水葬”与械斗等内容,这些作品因为极不寻常的故事与浓郁的地域特色而具备传奇色彩。

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在1930年代以后继续发展,但也开始分化。一方面是以左翼乡土小说为代表,初步展现出“革命之传奇”。一些作品(如蒋光慈的革命小说)直接写到了革命的血腥与暴力,也有部分作品(如茅盾的《虹》、丁玲的《韦护》)将革命与爱情结合,表现出别样的革命传奇;另一方面,以废名、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乡土小说为代表,如《竹林的故事》《边城》等。它们呈现出来的传奇不是革命式的暴风骤雨,而是宁静的、优美的,有东方传奇的神韵。特别是《边城》,建构了一个“桃花源”式的乡土社会,表现了一种自然却不寻常的人生形式与生命传奇。

传奇叙事在当代乡土小说中也很明显。“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如《红旗谱》《苦菜花》)将“革命传奇”演绎得淋漓尽致。它们写到了农民的觉醒与反抗,从受压迫到发动暴动、走向革命,不少作品还流露出浪漫主义情绪。此外,一些现实题材农村小说也展现出“英雄传奇”的特征,如《创业史》《三里湾》《山乡巨变》,就兼具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特征,表现出如火如荼的合作化运动以及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人物塑造方面,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性格鲜明,小说主人公也常常被塑造为英雄传奇人物。

如果说“十七年”小说的传奇叙事表现为革命化、英雄化,那么,新时期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则是民间的、小人物的。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活着》,这两部作品的故事线索都比较简单,但情节非常曲折,在极致的苦难书写中,给小说人物(及其命运)染上了相当传奇的色彩。又如莫言,他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塑造了余占鳌、上官鲁氏、司马库这样的民间传奇人物,通过“一幕幕英勇悲歌的舞剧”演绎出雄强的生命原力。同样是写苦难与生命,阎连科更倾向于寓言化写作,比如他的《日光流年》就写到一个村庄的几代人为了能活过四十岁而做的种种努力(即便是荒唐的),这实际上是将人置于宿命或绝境之中,在日光流年中演绎生命的极限,构成了一种悲壮的传奇。

乡土传奇叙事作为群体或现象出现的,则以寻根文学为代表,还兼及新写实小说与1990年代以来的“乡下人进城”书写。其中,寻根文学执意寻找民族文化之根,因而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如有论述:“‘寻根文学’往往会将故事设定在一个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背景中,那些独特的地方风情、风俗习惯、生活样貌,以及当地人的思维方式、精神信仰,再加上流传于当地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等,都会给读者带来新鲜而奇特的阅读体验。”^①稍晚出现的“新写实”乡土小说亦是如此。虽然“新写实”主张回到日常生活,书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放弃了“传奇”,相反,“新写实”非常注重小说的故事性,而跌宕起伏的故事又正合“传奇”的本义,比如刘恒的《狗日的粮食》、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就很接近民间传奇故事。1990年代还存在“乡下人进城”的叙事潮流,主要表现进城农民(尤其是女性)的生存之难乃至无奈堕落,就整体而言,它们呈现出“底层叙事”“伤痕叙事”乃至“怨恨叙事”的特征,在关注进城农民的生存困境的同时,也暴露出苦难展示的传奇叙事策略。

^① 郭冰茹:《当代小说的写作技术与“传奇”传统》,《上海文学》2018年第9期。

二、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传奇叙事的倾向与表现

乡土小说历来有传奇性的特点,新世纪以来,这种传奇叙事倾向更加明显。这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判断。其一,新世纪以来,有诸多乡土小说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传奇特征,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传奇化程度,都超过了此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许多作家(如莫言、贾平凹、余华、迟子建、阿来、胡学文、关仁山等)的近作都表现出向传奇靠拢的趋势。其二,就传奇叙事的形态而言,20世纪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下,借助“异域”色彩与夸张技巧而实现的,而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虽然也包括这些方面,但有更多神怪、奇幻的“非真实”的内容出现,如莫言的《生死疲劳》就完全是以“超现实”的方法写就的。其三,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还渗透到各类题材中,既包括《山本》《文城》《福地》等历史题材小说,也包括《金谷银山》《有生》《蛙》等现实题材小说,此外还包括《唇典》《额尔古纳河右岸》《云中记》等类宗教题材小说,呈现出“全面开花”的态势。

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传奇的表现方法与传奇的故事形态。此二者并非独立、隔绝,而是相互融合的。具体来说:

首先,较多使用巧合、偶然等技巧,或突出神秘因素在情节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巴赫金在他的《小说理论》中,以希腊小说为例,指出传奇故事与时间是“借助特殊的‘突然间’和‘无巧不成书’相互交错组织起来”^①,这在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与李佩甫的《城的灯》中亦有体现。《金谷银山》有太多机缘巧合的情节,最典型的是“金谷子”的故事。“金谷子”原本只是范少山的一个梦,作者却偏要把梦写成现实——范少山从爷爷范老井那里得知:“金谷子”不仅真的存在,而且是昔日上贡皇帝的贡米,只不过已经失传。可范老井事后又想起几十年前老姑奶奶曾带走十斤“金谷子”作为嫁妆,为范少山留下一丝希望。为此,范少山从燕山“追”到太行山,找到了老姑奶奶,却又得知:仅剩的一点“金谷子”已作为陪葬,在八年前随老姑爷爷一起埋进了坟冢。八个年头的“金谷子”能否发芽是可疑的,并且,如果要取出种子就必须掘坟开棺,其难度可想而知。可范少山没有多想,他软磨硬泡,终于得到了老姑奶奶的同意,开棺取出了种子。经过培育、栽种后,“金谷子”成功发芽并获得了丰收,范少山的“创业史”也由此开始。在《城的灯》中,刘汉香培育“月亮花”的情节也相当传奇、极其偶然。她从历史典籍里发现一种名为“花驿之冠”的“蓝烟儿”,此花极为奇特,是由青蒿嫁接而得,白日似青烟一缕,夜来蓝色渐褪,紫中泛银,银中蕴白,至午夜时分则紫蓝褪尽,晶莹如雪,灿若仙人脱衣。刘汉香花费四年时间培育“蓝烟儿”,均以失败告终。当她打算放弃时,一次偶然却使她获得成功:她无意中用煮豆腐的水擦拭花瓣,竟然使花瓣的颜色发生变化,由此成功培育出“蓝烟儿”,并取名为“月亮花”。

在历史题材方面,贾平凹的《山本》与余华的《文城》也有类似特征。《山本》主要借助神秘因素来推动小说叙事,尤其是神秘的“胭脂地”,小说开头写到:“陆菊人怎么能想得到啊,十三年前,就是她带来的那三分胭脂地,竟然使涡镇的事全变了。”原来,12岁的陆菊人在夜里听到“赶龙脉”的人说她家的“胭脂地”是一块宝地,将来能出官人,因此她颇有心计地将那块地要过来当作自己的嫁妆。

^① [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82页。

但在后文中,作者将涡镇的所有世事变迁都归因为“胭脂地”,就显得很不可思议。余华的《文城》也充满了巧合(或“不巧”)。这部小说的故事线索是林祥福寻找出走的纪小美。林祥福本不知道纪小美的身世,却能凭借纪小美的口音,从北方出发,准确地找到她的家乡——一个南方小镇。但很奇怪,到了这个并不大的小镇,却怎么都找不到纪小美,尽管他们一度离得那么近,却总是阴差阳错地错过,最终成为一段既传奇又遗憾的故事。

其次,运用各种“超现实”的创作方法,表现“怪力乱神”等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传奇之“奇”也可以理解为“怪”,指一些脱离现实或超越真实的内容。它多出现在具有宗教倾向的作品中。比如书写萨满的《唇典》就写到了诸多神怪的现象:满斗萨满生来就有一双蓝绿色的“猫眼睛”,可以看见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大萨满李良有许多神奇的法术,有超现实的能力。有评论家指出:“读《唇典》,猛然发现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许多经典的神秘魔幻形象在此汇集,看到现实与非现实的荒诞、神秘现实和魔幻在此浑然一体,能够感觉到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小说和中国古代的志怪小说、神魔小说、奇幻小说,以及当代西藏作家扎西达娃小说对其的沾溉。”^①除《唇典》以外,像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阿来的《云中记》、肖江虹的《傩面》在书写萨满、祭师、傩师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写到了一些神幻的内容。

当然,“超现实”并不局限于宗教类型小说,非宗教题材小说也可能包含神怪、奇幻的因素。这一方面表现为怪诞的情节。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劳》,它以“六道轮回”为叙事结构,以人(冤魂)一驴一牛一猪一狗一猴一大头婴儿的逻辑与视角来架构全篇,展现出“东方”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关仁山的《麦河》中的瞎子白立国也堪称奇人,他可以用泥土、石灰和血为亡人制作泥像,通过泥像,他又可以与亡魂对话;与瞎子白立国形影相伴的苍鹰也可以通灵,只要他摸着苍鹰的翅膀就可感知历史、预见未来。另一方面表现为神秘的叙述者。比如叶炜的《福地》就由一棵拥有六百多年历史的“老槐树”来讲述麻庄的历史与当下,胡学文的《有生》让一位年逾九旬、躺在病榻上不能说话的“祖奶”来“开口”叙述。这既提供了全知的叙事视角,打破了历史与现实的界限,也为小说增添了神秘、奇幻的色彩。

再次,浓墨重彩地塑造英雄人物,书写传奇式的个人命运与遭际。乡土小说在塑造农民形象,尤其是历史中的“乡贤”与当前涌现的“新农民”形象时,有不少作品运用了传奇叙事手法,将他们“英雄化”乃至“神化”。可以发现,在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中,有许多传统乡贤形象可以看作乡村领袖或者民族英雄,如护佑地方百姓安危的乡绅万仁义(《福地》),以血肉之躯劝退兵匪的王明鹤和黄盛萱(《刀兵过》《旷野黄花》),在战争年代保家卫国的那二爷(《那二爷的战争》),在乱世中为正义奔走、呼喊的黄朝勋(《旷野黄花》),他们都不失“英雄”本色。一些“新农民”形象也是如此,如《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麦河》中的曹双羊、《城的灯》中的刘汉香、《皖北大地》中的安玉枫,他们都有从“草根”到“英雄”的成长经历,最终成为“卡里斯玛”型人物,展现出卓越的能力,超凡的魄力,鲜明的性格,坚定的信念,以及稳定的品质。

为了更好地塑造英雄传奇人物,作家们还主动向传统文学、特别是极具传奇特征的武侠小说借取经验。其一是强化了人物性格的对立。比如《垛上》中的林诗阳与三侉子,《湖光山色》中的楚暖

^① 王达敏:《灵魂之殇——刘庆萨满文化长篇〈唇典〉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期。

暖与詹石磴,《日头》中的金沐灶与权桑麻,就分别属于善与恶、正与邪,并构成了持续而激烈的“压制—反抗”的关系。其中,林诗阳、楚暖暖、金沐灶的正义精神,就如同武侠小说中除暴安良、锄强扶弱的侠肝义胆,只不过这种江湖侠义被改写为道德与法理上的正义。其二是借鉴武侠小说的“复仇”模式。有学者指出:“民间传奇英雄的人格显现,是在行侠仗义的‘复仇模式’中完成的。”^①诚然,不少乡土小说通过“复仇”来推动小说叙事,比如林诗阳报三侏子的“辱母”之仇,旷开田报詹石磴的“辱妻”之仇,金沐灶报权桑麻的“杀父”之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仇恨构成了人物行动的内在驱动力。不过,与武侠小说“报仇雪恨”的快意结局不同,他们的“复仇”大都没有完成,因为在他们的宽恕之德下,仇恨通常被化解。

最后,致力于“陌生化”的书写,构成一种接受奇观。从根本上说,传奇是指那些不同寻常或少为人知的内容。在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中,这种传奇景观部分来自“异域”(即乡土小说的地域性),比如阿来的《云中记》、肖江虹的《傩面》、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就分别带我们走进了汶川大地震后的“藏地”、贵州山区的神秘技艺以及中俄边界的鄂温克族部落。这些内容距离大众认知较远,因此,它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与文化精神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

除了空间意义上的“异域”,一些在时间上较为久远、陌生的事物,如历史中真实存在的“土匪”与“酷刑”等,也成为乡土传奇叙事的重点。事实上,此二者都逼近伦理的极限,却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例如,莫言的《檀香刑》几乎通篇都在写“酷刑”,而且写得细致入微、带有“快意”,在表现生命极限与民间狂欢的同时,也有炫技、猎奇的嫌疑。这种写作倾向在当前仍有不少追随者,比如贾平凹的《山本》与余华的《文城》都有将近一半的篇幅在写土匪,很细致地写到土匪们的种种恶行与酷刑,如欺男霸女、烧杀抢掠的恶劣行径,又如砍手指、割耳朵、“摇电话”(将木棍插进肛门),以及将钉子钉进脑袋等酷刑。虽然这两部作品所写的故事都发生在清末民初,土匪横行是事实,但作家们在书写时并不节制,且缺少了应有的悲悯,更多是将其作为一种奇观而展示。

三、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传奇叙事的内因与外缘

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与多方面因素有关,它既缘于小说、乡土与传奇之间的内在关联,也与近年来大众化、媚俗化的文化语境以及乡土现实书写的困境与深化相关。

首先,小说是在传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以传奇为传统。我们知道,小说较早出现在魏晋时期,其主要形态为志怪或志人。鲁迅指出“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②,可见小说与传奇早有因缘。及至“唐传奇”,小说与传奇相融的意识更加自觉,“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事实上,考察中国小说史也可以发现,传奇一直是小说的重要特征,如古典文学中的《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甚至包括新文学中的许多作品与流派,均是如此。就此而言,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首先就是中国小说与传奇传统融合的延续。

^① 宋剑华:《变体与整合:论民间英雄传奇的现代文学演绎形式》,《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3页。

其次,乡土与传奇也存在内在的关联,传奇构成乡土本身的一种特性。这种关联主要源自乡土(小说)的地域性特点。事实上,在土地广袤的、历史悠久的乡土(民间)社会中,的确存在许多奇人奇事与奇风:或者是拥有特殊技能、传奇经历的个人(如接生婆、乡绅、土匪等);或者是在缺少规范、自由自在的民间社会中产生的奇闻逸事(如抢亲、换亲、借种);或者是各种稀奇古怪的风俗与习惯(如典妻、冥婚、跳大神等)。它们为传奇叙事提供了天然的土壤。例如,莫言小说塑造了许多传奇英雄人物,但这些人似乎只能存在于“高密东北乡”——在自由自在的民间社会。虽然都市也包含某种形态的传奇(如《倾城之恋》《长恨歌》),但乡土在这一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相比于城市,乡村社会存在时间更长,历史沉淀更为深厚、丰富,许多古老而隐秘的民族文化心理与记忆也都留存在乡土社会中。

还应该注意,在认识世界的观念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对于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农民习惯用各种想象进行填充,将它们理解为神造或天意,为其蒙上神秘又神圣的面纱;对于历史中的“英雄”,农民也愿意将其拔高乃至神化,将他们的故事传奇化,并留传下去。因此,乡土世界中存在大量的神话与传说,乡土小说创作自然不能回避,甚至很乐意去表现这些能够显示乡土本色和农民心理的内容。

再次,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还与当前的文学环境和文化语境有关。从文学创作环境来说,在文学逐渐从主流走向边缘的趋势下,作家们试图通过增加故事性、可读性来挽回读者,而传奇的内容(特别是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的人物命运)更有可能获得市场的青睐。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进入到19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大众文化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代名词,并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学影视化。许多作家并不排斥、甚至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改编,因此,他们在小说创作时就乐意去表现具有感官刺激、能够吸引人们注意的内容,将文学创作引向到传奇的方向。比如余华,他的《活着》曾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与效益。在新作《文城》中,余华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影视因素带入了小说创作中,追求故事的曲折离奇,如林祥福的“发家史”以及他与纪小美的“恋爱史”都极具传奇色彩,此外,小说对土匪种种暴力的书写也带有明显的感官刺激。

最后,乡土传奇叙事也是现实主义陷入困境又走向深化的一种表现。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至今,既取得了辉煌成就,也遭遇了很大的困境。许多作家感受到,传统现实主义已经束缚了乡土小说乃至整个文学的发展,需要开拓、创新与深化。如阎连科,他认为“文学已经被庸俗的现实主义所窒息,被现实主义掐住了成长的咽喉”^①。因此,他抛弃了现实主义的俗套,而融入了想象、梦幻、寓言、神话、魔变等内容。此外,他还提出过“乡土把聊斋丢到哪儿了”的质问,主张重拾聊斋的主义和精神^②。当然,“改良”现实主义并走向传奇的作家不只是阎连科,莫言更早冲破了现实主义的藩篱,从1980年代开始,莫言就汲取了中国志怪传统,并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影响,展现出迥异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东方”式的魔幻现实主义。

① 阎连科:《受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97页。

② 参见阎连科:《乡土把聊斋丢到哪儿了》,《小说评论》2022年第3期。

事实上,在中国志怪传统的无声浸润,以及西方文艺思潮、尤其是现代主义广泛进入中国文坛后,传统现实主义受到了巨大的挑战。新世纪以来,已经没有多少作家完全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相反,很多作家都追求故事的新奇与叙述的先锋,要求超越教条的“现实”与“真实”观,突破现实主义的边界,走向“无边的现实主义”。这既体现了现实主义作家的焦虑,也表明了他们寻求现实主义深化的努力。如贾平凹,他曾坦言,“在我磕磕绊绊这几十年的写作途中,是曾承接过中国的古典,承接过苏俄的现实主义,承接过欧美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承接过建构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好的是我并不单一,土豆烧牛肉,面条同蒸馍,咖啡和大蒜,什么都吃过”^①。虽然贾平凹一直以现实主义精神观照着城乡中国,但他并非是现实主义的忠实“粉丝”,他的乡土书写博采“各家”之长,常常有一些超现实的内容,比如能与动物交谈、可预知未来等。显然,诸如此类的书写已经不属于传统现实主义的范畴了,它是作家们在面对现实主义困境而做出的一种叙事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对现实主义的深化和超越。

四、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传奇叙事的意义与局限

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有其合理性。因为小说并不排斥传奇,如班固所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传奇不仅符合小说的特征,适当的传奇书写还能为小说增添别样的风采。此外,小说中的传奇也不见得就是脱离现实的编造,正如我们的生活同样存在偶然与巧合,小说中的传奇性情节也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乃至必然性。况且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并不像镜子一样,文学既可以超越现实,可以采取夸张、变形的方式来呈现另一种现实,甚至透过现实表面而抵达其本质,“从完全的‘不真’走向真实”^②。

乡土传奇叙事也有其意义,首先,增加了小说的故事性与可读性。小说是以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能否讲好故事决定着小说的好坏。佛斯特认为:“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这是所有小说都具有的最高要素。”^③钱谷融也曾谈到:“小说后来之所以会那样受人喜欢,所以会几乎人人爱读,必有它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这种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我们以为主要恐怕就在于其中所包含的故事性。爱听奇闻轶事,可以说是人类的共同心理。”^④传奇就是增加小说故事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许多作家都着力于塑造传奇人物,讲述传奇故事。比如胡学文的《有生》,一方面塑造了一个“祖奶”的形象,她是一位接生了一万多名婴儿的乡村医生;另一方面,小说讲述了她的传奇故事——她的坎坷人生也是乡村变迁与民族历史的一个缩影。可以说,《有生》的传奇叙事,使之成为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

其次,乡土传奇叙事还开拓了乡土小说与现实主义的边界。因为传奇叙事可以突破现实主义的种种壁垒,让作家在乡土世界中自由驰骋、充分想象。反言之,如果不借助传奇的叙事手法,作家就

① 贾平凹:《山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524页。

② 阎连科:《乡土把聊斋丢到哪儿了》,《小说评论》2022年第3期。

③ [英]佛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20—21页。

④ 钱谷融:《艺术·人·真诚:钱谷融论文自选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难以穿越现实的表层而进入到深层的空间与“非现实”的世界中去,很难打破时间的界限,在有限篇幅内获得“长时段”的叙事长度,也很难实现乡土书写的突破进而带给我们新鲜的阅读体验。传奇叙事就有助于破解这些难题。比如,将具有神幻色彩的事物当作小说的叙述者,赋予它们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叶炜的《福地》就以一棵“老槐树”的视角来俯瞰村庄、连通古今,展现出了现实之外的历史场景。莫言的《生死疲劳》通过西门闹的亡魂以及西门驴、西门牛、猪十六、狗小四等动物视角展开叙述,在展现了人的世界的同时,也展现了鬼魂世界与动物世界。又如,赋予小说人物某种超现实的力量,可以预知未来、能与神鬼对话、安抚亡灵等。关仁山的《麦河》中的瞎子白立国就能够通过泥塑与亡人对话,与他交谈最多的是“狗儿爷”,如果把“狗儿爷”的叙述连缀起来,就能够展现出麦河两岸的土地史以及农民的土地梦。作者也坦承泥塑“一下子让我找到了‘诉说历史’的视点”,并且,“让瞎子与鬼魂对话,虚实相间,既增加了历史厚度,还能节省篇幅”^①。

但也应该注意到,当前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也带来了一些弊病与危机。

首先,过分追求传奇效果,导致故事情节不够真实,人物形象不够典型。因为小说的传奇性主要是通过故事情节表现出来的,一些作家过于追求传奇效果,甚至以“奇”为本,导致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都存在某种欠缺。例如贾平凹的《山本》就以“传奇”为导向,有学者也指出,虽然作家自称要写一部“秦岭志”,但或许因为秦岭太大,作家并没有找到“山之本”是什么,又误将一种神秘、虚无的文化作为“山本”的概括^②。比如作品将涡镇的事事变化归结于陆菊人的三分“胭脂地”,此外,周一山能够听懂动物语言,又能从中获得“天机”;陆菊人、井宗秀在许多重要事情上的决策,都依靠一些神秘的预兆。诸如此类的安排就显得既随意又刻意,导致情节失实、人物失真。尤其是小说中的陆菊人,从普通的童养媳到涡镇的“茶总领”,陆菊人的变化不可谓不大,但我们很难不疑惑:陆菊人不过是普通出身,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智慧,懂得这么多?其中原因,恐怕是因为作家为了凸显这样一位传奇女性,却没有足够的铺垫,因而导致人物形象不够真实,也不够成功。

类似的问题不只是《山本》才有,当前许多作品都存在情节失实、人物失真的情况。这也警示我们: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应该做到“奇而可信”,无论是直面现实的乡土小说,还是重述历史的乡土作品,都需要考虑到它的真实性问题(至少是内在真实)。如果过分追求传奇效果而随意编造情节或夸大人物,就会因为缺少真实感与生活基础而走向虚假,导致情节大于人物的问题,甚至人物形象也难以成立,最终成为“失败”的作品。

其次,停留在故事层面,未能进入到更深层的情感、思想层面,这为更大的遗憾。在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中,有不少作品是以叙述传奇故事为目的,无暇顾及或忽略了对人类情感与思想的表达;也有一些作家为了迎合市场,主动放低了自己的创作姿态,走向了一条媚俗化的道路。这只能创作出来浅薄、庸俗的作品,没有真挚情感,也没有深邃思想。其中,思想层面的缺失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制约乡土小说乃至当前中国文学的最大症结不是能否讲好一个故事,而在于作家是否具备独立的以及高深的思想。这并不是说故事就不重要,只是如果一部作品只停留在故事层面,那它难以说

^① 关仁山:《麦河》,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526页。

^② 参见贺仲明:《思想的混乱与自我的复制——对〈山本〉文学价值的重新考量》,《南方文坛》2019年第2期。

是一部优秀的作品。这里可以以余华和他的《文城》为例进行说明。《文城》的传奇色彩相当明显,事实上,余华的早期创作的《许三观卖血记》《活着》也存在类似的特征。但这两部早期作品并没有停留于故事的表面,它至少还有一些深刻的东西,比如对于苦难的表达,对苦难中的情感的呈现,对苦难与生命的思考。可这些优秀的质素在《文城》中就非常淡薄了。《文城》更多地是对一个传奇故事的演绎,对一对青年男女的捉弄,对暴力的极致书写。相比之下,西方文学中卡夫卡的《变形记》就很有借鉴意义,它虽然讲述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主人公格里高尔突然变成了一只甲壳虫,但它直指了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以及现代人的普遍困境。

实际上,传奇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就如同古今中外许多优秀小说都不乏传奇色彩,可问题的关键在于——传奇并非目的,而是手段,任何小说的传奇叙事都需要坚持“适当”的原则。考察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是:作家们在乡土书写中是否过分地追求“传奇化”效果,是否又丢失了其他更为重要的东西?

责任编辑:冯济平

On the Legendary Narrative Tendency of Local Novels in the New Century

Yang Chaogao

School of Arts and law, 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Local novels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legends, and have formed a legendary trend in recent years. 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increasing use of coincidence, chance and mystery factors or in the use of surrealist methods to write personal legends, write about supernatural phenomena, extraordinary feats of strength, crime of unnatural depravity of men or supernatural beings and deal with other "alienated" content.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legendary trend of local novels. On the one hand, there is an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on the other, it is also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plight of realism in recent years. Legends can enhance the story of the novel and open up the boundary of local writing and realism. However, its limitations are also obvious. One is that the pursuit of legendary effect leads to the failure of the story plot and character image, and the other is the lack of emotional and ideological expression.

Key words: legendary narration; local novel; realism; *Shan Ben*; *Wen Cheng*; *Golden Valley and Silver Mountain*

从侨土嬗代到吴会之争： 孙吴文学本土化与世族文学兴起

徐昌盛

山东大学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根据历史进程和文学发展, 将现在可以考知的 49 名孙吴文人分为前、中、后三期, 能够鲜明地发现侨土嬗代的演进趋势以及孙吴文学从侨土融合到全面本土化的进程。在江东文学的崛起过程中, 出现了吴会之争, 吴郡文人后来居上, 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世族文学群体。不同于汉代世族的经学传家, 吴郡世族文史成就斐然, 尤以文学名世, 开启了东晋以降门阀士族的尚文之风。

关键词: 孙吴; 文人; 文学; 侨土嬗代; 吴会之争

中图分类号: I206.2; K23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2-0048-12

虽然已经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孙吴后期的文学水平已经很高^①, 但孙吴的文学情况, 由于存世史料的有限和作品的稀少, 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而孙吴文学的发展, 亦未能得到充分的揭示。如果扩大研究视野, 深入分析文学家的籍贯和目录学的记载, 那么孙吴文学的进程实际上可以分为“侨土嬗代”和“吴会之争”两个阶段, 而这两个阶段与文学本土化的实现以及吴郡文学的兴起和世族文学的塑造密切相关。

一、侨土嬗代与孙吴文学本土化

孙吴一代的文人, 目前可以考知的有 49 人。何谓文人? 曹道衡界定说: “凡是现在还存留着文章, 并且确有文学意味的, 当然应该加以论述; 其次是《隋书·经籍志》等书载有他们集子或作品篇数的, 虽然作品已经散佚, 但至少说明他们能够写作, 所以也应加以论述; 再一种是史籍中讲到他们曾写过文学作品或赞扬过他们的文学才能的, 也予以论述。”^② 据此, 我们将此 49 名文人按卒年先后(其中入晋吴人按齿序) 排列如下: 沈友、张紘、张敦、滕胄、鲁肃、陆绩、暨艳、士燮、骆统、张温、虞翻、张昭、谢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三国吴地文化与文学”(21FZWB075)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徐昌盛, 男, 江苏射阳人, 文学博士, 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① 曹道衡指出“吴地的文学水平, 在西晋统一前, 已经很高”。详见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曹道衡文集》卷五,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8 年, 第 313 页。

② 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年, 第 325 页。又, 刘跃进在研究秦汉文学时也从广义上界定了文人, 他说: “有诗作或辞赋等文学作品存世者、有文学批评著作存世者、虽无作品传世而据传文或史志记其能文而生平可考者、传统记载中以为文人者、异域人以汉文从事与文学有关活动者。” 详见刘跃进:《我研读〈文选〉的体会》,《古典文学知识》2020 年第 4 期。

承、裴玄、裴钦、薛综、胡综、张承、顾谭、张纯、孙权、诸葛恪、朱异、周昭、纪陟、张俨、陆凯、姚信、韦昭、华覈、陆景、薛莹、孙皓、陆喜、杨厚、万震、闵鸿、郑丰、杨泉、盛彦、褚陶、孙拯、纪瞻、顾荣、贺循、陆机、陆云、张翰、蔡洪等。^①

为便于历时性地考察孙吴文人的转变和文学发展的脉络，兹将吴国政权分为三期^②：一是从孙策占据江东的兴平二年（195年）到孙吴割据局面稳定的黄初二年（221年），共计27年，属于孙吴政权的早期；二是从黄武元年（222年）到孙权去世的太元二年（252年），共计31年，属于孙吴政权的中期；三是孙亮建兴二年（253年）到吴灭亡的天纪四年（280年），共计28年，属于孙吴政权的后期。兹将孙吴的文人按政权分期排列如表1：

表1 孙吴文人表

政权分期	姓名	《隋书·经籍志》 有别集者	侨籍人数 (别集)	土籍人数 (别集)	作家数 (别集数)
早期 (195—221年)	沈友、张敦、陆绩(土)	张纮(侨)	3(1)	3(0)	6(1)
	滕胄、张纮、鲁肃(侨)				
中期 (222—252年)	暨艳、士燮、骆统、张温、虞翻、谢承、顾谭、张纯、孙权(土)	暨艳、士燮、骆统、张温、虞翻、谢承(土)	7(2)	9(6)	16(8)
	张昭、裴玄、裴钦、胡综、薛综、张承、诸葛恪1(侨)				
后期 (253—280年)	朱异、纪陟、张俨、陆凯、姚信、韦昭、华覈、陆景、孙皓、陆喜、杨厚、万震、杨泉、褚陶、孙拯、纪瞻、顾荣、贺循、陆机、陆云、张翰、蔡洪(土)、周昭、薛莹、闵鸿、郑丰、盛彦(侨)	纪陟、张俨、陆凯、姚信、韦昭、华覈、陆景、杨厚、杨泉、孙拯、顾荣、贺循、陆机、陆云、张翰、蔡洪(土)、薛莹、闵鸿、郑丰、盛彦(侨)	5(4)	22(16)	27(20)

据表1可知，孙吴早期的文人寥寥无几，而且侨籍人数同于土籍人数，这与孙坚、孙策和孙权创业时期重视武功、无暇顾及艺文有关。随着孙吴统治的渐趋稳定，孙吴中期的文人规模逐渐扩大，土籍文人占据了优势地位，这是孙权称王后开启江东化历程的结果。孙吴后期文人数竟达27人之多，高于前两期的总和，可知此时孙吴文人已经非常繁多。而此时侨籍文人锐减，土籍文人剧增，固然与侨籍士人的相继谢世及其边缘化有关，但根本上是孙吴政权江东化的结果。

孙吴文学的本土化与孙吴政权的江东化密切相关。孙吴统治者的籍贯是吴郡富春，却是在淮泗之间发迹，因此孙吴政权早期的骨干，主要来自淮泗与江淮之间。及至黄武元年孙权称王后，早期创业的人士日渐凋零；孙权注意重用江南人士，开启了孙吴政权江东化进程。孙策受袁术之命进入江东后，驱逐了东汉朝廷所置官员，实际上是名不正言不顺。孙氏与江东士族的关系复杂，或者杀戮，

① 参见徐昌盛：《孙吴文学系年》，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2年。

② 关于吴国历史的分期，田余庆根据孙吴政权江东化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建安末年以前，主要政权掌握在侨寓集团手中，如周瑜、吕蒙、张昭、孙劭等，“群吏爪牙兼用江东人”；二是建安末年至黄武年间，“顾、陆先后成为当轴主政人物”，即用顾雍出任丞相、陆逊统领上游重镇；三是黄武年间及以后，由各郡举荐人才，实现了全面的江东化。详见田余庆：《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再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19页。关于吴国文学的分期，傅刚提出的方案是：“东吴局面的形成应是在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自此至孙权卒年（252年）可为吴国前期；自孙亮以后至吴国灭亡可算作后期。”详见傅刚：《吴蜀文学不兴的社会原因探讨》，《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

或者拉拢,江东士族对孙氏亦在迎拒之间。^①随着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北方的形势日趋稳定,北士南流运动既已停止,侨寓集团无法获得人才的补充。黄龙元年孙权称帝,距离孙策占据江东已经30年,早年跟随孙坚、孙策的侨寓人物相继老去,退出政治舞台,江东士人才成为孙吴政权的资源和团结对象,而以吴郡四姓为代表的江东世族逐渐跻身政权中心,成为孙吴政权的主要人物。

侨籍士人张昭与土籍士人顾雍的地位变迁,可视为观察“侨土嬗代”的样本。张昭(156—236年),彭城人,是淮泗集团的代表人物。在孙策创业之初,张昭甚见重用,当时的“文武之事,一以委昭”^②,成为孙策临终的顾命之臣。孙权很倚重张昭,“待张昭以师傅之礼”^③,但质子事件与赤壁之战改变了孙权对张昭的信任。

一是质子事件。建安七年,曹操责孙权遣质子,孙权不愿从命,张昭犹豫不能决,周瑜说:“质一人,不得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观其变。”^④鲁肃说:“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⑤周瑜、鲁肃的进言不同于“众人之议”,切中了孙权的心思。

二是赤壁之战。《三国志》载,建安十三年,“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惟瑜、肃执拒之议,意与权同”^⑥。曹操率大军南侵,群臣“莫不响震失色”^⑦,张昭主张迎降曹操,孙权“深失所望”,一直耿耿于怀;而周瑜、鲁肃等主张迎击曹操,孙权说“甚合孤心”。因此在孙权称帝后的百官朝会之际,“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昭忠谏亮直,有大臣节,权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盖以昔驳周瑜、鲁肃等议为非也。”^⑧后来孙权两度拒绝了拜张昭为相的朝议。黄武初年之后,张昭“以老病,上还原位及所统领”^⑨,无奈退休而专心治学。因此,建安十三年是淮泗集团人物和江淮集团人物更替的时间节点。

赤壁之战后,孙权依赖的主要是周瑜、鲁肃等江淮人物。到了孙权称王的黄武年间,开始重用江东士人。田余庆指出:“直到建安中期后期,吴四姓代表人物尚无一人被孙权委以文武重任。顾雍曾为会稽郡丞行太守事,而孙权领会稽太守居吴,所以顾雍长期不在孙权身边,至黄武初始擢居吴王府为卿。……顾、陆拔起于侪辈之中,都比较晚,在建安末、黄武初。”^⑩顾雍入朝为相,陆逊官拜大都督,朱桓以抗魏有功封嘉兴侯、迁奋武将军,张温主管选曹、迁太子太傅。因此说孙吴政权的统治核心,大约在黄武年间,由侨寓集团向本土大族嬗递。

① 参见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262页。

②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张昭传》,第1219页。

③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第1116页。

④ 《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周瑜传》,第1261页。

⑤ 《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鲁肃传》,第1270页。

⑥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第1117—1118页。

⑦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第1118页。

⑧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张昭传》裴注引《江表传》,第1222页。

⑨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张昭传》,第1221页。

⑩ 田余庆:《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再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318页。

黄武元年,孙权即王位告天称“权生于东南”^①,强调自己籍贯的本土性,也是孙权拉拢江南人士的重要标志。田余庆说,孙氏以吴人还治吴土,自然而然地会走上江东本土化的道路;孙吴与江东大族的结合,亦即孙吴以淮泗人为主体的政权转变为以江东人为主体的政权,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可以称之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吴国的三署是清贵之选,是吴国贵族的起家之选。三署即五官署、左署、右署,各以中郎将统领郎官,起源于汉,魏、吴承之。郎有郎中、中郎、侍郎等名目,无员数,来自察举、征拜、任子诸途。郎官日在帝王左右宿卫扈从,有被甄选升进的便利条件。所以,三署实际上是吴国官员的养成和储备机构,是贵游子弟麇集之所。^②到了黄武年间,江东子弟在三署之中已占相当的比例,说明本土人物已经在政治上逐渐取得主要的地位。

二、吴会之争与江东格局的嬗变

据《世说新语·政事》,“贺太傅作吴郡,初不出门,吴中诸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云:‘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出行,至门反顾,索笔足之曰:‘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屯诸邸,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陆抗时为江陵都督,故下请孙皓,然后得释。”^③贺劭(226—275年)出身会稽大族贺氏家族,被陈寿评为“厉志高洁,机理清要”^④,于孙休世出任吴郡太守,竟遭到吴中豪强的轻视,引发了会稽郡和吴郡的地域攻击,兹称为吴会之争。

贺氏与顾氏、陆氏等人的剧烈冲突,是江东内部会稽郡和吴郡长期矛盾积累的产物,本质上是孙吴政权本土化进程中吴郡政治和文化崛起的结果。

通过对孙权称王后会稽郡、吴郡文人情况的统计发现,孙吴统治中期的会稽郡文人有骆统、虞翻、谢承等3人,吴郡文人有暨艳、张温、张承、顾谭、张纯等5人;三嗣主时期的会稽郡文人只有杨泉、贺循等2人,而吴郡文人则有朱异、张俨、陆凯、姚信、韦昭、华覈、陆景、孙皓、陆喜、杨厚、褚陶、孙拯、顾荣、陆机、陆云、张翰等16人。不仅文人如此,《三国志·吴书》传记的吴郡人物,也远超会稽郡人物。根据史念海的统计,吴郡7县共有23人,分别是富春孙峻、孙琳,吴县顾雍、顾劭、顾谭、顾承、朱桓、朱异、陆绩、张温、陆瑁、陆逊、朱据、陆抗、陆凯、陆胤,余杭凌统,乌程吾粲、徐详,钱唐全琮,阳羨周鲂,云阳韦昭,武进华覈。会稽郡5县共有13人,分别是山阴闾泽、贺齐、锺离牧、贺劭,余姚董袭、虞翻、虞汜、虞忠、虞耸、虞曷,乌伤骆统,上虞吴范,长山留赞。^⑤正是因为孙吴后期的吴郡人物占据了很大优势,心理上具有优越感,故而敢于轻视出自会稽名门的一郡之长。

在孙吴政权江东化的过程中,江东内部的吴郡士人占据了主流地位,而汉代士人辈出的会稽郡逐渐边缘化。会稽郡学术传统深厚,产生了会稽虞氏这样的易学世家。会稽虞氏早期与孙氏关系密切,因为虞翻最早追随孙坚,并说降会稽太守王朗和豫章太守华歆,是孙氏建立江东基业的功臣。而

①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裴注引《吴录》,第1135页。

② 田余庆:《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再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303页。

③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1页。

④ 《三国志》卷六十五《吴书·贺劭传》,第1470页。

⑤ 史念海:《〈三国志〉及〈晋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史念海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0—243页。

吴郡陆氏早期与孙氏颇有仇怨。为阻止孙策进攻庐江,陆康宗族坚守两年,成为孙策进军的阻力。吴郡张氏的张允为高岱八友之一,高岱为孙策所诛,张允不能不受牵连。何以孙吴政权江东化后吴郡人物异军突起而会稽郡人物竟衰落至此?这应与会稽士族的政治地位变迁有关。会稽士族的代表相继在孙权时期去世,如董袭卒于建安十八年(213年)、吴范卒于黄武五年(226年)、贺齐卒于黄武六年(227年)、虞翻卒于赤乌四年(241年)、阚泽卒于赤乌五年(242年)等。早年仕于孙氏的会稽士人谢世后,虞翻诸子、贺齐子孙等承父祖之荫,尚有出仕的机会,但其他会稽士人仕途渺茫,更遑言位居高官了。^①

会稽士人的政治参与度,也可从孙权后期的“二宫构争”事件中管窥。“二宫构争”事件中,支持太子孙和的有陆逊、诸葛恪、顾谭、朱据、滕胤、施绩、丁密等,主要以吴郡世族为主;支持鲁王孙霸的有步骘、吕岱、全琮、吕据、孙弘等,主要以北方士人为主。卷入这次权力之争的北方士人和吴郡士人众多,而会稽士人仅有尚书丁固、中书令孙弘二人。丁固乃丁览之子,是会稽山阴人;孙弘是会稽人,为人“佞伪险谀”^②。到了三嗣主时期,位居高官的会稽士人也屈指可数,约略可数者仅有4人:丁固“历显位,孙休时固为左御史大夫,孙皓即位,迁司徒”^③;锺离牧,会稽山阴人,孙休时为平魏将军、扬武将军,领武陵太守;贺劭,贺齐之孙,孙休即位后出为吴郡太守,孙皓时迁中书令,领太子太傅;朱育,会稽山阴人,孙休时仕郡门下书佐,“后仕朝,常在台阁,为东观令,遥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④。而此时的吴郡世族,仅陆氏一门,即有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煊赫无匹。

吴郡世族权倾一时,也确实引起了皇权的警惕。《抱朴子·吴失》说,吴国世族“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出饬翟黄之卫从,入游玉根之藻税。僮仆成军,闭门为市。年马掩原隰,田池布千里。”^⑤黄武四年(225年)的张温、暨艳事件和嘉禾五年(236年)的吕壹校事事件,孙权主要目的是打击吴郡世族。孙皓也忌惮陆氏世族的显赫,对陆凯、陆抗有所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世说新语·规箴》引《吴录》称,孙皓因陆凯“宗族强盛,不敢加诛”。^⑥《三国志》亦载:“初,皓常衔凯数犯颜忤旨,……既以重臣,难绳以法,又陆抗时为大将在疆场,故以计容忍。”^⑦直到丞相陆抗死后,孙皓才敢惩罚陆氏家族。据记载,陆抗死后,天册元年,孙皓“竟徙凯家于建安”^⑧,将整个陆凯家族迁至建安郡;天策元年,陆凯弟陆胤之子陆式“与从兄祗俱徙建安”^⑨。陆机对孙皓打击家族之事耿耿于怀,其述《辨亡论》主旨曰:“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功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论孙权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辨亡论》。”^⑩

吴会地位的变迁,亦与孙吴实行的领兵制和复客制有关。贺劭“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

① 吴从祥:《六朝会稽贺氏家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5页。

②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张休传》,第1225页。

③ 《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虞翻传》裴注引《会稽典录》,第1324页。

④ 《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虞翻传》裴注引《会稽典录》,第1326页。

⑤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45页。

⑥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302页。

⑦ 《三国志》卷六十一《吴书·陆凯传》,第1403页。

⑧ 《三国志》卷六十一《吴书·陆凯传》,第1403页。

⑨ 《三国志》卷六十一《吴书·陆胤传》,第1409页。

⑩ 《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67页。

亡”，针对的问题是“役使官兵”和“藏逋亡”，即整肃领兵制和复客制。孙吴的复客制中，“客”是佃客，“复”是免除，即免除所属佃客的负担。复客制主要发生在建安时期，是孙权优待过江北军人的政策^①。“藏逋亡”是隐匿未经国家允许的人口，损害了国家的财赋和兵源。“役使官兵”属于私役官兵，这涉及到孙吴的世袭领兵制。孙吴的兵由将领世袭，成为部曲家兵。唐长孺指出：“将领是有权支配他的兵士作各种有利于他私人收入的劳动的”，“然而这是私役，所以揭破了要得罪”。^②左思《吴都赋》说：“其居则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歧嶷继体，老成弈世，跃马叠迹，朱轮累辙，陈兵而归，兰辀内设，冠盖云阴，闾阎阗噎。”^③左思列举的“虞魏之昆、顾陆之裔”，其中吴郡顾、陆家族领兵之事明确见载于史籍，但会稽虞翻、魏朗家族未闻有领兵记载^④，吴郡、会稽郡的势力变迁由此可见一斑。会稽郡出身的顾劭明知吴郡豪族的私役情况，因此至屯邸检校，当然不会扑空，故“罪者悉众”。

三、“吴郡四姓”与世族文学群体形成

“吴郡四姓”是吴国的世家大族，不仅在政治军事上人物显赫，如顾雍、陆逊、陆凯为丞相，朱异为大都督，朱然为左大司马，陆抗为镇军大将军，张温为太子太傅等；而且在文学和学术上人才辈出，择其要者，有吴郡顾氏的顾谭、顾荣，吴郡陆氏的陆绩、陆凯、陆景、陆喜、陆机、陆云，吴郡张氏的张敦、张温、张纯、张俨、张翰，等等。

吴郡顾氏文人的主要代表是顾谭和顾荣。顾谭(205—246年)，顾雍之孙，弱冠时与诸葛恪等为太子四友。赤乌六年(243)，丞相顾雍卒；七年，顾谭为太常，代雍平尚书事，时鲁王孙霸见宠，顾谭上书建议“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⑤，由是得罪孙霸；又以前年芍陂之役论功为全琮父子所恨，因被构陷而流放交州，最终卒于交趾。顾谭在交州时幽而发愤，著《新言》二篇，所作《知难篇》属于自我伤悼的作品。《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著录的《顾子新语》，当即顾谭的《新言》。其他作品可知的有《议奔丧》《上疏安太子》。顾荣(?—312年)，与纪瞻、贺循、闵鸿、薛兼并称“五俊”；又因与陆机、陆云一同入洛阳，被称“三俊”。顾荣颇有文学才能，《世说新语·赏誉》载，蔡洪称其为“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⑥。《隋书·经籍志》收录《顾荣集》五卷。

吴郡朱氏不以文才名世，而以武功著称，故旧目称“朱武”。吴郡朱氏虽然可以追溯到著名楚辞家朱买臣，但后世鲜有人物。及至孙吴，朱桓屡立战功；其子朱异，有将领之才，代父领兵，孙亮时官拜大都督，并存《赋弩》，说明兼有文才。又，朱据“有姿貌膂力，又能论难”，任左将军、骠骑将军，封云

① 参见胡宝国：《对复客制与世袭领兵制的再探讨》，《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

② 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22页。

③ 《文选》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刻本，第88页。

④ 唐长孺注意到虞魏并无领兵记载，但左思既将其与顾陆并列，认为“《吴志》未载领兵的大族实际上都有兵”，又引《魏书·邓艾传》载邓艾对司马师说“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详见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20页。

⑤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顾谭传》，第1230页。

⑥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36页。

阳侯,被孙权许为“才兼文武”^①,现知有《争太子和事》。另外尚有朱治《说孙贲》、朱然《上书讨马茂》,朱绩《与诸葛融书》,主要是军政公务文章。

吴郡张氏分为两支:一支是张允、张温父子,另一支是张敦、张纯、张俨、张勃、张翰。张允是高岱八友之一,曾任孙权东曹掾,似典选举之任。张温尝从唐固就学,晋见孙权时,以文辞占对闻名,曾做过议郎、选曹尚书、太子太傅,因暨艳案而受牵连,史传称他“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论议之辩,卓踈冠群,炜晔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②。张温著作有《三史略》,系《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的节略,又有《张温集》,另有《自理》《至蜀诣阙拜章》。张敦有张纯、张俨两子,张俨有张勃、张翰两子。《文士传》载:

张惇子纯,与张俨及(朱)异俱童少,往见骠骑将军朱据。据闻三人才名,欲试之,告曰:“老鄙相闻,饥渴甚矣。夫骖馵以迅骤为功,鹰隼以轻疾为妙,其为吾各赋一物,然后乃坐。”俨乃赋犬曰:“守则有威,出则有获,韩卢、宋鹊,书名竹帛。”纯赋席曰:“席以冬设,簟为夏施,揖让而坐,君子攸宜。”异赋弩曰:“南岳之干,钟山之铜,应机命中,获隼高墉。”三人各随其目所见而赋之,皆成而后坐,据大欢悦。^③

张纯、张俨少年便已文才敏捷,则知张氏注重文学教育。张敦、张勃《吴录》载其“敦德量渊懿,清虚淡泊,又善文辞”^④。张纯有《赋席》。张俨有《赋犬》,又有子书《默记》三卷,其中有《述佐篇》记载了诸葛亮与司马懿的书信,又有诸葛亮上表伐蜀文^⑤;又,《隋书·经籍志》载有《张俨集》。张翰,性纵任不拘,号“江东步兵”,本传载其“有清才,善属文”,有“文笔数十篇行于世”^⑥。“八王之乱”爆发时,张翰托以思念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而著《首丘赋》。又,《隋书·经籍志》载有《张翰集》。南朝文学批评家对张翰颇为肯定:《文选》收录其《杂诗》一首;《诗品》列其为中品,说其诗歌“虽不具美,而文采高丽”;《文心雕龙·才略》说“曹掾清靡于长篇,季鹰辨切于短韵,各其善也”,也肯定张翰擅长诗歌短制。另外,张俨子张勃入洛后,有《吴录》三十卷。

陆氏文人在“吴郡四姓”中最为突出。吴郡陆氏的学术代表,有陆绩、陆凯、陆玑、陆胤、陆机等,尤以陆绩的学术著作最丰。陆绩本传说他“作《浑天图》,注《易》释《玄》”^⑦;《隋书·经籍志》载其注《周易》,并与虞翻合作《周易日月变例》,又与宋衷注《扬子太玄经》等等。章炳麟《陆机赞》说:“机之族始于陆绩,说《易》明《玄》,为经术大师。”^⑧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指出,三国《易》学有三派,江东派则以虞翻、陆绩为代表。可知陆绩是象数《易》学的大师。此外,陆凯著有《吴先贤传》,又有《扬子太玄经》注;陆玑有《毛诗草木虫鱼疏》;陆胤有《广州先贤传》;陆机有《晋纪》《洛阳记》《吴章》等。吴郡陆氏的文学代表,有陆绩、陆凯、陆喜、陆景、陆机、陆云等。陆绩现有《自知亡日为辞》。陆凯,《隋

①《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朱据传》,第1340页。

②《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张温传》,第1333页。

③《三国志》卷五十六《吴书·朱治传》,第1317页。

④《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顾劭传》,第1230页。

⑤《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第935、923—924页。

⑥《晋书》卷九十二《张翰传》,第2385页。

⑦《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陆绩传》,第1328页。

⑧章炳麟:《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37页。

书·经籍志》载有《陆凯集》。陆喜是吴末创作颇丰的作家，《晋书》载：

尝为自叙，其略曰：“刘向省《新语》而作《新序》，桓谭咏《新序》而作《新论》。余不自量，感子云之《法言》而作《言道》，睹贾子之美才而作《访论》，观子政《洪范》而作《古今历》，鉴蒋子通《万机》而作《审机》，读《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娱宾》《九思》，真所谓忍愧者也。”其书近百篇。^①

陆景，史载其“澡身好学，著书数十篇也”^②。作品可知者，有《与兄书》《诫盈》等；《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载有《典语》《典语别》，集部载有《陆景集》。吴郡陆氏最著名的，自然是陆机和陆云。“二陆”不仅是吴郡陆氏的代表，也是孙吴文学的代表。他们作品甚多，明确作于吴时的，有陆机《吴大司马诔》、陆云《嘲褚常侍》。另外，陆瑁、陆逊、陆凯、陆抗也有不少存世之作，但基本是军政外交公文。

综合“吴郡四姓”的学术情况，经学成果主要是陆绩的《易》学、陆玠的《毛诗》学，子学成果主要是顾谭的《新言》、张俨的《默记》、陆喜的《言道》《访论》《审机》以及陆绩、陆凯的《太玄》注，史学成果主要有张温的《三史略》、张勃的《吴录》、陆凯的《吴先贤传》、陆胤的《广州先贤传》、陆机的《晋纪》《洛阳记》等。而在文学领域，顾荣、朱异、张温、张纯、张俨、张翰、陆绩、陆凯、陆喜、陆景、陆机、陆云等皆以文学知名；且顾荣、张温、张俨、张翰、陆凯、陆景、陆机、陆云等，《隋书·经籍志》均著录有别集。据此可知，“吴郡四姓”在文学领域人才辈出，构成了汉晋之际独特的世族文学群体，但限于传世作品的稀少，且以公文为主，吴郡世族文学特色已殊难考知了。

四、汉晋大族转变中的文化簪缨

“吴郡四姓”是孙吴的世家大族，属于三国时期的“新出门户”。《吴录·士林》说：“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③陆机面对中原士人而吟唱《吴趋行》，自豪地回顾故国人物道“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④，重在强调“四姓”的人才鼎盛。

“吴郡四姓”能够跻身世族，与朱治的提拔密切相关。朱治任吴郡太守时，“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治率数年一遣诣王府，所遣数百人”^⑤。因此田余庆说：“吴四姓并称，起于东汉末以至三国时期。……吴四姓之起与日后江东历史关系至大，它们勃兴于三国之世，朱治当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⑥陆凯说“先帝外仗顾、陆、朱、张”^⑦，知“吴郡四姓”是孙权的重要依靠对象。当然，“吴郡四姓”具有不同的特点，《世说新语·赏誉》说：“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⑧田余庆说：“据今见吴国人物资料论之，以张温为文，朱桓为武，陆逊为忠，顾雍为厚，完全合辙。”^⑨“吴郡四

① 《晋书》卷五十四《陆喜传》，第1487页。

② 《三国志》卷五十八《吴书·陆抗传》，第1360页。

③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68页。

④ 《文选》卷二十八，第399页。

⑤ 《三国志》卷五十六《吴书·朱治传》，第1305页。

⑥ 田余庆：《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兼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309页。

⑦ 《三国志》卷六十一《吴书·陆凯传》，第1406页。

⑧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68页。

⑨ 田余庆：《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兼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309页。

姓”也通过互相联姻加强实力,如顾谭、顾承是陆逊的外甥,顾劭是陆绩的外甥,陆抗是张承的女婿,顾谦是陆机的姐夫,张白是陆绩的女婿,等等。通过联姻,“吴郡四姓”形成了荣辱与共的血缘纽带。

“吴郡四姓”是汉代旧族,至孙吴时期正式成为世家大族。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说“吴诸顾、陆,旧族长者,世有高位”^①,知陆氏和顾氏在汉代已颇具声望;但二氏很晚才为孙氏所信用,“顾、陆拔起于侪辈之中,都比较晚,在建安末、黄武初”^②。吴郡陆氏“世为族姓”^③,汉代比较有名的有两支。一支是陆绩,有子陆褒,陆褒有子陆康,陆康有子陆绩。另一支是陆纡,有子陆骏,陆骏有子陆逊。陆绩是“建武中为尚书令”^④的陆闳之孙,尚书台在光武帝即位后改成中枢机构,尚书令的地位自此备受尊崇。陆绩曾仕郡户曹史,后被辟为别驾从事,史有专传;他娴于吏干,因坐尹兴的冤狱而惨遭笞掠,却能慷慨从容,得到了皇帝的宽宥。陆绩长子陆稠,官至广陵太守,有治理的名声;次子陆逢,官乐安太守;少子陆褒,即陆康之父,史书载其“力行好学,不慕荣名,连征不就”^⑤,是砥砺学问和人品的典范。陆康是陆逊的从祖父,与陆纡是从兄弟。从陆骏开始,吴郡陆氏又分为两支:一支是陆逊和子陆抗及其孙陆晏、陆景、陆机、陆云,一支是陆瑁和其子陆喜。陆逊有侄子陆凯及其弟陆胤。吴郡陆氏与孙氏政权本有宿怨。孙策攻破庐江,庐江太守陆康宗族百余人,遭罹饥厄,死者将半,陆康旋死。而陆康子陆绩被孙权贬谪,死于贬所。因此陆氏必须有重大的立功表现,才能改善与孙氏政权的关系。

陆氏家族命运的转折和武功上的发达,受益于陆逊在夷陵之战上的卓越表现。陆逊任孙吴大都督,于夷陵一役粉碎了刘备的大举进攻,奠定了陆氏在孙吴政权的地位,“从此以后至吴亡,陆氏子孙专上流之任达五十余年之久”^⑥。陆逊起家于县令,召募二千兵士,为孙权讨伐“恶逆”立功。但是在得到吕蒙荐举以前,陆逊并未获得孙权的显授。从陆逊开始,陆氏与孙氏的联姻甚为密切,如陆逊娶孙策之女,陆抗实是孙策的外孙;又,陆景娶了孙皓之妹。陆逊深得孙权信任,曾受命辅佐皇子。孙权称帝后移都建业,留太子孙登等于武昌,命陆逊辅导诸皇子。当时,建昌侯孙虑作斗鸭栏,陆逊严肃地教训道:“君侯宜勤览经典以自新益,用此何为?”^⑦孙虑听后,马上拆毁撤去。随着侨寓集团的隐退,孙权注意拉拢江东豪族,提拔了陆逊,仍旧实行世袭领兵制度。^⑧陆氏家族日益坐大,成为吴郡世族之执牛耳者。《世说新语·规箴》载:“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⑨因此有学者指出:“吴四姓以顾、陆为著,陆在顾后,但陆氏更强。”^⑩

吴郡顾氏在汉时已颇有人物。丞相顾雍的曾祖顾奉,曾在东汉明章年间受业于豫章南昌大儒程

①《文选》卷四十四,第622页。

②田余庆:《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再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318页。

③《后汉书》卷八十一《陆绩传》,第2682页。

④《后汉书》卷八十一《陆绩传》,第2682页。

⑤《后汉书》卷八十一《陆绩传》,第2683页。

⑥田余庆:《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兼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325页。

⑦《三国志》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第1349页。

⑧世袭领兵制度,是由君言赐给将领以士兵,死后子弟继续统率,形成世袭;但士兵并不是私属,仍属朝廷,君主有权夺回,改赐他人。参见祝总斌《“八王之乱”爆发原因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302页。

⑩田余庆:《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兼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308页。

曾。史载程曾：“受业长安，习《严氏春秋》，积十余年，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①则顾奉从程曾学的，是《春秋》严氏传。顾奉后来得到了会稽太守张霸的擢用。和帝永元中，张霸为会稽太守，“表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奉后为颍川太守，松为司隶校尉，并有名称。”^②吴郡顾氏崛起为世族，当归功于顾雍，因为他居吴之相位 19 年。顾雍早年从蔡邕学习琴书，后为州郡推荐，“弱冠为合肥长，后转在娄、曲阿、上虞”^③，所历四县“皆有治迹”。顾雍不仅自身言行处事严肃谨慎，“为人不饮酒，寡言语，举动时当”，而且严格要求族人，其孙顾谭因醉酒起舞，顾雍严厉斥责他“恃恩忘敬，谦虚不足”。^④又，族人顾悌“以孝悌廉正闻于乡党”，“待妻有礼”。其父顾向年老致仕，凡有家书，顾悌“常洒扫，整衣服，更设几筵，舒书其上，拜跪读之，每句应诺，毕，复再拜”，可谓恭敬之至；父有病，辄“临书垂涕，声语哽咽”；父以寿去世后，他竟“饮浆不入口五日”。^⑤由此可见顾氏家族以儒家道德自励的家风。顾雍在政治上立身慎重，为政正直，为人宽厚，故而赢得了“顾厚”之声誉。其子顾劭“博览书传，好乐人伦”^⑥，清谈为一时之秀，为庞统所欣赏；又能知人善任，所拔擢的微贱之人如丁谡、殷礼、吾粲等皆成栋梁。

吴郡世族是沟通“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的桥梁。陈寅恪分析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时指出，魏统治者曹氏出身寒族，并不以儒学为务；刘备即使真是汉朝宗室，也已跌落为寒族，且不甚乐读书，与真正的宗室刘焉“积学教授”不同；而孙吴政权是汉末江东地区的强宗大族拥戴江东地区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孙氏而组织起来的政权；西晋政权是儒家豪族政权，与曹魏时期不一样，而与东汉有相通之处，东汉、孙吴、西晋的社会阶级是一脉相承的。^⑦由此观之，吴郡世族实构成了东汉至西晋世族发展的重要一环。田余庆将魏晋士族分为“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前者由世家大族演变而来，保持儒学传统，个别由儒入玄；后者兴起于魏和西晋，至东晋更为突出，一般习于玄学或出入玄儒。魏晋士族只有少数几家具有东汉世家大族渊源；多数并非由东汉世家大族演变而来，而是魏和西晋因际遇而上升的新出门户。^⑧

如前文所述，“吴郡四姓”在东汉尚不能称大族，但在三国时期跻身世家大族，是“旧族门户”向“新出门户”嬗变的代表。东汉世族的代表是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等。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四代人中，居三公之位者 5 人，地位显赫。弘农杨氏，世以《欧阳尚书》著称，杨震有“关西孔子”之谓，“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⑨。东晋和南朝的门阀士族兴起于曹魏西晋之际，如太原王氏和琅邪王氏虽是东汉“旧族门户”，但早已衰落，直至曹魏入仕方才复兴。至于颍川庾氏、陈郡谢氏等，完全是新出门户，直至西晋方才显达。^⑩如此，三国时期兴起的吴郡世族，在东汉

① 《后汉书》卷七十九下《程曾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2581 页。

② 《后汉书》卷三十六《张霸传》，第 1241 页。

③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顾雍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第 1225 页。

④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顾雍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第 1226、1225 页。

⑤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顾雍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第 1228 页。

⑥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顾劭传》，第 1229 页。

⑦ 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2—26 页。

⑧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5 版，第 315 页。

⑨ 《后汉书》卷五十四《杨彪传》，第 1790 页。

⑩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 316—317 页。

世族向魏晋士族的新旧演变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尤其体现在学术和文学领域。

吴郡世族继承了汉代的家族学术传统。汉代经学注重家法,世代相传,从而形成了众多的经学世家。如《尚书》学,有夏侯始昌、夏侯胜、夏侯建等夏侯氏之学和欧阳生及其子、欧阳高、欧阳地余、欧阳政、欧阳歙等的欧阳氏之学;《礼》学,有戴德、戴圣叔侄的大、小戴之学;《诗》学,有韦孟、韦贤、韦玄成、韦赏家族的《鲁诗》韦氏学。汉代吴地的家族学术,也颇有可述,如交州,既有陈钦、陈元父子的《费氏易》学和《左传》学,又有包咸、包福父子的《论语》学。但最典型的,还是会稽虞氏和贺氏家族。会稽虞氏是著名的易学世家,从虞光、虞成、虞凤、虞歆到虞翻,五世治孟氏《易》。会稽贺氏也是礼学世家,吴末的贺循精通《礼传》,晋代议礼,多从其说。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中说:“江南自荆州学派星散之后还是继承汉儒传统,全未受什么影响。”^①“吴郡四姓”中的陆氏,在汉代最为煊赫。汉末吴郡没有遭遇战乱,因此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汉代经学的传统。如前所述,陆绩是《易》学名家,注《周易》,并与虞翻合作《周易日月变例》,被章炳麟称为“经术大师”,汤用彤视其为三国《易》学江东一派的代表,唐长孺则以为,陆绩《易》学以象数说经,继承了汉代保守的学说。

正如前文所示,吴郡世族最突出的成就体现在文史领域,在汉晋世家大族中具有独特性。汝南袁氏,虽是《孟氏易》学世家,但不以文学著名。弘农杨氏,世传《欧阳尚书》,但直至杨修,始以文学知名,且未能持久;西晋的杨骏与其弟杨珧、杨济并称“三杨”,权势煊赫,但在学术和文学上无甚成就。河内司马氏,“虽不及汝南袁氏、弘农杨氏之累代三公,但亦家世二千石,其为东汉中晚以后之儒家大族无疑也”^②,但司马氏虽然崇礼重孝,却不以经学著名。司马炎称帝后,善于啸聚风雅,多次组织华林园诗会,但本人亦无甚文学成就。范阳卢氏,卢植在汉末为大儒;卢毓在曹魏位至三公,属于“新出门户”;卢毓有卢钦、卢珽二子,卢钦颇有文学才能,著有“诗赋论难数十篇,名曰《小道》”^③。直至东晋,以王谢为代表的门阀士族兴起,士族出身的文学家蜂拥而出,士族文学的成就才炳蔚于世。因此在从汉代世族向魏晋士族转变过程中,文人辈出的吴郡世族是独特的存在。

吴郡的世族文学与魏晋庶族文学亦有所不同。庶族亦称寒族,是与士族、势族、世族相对而言。钱志熙说:“真正称得上‘势族’‘世胄’的都是先世元功大勋的后裔,他们也往往是当时的勋贵。而父祖为二千石以下的官僚家的子弟,如无世爵可承,则也应属于寒素。”^④兹以钟嵘《诗品》视为太康文学代表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为例。据《晋书》,“洎乎二陆入洛,三张减价。考覈遗文,非徒语也”^⑤,说明世族出身的“二陆”文学成就在当时最高。“三张”的张载、张协、张亢兄弟,虽以文学知名,家世并不显赫,其父张收官至蜀郡太守。“两潘”中,潘岳祖父潘瑾官至安平太守,父潘芘官至琅琊内史;潘尼祖父潘勖为东海相,父潘满为平原内史。“三张”“两潘”家族仅仅是帝国的“中层干部”,只能归入庶族文学。而“二陆”家族的“二相五侯”,是三国时期的豪门世族。士庶身份的不同,在文学内容上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左思反对“世胄躐高位”(《咏诗》其二)的不平等现实;潘岳谄事贾谧,以致

①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51页。

② 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42页。

③ 《晋书》卷四十四《卢钦传》,第1255页。

④ 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158页。

⑤ 《晋书》卷五十五《张载传》,第1525页。

有“拜路尘”的行径；而陆机的作品却注重维护故国和家族的声誉，如《吴趋行》歌颂故乡的人文和物产、《答贾谧诗》说“吴实龙飞”等，旨在对抗中原士人的歧视，因为陆氏在吴权势最大，所以要洗脱故国覆亡的责任。^①

吴郡世族文史甚于经学的情形，大约与当时经史分离和文史合流的形势有关。史学原是经学的附庸，班固《汉书·艺文志》系因袭刘向、刘歆《七略》《别录》而成，它将史部书籍系于《六艺略》“春秋类”之下，一般的解释是史部书籍较少，不足构成一家。但逯耀东指出《汉书·艺文志》不立史部，实际上和史学著作篇帙的多少无关，而是因为“当时史的独立概念没有形成，经史没有分立，史学只不过是依附于经学下的一个旁支而已”^②。魏晋史学脱离经学而独立发展。西晋荀勖撰《中经新簿》，已将史学列为丙部，与甲部经学、乙部子学、丁部集学等并列。逯耀东说：“荀勖的《新簿》不仅分划出甲、乙、丙、丁：经、子、史、集的范围，而且将史部书籍自《春秋类》摘出独立成为一部，这的确是中国目录学史发展过程中新的里程碑。”^③ 魏晋以后“经史”并称，“说明史学不仅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而且已升格到和经学同等的地位，并且成为专家之学，与经学一样成为教授与学习的现象”^④。胡宝国也说，西晋人频繁使用“经史”一词，也说明经史已经分离，随着经学与史学区别的日益明晰，在官学和私学中，史学皆成为独立教授的门类。^⑤ 宋文帝设立儒、玄、史、文四馆，从制度上确立了史学的地位。因此，吴郡世族文史成就，实是经史分离之际文史合流的体现。

责任编辑：潘文竹

Localization of Literature of Wu and the Rise of Aristocratic Literature: from the Shift between Settlers and Natives to the Contest between Wujun and Kuaiji

Xu Changshe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literary development, the forty-nine writers of the Wu Kingdom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periods, namely the early, the middle and the late, clearly showing the evolution trend of the natives and settlers and the process of the Wu's literature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n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settlers' literature to totally localized literature. In the rise of the Jiangdong literature, there was a contest between Wujun and Kuaiji. The writers of the latter prevailed and formed a big aristocratic literary group. Different from the Confucian classics of the foregoing Han Dynasty, the Wujun scholar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especially in literature, which ushered in the practice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literature by those of influence and literati from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Key words: Kingdom of Wu; literati; literature; shift between settlers and natives; contest between Wujun and Kuaiji

① 参见徐昌盛：《张华“二俊”说与陆机的悲剧命运》，《兰州学刊》2012年第3期。

② 逯耀东：《〈隋书·经籍志·史部〉形成的历程》，《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第24页。

③ 逯耀东：《〈隋书·经籍志·史部〉形成的历程》，《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第48页。

④ 逯耀东：《经史分途与史学评论的萌芽》，《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第180页。

⑤ 参见胡宝国：《经史之学》，《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31页。

论北朝歌诗的创作与表演

——以同题横吹曲、相和挽歌、杂曲本事歌为例

宋亚莉¹ 石飞飞²

1. 青岛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00

摘要:北朝乐府歌诗中的鼓角横吹曲、相和歌、杂曲歌等各有其代表作品。横吹曲中的同源乐歌如《折杨柳歌辞》与《折杨柳枝歌》等,是多次改编再创作的歌诗作品;相和歌中的挽歌重实用,广泛使用在北朝贵族和皇室葬礼上;杂曲歌中的本事体歌诗《杨白花》,继承了西晋故事体歌诗情节曲折、敷衍史实的特点,更具表演性。这些歌诗展示了北朝歌诗在创作与表演方面均具独特风格,体现了文学创作与说唱表演的密切关系,为后代尤其是唐代歌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折杨柳歌辞》;挽歌;《杨白花》;乐府歌诗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2-0060-11

北朝乐府歌诗以南北文化交融为背景,以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最具特色。鼓角横吹曲中的同源乐歌如《折杨柳歌辞》与《折杨柳枝歌》等,乐歌曲名极为相似,文本结构基本相同,歌辞内容有所关联,可能是歌诗流传过程中多次学习、改编、再创作的结果,也展现了汉魏旧曲在北朝的影响力。相和歌中的挽歌实用性极强,在皇室贵族的葬礼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杂曲歌辞中收录的北朝本事体歌诗《杨白花》,继承了西晋故事体歌诗情节曲折、敷衍史实等特点,更具现场表演性。这些歌诗可视为唐代歌诗兴盛的先导,对其研究和思考有助于探寻乐府歌诗发展、演变的规律,为后代歌诗的创作、表演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同题横吹曲的创作与表演

《乐府诗集》中,横吹曲辞被称为梁鼓角横吹曲,这些歌诗采录于北朝,在南朝刘宋时代已经流行。王运熙先生说:“北方乐曲在南朝刘宋时代既已流行,则《乐府诗集》所著录的梁鼓角横吹曲,实际是刘宋以至萧梁时代乐府前后累积起来的北方乐曲,并非仅是萧梁一代收采而成。”^①《乐府诗集·横吹曲辞》解题曰: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诗表演及文体综论”(20AZW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宋亚莉,女,山东青岛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研究;石飞飞,女,山东青岛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①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增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15、517页。

又《古今乐录》有《梁鼓角横吹曲》，多叙慕容垂及姚泓时战阵之事，其曲有《企喻》等歌三十六曲，乐府胡吹旧曲又有《隔谷》等歌三十曲，总六十六曲，未详时用何篇也。^①

《乐府诗集》著录的梁鼓角横吹曲今存作品凡 22 题 66 曲，当时应可以入乐演唱的。其中不少乐歌曲名相同，如《折杨柳歌辞》与《折杨柳枝歌》，《陇头歌辞》与《陇头流水歌辞》，《紫骝马歌辞》与《紫骝马歌》，《地驱歌乐辞》与《地驱乐歌》，等等。这些乐歌曲名大体相似，歌辞内容有所关联，乐调可能同出一源。其中文本结构、内容等关联最为密切的，当属《折杨柳歌辞》与《折杨柳枝歌》，《陇头歌辞》与《陇头流水歌辞》。相比而言，《折杨柳歌辞》与《折杨柳枝歌》又保存完整且更具代表性，因列其文本如下：

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座郎膝边。
放马两泉泽，忘不著连羈。担鞍逐马走，何得见马骑。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娑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踟蹰黄尘下，然后别雄雌。（《折杨柳歌辞》五曲）^②
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折杨柳枝歌》四曲）^③

《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歌》两组乐歌皆为五言四句，前者五曲、曲四解，后者四曲、曲四解。两组歌诗的第一曲仅有 3 个字不同，故第一曲在演唱时也起到类似引子的作用。从内容上看，前者第二曲和后者第二、三、四曲涉及的是婚嫁情爱之事，而前者的第一、三、四、五曲和后者的第一曲则与远行征战有关，叙述直白、率真。

值得注意的是，题名为《折杨柳》的乐歌魏太康末已在京洛之地流传，《宋书·五行志》记载：“太康末，京、洛始为‘折杨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词，终以禽获斩截之事。”^④说明最晚在晋太康末年，京城开始流传的《折杨柳》歌，其曲以歌唱征战苦辛开始，以获胜擒获敌人作结。横吹曲中《折杨柳歌辞》第一、三、四、五曲和《折杨柳枝歌》第一曲抒写兵革苦辛的辞意，与《宋书》所载太康时的《折杨柳》歌极为相近；而婚嫁情爱之辞，应是对《折杨柳》乐歌的改造与创新。

如前篇首所论，梁鼓角横吹曲是在刘宋至萧梁时采入乐府，《折杨柳枝歌》中写婚嫁情爱之乐歌，从内容上与魏太康末京洛之地流行的乐歌无所关联，但与梁代的《折杨柳》内容相近。《乐府诗集》

①《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09—310页。

②《乐府诗集》卷二十五，第369—370页。

③《乐府诗集》卷二十五，第370页。

④《宋书》卷三十一《五行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4页。

录有的梁元帝至江总等梁、陈诗人的《折杨柳》10首,多写离别相思,在内容上的确与上述《折杨柳枝歌》较为接近。陈朝徐陵《折杨柳》载:“嫋嫋河堤树,依依魏主营。江陵有旧曲,洛下作新声。妾对长杨苑,君登高柳城。春还应共见,荡子太无情。”^①郭茂倩于梁元帝《折杨柳》解题中指出:

按古乐府又有《小折杨柳》,相和大曲有《折杨柳行》,清商四曲有《月节折杨柳歌》十三曲,与此不同。^②

相和大曲《折杨柳行》,为《宋书·乐志》所载宋大曲15首之一,郭茂倩解题说它和清商四曲《月节折杨柳歌》13首与古乐府《小折杨柳》不同。古乐府《小折杨柳行》现已无从考证,《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歌》与《折杨柳行》《月节折杨柳歌》四者之间的关系,可稍作分析。《折杨柳行》在《宋书·乐志》中保留了两首,即《西山》(西山一何高)和《默默》(默默施行违)。《默默》为古辞,是典型的咏史之作;《西山》为文帝辞,写游仙而慨叹仙事渺茫。《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将这两首歌诗收录于《折杨柳四解》下,属相和歌辞瑟调曲,解题中引曰:“王僧虔《技录》云:《折杨柳行》歌,文帝‘西山’、古‘默默’二篇,今不歌。”又称这二曲为“魏、晋乐所奏”。^③

而郭茂倩上引文所述清商四曲《月节折杨柳歌》13首,指的是从《正月歌》至《十二月歌》的12首再加上《闰月歌》,逯钦立先生定为晋辞。其《正月歌》曰:“春风尚萧条,去故来入新。苦心非一朝,折杨柳,愁思满腹中,历乱不可数。”^④其余12首,也均叙相思离别之情,与梁陈之《折杨柳》内容大致相似。这13首歌曲的句式完全一样,均为六句,前3句和后2句为五言,中间的第4句为三言,即“五五五三五五”。而梁、陈之《折杨柳》10首则均为五言八句。二者的乐调可能已发生较大变化,或为完全不同的曲调。可知“折杨柳”类的相关乐歌,与梁鼓角横吹曲、横吹曲、相和大曲、相和歌辞瑟调曲、清商曲,都有密切的关系。

其中有些歌辞曾为魏晋乐所奏。从乐歌内容上讲,《折杨柳歌辞》继承的是晋太康时流行的《折杨柳歌》,主要表现“征战苦辛”之事。而横吹曲《折杨柳枝歌》则为晋代《月节折杨柳歌》之流变。太康末的《折杨柳歌》,无疑是可歌的。从13首句式完全一致这一点可以推知,《月节折杨柳歌》应是配合同类曲调歌唱的。故在《梁鼓角横吹曲》全部可歌的前提下,《折杨柳歌辞》与《折杨柳枝歌》又有各自的源流。梁元帝《折杨柳》,郭茂倩解题引《唐书·乐志》曰:“梁乐府有胡吹歌云:‘快马不须鞭,反插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此歌辞元出北国,即鼓角横吹曲《折杨柳枝》是也。”^⑤可见梁陈时的《折杨柳》,颇受梁鼓角横吹曲的影响,是对梁鼓角横吹曲的拟作。

陇头流水曲名本身即蕴含艰辛险阻之意,再与兵革征战、征人凄苦相关联,悲凉意味更加浓烈。《乐府诗集》所载陈后主《陇头》诗解题曰:“一曰《陇头水》。《通典》曰:‘天水郡有大阪,名曰陇坻,亦

①《乐府诗集》卷二十二,第329页。

②《乐府诗集》卷二十二,第328页。

③《乐府诗集》卷三十七,第547页。

④《乐府诗集》卷四十九,第723页。

⑤《乐府诗集》卷二十二,第328页。

曰陇山,即汉陇关也。’《三秦记》曰:‘其阪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所谓陇头水也。’”^①
内容如下: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陇头歌辞》三曲)
陇头流水,流离西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西上陇阪,羊肠九回。山高谷深,不觉脚酸。
手攀弱枝,足逾弱泥。(《陇头流水歌辞》三曲)^②

此两首乐歌写尽凄苦:环境恶劣,“羊肠九回,山高谷深”;征人身体疲惫,“寒不能语,舌卷入喉”;心境凄然,“念吾一身,飘然旷野”“遥望秦川,心肝断绝”。读来如梗在喉,令人万分心酸。两组歌诗以四言四句为主,第一曲仅一字之差,演唱时可能起到引子的作用。其他几曲,辞意相近,很有可能在同一曲调下,不同演唱者对歌辞做了字句的改动。两组歌诗都渲染陇头山高路险,配以曲调,有令人悲从中来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陇头流水歌辞》第三曲四言二句,可能佚失了两句。《乐府诗集》于两首乐歌后皆有“右三曲,曲四解”的记载,再结合其他曲皆是先叙述环境艰苦,后抒怀人之感受,第三曲缺失的应该是抒写歌者感受的两句。魏晋六朝的拟作,诸如陈后主《陇头》:“陇头征戍客,寒多不识春。惊风起嘶马,苦雾杂飞尘。投钱积石水,敛辔交河津。四面夕冰合,万里望佳人。”^③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了思念佳人的内容,既与梁陈一贯喜写艳情的审美趣味有关,也是《陇头》民间乐歌的文人化发展的表现。

此两组乐歌之外,梁鼓角横吹曲中的一些乐歌在流传中经过南朝乐工的翻译再创作,或为了保持原汁原味,或的确无法翻译,其中有一些词语直译而来,一些语句至今无法解读,如《地驱歌乐辞》《地驱乐歌》:

青青黄黄,雀石颓唐。槌杀野牛,押杀野羊。
驱头入谷,自羊在前。老女不嫁,踏地唤天。
侧侧力力,念君无极。枕郎左臂,随郎转侧。
摩捋郎须,看郎颜色。郎不念女,不可与力。(《地驱歌乐辞》四曲)^④
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地驱乐歌》一曲)^⑤

①《乐府诗集》卷二十一,第311页。

②《乐府诗集》卷二十五,第371、368页。

③《乐府诗集》卷二十一,第311页。

④《乐府诗集》卷二十五,第366—367页。

⑤《乐府诗集》卷二十五,第367页。

两首乐歌虽然题目类似,但结构、风格截然不同,《地驱歌乐辞》四曲,每曲四言四解;《地驱乐歌》一曲七言。前者杂糅着令人费解的北朝方言,如“雀石颓唐”“侧侧力力”“摩捋郎须”“不可与力”,然方言的存在并不影响对其内容的理解,反觉别有情致。歌诗前者直率表达情爱,是北朝民间乐府的典型风格;后者却委婉含蓄,颇有南朝之风。而《紫骝马歌辞》《紫骝马歌》既较好的保存北朝民歌特点,又不失文士之雅:

烧火烧野田,野鸭飞上天。童男娶寡妇,壮女笑杀人。
 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不知饴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紫骝马歌辞》六曲)
 独柯不成树,独树不成林。念郎锦襦裆,恒长不忘心。《紫骝马歌》一曲)^①

《紫骝马歌辞》六曲,每曲四解。郭茂倩解题引《古今乐录》曰:“‘十五从军征’以下是古诗。”^②今人也多采纳《紫骝马歌辞》六曲解题的说法,把《紫骝马歌辞》六解的后四解,即“十五从军征”至“泪落沾我衣”的16句视为汉代古诗^③,《紫骝马歌辞》六曲的后四曲很可能是由古诗改编而来,根据配乐演唱的需要,原16句古诗被分割成了四解。以歌辞内容看,《紫骝马歌辞》第一曲写“童男娶寡妇”的北地风俗,自第二曲起抒发游子思乡之情,与后四曲在内容上连贯,这应该也是将《十五从军征》改编为《紫骝马歌辞》的原因之一。而排在《紫骝马歌辞》之后的《紫骝马歌》,是一首情歌,其内容与《紫骝马歌辞》六曲显然不同。郭茂倩解题引《古今乐录》也说:“与前曲不同。”因二者均为五言四句,其“不同”可能包含曲调的变化,虽无更多的证据,但从《古今乐录》重点关注音乐来看,二者已非同一乐调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沈德潜《说诗晬语》中指出:“北音竞奏,钲铙铿锵,《企喻歌》《折杨柳歌词》《木兰诗》等篇,犹汉魏人遗响也。”^④梁鼓角横吹曲中同题乐歌的活跃与深受欢迎,既反映出汉魏旧曲在北朝的影响力,也是歌诗发展流变的必然趋势。

二、相和挽歌的创作与表演

《乐府诗集》收录的北朝相和歌,有相和曲、吟叹曲、平调曲、瑟调曲、楚调曲五种乐调14篇,共19

①《乐府诗集》卷二十五,第365、366页。

②《乐府诗集》卷二十五,第365页。

③参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5—336页。

④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第“六九”条,霍松林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校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4—205页。

首。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北齐和北周,且以文人歌诗为主。其中的挽歌,主要为哀悼逝者而作,由于有现实应用的需求,其创作、表演最值得注意。

北朝创作的相和歌挽歌,《乐府诗集》仅收录1首,即北齐祖珽的《挽歌》:

昔日驱驷马,谒帝长杨宫。旌悬白云外,骑猎红尘中。
今来向漳浦,素盖转悲风。荣华与歌笑,万事尽成空。^①

前四句追述亡者的生平事迹,后四句抒发哀情。全曲不直接表达悲伤,而借景寄托哀情。祖珽精通音乐,“天性聪明,事无难学,凡诸伎艺,莫不措怀,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语及阴阳占候,医药之术尤其是所长”,并“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②琵琶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相和曲七种乐器——“曲笙、笛、节歌、琴、瑟、箏、琵琶”之一。新曲指俗乐新声,相和挽歌也在其列。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此首《挽歌》能否配乐演唱,但是以祖珽的音乐才能,这首歌诗创作之时很可能考虑过入乐演唱。

《乐府诗集》记载的北朝挽歌仅此一首,而北朝挽歌盛行并广泛用于演唱表演的情形,多见载于史籍。如:

(道珣)少而敏俊。世宗初,以才学被召,与秘书丞孙惠蔚典校群书,考正同异。自太学博士转京兆王愉法曹行参军。临死,作诗及挽歌词,寄之亲朋,以见怨痛。^③

帝又亲为(冯诞)作碑文及挽歌,词皆穷美尽哀,事过其厚。车驾还京,诏曰:“冯大司马已就坟莹,永潜幽室,宿草之哭,何能忘之?”遂亲临诞墓,停车而哭。^④

(尔朱文略)系于京畿狱。文略弹琵琶,吹横笛,谣咏,倦极便卧唱挽歌。^⑤

上引第一条中的“挽歌词”,创作于宋道珣临终之前,为自挽歌,“寄之亲朋,以见怨痛”。这类自挽之作,一般不用于葬礼场合表演和演唱。第二条中的“挽歌”,是孝文帝亲自为冯诞创作的,应会在冯诞葬礼上演唱。第三条中的“挽歌”与葬礼无关。尔朱文略是一个善乐能歌之人,只是恃才放旷,与常人不同:

(尔朱文略)以兄文罗卒无后,袭梁郡王。以兄文畅事,当从坐,高祖特加宽贷。文略聪明俊爽,多所通习。世宗尝令章永兴于马上弹胡琵琶,奏十余曲,试使文略写之,遂得其八……初,高祖遗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横,多所凌忽。平秦王有七百里马,文略敌以好婢,赌而取之。明日,平秦致请,文略杀马及婢,以二银器盛婢头马肉而遗之。平秦王诉之于文宣,系于京畿狱。^⑥

①《乐府诗集》卷二十七,第401—402页。

②《北齐书》卷三十九《祖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16、514页。

③《魏书》卷七十七《宋翻传附道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90页。

④《魏书》卷八十三《冯熙传附冯诞传》,第1822页。

⑤《北齐书》卷四十八《尔朱文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67页。

⑥《北齐书》卷四十八《尔朱文略传》,第666—667页。

大约也只有这样狂放不羁的人,才能身系在狱而放声高唱挽歌。他的挽歌,更像是预见死亡、为哀悼自己而作。

如果说尔朱文略的自挽气息不够明显,也无法明确最终用在葬礼上,那孝庄帝临终的五言诗歌被用在自己的葬礼上,则是自挽的明证。据《洛阳伽蓝记》,永安三年(530年),尔朱兆将孝庄帝囚禁,缢死于三级寺,孝庄帝临崩礼佛,发誓来世不为国王,并作诗称:

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①

至太昌元年(532年)冬,孝庄帝“梓宫赴京师,葬帝靖陵”,其临终所作五言诗即为挽歌词,演唱于葬礼上,“朝野闻之,莫不悲恸。百姓观者,悉皆掩涕”。^②这说明挽歌专为某一丧主而作的礼制早已形成。这一礼制是自挽体、献挽体与奉旨创作各类挽歌生成的共同前提。

献挽是当时挽歌最为常见的创作方式。卢询祖为赵郡王妃郑氏所作的挽歌,即是典型的一例:

(卢询祖)有文集十卷,皆致遗逸。尝为赵郡王妃郑氏制挽歌词,其一篇云:“君王盛海内,伉俪尽寰中。女仪掩郑国,嫔容映赵宫。春艳桃花水,秋度桂枝风。遂使丛台夜,明月满床空。”^③

卢询祖为赵郡王妃郑氏所作挽歌,前四句盛赞郡王与王妃的伉俪之情,写出王妃女仪无双,对其品德、容貌进行赞扬,“春艳桃花水,秋度桂枝风”,借春秋代序,时光飞转来写生命的短暂,末二句“遂使丛台夜,明月满床空”,借明月照空床暗指王妃的逝世,“空”中有失落与惆怅之感,与祖珽《挽歌》“荣华与歌笑,万事尽成空”之句有异曲同工之妙。诗歌中的遗憾、悲痛和伤悼,以委婉、含蓄、优雅的方式表达出来,是较为典型的用于贵族葬礼上的献挽类挽歌。此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载献挽类挽歌,还有温子昇的《相国清河王挽歌》、卢思道的《彭城王挽歌》《乐平长公主挽歌》。

高门讵改辙,曲沼尚余波。何言吹楼下,翻成薤露歌。(《相国清河王挽歌》)^④

旭旦禁门开,隐隐灵舆发。才看凤楼迥,稍视龙山没。犹陈五营骑,尚聚三河卒。容卫俨未归,空山照秋月。(《彭城王挽歌》)

妆楼对驰道,吹台临景舍。风入上春朝,月满凉秋夜。未言歌笑毕,已觉生荣谢。何时洛水湄,芝田解龙驾。(《乐平长公主挽歌》)^⑤

①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永宁寺”条,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②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永宁寺”条,第18页。

③ 《北齐书》卷二十二《卢询祖传》,第321页。卢询祖的这首挽歌,在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齐诗》卷一中,题为《赵郡王妃郑氏挽词》(第2261页)。

④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魏诗》卷二,第2222页。

⑤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隋诗》卷一,第2636页。

卢思道的《乐平长公主挽歌》也是先写生前荣宠,再说死后万事成空。《彭城王挽歌》在写法上稍有不同,是从灵驾驶出禁门写起,中间回顾彭城王作为将军的威仪,最后归结到“空山照秋月”。卢祖洵、温子升和卢思道所作的挽歌,都明确是为某个特定的死者而作。从葬礼使用的角度考虑,叙述亡者生平,赞美其举止言谈、仪容、出身和功绩,表达生者的悲痛哀悼之情,构成了挽歌基本的写法。具体内容中又要切合不同逝主的身份、特点,准确地表达生者的情感,并配合哀乐演唱之。

北朝奉旨创作的挽歌也较多。皇室宗亲或老皇帝去世,皇帝或新皇要求朝臣文士作挽歌,从中选取优秀的作品而令挽郎演唱。这在当时已经成为朝廷的一种惯例:

及文宣崩,文士并作挽歌,杨遵彦择之,员外郎卢思道用八首,逖用二首,余人多者不过三四。中书郎李愔戏逖曰:“卢八问讯刘二。”逖衔之。^①

北齐文宣帝高洋崩于天保十年(559年)。皇帝驾崩,诸多文士并作挽歌,杨遵彦择选其高下优劣,多者如卢思道选用8首,少者如刘逖选用2首。李愔还嘲弄刘逖,刘逖因此怀恨在心。从时人对卢思道的赞美与对刘逖深以为恨的态度可见,文士们创作的挽歌被选用于帝王葬礼,应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卢思道的8首挽歌,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上述两首挽歌与为他赢得“八米卢郎”美称的那8首挽歌的创作时间,当相去不远。此事在《隋书·卢思道传》中也谈及,并述细节:“文宣帝崩,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其善者而用之。”^② 朝廷文士每人都作10首,挽歌的数量肯定非常多,所以会专门有人择选。如果每位皇帝去世后都有这样的挽歌创作活动,朝廷文士奉旨创作或主动敬献挽歌的数量更是可观,可知文献所保留下来的挽歌,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北朝时期,挽歌仍备受皇室贵族重视,朝廷有专门从事帝王挽歌表演的专业人员——挽郎。能够在皇帝的葬礼上担任挽郎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也是一项重要的人生履历,甚至成为日后平步青云、出仕为官的良好开端。他们多是从公卿以下弟子中选取的德才兼备者,其中通晓音乐是能够入选的必备条件。据笔者统计,北朝史籍可考的挽郎共11位,即:孝文帝葬礼时(499年)的周遵和、寇俊,宣武帝葬礼时(515年)的谷士恢、崔巨伦、崔胤、邢邵、刁柔,孝明帝葬礼时(528年)的杜长文、裴远、裴宽、檀翥。北朝每一位入选挽郎,在文学、武艺、门第、状貌诸方面必有一二过人之处。挽郎可谓同龄人中的精英,由他们来演唱挽歌,必会极大提升挽歌表演的整体水准。而实用性是挽歌的最本质特征,因此,只有在葬礼场合演唱或表演,才能表达其特定的内涵并体现其价值。

挽歌创作者在下笔时,既要考虑到切合逝者的身份,又要站在亲友的立场来表达赞美和哀悼。这是挽歌能够进入到葬礼程序并由挽郎演唱的基本前提。优秀的挽歌和精彩的挽郎表演的完美结合,是隆重而典雅的皇室贵族葬礼必不可少的仪式内容。然而,葬礼仪式虽然对挽歌有着巨大的需求空间,但是却没有给创作者留下多少自由发挥的余地,这从根本上限制了挽歌的发展,也正是北朝之后挽歌创作逐渐丧失生命力而走向衰弱的原因。

^①《北史》卷四十二《刘芳传附刘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51页。

^②《隋书》卷五十七《卢思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97页。

三、杂曲本事歌的创作与表演

北魏、北齐和北周各代皆有杂曲歌辞流传,《乐府诗集》共收录18首。其中北魏、北齐的作品主要是本朝诗人所作,北周作品则多出自庾信、王褒之手。《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收录的《杨白花》,是一首典型的以音乐伴唱演述故事的北朝杂曲歌诗: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①

该歌诗以杨柳之花起兴,一语双关,暗指杨华和胡太后之事。对此本事,《梁书》《南史》均有记载:

杨华,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为魏名将。华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华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踏足歌之,辞甚凄惋焉。^②

时复有杨华者,能作惊军骑,亦一时妙捷,帝深赏之。华本名白花,武都仇池人。父大眼为魏名将。华少有勇力,容貌瑰伟,魏胡太后逼幸之。华惧祸,及大眼死,拥部曲,载父尸,改名华,来降。胡太后追思不已,为作《杨白花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踏蹄歌之,声甚凄断。^③

这两段文字与《乐府诗集》的记载稍有差异。首先,今传《梁书》中的“辞甚凄惋焉”,《南史》作“声甚凄断”,而《乐府诗集》卷七十三《杨白花》解题引《梁书》作“声甚凄婉”。从歌诗表演的角度,作“声”似优于“辞”,当作“声甚凄断”为是。另外,歌诗的题目,《南史》《乐府诗集》作《杨白花》,《梁书》作《杨白华》。按《南史》,杨华本名杨白花。《乐府诗集》卷七十三的唐柳宗元所作《杨白花》,其文本中也1次提到“杨柳齐作花”、3次直接讲到“杨花”。故当依《南史》《乐府诗集》作《杨白花》。

乐府歌诗本是“缘事而发”,《杨白花》即为此类。杨白花是魏名将杨大眼之子,为魏胡太后爱慕并被“逼通之”,杨白花担心因此招来祸端,等到自己父亲去世后,就带领部下归降梁朝,并改名杨华。南去的杨华让胡太后思念不已,故而创作此曲。此歌诗含蓄地敷衍了一个女子思念所爱之人的故事,以杨花暗喻杨华,以“杨花飘荡落南家”暗喻杨白花归降梁朝,以祈愿燕子“衔杨花入窠里”暗指希望杨华回到魏朝。歌诗没有直言故事中人物,却处处暗指故事主人公,从杨白花南去归降梁朝,到身在北朝的女子拾到杨花而思念情人,再到最后希望情人归来,故事情节颇为曲折,很好地刻画出一位专情深情的女子形象,读来已令人心酸不已。配乐演唱出来,必然更动人心弦。

作为艺术作品的本事体歌诗,《杨白花》所表现的内容与真实的历史有一定差异,主人公的信息与史书中的真实记录不符。《杨白花》是以史实为原型的一种再创造,塑造了一位苦苦期盼所爱之人

①《乐府诗集》卷七十三,第1040页。

②《梁书》卷三十九《杨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56—557页。

③《南史》卷六十三《王神念传附杨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35—1536页。

归来的痴情女子形象,似乎演绎了一个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然历史事实却不尽然,史籍中的胡太后并非用情专一的痴情女子。《北史》记载,“胡太后多嬖宠,帝与明帝谋诛之,事泄,免官。”^①这里的“帝”,是后来成为西魏文帝的元宝炬;“明帝”,即胡太后之子、北魏孝明帝元诩。史家甚至认为胡太后生活太淫乱,以致天谴:“天统三年十月,积阴大雨。胡太后淫乱之所感也。”^②可见胡太后绝不是什么专情之人,杨华只是她众多的男宠之一。史籍中的杨华,也并非负心薄幸之流。据《南史》:

(王)神念少善骑射,及老不衰,尝于武帝前手执二刀楯,左右交度,驭马往来,冠绝群伍。时复有杨华者,能作惊军骑,亦一时妙捷,帝深叹赏之。^③

杨华擅长一种“惊军骑”的武艺,同由北魏入梁的王神念一样,都得到梁武帝萧衍赏识。杨华过人的武艺可能也是胡太后对他念念不忘的原因吧。《梁书》记载,归降梁朝之后,杨华“累征伐,有战功,历官太仆卿,太子左卫率,封益阳县侯”,“太清中,侯景乱,华欲立志节,妻子为贼所擒,遂降之,卒于贼”。^④因妻儿被俘而甘愿投降,可见杨华并非负心之流。综此,知《杨白花》歌诗对男女主人公都作了较大的改造,使得该歌诗成为“痴情女子负心汉”类型的本身体歌诗,在演唱上呈现一种“声甚凄惋”的效果。

《杨白花》主要通过演唱来敷衍故事,这和杂曲歌辞中的《焦仲卿妻》类似。从相关记载来看,《杨白花》的演唱者以胡太后的宫女为主,她们“连臂踏足歌之”。“连臂”,即手拉手;“踏足”,当是应和音乐节拍的跺脚。据说,“连臂”而歌的舞蹈样式“在原始社会中是广泛流行的舞蹈形式,至少在亚洲北大陆草原是这样的”^⑤。事实上,从考古发掘实物来看,“连臂”而歌的舞蹈形式在中国大地上分布更为广泛。^⑥胡太后作为北魏鲜卑人,其宫女表演《杨白花》时的“连臂踏足”之舞,采用的当是鲜卑族传统的舞蹈形式。我们今天已难以考知更详细的《杨白花》表演方式,但据其“声甚凄断”的表演效果可知,这是一种音乐、歌辞、舞蹈共同配合的表演。

与《杨白花》相比,《咸阳王歌》也是有史事依托、可以入乐演唱并广为流传的乐歌。据《北史》,景明二年,咸阳王元禧因谋反被赐死,临死之际,散尽家财:“禧之诸女,微给资产、奴婢。自余家财悉以赉高肇、赵修二家,其余赐内外百官,逮于流外,多百匹,下至十匹,其积聚若此。”宫人伤其人其事,乃为作歌诗:

其宫人为之歌曰:“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踏霜与露。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虽富贵,闻弦管奏之,莫不洒泣。^⑦

①《北史》卷五《魏本纪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5页。

②《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26页。

③《南史》卷六十三《王神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35页。

④《梁书》卷三十九《杨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57页。

⑤盖山林:《阴山岩画与原始舞蹈》,《舞蹈论丛》1981年第4期。

⑥关于这一点,详可参阅刘怀荣:《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2—69页。

⑦《北史》卷十九《咸阳王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92页。

“奈何作事误”一语,对元禧的痛惜、悲悯远在责备之上;“洛水湛湛弥岸长”一语,更借湛湛洛水寄予无尽的哀思。从“其歌遂流至江表”可知,这首乐歌曾从北地流传至江南。歌诗通过咸阳王的故事表现了深深的懊悔和无奈,配之管弦,“北人之在南者”闻听此歌,无不悲从中来,潸然泪下。由此可见,杂歌曲中的本事歌诗往往对现实的人和事加以演绎和升华,从而成为广为大众喜爱和传唱的新曲辞。

北朝乐府歌诗是中国歌诗的重要组成,此时期政局动荡、王朝更迭频繁,多民族地域文化和音乐元素的融入,南朝文人的入北,北朝各代统治者的喜好和民间普遍的文化消费需求,为北朝乐府歌诗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北朝鼓角横吹曲中《折杨柳歌辞》与《折杨柳枝辞》、《陇头歌辞》与《陇头流水歌辞》等同题乐歌,相和歌中的挽歌,杂曲歌中的本事体歌诗《杨白花》等,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北朝歌诗在创作、演唱、表演等方面的独特风格,体现了文学创作与说唱表演的密切关系,为后代尤其是唐代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潘文竹

On the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Northern Dynasty Song Poems

Song Yali¹ Shi Feifei²

1.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2.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00, China

Abstract: *Gu jiao heng chui qu*, *xiang he* lyrics and *za qu* lyrics in the *yuefu* poetry of the Northern Dynasty have their own representative works. The poems of the same origin that can be performed with music in the *heng chui qu* such as "Lyric of Plucking Willows" and "Song of Plucking Willows" are poems adapted and re-created for many times. The elegies in *xiang he* lyrics are practical and widely used in funerals of nobles and royal families in the Northern Dynasty. The story-style poem "Yang Bai Hua" in the miscellaneous songs inheri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ory-style song poem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tortuous and perfunctory with historical facts, is more performative. These poems show the unique style of poetry in the Northern Dynasty in terms of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 reflec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creation and talking-and-singing performance,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in later generations, especially in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Lyric of Plucking Willows; elegy; Yang Bai Hua; *yuefu* poetry

秦王朝皇帝理论的政治伦理缺陷及其后果

张师伟

西北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3)

摘要: 秦王朝短命而亡固然有其执政理念、政策体系及六国残余势力等的影响,但它所建构的皇帝理论在政治伦理上存在的缺陷在根本上是难辞其咎的。皇帝制度建构起来以后,秦王朝仍然延续了无限尊崇圣人的理念,并因圣王合一的特点而将帝王摆在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上,使其能够以圣人之禀赋而率性而为,奉行霸道政治伦理,虽以圣王自居,以救世自命,但在实践中却已是政令日非,民生愈艰,终至于不亡不止。秦王朝的短命而亡,并非皇帝制度体系的缺陷所致,而是皇帝制度体系在政令制定及政策运营的伦理指导上存在根本性缺陷所致。

关键词: 秦王朝; 皇帝理论; 霸道政治; 伦理缺陷; 短命而亡

中图分类号: K233; D6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2-0071-10

先秦诸子在政治伦理思想方面固然创造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也在许多方面无愧于中华民族的智慧瑰宝,迄今仍在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与理论借鉴价值,但就先秦诸子在当时的共同理论成果而论,秦始皇所继承的圣王救世思想和一统理论乃是其中最为主要的方面。^① 诸子百家尽管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意见纷纷,莫衷一是,但在圣王救世的理想上却取得了高度共识,虽然各个学派在政治理想上差别甚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将各自政治理想的实现希望寄托在圣王,唯有圣王才堪当挽救当时衰乱之世之重任。秦始皇在开创皇帝制度和创生皇帝理论的时候,虽然有自己在具体细节上的创造性,但其核心的内容设计却几乎完全来自于先秦诸子在圣王救世理想上的高度共识。在秦始皇的皇帝理论中,皇帝取得了圣王的资格,取代了圣王的位置,或者说秦始皇之皇帝无非是诸子所谓圣王的现实版本,在救世所要求的圣王的智慧、仁慈、德行、能力及功绩上,皇帝不仅完全合乎圣王的要求,甚至还远远地超越了诸子视域中的三皇五帝等上古先王。“古之五帝三王,……实不称名,……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② 秦始皇之皇帝作为诸子之圣王的现实版本,更为集中地体现了人类理性的能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并因此而更为明显地减少了所受到的天、民及神等的制约,皇帝作为现实版的圣王,智慧卓越,能力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16ZDA104)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转换与创新研究”(22XZZ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师伟,男,山西汾阳人,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思想史研究。

^①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9页。

^②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6—247页。

超群,爱心无限,功绩至伟,没有任何的污渍及缺点、不足,具备了任意行政的充分条件。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秦始皇父子在如何行政的问题上,完全能够以战国思维的国家本位立场,肆意而为,无所忌惮,超越了时代的限制,穷尽了天下的财力,民穷财尽,民怨沸腾,“天下苦秦”,^①终至于招来了“斩木为兵,揭竿为旗”^②的抗暴义兵,貌似鼎盛的秦王朝由此短命而亡,仅仅存在了十五个年头,而未能如秦始皇所预计的那样传诸万世。

秦王朝的短命而亡,标志着战国时期颇为流行之霸道政治伦理观念退出了历史舞台,政治大一统的王朝呼唤着能行王道的政治伦理观念。一方面,至尊的政治权力需要得到彻底之理论所提供的伦理约束,理论彻底性不够即不能在政治伦理上居于至尊政治权力的上游,以使政治权力自觉地遵循政治伦理的规范,知有所顾忌,而不肆意妄为;另一方面,理论的彻底性又必须体现出政治伦理上的建设性,只有建设性的政治伦理,才能够发挥引导、规范和约束的作用,赋予政治制度以应有的严肃性,保证政治关系具有必然的稳定性,并在赋予统治者以统治正当性的同时,产生让统治者敬畏的神圣性。秦王朝在政治伦理思想上的缺陷在根本上就来自于它的实用性取向,但求理论为政治所利用,放任政治不受理论的制约,以至于统治者在享有政治伦理思想所赋予的政治至尊地位之同时,却毫无政治伦理上的自我节制与自觉约束,肆无忌惮,无所拘束,既已“专以天下自适矣”,^③又“独擅天下之利”,^④任性的最高权力最终招致了可悲的结局,秦王朝“只有十五年的历史,就被伟大的农民战争推翻了”。^⑤尽管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但也恰恰因为加强了控制而得以将政治伦理上的任性缺陷放大,而至于不可收拾。汉帝国的长久在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对皇帝制度体系进行了必要的政治伦理矫正的基础上,敬天,尊儒,爱民,知所顾忌,有所约束。

一、秦王朝皇帝理论的霸道政治伦理逻辑及其效果

秦王朝的建立漫长而曲折,秦人从周王朝的附庸开始其奋斗历程,经历了建立国家、渐进强大,最终统一华夏,建立秦王朝,一路走来,克服了重重险阻,收获了发展的果实。秦国在统一华夏之前的历史阶段,取得了诸多可圈可点的成绩,而它统一华夏的功绩也一再被看作是秦国鼎盛阶段的标志性成果。秦国为什么能?这个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研究的相当价值。秦王朝建立后在鼎盛段迅速地盛极而衰,并由衰而亡,同样也极为令人瞠目。秦王朝怎么会这样?秦为什么会一路高歌猛进在列国中崛起,又何以会二世而亡?在秦王朝灭亡后的数千年间,理论家们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后者,而对于前者则关注不够;现代学者中不少人关注前者,而相对淡化后者。古今理论家关注点的不同,主要取决于各自的思考目的,古人注重从亡秦中吸取教训,秦国崛起在他们看来,并无意义,今人则注重分析秦国崛起的治理秘密,以为现代国家治理之借鉴,而秦王朝短命而亡却并没有太复杂的影

①《史记》卷48《陈涉世家》,第1950页。

②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页。

③《史记》卷87《李斯列传》,第2555页。

④《史记》卷87《李斯列传》,第2556页。

⑤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36页。

响因素可以挖掘。但在实际上,秦国在列国中崛起和秦王朝短命而亡,具有共同的内在机制,体现了同样的政治伦理思想。在秦国一路崛起的过程中,国家建构及国家治理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来自于国家本位的法家学派,这是自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以来,就一直在秦国政治中发挥指导作用的政治伦理思想,在法家政治伦理思想指导下,秦国的制度设计及行政策略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以法教育、动员、组织及利用民力的政策,秦国一路崛起的秘密,就在于它拥有一套能够充分动员、组织和利用民力的制度体系和行政策略,使得民力通过行政而几乎完全转化为国家的战力。在秦统一之后,秦始皇确立的皇帝制度,并未改变在制度平台上穷竭民力的行政策略,“他的一切功绩都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之上的”,^①但是在统一完成之后,国家的战力已经无用武之地,并不能经由战争中的军功而反馈民力,民力被充分地动员和组织起来以后,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了皇帝无穷欲望的满足中,民力有尽,欲望无穷,不至于民力竭尽而不能停止,而民力竭尽后,国家就不得不面对覆舟的滔天巨浪,“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②陈胜、吴广开启的抗秦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并最终荡灭了具有赫赫声威的秦帝国。

1. 秦王朝国家本位的霸道政治伦理。秦王朝作为皇帝制度的开创者,它在政治理论上的创造性就在于皇帝理论。虽然皇帝制度和皇帝理论在秦以后持续地存在了两千多年,但自西汉以后,皇帝制度及皇帝理论都越发明显地染上了儒学的特征,与儒家化了的意识形态逐渐融合在一起,在政治伦理上呈现出了儒家王道的显性内容。秦王朝的皇帝制度及皇帝理论,既没有受到黄老学派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从而在行政策略及政策供给上有所收敛,更没有受到儒家化意识形态的整体性约束,从而使得王道之“仁义不施”,^③而霸道之为国驭民依旧。秦王朝国家本位的霸道政治伦理,首先表现在目的上的国家本位,即国家制度安排及行政策略等优先实现国家的目的,比如秦王朝的诸多重大举措都在维护国家之利益,筑长城,修直道,巩固权威,统一文字,行封禅,巡天下,如此等等,无一不是直接服务于新统一之国家的稳定,甚至于为国力之增加及边防之需要而广泛动员和使用民力,^④具体的惠民之政则在内容上空空如也。秦王朝国家本位的霸道政治伦理,其次表现在以强力行政,推行法家之重刑主张,奉行以力服人之原则,它表现为国法对民生的强有力干预,民生之一切都在国法之下,而国法则以重罚之强力使民服从于国家意志,服务于国家之目的,民之利害必以国之利害而利害,否则就会遭遇强力之惩罚,民以是否有利于国为有政治价值之标准,而国则并不以是否有利于民作为其有政治价值之标准,反而是以满足君主为主,“专以天下适己”。^⑤秦王朝国家本位的霸道政治伦理,还表现为行政在内容上缺少仁义的内容,虽然皇帝理论也在理念上自诩“赏及牛马,恩肥土域”,^⑥但在实践中却既无轻徭薄赋之举,也无使民以时的观念,役民无度在结果上就是夺民衣食,置民于艰难困顿中而不顾,以至于民生困苦而“天下苦秦久矣”。^⑦

① 林剑鸣:《秦史稿》,第383页。

② 《汉书》卷51《贾山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32页。

③ 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第3页。

④ 林剑鸣:《秦史稿》,第371—383页。

⑤ 《史记》卷87《李斯列传》,第2555页。

⑥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2页。

⑦ 《史记》卷48《陈涉世家》,第1950页。

2. 秦王朝霸道政治伦理的民以为国。在秦王朝之前,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早就存在不少关于国与民之关系的看法。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①颇有代表性,既在政治伦理上将民作为国之前提,无民即无以为国,无民也无以为君,所以民不仅是国之宝,也是君之宝,如孟子所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②法家思想家也在政治价值上有君以为民的观念,将君设定为民之手段,将民设定为君主之目的,“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③诸子中的多数学派,都承认民在政治中的目的性价值,并以重民、爱民、惠民等作为行政指南。秦王朝霸道政治伦理却将国家及君主置于目的性的位置上,而以民为满足国家及君主需要之工具,务求民必须要有利于国及有利于君。而有利于国和君,在霸道政治伦理指导下,两者并无实质的不同,都认为民只有工具的价值,而无目的之价值。秦王朝霸道政治伦理,在民与国之关系上,奉行民以为国原则,即将君主掌控的国作为行政之目的,而将民作为服务于国之目的之工具,在君之需即为国之需的制度环境下,民以为国就包含了民以为君。民以为国的行政伦理思想,一方面将衡量民在政治价值上正当与否及正当性程度的标准与尺度,确定为民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服务了国之目的,并因此而使民如何生存在根本上受到了国家需要的规范与制约,民必须以满足国家利益需求的方式来生活,国家则可以用自身的需求无限制地索取于民;另一方面也使民完全失去了主动影响政治及行政的理由,并且由此豁免了国家行政改善民生的义务,国家行政的内容由此而变成了只是以民力奉养国家,而毫无以国家之力反哺于民的惠政。即使统治者欲求无度,秦王朝的行政在贯彻民以为国的伦理原则上也未尝变革,民以为国表现在法治上,就是官依法治民,民奉法为国,两者依法交往,国不爱其民,民也不爱其国。

3. 秦王朝霸道政治伦理的求治反乱。秦王朝在创立皇帝理论和建立皇帝制度之时,在长治久安上表现得信心满满,“皇帝之德,存定四极”,^④“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莫不安所”,^⑤“人迹所至,无不臣者”,^⑥“日月所照,莫不宾服”,^⑦并以为从始皇帝开始可以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⑧但在秦始皇之后,秦王朝顷刻间就陷入了大乱,朝堂上君昏臣奸,领土上狼烟四起,揭竿斩木之人来势汹汹,六国残余势力则借势割据称雄,曾并吞八荒的秦王朝竟至于一蹶不振,乱极而亡。何以求治而反乱?秦王朝奉行的霸道政治伦理恐难辞其咎。一方面,秦王朝大一统之后,国家已经没有敌国,列国争雄之霸道伦理已完成其使命,动员、组织和利用民力以增强国家之战力的必要性,已经不复存在,而国家因动员、组织和利用民力所造成的损失也不能再由战胜攻取而得到敌国的补偿。深彻动员、完全组织和充分利用民力于国家目的,必然造成统治者穷奢极欲和民穷财尽的不良结果,而这种不良结果之累积则必然损害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求治而反乱,在很大程度上,乃是这种霸道政治伦理思想指导下治国理政的必然结果,汉初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多反

①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73页。

②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第1001页。

③ 《慎子·威德》,转引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90页。

④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5页。

⑤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2页。

⑥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5页。

⑦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4页。

⑧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36页。

其道而为之。另一方面,秦王朝在大一统之后,在许多重大工程上操之太急,比如长城、直道、灵渠等虽然有修筑的必要,但在大乱之后可以稍微缓一缓,国力及民力都在历年的大战中耗损颇多,难以在短时间内再有余力从事规模浩大的公共工程建设,然而秦王朝之统治者抱着霸道政治伦理的宗旨,行政只从国家之需要及君主之欲望出发,国家之需要不肯稍缓,君主之欲望不减反增,官吏们滥用威权,国家滥用民力而不曾稍缓,民力日益枯竭,民生日益困苦,终至于忍不可忍,天下苦秦久矣,^①大乱之来临,遂不可避免。秦王朝统治者在历来霸道政治伦理基础上所取得的成功,导致了他们在行政上的过度自信,而过度自信又遮蔽了节制的理智,犯错而不知,有乱而不认,终至于大乱而国灭。

二、秦王朝皇帝理论的伦理瑕疵及其政治悲剧结局

先秦诸子寄希望于圣王来挽救战国时期的衰乱之世,从理想的层面而论,并无明显的不妥。每当衰乱之世降临时,理论家都会代表社会,提出理想的救世方案,而每一个救世方案的兑现及履行都无不需要非常之人。古希腊之柏拉图也曾寄希望于哲学王来挽救当时的衰乱,只是在意识到哲学王在经验中可能性极低,甚至意识到了哲学王在经验中无可能性的时候,他才将挽救衰世的希望寄托在良法上。^②先秦诸子中的绝大多数都将挽救衰世的希望,只寄托于圣王,而对其他则无所寄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中国自上古以来就存在的尊崇先王的政治传统,古圣先王既曾在历史上创造了盛世之良治经验,又在国家善治上创造了具有一定普遍价值的思想传统。先秦诸子在政治思维方式上受到的现实约束及所继承的理论资源,决定了他们在思考和解决国家善治问题的时候,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理想中的古圣先王,寄希望于在当世也出现如古圣先王那样智慧超群、功业卓著并深藏爱心的圣王,共同炮制了圣王救世的理论。^③在先秦诸子看来,战国时期的衰乱,非具有古圣先王那样的智慧及功业、爱心等,就不足以堪当救世的重任。虽然各家在圣王理想的内容设定上各不相同,但其对于圣王挽救衰乱之世的愿望却非常一致,圣王救世理想就由此而成为时代之政治共识。因为诸子在圣王救世的理想内容上各有侧重,在经验中也并不难提供一个可靠的模本,再加上每一个关于圣王救世的理想内容,都没有在经验中检验过,所以当秦始皇以皇帝理论及皇帝制度将圣王救世理想予以兑现的时候,就难免出现内容上的明显瑕疵,而此瑕疵也就恰恰成了秦王朝政治悲剧之政治伦理思想的根源。

1. 秦王朝皇帝理论的圣王救世伦理。秦王朝开创的皇帝理论貌似横空出世,而实际上却颇有渊源。一方面,中国自上古以来即以宇宙至上神为政治至尊权力的源头,至上神不仅派生出了政治至尊权力,而且也支配着至尊权力,殷商时期的听于神和西周时期的得天命,都不过是人间至尊权力以至上神之名义而获得政治伦理正当性的途径,人而以至上神的名义来获得行使政治至尊权力的垄断资格;^④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战国诸子在理想统治者的选择上也广泛地推崇圣王,形成了圣王救世的

① 《史记》卷48《陈涉世家》,第1950页。

② 王楷模:《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③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第129页。

④ 张师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演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1—102页。

时代性共同理想,虽然圣在此处乃是人之理性的高度抽象,圣人也由此而成为人世间理性程度最高的人,以圣人为王,就是选择了以理性的方式挽救衰乱之世,人之理性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神化,圣是人的神化,圣王则是王的神化。诸子在理论内容上还只能达到将王理性化为圣,还没有将王的理性化推进到神化的地步,秦始皇开创的皇帝理论则以神秘、神圣的神化概念——皇帝,来指称人世间的王者,在理论上实现了对王的彻底神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始皇的皇帝理论就是战国诸子圣王救世个体理想的神化升级版。“秦始皇承继了春秋战国的‘造圣’和‘崇圣’的思想成果,同时又有新发展,这就是朕即圣,即圣王”。^①两者只是在神化的程度上有别,而在政治伦理的内容上则根本一致。皇帝作为王者之圣化彻底的政治结果,在理性的程度上超越了一切人,成为高出他者的唯一至尊存在,全知,全能,全善,既不需要他者补充其不足,也不需要他者的帮助,更不需要他者在伦理上的矫正偏颇,在人世间的一切事务中,皇帝获得了绝对自由支配的权限,既可以殚精竭虑的付出,也可以肆无忌惮的任性,不必担心有错误,因为他自以为不可能犯错误,也不必担心被推翻,因为他以为自己有绝对的权威。“天上地下所有一切都属于皇帝所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是占有、支配一切的最主要的根据”。^②人而自以为是神,就必然要在政治伦理上犯过于自信的错误。

2. 秦王朝皇帝理论的政治伦理缺陷。秦始皇之皇帝理论在政治伦理上的最大缺陷就是过于自负,以至于在行为上失掉了应有的敬畏和警惕,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至于灭亡而自负不能止。实际上,中国上古的典籍中既不缺乏重民的理论,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③也不缺乏统治者任性而为不知自律的众多经验性后果及其教训,“民弃其上,不亡,何待”,^④但那都是人世间还未神化的人所看到的常规现象。人世间的诸多经验性瑕疵,并不会因为人的被神化为圣就不存在,但人被神化到圣以后,就会在理性上过于自负,而不能看到自身之不足、局限及相应的政治危险。从诸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来看,战国衰乱之世的挽救必须要依靠拥有理性的智者,只有智者才能基于理性而有效解决问题。但当所面对的问题复杂艰巨时,人们就会对赖以解决问题的理性给予无限的希望,将理性神化为无所不知、无所不及、无所不能的圣,以便能依靠圣来解决一切的问题。“圣人是赞天地之化育的中介,是人类的救星,……是真、善、美的人格化”,^⑤然而当理性被神化为圣的时候,圣就已经是非理性的神,而自动失去了判断自己能力的理性精神,自以为无所不能,自以为永远绝对正确,不知戒惧,不顾危险,不知所止,犯错而不知,履险而不返。秦始皇的皇帝理论在将理性神化的程度上远超先秦诸子,秦始皇被神话为古往今来第一人,“自上古以来未尝有”,^⑥既在理论认识上不允许有不同的见解,也不允许他人议论自己的言行,更不允许别人指正自己的缺点,甚至都不允许他人报告实情,犯错而不接受被提醒,昏聩而不接受贤者辅助,秦二世甚至是即使面临着危亡的险境,也依旧任性而为,终至于政治局面不可收拾,不亡而无止。秦始皇时期任性而为、不知收敛的苛政,已经让天下人“苦秦久矣”,^⑦

①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第132页。

②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页。

③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廖名春、陈明整理,吕绍纲审定:《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7页。

④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48页。

⑤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30页。

⑥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36页。

⑦ 《史记》卷48《陈涉世家》,第1950页。

秦二世的昏聩妄为又进一步瓦解了国家用以解决问题的能力。^①一方面,民怨沸腾日趋激烈,另一方面,国家治理越发无能,两者叠加在一起,秦王朝在政治伦理上的缺陷就必然滋生出乱亡的结局。

3. 秦王朝短命而亡的政治悲剧结局。秦王朝短命而亡的悲剧结局,向来颇具理论吸引力。不同时代的众多理论家都曾经就此议题发表过不少高论,有的理论家哀悼亡秦而试图从亡秦的政治悲剧中吸取教训,求取长治久安的策略,其中颇为著名者即为汉代之贾谊;有的理论家则借秦短命而亡的事实,批判秦始皇父子的暴政,试图从秦政传统中走出来,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谭嗣同。不论是哀悼亡秦,还是鞭挞暴秦,秦王朝短命而亡的悲剧结局终是事实。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悲之国也必有可恨之理。秦王朝之短命而亡,从后来一系列事实来看,并非其所确立的一套国家制度不合于时而存在根本性缺陷,即秦始皇所确立的皇帝制度具有历史发展的高度合理性,继承秦王朝皇帝制度的汉朝,比项羽所实施的霸王体制,更具有制度的优越性,楚汉战争中的刘胜项败在各自所选择的国家制度上就已经决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始皇所确立之皇帝制度在政治伦理上的历史先进性在当时是毋庸置疑的,皇帝理论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伦理内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秦王朝之短命而亡,在根本上乃是由于它的行政伦理缺陷,即在政治制度已经确定的情况下,秦始皇父子在如何行政的问题上犯了伦理性错误,并由此而犯下了一系列无可挽回的行政策略错误,既不能正确地处理重要的关系,比如在尊君与重民的关系上就犯了重大的原则性错误,片面地执行了国家本位、君主本位的策略,忽略了重民、惠民、利民及爱民等的政策落实,以至于民穷财尽、民怨沸腾而不自知;也不能自觉地调节自己行为,节制欲望,轻徭薄赋,以天下之财养天下之民,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以疲惫之民奉养皇帝无穷之欲,在行政中本末倒置,不啻于割肉自食,肉尽而身死,民尽则国亡。诚如柳宗元所说,“失在于政,不在于制”。^②

三、秦王朝皇帝理论在政治伦理思想上的教训反思

秦王朝所开创的皇帝理论及皇帝制度,在政治伦理上有其相当的历史合理性,特别是在制度体系的建构方面。这一点已经在皇帝理论及皇帝制度的长期延续中得到了证明,在民主体制于近现代获得制度优势之前,秦王朝所开始的皇帝理论及皇帝制度在传统农业社会治理中的优势,在古代世界中还相当明显。诚然皇帝理论及皇帝制度在秦以后的历代都有所发展,皇帝理论及皇帝制度相对于同时代其他政治理论及制度的优势,并不能都归功于秦,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秦以后的历代贤明统治者。秦王朝在政治伦理思想上留给后世的主要理论遗产是负面的,或以负面为主的。在政治伦理上,秦王朝最广为诟病的内容就是他在行政伦理方面所犯的错误,它在其他方面所犯的错误大多都根源于行政伦理的错误。秦王朝在行政伦理方面所犯的错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错误是犯在了价值目标的层面上,即在价值目标上颠倒了国与民的位置,以至于在行政的价值上不仅几乎完全忽略了保民、惠民、利民等方面的内容,而且还在行政的价值上过于突出了国家的地

^① 林剑鸣:《秦史稿》,第434—435页。

^② 柳宗元撰,吴文治等点校:《柳宗元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0—111页。

位,将民设定为国家的手段,民以为国,将国家设定为民的目的,为国而不惜民力,甚至不惜民命,以至于行政的结果将民逼迫到了国家之敌人的位置上,以亡秦为己任,“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①彻底失去了民。第二个错误是犯在了行政之方法的层面上,将苛政作为了行政常态,不知道养息民力,而一味地以强力行苛政,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为行政令而不顾民生,罔顾民命,以至于在结果上不仅将民力榨尽而至于民怨沸腾,“天下苦秦久矣”,^②而且还以苛政而瓦解了自身的能力,任官者尽责有功则遭奸人记恨和陷害而不得安生,因故不能尽责而致败,则沦落成为国家危亡的背锅侠,同样也不得安生。秦王朝的苛政将人们赶入了绝境,“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③除了反抗或背叛,就只有死路。

1. 政治价值的迷失与国家治理之本末倒置。秦王朝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处在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位置上,在一定程度上,它必然要承受因为理论发展不成熟而带来的苦涩结果。秦王朝在理论上继承了诸子的思想遗产,将诸子圣王救世的共同理想落实转化为一种具体的政治制度理论,并据此而建立起了相应的政治制度体系。但因为秦王朝继承诸子的方式,并不是理性的梳理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只是从政治家的立场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取其所需,并进行实用主义的内容组合,所以秦王朝并没有达到将政治制度建立在彻底理论逻辑的基础上,反而以政治实践之需要来组合理论之不同内容,以至于政治实践既不能得到理论之真正的支持,也不能获得理论之必要的规范和约束,而政治实践则由此而处在为所欲为的野蛮境地,而野蛮则构成其灭亡的原因之一。^④秦王朝在理论上的不成熟,表现在政治伦理思想上,就是迷失了政治价值上的方向引领,以至于既不能正确地处理政治统治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也不能恰当地定位政治统治所要达到的目的,更不知道政治统治在实践中必须要坚守而不能突破的底线。政治价值上的迷失表现在国家治理上的结果,就是在政治实践中形成了本末倒置的不良国家治理。这既表现在秦王朝竭民力而失去了治国之本、尽国家之职以满足君主之欲望的手段与目的之错位上,“专用天下适己”“独擅天下之利”,^⑤也表现在政策选择上错误地排列了国家机器建设与休养民力等的优先性位次,致使天下人“苦秦久矣”。^⑥国家治理因在价值选择上的失误而导致的本末倒置,一方面导致了统治者在政策选择上的严重错误,一再地殫竭民力,以至于民力疲惫、困顿而趋于极端,形成“天下苦秦”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又导致了统治者视民为敌的不良态度,在风起云涌的反秦浪潮之中,只知道使用暴力手段剿灭,而丝毫不反省其错误的政治价值观,在错误政治价值观的引领下一直错下去,不亡不休。

2. 秦王朝行政伦理的苛政取向及逼民为敌。如果说秦王朝在政治制度理论及其制度伦理方面还有较大的历史合理性,在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期,促进了新型制度体系的建构,基本形成了秦汉以后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那么秦王朝在行政伦理方面的错误则

①《汉书》卷51《贾山传》,第2332页。

②《史记》卷48《陈涉世家》,第1950页。

③《史记》卷48《陈涉世家》,第1950页。

④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第8页。

⑤《史记》卷87《李斯列传》,第2555页。

⑥《史记》卷48《陈涉世家》,第1950页。

在败亡之后就屡屡为人们所诟病,其中最主要的诟病就是贾谊所说之“不施仁义”。^①从后世人们对秦王朝之行政伦理的诟病内容来看,苛政虐民无疑处在首位。秦国从商鞅变法之后,就大行法治,而法治的秘密就在于国家以利害用其民,既务求使民皆有利于国,也务求让民竭尽全力以有利于国,国与民之间的关系只在于利害,为求国之大利,就必须依法使民,使其务必穷尽其力。在秦国一路崛起的过程中,国家不断开疆拓土,国力膨胀时,民力也渐趋竭尽,特别是在吞灭六国的战争中,六国皆竭尽民力以保国,秦国竭尽民力以灭六国,国家只是用强制手段逼迫民尽死力,而并无利以赏赐于民,除了少量军功地主外,绝大多数民都在苛政之下,苟延性命。秦王朝统一之后,民即不再有军功致富的路径,而仍然有尽死力以为国家的法定义务,国家治理在内容上主要就是竭尽民力以为国家,其于民力则并无息养之内容,使民陷入“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绝境。^②在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秦王朝在行政伦理上仍坚持战国时期的霸道原则,而民却已经不能再从对外战争中获得爵产之利,行政在内容上就失去了军功之赏的一面,而只剩下了竭尽民力以为国的一面,频繁地动员、组织和利用民力的苛政,终于在政治结果上产生了逼民为敌的效果,载舟之水,其性至柔,可任由行舟者驾驭其舟,但是在变成了覆舟之水以后,其性至刚,无坚不摧,任何强悍的国家机器都不足以抵御覆舟之水的滔天巨浪。

3. 秦王朝行政伦理的昏聩瓦解了国家能力。秦王朝的行政伦理还无法有效预防统治者的昏聩。秦王朝统治者的昏聩,一方面是因为秦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集圣与王于一身,并在政治伦理上高度自信,而在实质上“窒息了理论思维”,^③不允许他人思考,不允许他人议论,而只允许学习皇帝之明法,“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④,除了法之外,其他的理论不允许存在,不允许传习。“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⑤虽然在客观上已经造成了统治者闭目塞听以治天下的危险局面,但最高统治者仍然自以为无恙,我行我素,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即使至此绝境,仍不愿闻听他者之言。另一方面,秦王朝统治者的昏聩,也是因为最高统治者在行政的过程中,不能正确地辨别忠奸善恶,以顺承己意为忠,以违逆己意为奸,以纵容自己之愿望为善,以阻遏自己之愿望为恶,以至于嘉言善谋尚未能上达于君而倡议者已得罪,君早为奸邪阿谀奉承之声盈耳而谗谀之人已富贵,为国立功者,经历千难万险而功归于谗谀之近臣,为将者,虽功勋累累也不免因谗言而获罪。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理论赋予王以圣者在智上卓越的绝对优势,就在实践中转生出了在行政伦理层面的致命缺陷,皇帝在形而上世界中所拥有的无限智慧,只是皇帝制度所需要的一种形而上判断,但皇帝如果以为他在形而下世界也具有无限智慧,那就一定会在行政伦理上带来过于自信的偏激性错误,并因此等错误而堵塞了经验理性的资政途径,使自己处在认识错误而无从纠正、行事乖离而无从纠偏,而只能一误再误而陷入绝境。行政伦理上过于自信的偏激,将秦王朝之最高统治者在自身资质平平之下,陷入了不智不明

① 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第3页。

② 《史记》卷48《陈涉世家》,第1950页。

③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8页。

④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5页。

⑤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5页。

的境地,并因君之不智及不明而使国家治理能力趋于瓦解,国家治理在组织上越发没有凝聚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越来越低,能有效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少,而面对的问题、困难及危险反而越来越大,在解决问题已经无望且危险越来越大时,国家治理的体系遂分崩离析。

秦王朝在政治上迅速灭亡的命运,在根本上即归结为它在政治伦理思想上的致命缺陷,但它在政治伦理思想上的致命缺陷又是难以避免的。秦王朝因政治伦理思想上的致命缺陷所导致的速亡结果,乃是克服其在政治伦理上致命缺陷的一剂良药之药引子,可供继秦而起的王朝镜鉴。但只有药引子,也不能真正纠正秦王朝在政治伦理思想上的致命缺陷,真正能够纠正秦王朝政治伦理思想之致命缺陷的良药,只能是诸子百家在政治伦理思想上融会贯通的真正集大成者。

责任编辑:侯德彤

Political Ethical Defect of the Emperor Theory of the Qin Dynasty and Its Consequences

Zhang Shiwe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710063,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short death of the Qin Dynasty was caused by its ruling philosophy, policy system and the remnants of the six states, the political ethical defects of the emperor theory it constructed were also to blam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mperial system, the Qin Dynasty still continued the concept of infinite reverence for saints, and placed the emperor in the supreme sacred position due to the unity of the holy and the emperor so that the emperor assuming himself a saint with talent could act arbitrarily, and pursue dictatorial political ethics. Although he regarded himself as a holy emperor and claimed to save the world, the government orders were less obeyed, and people's livelihood was becoming worse in practice. Eventually, the Qin Dynasty collapsed. Its short death was not caused by the defects of the imperial system, but by the fundamental defects of its ethical guidance in the formulation of political decrees and the operation of policies.

Key words: Qin Dynasty; emperor theory; dictatorial political ethics; ethical defect; short death

清代州县治理的区域特色、实施路径与基本策略

——基于顺天府宝坻县的考察

王洪兵¹ 马凤民²

1.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所, 山东 青岛 266100; 2. 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 加影市 43000

摘要: 在皇权下县遭遇巨大困境的背景下, 州县治理成为清王朝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重要基础。清代的州县治理在基本制度设计上具有普遍共性, 然而在疆域辽阔的传统中国, 区域特色鲜明的生态环境以及人文背景深刻影响着县域治理的开展。就京畿地区而言, 县级政权地处统治中心地带, 又居于国家行政体制的底端。如果从基层民众的视角来看, 县级政权统辖数百村庄, 在民众看来它就是乡村社会之顶端。清代“皇权不下县”的行政特色以及简约治理的理念决定了县域治理的多元特性, 清王朝将县级政权建设作为实施基层治理的核心任务, 在此基础之上, 国家意志与国家权力借助县级行政机制以及半官方、民间治理资源, 形成了官民协同治理的基本策略。

关键词: 中央与地方; 国家治理; 州县治理; 乡村治理; 华北区域

中图分类号: D691;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2-0081-13

治国安邦, 重在基层, 州县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明清之际, 中国逐渐由一个内陆省份汉人为主体的王朝国家向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族群帝国演进。与明王朝相比, 清王朝的国家治理面临更大挑战, 就疆域规模来说, 清王朝突破明代两京十三省的格局, 国家有效治理范围延伸至亚洲内陆边疆, 国家的地缘战略演变为“以满洲和大漠以南的蒙古族聚居区为核心, 以内地省份为腹地、靠边疆提供防卫的新格局”。^① 受此影响, 清王朝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行政体制和治理模式。面对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超大王朝, 如何利用有限的行政资源实现有效治理, 成为摆在清王朝面前的一项巨大挑战。在推进地方治理的过程中, 清王朝重视发挥州县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以顺天府、奉天府两京府以及十八省分辖全国疆域, 进而在京府、各省所辖区域分设府州县等基层行政组织, 从而形成了层级清晰、结构严密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② 清代州县在制度设计上基本一致, 然而受行政区划、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项目“中国礼制文化与国家治理研究”(22VLS004)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青苗会与近代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研究”(14BZS049)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王洪兵, 男, 山东五莲人, 历史学博士, 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教授, 副院长, 主要从事清史研究; 马凤民, 男, 山东惠民人, 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① [美] 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 1600-1949》,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 第12页。

② 傅林祥:《从分藩到分省——清初省制的形成和规范》,《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

态环境、人文地理等因素影响,州县之间的资源禀赋各异,各地州县体制在实践运作过程中又存在着一定的区域差异。清代地方行政体制尤其以京畿地区最为复杂,京畿为首善之区,清王朝在京畿地区设置直隶省、顺天府,实施直隶总督、顺天府尹的二元管理体制。^①顺天府为京师所在,作为京府管辖包括大兴、宛平两京县在内的二十四州县。如果说顺天府居于清王朝统治中心,作为二十四州县之一的宝坻县则地处中心之边缘。清代顺天府宝坻县刑房档案蕴含着州县治理的大量信息,本文通过梳理顺天府宝坻县档案,考察宝坻县实施地方治理的基本途径、策略,揭示宝坻县如何通过县域治理勾连国家治理与乡村治理,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清代州县治理的区域特色,从而进一步拓展中国州县治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一、清代州县治理的生态环境与社会背景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农业模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比工业模式更加依赖于自然环境。它们因土壤和气候的差异而不同,因此可能造成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社会结构和政府”,“简而言之,在农业社会中,地理塑造了社会结构”。^②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要揭开乡村社会的面纱,就“要解释深藏在自然条件、社会构成和人类行为中的动态的相互关系”。^③宝坻县位于京师顺天府之东南约180里。^④处于华北平原北部,临近渤海湾,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受此影响,宝坻县气温、降水等分布极不均匀,降水多分布在夏秋二季,春冬之际降水稀少,由此形成了该地水旱灾害、蝗灾频仍的规律。生态环境、自然气候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农业、肥沃的土壤和稳定的气候,为古代世界的帝国提供了物质和生态基础”。^⑤宝坻县具有典型的华北农业生产条件,土壤以风化土和冲积土为主,土质疏松,富含各种矿物元素,吸水性和透气性较好,便于耕作和作物的生长。^⑥

宝坻地处京东,县名源于该地自然生态环境,所谓宝坻,“滨大海、引漕河,逶迤曲折,经二百里,说者谓饶鱼盐、芦苇之利,故曰宝;又水中高者为坻,溯宝坻之所由名,正以大川故也”。^⑦另据康雍乾三朝元老钱陈群称,“金大定间,复建为县,命之曰宝坻,意者稼穡惟宝,如坻如京耶”^⑧,由此亦可见农业在宝坻县的重要地位。宝坻县作为京东重邑,“地滨直沽,饶鱼盐之利,户口田赋,生息繁多”,凭借其丰富的物产资源,成为京畿物资供给的重要来源,诸凡“亲贵之汤沐、禁旅之刍茭多赋自兹土”。^⑨

① 王洪兵:《清代京畿协同治理模式初探——以顺天府四路同知为例》,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2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85—106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8页。

③ [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58页。

④ 万历《顺天府志》卷1《地理志·疆域》,万历刻本,第10页a。

⑤ [英]迈克尔·S.诺斯科特:《气候伦理》,左高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⑥ 孙敬之主编:《华北经济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页。

⑦ 乾隆《宝坻县志》卷2《形胜·山川》,乾隆十年刻本,第1页a-b。

⑧ 乾隆《宝坻县志》序言《钱陈群序》,第1页b。

⑨ 乾隆《宝坻县志》序言《直隶布政司方观承序》,第2页a。

宝坻县农业生产受自然生态的影响极大,宝坻县所处的华北平原生态特征明显,“土壤虽少变迁,气候殊多难测,民虽安土重迁,实属依天为命,如遇雨量调润,五谷即可丰登,反之,良田美土有顿成沙漠之患,是以雨量之多寡,乃农产丰啬之所系,过少则亢旱为灾,过多则又有洪水泛滥之虞”。^①水利问题关系到宝坻农业生产的兴衰,旱涝灾害交替,时刻影响着当地的农业生产。传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文明社会,农业生产对广大农民来说几乎是生活的全部,他们渴望获得来自信仰领域或者村社、国家政权的全面保护。清代宝坻县的主要粮食作物有大麦、小麦、荞麦、黍、稷、粟、粳、稻、薯蓣、豆等种类,这些农作物抗灾能力差,很容易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②

宝坻县地近京师,明清时期,土地多被皇室贵族侵占。明代宝坻县土地主要被王公贵族瓜分,到清初又被旗人圈占过半。清代宝坻土地分配状况大致是“民所存者,圈之余耳”。顺治元年(1644),宝坻县原额民地 6890 余顷,到顺治四年(1647)间,八旗圈占 4417 余顷,另金派粮船地 900 顷,投充地 1515 余顷,民地仅存 57 顷余。乾隆九年(1744),拨补民地 1417 余顷,虽然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圈地引发的旗民冲突,但是因为宝坻本境官地不足拨补,即以邻境补偿,“民居此而地居彼,是以抗租交控,胶葛不休”。^③由于肥腴土地多被圈占,宝坻县民人所种之田大多洼下贫瘠,乡民辛劳一年,“而收入颇寡,但得五六斗或七八斗即庆有年”,并且宝坻县每年雨水不均,“三月中得雨,麦乃熟,六月中雨过则河水发,而禾稼淹然斥卤之地”,此外宝坻县乡村容易滋生蝗蝻,“若少旱,辄生蝗”。^④农业生产条件恶劣,人为因素及自然条件的双重影响,导致宝坻县乡村民众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华北乡村恶劣的生态环境给来华传教士一种残破不堪的印象:“漫天无垠的灰尘,村落全部由土坯建造。这里的房屋大多相似,均令人生厌。只有一些房屋用灰瓦做顶。在一些破败的院落,偶遇葫芦或南瓜构成的一抹绿色,那简直是对眼睛最好的犒赏。……我到处看到辛苦的人力灌溉,只有通过这种辛勤的劳作,干涸的土地才会萌发出绿意”。^⑤华北的乡土景观是华北乡村生态环境的真实反映。清代的华北乡村充满了荒凉和破败之感,这种情形到清末更加突出,在直隶望都县,全县大小村庄一百余,人口稀少、经济衰落,“鸡犬之声不闻,噫!荒凉亦云极矣”,“总一邑而计之不过大县一乡一隅之聚落耳”。^⑥恶劣的生态加之赋重差繁民不堪命,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户口半皆流亡,墟落日形萧索,其困苦情形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⑦

宝坻县号称“京东大邑”,明代宝坻编户二十六里,万历年间,宝坻户口实在 3720 户,共 36684 丁口。^⑧明末清初,京畿地区战乱不断,宝坻县民生遭到严重破坏,户口凋敝。顺治元年(1644)编审户口,

① 方显廷、毕相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一)》,《纺织时报》1936年第1267期,第4659页。

② 乾隆《宝坻县志》卷7《风物·物产》,第5页a-b。

③ 乾隆《宝坻县志》卷5《赋役·田壤》,第7页b。

④ 乾隆《宝坻县志》卷7《风物·风俗》,第1页a-第2页b。

⑤ [德]狄德满:《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崔华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页。

⑥ 光绪《望都县新志》卷1《方輿志·村堡》,光绪三十年刻本,第50页b。

⑦ 光绪《望都县新志》卷3《赋役志·田赋》,光绪三十年刻本,第19页b。

⑧ 万历《顺天府志》卷3《食货志·户口》,万历刻本,第5页a。

其中投充、优免、逃亡、故绝人丁 12126 人,里数亦由 26 减至 20,实存人丁 3998 人,据宝坻县民侯肇新反映:“坻邑频遭兵火,人亡地荒”,土地荒芜达 1568 余顷,导致人口大量逃亡,“坻邑自去岁征五免五,既已报荒除税犹且封纳不前,倘今照旧催征,在民惟恐负欠,仍必至于逃亡”,蠲免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宝坻县社会秩序紊乱的局面。^①另据宝坻县民杜懋哲等反映,“宝坻弹丸鄙邑,久罹兵灾,差繁赋重,地荒民逃,困苦已极”。^②关于京畿地区民众生活困苦的原因,据御史反映,“观天下之民贫苦皆同,而北方之民尤甚;北方之民贫苦皆同,而直隶八府为甚,顺、永、保、河四府为尤甚。”推其原因,“良以圈拨之后,民多失业,饥寒愁苦,日益无聊,以致柔善者转死于沟壑,其巧黠者则卖身为庄头家人,若强梁者则期而为贼盗”,从而导致直隶地区盗贼横行,秩序紊乱。^③

此外,宝坻县地处京畿,旗民杂处,“旗民地亩交涉之案甚多”。^④清代统治者为加强地方治理,将旗民亦交由地方协管,“令编旗籍者亦入版图,许有司稽核之,凡遇浚河、筑堤、丈田诸事,皆得通力合作,相济有功”。^⑤在京畿各州县有大量旗人居住,先设“乡屯、领催”管理,后“于屯居旗人内择其老成者放为屯目”,凡单户、寄零居住旗人交附近守堡屯目管辖。在诉讼方面,京畿地区设置理事通判、同知,“凡有屯居旗人命盗等案向系州县官办理,惟拣放屯目及控告地土钱债等项悉由理事厅办理”,此后又进行了调整,“令理事厅并有旗人居住之州县一体清察,拣放屯目应以州县为专管,各路理事厅为统辖”。^⑥在宝坻县,旗民矛盾成为困扰县域治理的一个普遍问题,清王朝采取“旗民分治”的策略,部分地缓解了这一困境。^⑦宝坻县灾害频仍的生态环境、顺直共管的行政体制、旗民杂处的民族分布特色构成了宝坻县县域治理的典型区域特色。

二、清代州县治理的制度规范与实践运作

明清以来,宝坻县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明代即为京东重邑,有“作固京畿、控扼虏冲”之称。^⑧至清代,宝坻县扼京津之交通要道,“西北、西南、东北、东南、正南五路系赴京、省、宁河、天津、山海关等处大小道路”。^⑨宝坻县为直隶省顺天府所辖二十四县之一,疆域广袤达六百余里。尤其是宝坻所属梁城所濒临海滨,距离县城遥远,“一切催漕、捕蝗、巡缉私盐逃盗等项,该县不能兼顾,千总无查审刑

① 《宝坻县民侯肇新启为小民万难包荒事》(顺治元年十一月),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153357。

② 《宝坻县民杜懋哲等启请免其买办豆草并蠲豁前朝金派剥缸》(顺治元年十一月),内阁大库档案,038012。

③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页。

④ 《直隶总督刘峩覆奏旗民交涉事件秉公严办事片》(乾隆四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033190。本文所引宫中档奏折、军机处档折件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下同。

⑤ 乾隆《宝坻县志》卷6《乡闾·村庄》,第18页b。

⑥ 光绪《通州志》卷1《封域志·旗庄》,光绪九年刻本,第43页b。

⑦ 邱源媛:《清代旗民分治下的民众应对》,《历史研究》2020年第6期。

⑧ 万历《顺天府志》卷6《艺文志·碑刻》,万历刻本,第12页b。

⑨ 《宝坻县知县禀文》(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天府档案,40-005。本文所引清代档案资料,除特别注明外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

名、踏勘相验之责,该县遇有公事,巡历往返经旬,政务难免迟误”。鉴于宝坻县疆域过于庞大,署理直隶总督唐执玉建议以天津州到山海关的大路为界,“路南割归梁城,路北仍属宝邑”,将梁城所改为新设县的县治,裁撤梁城所千总,另添设知县管辖,新设县钱谷事件归霸昌道督催。^①随后,雍正皇帝亲自为新设县命名“宁河县”。^②分县之后的宝坻辖区仍然广阔,与遵化、玉田、香河、天津县、蓟州、武清、三河等县邻界,东西广 80 里,南北袤 175 里,成为顺天府所辖州县中的重要区域。^③

宝坻县位于顺天府与直隶交界地带,“濒沧海、引漕河,延袤二百余里,于京师为股肱邑”^④,被视为“畿内之赤县”,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至清末,随着京畿行政体制的变革,宝坻县的地理位置愈发重要,光绪九年(1883),据宝坻县知县刘枝颜称:

该县向无驿站,仅止递马八匹,递送本处寻常公文,本可将就敷用。自同治九年督臣驻扎天津,兼办洋务,公文逐渐加增,近因海防、边防同时举办,如奉天、吉林等省各将军、府尹,山海关道,新设宁古塔等处督办,奉天驿巡道、东递道、吉林道,驻扎营口一带之毅军,驻扎宁河芦台之淮军,驻扎山海关之练军,以及奉、吉等省防练各营皆与北洋大臣衙门并津海关道、海防营、附属支应局、机器局、制造局、军械所,暨各统领营官传有往来文牒,较从前多二十数倍,且悉关防务重要,往往排单札迎限日行四五百里,实为向来所无。^⑤

鉴于宝坻县地理位置之重要性,为确保中央与地方信息的迅捷传递,经府尹、直隶总督咨商,同意添设夫马,扩大驿站规模。

从京畿治理的角度来看,地处统治中心的宝坻县与外省州县有着显著差异,官民分治、相得益彰的思想成为宝坻县治理的基本模式,作为“畿辅望县”的宝坻县,其乡村社会结构与地方治理有其明显的地域特色。宝坻附近京畿,政情、民俗无不深受影响,乾隆年间,据顺天府尹蒋炳称,“坻邑濒沧海引漕河,延袤二百余里,于京师为股肱邑。我朝列圣涵濡之泽既厚且深,加以我皇上湛恩汪濊,休养生息,其士民共被日月之光而沾雨露之润,治化蒸蒸日上,蔚乎可观”。^⑥虽然蒋炳所言不无夸饰之辞,但宝坻县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不可低估。因为地近京师的缘故,国家的各项惠民措施在宝坻县均得以贯彻执行,“畿辅内地,实先天下而被其泽,如奠井疆、平赋役、养官廉、褒节义、罢银鱼花石之供、苏剥船浅夫之困”,“而自迩年来,分新邑、摊地丁、募营田、兴水利,顷又奉旨免天下明年租,日下近光者益复宴然安和,粲然明盛”。^⑦由此可见国家政策对宝坻县治理影响之深远。

宝坻县具有清代州县的共有特征,同时因其地处京畿,又具有明显的地域特性。宝坻县的特殊

①《兼吏部尚书张廷玉题请将直隶天津州改为府治并设天津县知县一员等情本》(雍正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第6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7—400页。

②光绪《宁河县志》卷2《职方志·沿革》,光绪六年刻本,第4页b。

③光绪《顺天府志》卷19《地理志一·疆域》,光绪二十八年刊本,第3页a-b。

④乾隆《宝坻县志》序言《顺天府尹蒋炳序》,第1页b。

⑤《直隶总督张树声等奏为宝坻县地当冲途差务繁重请添夫马事片》(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03-7137-089。

⑥乾隆《宝坻县志》序言《顺天府尹蒋炳序》,第1页b-第2页a。

⑦乾隆《宝坻县志》,《凡例十二则》,第1页a。

性在于它兼具“中心与边缘”双重性格:与全国其它大部分州县相比,宝坻县无疑属于清代统治中心区域,但是在顺天府行政体制中,它只是一个边缘州县,清代州县治理体制的共性与京畿州县体制的特殊性在宝坻县行政体制上都能得到展现。此外,从宝坻县地方治理的角度来看,代表国家权力的宝坻县知县、县城与广大的乡村社会亦构成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清代京畿社会秩序正是建构在这种多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基础之上。

为强化京畿治理,清王朝在京畿地区实施顺天府、直隶总督二元协同治理模式。在州县治理层面,以直隶总督统辖全省各州县,顺天府所属州县则由顺天府直辖,同时由直隶总督兼辖。为协调顺天府与直隶总督关系,京畿地区在直隶总督、顺天府与各州县之间另设东南西北四路同知管辖州县事务。就宝坻县而言,在京畿地区分别接受东路同知、通永道、顺天府与直隶省三级行政管辖,宝坻县在京畿行政体制中居于最底层。宝坻县作为顺天府与直隶总督共同管辖地区,按照定例,宝坻县缺出,先尽顺天府属人员升调,顺天府无合式人员,再于直隶选缺知县内逐加拣选。

宝坻县作为顺天府属州县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接受顺天府的监管考核,定期“赴府尹衙门面禀地方事宜”。^①宝坻县的日常行政事务主要由顺天府负责稽查,以嘉庆十二年(1807)宝坻县知县包庇库书侵吞库银案为例,从嘉庆六年(1801)起至嘉庆十一年(1806)间,宝坻县库书沈明琳、旗租柜书杨昱及其子杨锡璋,先后侵吞、浮收库银达1100余两,沈明琳等人侵蚀行为被库房贴书刘振绪发觉,并呈明知县王铠查实,但是知县仅罚其弥补,并未严惩。刘振绪随向通永道呈控,通永道又将该案“批交东路厅候讯”,但是东路同知归思燕却将此案扣压五月不办,无奈之下刘振绪前赴顺天府衙门呈控,兼尹邹炳泰等以案关重大,亲自鞠讯,顺天府认为“该知县征收病民,大干法纪,乃竟敢肆意浮收,该县显有通同舞弊情事,此案事关侵盗浮收情节重大”,为此顺天府奏请将知县王铠革职,另外府尹等又以东路同知归思燕扣压案件长期不办,将其一并参处。^②在办理此案的过程中,宝坻县、东路厅、通永道、顺天府逐级审理讼案的实践,基本反映了顺天府行政体制特征。^③

州县是清代地方行政体制的基础,在顺天府州县行政体制中,宝坻县知县仅为正七品,居于京畿地方行政体制的最底层。然而,在广大乡民心目中,他们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令者,亲民之吏以主县事者也”。^④依照清代政治伦理,“皇帝是臣子的君父,州县官被认为是‘父母官’”。^⑤知县被广大民众尊称为大老爷、老父师、父母官,承担着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核心角色,在民众看来,“邑令为亲民之官,于一邑事无所不统”,在统治者看来,知县事关地方治理的全局,“令之贤否,闾阎之安危系之”。^⑥

①《宝坻县知县移文》(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顺天府档案,23-003。

②《兼管顺天府尹邹炳泰、府尹宋榕奏请将宝坻县知县王铠革职审办事》(嘉庆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03-1510-013。

③关于顺天府、直隶总督、四路同知与地方州县的行政关系,可参见王洪兵:《清代京畿协同治理模式初探——以顺天府四路同知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9年第22卷,第85—106页。

④乾隆《宝坻县志》卷8《职官·县令》,第1页a。

⑤[美]司马富:《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张安琪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22年,第154页。

⑥光绪《宁河县志》卷6《职官志》,光绪六年刻本,第9页b—10页a。

表1 宝坻县知县出身资格统计表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统	合计
进士		4	4	4	1	8	2	1	3		27
举人	2	2	1	5		14	3	4	2	1	34
五贡	3	3				2		1	4		12
贡监		6	3	4	1	2	2	1	10		30
其他	2	6		3	2				6		19
总数	7	21	8	16	4	26	7	7	25	1	122

资料来源：伍耀：『順天府档案』に見える清代国家基礎権力の實現—宝坻県の官僚配置と社会組織の役割を例に一』、『東アジア研究』第66号、2017年、第17-32頁。

清代州县根据治理的难易程度，又可以分为冲、繁、疲、难四种情形，四者组合后形成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①在京畿治理的实践中，顺天府各州县均被视作“民俗刁顽”之区。^②其中宝坻县“地方辽阔，政务殷繁，经管河道堤工，稽查海口出入船只，系繁、疲、难三项相兼沿河要缺”。^③嘉庆十九年（1814）间，顺天府兼尹刘鏞之对宝坻县的定性是繁疲难三项相兼，“俗敝民残，最为难治”^④，“民刁俗悍，讼狱繁兴，最为难治”^⑤。

县域治理是一项综合性工程，知县为县域治理的核心，“县令为守土吏，宰百里，凡民生利病独以一身肩之，故其责为特重”，当然州县治理并非知县一人之责，“司教诲者则有师儒任，分治者则有僚佐，理盐课者则有场员，职捍卫者则有武弁，位虽不同，而期于为民则一也”。^⑥清代的州县治理，凡一州县各项事务总其成于州县，并分治于县丞、典史、巡检等佐贰官，佐贰均系办事之员，并无专擅之权。^⑦在顺天府宝坻县，除知县外，另设主簿、典史、教谕、训导各一员，协助知县维持地方治理。^⑧主簿、典史各司其职，典史的职责：“每逢朔望，随同宣讲圣谕广训，务使家喻户晓，咸知理法，经管监狱，加谨巡防，并无疏懈，稽查禁卒，不许凌虐罪囚，克扣口粮，专司缉捕，严督捕保，昼夜巡缉，随时缉获”。^⑨宣统年间，根据宝坻县典史孙祖耀的履历事实册来看，该县典史职责主要涉及刑狱、缉捕、治安事务，“该员管理监狱，悉心防范刑禁人等，严加约束；该员每逢差遣，不避艰难，奋勉出力，事无贻误；该员

①《广西布政使郭銜奏陈地方吏治折》（雍正六年三月十九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402008352。

②《大学士兼管顺天府尹事务卓秉恬、府尹李德奏为香河县周鸣凤人地不宜请撤任事》（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03-2755-017。

③《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事务何凌汉等奏请以金照调补宝坻县知县事》（道光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03-2657-092。

④《顺天府兼尹刘鏞之、府尹费锡章奏请以关实秀升补宝坻县知县事》（嘉庆十九年五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03-1558-010。

⑤《顺天府兼尹刘鏞之、府尹费锡章奏请仍以关实秀升补宝坻县知县事》（嘉庆十九年九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03-1561-012。

⑥ 光绪《宁河县志》卷6《职官志》，光绪六年刻本，第1页a。

⑦《兵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事务卓秉恬等奏为特参芦台巡检、宁河知县事》（道光十九年五月初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03-2862-014。

⑧ 乾隆《宝坻县志》卷8《职官》，第22页b。

⑨《大学士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务庆桂题覆典史吴熙祿六年俸满保荐》（嘉庆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内阁大库档案，004459。

操守甚严,颇知自爱,民间词讼不敢擅受;该员平日缉捕,郑重其事,宵小敛迹,闾阎乂安”。^①在地方治理过程中,典史成为协助知县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宝坻县作为繁疲难三项相兼要缺,日常事务异常繁杂,这对宝坻县知县以及整个行政体制来说无疑是严峻的考验。从光绪五年十一月到光绪六年二月四个月内,署理宝坻县知县的杨谦柄疏防被劫案件即达四起。^②仅光绪五年(1879)间,宝坻县即更换管近修、王堃、杨谦柄三任知县。继任知县刘枝彦在任期间也备受劫案困扰。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二十七日,宝坻县民曹士谟家被窃且拒伤事主,但是该案四个月疏防限满未能抓获贼犯,直隶总督李鸿章对相关责任人题参,疏防文职承缉宝坻县知县刘枝彦、协缉宝坻县典史赵英、督缉东路同知郝联薇、统辖通水道李培祐等均被题参罚俸。^③曹士谟家被窃案未久,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初二日,宝坻县民人徐惠禾客店被窃,赃贼未获,四个月疏防限满,知县刘枝彦、典史赵英、东路同知郝联薇、通水道李培祐再度被参。^④光绪七年(1881),宝坻县民张国栋家骡马被窃,知县刘枝彦、宝坻县典史赵英、东路同知郝联薇、通水道李培祐等均被李鸿章题参。^⑤刘枝彦在担任宝坻县知县的两年内,因窃盗疏防即连续三次被题参罚俸,由此可见宝坻县治理存在着巨大困局。

三、清代州县治理的实施路径与区域特色

宝坻地处清代统治中心地区,无论在地方行政体制、国家治理政策,还是农业生产秩序、日常生活、乡俗民情等诸多方面均与华北或全国其他地区有较大的差异。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宝坻县乡村被描述为生机盎然的世外桃源,“襁褓熙熙,相助相友;入享其成,出贸其有;细雨村宁,斜阳渡口;野店官桥,行歌击缶”,一幅祥和安乐的田园景象。^⑥然而在治理实践中,宝坻县乡村社会异常复杂,对于居于国家行政设置最底层的知县而言,具有极大挑战。清代知县统辖全县大小各项事务,位卑而事繁,据雍正年间的知县蓝鼎元称,作为一个合格的知县,其负责的日常事务包括:“正己率属,使丞尉共勉为不贪,使绅衿皆范于名教,使民人知尊君亲上,孝弟忠信之为美。为除其豪强、盗贼、讼师、衙蠹之害,导养其农桑、畜牧、山林、川泽之利,制节其风俗、奢俭、积贮、贸迁之宜,寓军政于保甲之中,行催科于抚字之内”。^⑦简而言之,清代州县治理主要包含催征钱粮、维持治安、审理词讼、兴修水

①《宝坻县典史孙祖耀履历事实册》(宣统二年),顺天府档案,12-016。

②《直隶总督李鸿章题为前署宝坻县知县杨谦柄等员疏防限满赃贼未获题请参处事》(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吏科题本,02-01-006-005564-0018。

③《直隶总督李鸿章题为查参宝坻县知县刘枝彦等疏防民人曹士谟家被窃案限满未获事》(光绪七年闰七月二十七日),吏科题本,02-01-03-12025-023。

④《直隶总督李鸿章题为查参宝坻县知县刘枝彦等员疏防赃贼无获事》(光绪七年八月二十日),吏科题本,02-01-03-12027-042。

⑤《直隶总督李鸿章题参宝坻县张帼栋被窃案文武职疏防职名事》(光绪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吏科题本,02-01-03-12035-022。

⑥乾隆《宝坻县志》卷6《乡间》,第1页a。

⑦《记名要紧知县蓝鼎元奏陈知县职责事》(雍正年间),宫中档雍正朝奏折,402003932。

利、扑捕蝗蝻、保护禾稼等涉及国计民生的各项事务。

催征钱粮。征收赋役钱粮是州县治理的核心工作,该项工作也被看作知县考核的重要参考,看其征派正杂钱粮是否“遵用司颁戡法秤收”,是否“悉令花户自封投柜”,有无扰累民众。^①因国家正式行政体制规模难以覆盖全县各村庄,宝坻县钱粮征收主要依靠乡里组织和民间组织实施。在宝坻县乡村设置乡保、书手、车领等职役,协助官方“催办租粮,接借垫封”。^②近代以来,随着乡里组织逐渐衰落,青苗会组织逐渐取代乡里组织催征钱粮的职责。咸丰年间,在宝坻县一起钱粮征收纠纷中,兴保里车领庄永顺向知县禀告:“切蒙谕令身同本里各庄首事人等垫封本里欠粮,身同首事人等赴各柜查明,除欠粮大户,本城王姓、芮姓、白姓,广济寺、黄庄张姓、孙姓、蒋姓,林亭镇张姓李完等家自行完粮外,下剩欠粮,各花户共欠粮银 260 余两。身同首事人等已完粮银 160 余两,下欠粮银百十两。恳恩宽限,身同首事人等务于十一月十三日完纳,不敢违误”。由此可见,晚清以来,青苗会首事成为宝坻县征收钱粮的骨干力量。

社会治安。社会治安是宝坻县治理的重中之重,宝坻县通过编查保甲、日常稽查、严防严控等方式加强治安管理。第一,加强乡里体制建设。乾隆年间的宝坻共有 4 乡、20 里、910 村庄,全县共设置 45 保,乡长 27 保正 32,以乡统里,以里辖村。^③乾嘉以降,随着乡长、保正逐渐融合为乡保,乡保成为宝坻县沟通联络官府与乡村的重要中介力量。^④宝坻县乡保的核心工作是“稽查娼赌、贼匪、凶暴”。^⑤第二,城镇设置循环号簿。为加强城镇治安,在关厢集镇,乡保向坊店发放“循环号簿”,责令店家登记过客姓名,严密稽查,每月朔望,将簿送县查核。^⑥第三,城乡冬防。每年冬季宝坻县都会在全县范围内张贴冬防告示:“时届冬令、宵小易生,栅栏窝铺、修整宜新,鸣锣击柝、彻夜巡更,小心火烛、盘詰匪人,过客住宿、天明放行,窝娼窝赌、立置严刑,私盐私宰、法不从轻,保甲狗隐、一并重惩。”^⑦第四,城乡防火。宝坻县乡村房屋多以柴草苫盖、秫秸为篱,最易引火延烧,而城内关厢居民稠密,也是防火的重要区域。宝坻县主要依靠各乡保牌甲时刻留心查察,同时公备救火器具,以防不虞。^⑧第五,严禁赌娼。娼赌是导致地方治安事件的重要诱因,在官方看来,游荡棍徒不务正业,或窝留娼妓,或开设聚赌,引诱良家子弟,轻则废时失业,重则倾家荡产,最终因谋生乏术而流入匪类,合伙截劫窃盗,因此严禁赌娼成为州县治理的重要事务。^⑨

审理词讼。词讼是州县治理的晴雨表,清代知县在加强官府审理词讼职能的同时,注重发挥乡

①《通水道造送所属州县大计履历事考清册》(宣统二年),顺天府档案,12-016。

②《尚节里首事王国祥呈状》(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顺天府档案,93-097。

③乾隆《宝坻县志》卷6《乡间·村庄》,第1页b-第18页a。

④王洪兵、张松梅:《皇权下县:清代乡里制度实践运作的困境及其出路——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东岳论丛》2022年第3期。

⑤《宝坻县乡保认状》(道光三年五月初三日),顺天府档案,89-014。

⑥《宝坻县知县李为饬发坊店循环号簿事》(嘉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顺天府档案,41-002。

⑦《宝坻县冬防告示》(嘉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顺天府档案,41-009。

⑧《宝坻县防火告示》(嘉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顺天府档案,41-011。

⑨《宝坻县严禁娼赌告示》(道光十八年六月初八日),顺天府档案,41-019。

村调解机制,将“爱民息讼”^①作为处理民间诉讼的基本方针。第一,严禁讼棍。宝坻县民间纠纷繁多,民众多因“口角微嫌、睚眦细故”而辄行涉讼,在官方看来出现上述现象的根源“必由讼棍主唆所致”,官方的策略是严禁讼棍,同时劝谕民众凡有户婚田土、人命斗殴窃盗等案,务必通过正当途径呈告。^②第二,士绅调解。宝坻县乡村有大量具有科举功名的士绅,他们热心于调处民间细事,为避免“小忿酿成讼端”,通过说合的方式,“彼此互相服礼,情甘息讼”,知县乐于接纳士绅调解结果,“从宽免究销案”。^③宝坻县注重发挥士绅在调解纠纷方面的作用,在一起涉及士绅的讼案中,知县特别向当事生员指出:“尔既身列学宫,应知睦族之道,果尔弟侄辈有错谬之处,亦当正言教率,骨肉间不必因细故动辄拘讼也”。^④第三,宗族调解。对于民间的细事纠纷,尤其与宗族相关的田宅、户婚、继承、赡养等纠纷,知县一般将其交由宗族调解,“飭该乡保协同该族长秉公查理禀夺”^⑤,发挥宗族的调解机制。在官方看来,族内纠纷最稳妥的解决方案就是“邀同说合人并亲族人等自向凭情理要”,从而避免兴讼,“致伤一本之谊”,这无论对于官府和民众来说都具有积极意义。^⑥华北宗族虽然不具有南方宗族的发展规模,但是在调解乡村纠纷方面仍发挥了巨大作用。^⑦大量细事纠纷经亲族调处后,能够考虑“亲友情面”,念及骨肉之情,通过“磕头服礼”等形式,“情甘息讼”。^⑧档案资料显示,宝坻县大量的宗族内部纠纷官府并未直接干涉,或者“传谕处以家法”^⑨,或者交族长设法调解,“责成该氏族长并自邀亲戚,秉公理处完结,孰是孰非,着该族长及公长亲来案呈明”。^⑩通过宗族调解,双方达成“归于和好、俱愿息讼”的共识,知县也乐于接纳宗族调处结果,在告诫保持族内和谐的同时,同意“免传讯销案”。^⑪

兴修水利。宝坻县境内地势低平,境内河流密布,较大的有潮河、窝头河、八门城河、柳沽河、东淀河等河流。丰富的水利资源有益于农田灌溉,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每逢雨水过盛之季,河水漫堤,禾稼多被淹浸。因此修理河堤、挖掘河道就成为宝坻县地方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鉴于当地的生态气候特征,清代统治者重视发挥宝坻县知县的治河职能,将宝坻县知县视为“经管河道、堤工,并稽查海口出入船只”之繁、疲、难三项沿河要缺。^⑫兴修水利是宝坻县知县的一项重要职责,地方水利的好坏是判断知县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例如雍正年间,宝坻县知县吴盘因兴修水利成就突出,得到嘉奖:“宝坻县最为低洼之地,平时易于被水,知县吴盘实心办事,将上特颁帑金新修之堤埝,

①《嘉善里胡各庄文生吕子皆等呈状》(光绪二十年三月十八日),顺天府档案,119-084。

②《宝坻县严禁讼师告示》(道光十八年六月初八日),顺天府档案,41-020。

③《和乐里武生芮国樑等禀》(嘉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顺天府档案,185-135。

④《兴保里黄庄武生李嘉猷禀》(嘉庆年间),顺天府档案,200-189。

⑤《得义里角淀庄杨德谦呈状》(道光年间),顺天府档案,181-171。

⑥《务本里龙尾屯许永太呈状》(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五日),顺天府档案,183-127。

⑦王洪兵:《清代华北宗族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⑧《厚俗里民人刘廷荣与遵允事》(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顺天府档案,181-129。

⑨《兴保里黄庄士瑞禀》(嘉庆二十三年十月初九日),顺天府档案,180-030。

⑩《得义里王家庄邓王氏呈状》(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顺天府档案,183-098。

⑪《兴保里程泗淀庄族长于成龙呈状》(道光七年八月初六日),顺天府档案,182-088。

⑫《直隶总督袁守侗奏请以王锡璵调补宝坻令折》(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军机处档折件,030012。

加意保护,昼夜巡视,是以堤工无恙,而地方不受水患,甚属可嘉”^①,吴盘因治河成绩突出升授山西大同府知府。水利事业关系国计民生,清王朝将治水置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位置,在强化国家治水职能的同时,重视发挥乡村社会和民间组织在水利设施修建、维护等方面的作用。由于州县行政资源短缺,兴修水利成为村庄的基本职责,在官方看来,“开一沟、通一渠,一乡之利害多由一乡之公议决之,非一邑之所关也”。^②在宝坻县地方,河道、沟渠纵横交错,沿河“各庄按地亩摊钱,挑挖堤埝,以防水患”。^③为修理维护河堤,沿河村庄青苗会除摊钱之外,还有出夫之责,光绪十年(1884),据厚俗里萧家埝庄首事田凤澜等称:“身等与身庄田均充首事,经办青苗会事,奈田刚于光绪八年撵要青苗会钱,适年孙庄承种身庄地五顷余亩,每亩按四百五十文摊撵,本庄因各家出夫修埝,每亩按二百五十文撵要”^④,可见宝坻县乡村水利设施主要由各庄青苗会负责管理和维护。

扑捕蝗蝻。受当地特殊生态环境影响,宝坻县是蝗蝻易发、高发区域,预防、扑捕蝗蝻成为州县治理的重要事务。因为蝗蝻关系到粮食收成和赋税的征收,康熙曾经在给直隶巡抚赵弘燮的奏折朱批:“民间俗语,有蝗不多乃是大熟之年,朕看多年故然如是”。^⑤在另一份奏折朱批中,康熙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向闻田间老人说,蝗虫不伤谷即是好年成,想是有的,朕亦曾经过”。^⑥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月间,直隶地区蝗灾蔓延,直隶巡抚赵弘燮督促宝坻县知县汤大正加紧扑捕,但是汤大正扑捕不力,“致东堤头与贯儿庄、于家铺产滩等处蝻子已经生翅,养成飞蝗”。^⑦赵弘燮斥责科举出身的知县没有治理经验,他指出:“乃历来县令每系书生,因循不力,臣以飞蝗关系民生,惟恐蔓延,不敢稍为宽假,业已两劾其官,今岁臣于宝坻一县叮咛告诫,尤为淳切,无如该令汤大正又系新任,虽舌敝颖秃,而仍漫不经心”,因此将知县汤大正题参。^⑧赵弘燮痛斥汤大正“漠视民瘼”,“该县因被参之后愈加废弛,坐视飞蝗日炽,不多拨人夫上紧扑捕,以致督捕之员呼应不灵”,蝗灾有可能会蔓延及大兴、宛平,甚至京师五城。^⑨鉴于官方捕蝗存在的不足,除利用官方资源外,宝坻县还注重发动民间力量,“派役督同各首事仿照扑蝗陈法,挖沟圈围焚烧”,官府联合乡里组织、青苗会组织共同捕蝗,“飭乡保暨各村首事人等留心遍查,如遇有遗孽处即行率同村众,挖掘净尽,以免贻害”。^⑩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第38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30-331页。

② 民国《任县志》卷1《地理·河流》,民国四年铅印本,第15页b。

③ 《得义里小刘庄河役董开山呈状》(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三日),顺天府档案,114-092。

④ 《厚俗里萧家埝庄首事田凤澜等禀》(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三日),顺天府档案,107-050。

⑤ 《直隶总督管理巡抚事务赵弘燮奏陈捕杀宝坻等县蝻子折》(康熙五十八年五月七日),宫中档康熙朝奏折,401000576。

⑥ 《直隶巡抚赵弘燮奏报委派知府张朝琮扑灭宝坻县蝗蝻折》(康熙五十年七月二十日),宫中档康熙朝奏折,401000295。

⑦ 《直隶巡抚赵弘燮奏陈委巡道等前往宝坻县扑灭蝗蝻折》(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宫中档康熙朝奏折,401000186。

⑧ 《直隶巡抚赵弘燮奏报宝坻知县汤大正扑捕蝗蝻因循不力请拣选干练之人以任知县职折》(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宫中档康熙朝奏折,401000187。

⑨ 《直隶巡抚赵弘燮奏报将查捕蝗蝻不力之宝坻知县汤大正解任折》(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宫中档康熙朝奏折,401000188。

⑩ 《宝坻县存城汛把总汪德昌禀》(光绪十五年六月初三日),顺天府档案,307-002。

保护禾稼。农业生产事关国计民生,青苗生长收获期间,宝坻县采取多项措施保护青苗。首先,允许民众自发保护青苗。尤其在麦秋、大秋之际,乡民恐人偷窃,多雇看青人看护青苗。但是民众自发看青活动因缺乏规范,容易激化矛盾,甚至诱发命案。^①其次,官方通过颁发告示等形式保护青苗。官方告示主题一般是“严禁偷窃禾稼并纵令牲畜践食以安农业事”,内容大致如下,“示仰闾邑乡牌旗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尔等凡遇禾稼成熟,必须俟地主收割完毕,方准赴地捡拾遗穗,牧放牲畜,倘敢故违,该乡牌地主人等立将人赃牲畜获住,具禀送县,以凭讯究,妇女孩童有犯,定将其夫男家长传案究惩,绝不姑宽”。^②再次,村庄有组织看青。无论民众自发看青,还是官方政策性护青,均难以实现对禾稼的切实保护,在此背景下,华北村庄公议设立青苗会,“议定如有偷窃禾稼、割草之人,即行议罚,倘敢隐匿不举,即以知情者受罚”。^③通过官民协同合作,宝坻县的农业生产秩序基本得到维护。

四、结语

州县治理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全局,所谓“郡县治,天下无不治”^④,州县治理是连接乡村治理与国家治理的重要纽带,从此意义上来看,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鉴于州县治理的特殊重要意义,清王朝在完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体制建设的同时,从县级政权建设、知县群体选拔考核等角度不断完善夯实州县治理的基础。清代疆域辽阔,各地风俗各异,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⑤,州县治理既有制度共性,也存在着巨大实践差异。州县治理建立在特定行政区划的基础之上,“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与政治意蕴,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式”。^⑥清代的州县治理是包含环境、生态、人文、地理、官制、民俗等各项因素在内的一项综合工程。清代宝坻县在竭力发挥官方正式机制推进州县治理的过程中,注重官方正式机制与民间非正式机制的协调同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一套由官治和民治紧密衔接的州县治理的“宝坻模式”。

州县治理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现实问题,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正所谓基层不牢,地动山摇。近代以来,随着县域治理科层化的不断强化,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如何调和国家治理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矛盾冲突成为县域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县域治理的主要目标在于真正激活基层社会的活力,重构基层治理自主性”。^⑦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特色鲜明的农业大国,州县治理居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位置,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中国州县治理的历史经验和现实

①《直隶总督颜检题为审理宝坻县民晁廷佐因看青纠纷伤毙陈六一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嘉庆八年十一月初十日),刑科题本,02-01-007-025987-0009。

②《宝坻县严禁偷窃禾稼告示》(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顺天府档案,41-043。

③《宝坻县常家甸庄青苗会首事王占鳌等呈状》(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顺天府档案,106-154。

④光绪《榆社县志》序《榆社县志序》,光绪七年刊本,第1页a。

⑤光绪《乐亭县志》卷2《地理·风俗》,光绪三年刊本,第10页a。

⑥公丕祥:《传统中国的县域治理及其近代嬗变》,《政法论坛》2017年第4期。

⑦杨华:《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序言”,第4页。

实践表明：“县域治理最大的特点是既‘接天线’又‘接地气’”。^①州县治理身处国家治理与乡村治理夹缝，州县治理的效果取决于能否协调国家治理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发挥州县政府能够严格贯彻国家政令的制度优势，确保地方治理的方向性和准确性，又能够灵活转化国家政令，使其切近民生，确保国家政策的可操作性。当然，州县治理的有效实施，除需要加强县级政权建设、提升县级官员行政能力与基本素养、加强对县域治理的监督等政策外，还需要从区域实际出发，适度调整县与乡村之间的关系，适当给予乡村自治组织一定自治权，加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通过密切官民协同合作，从而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形成“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立体式治理体系，达致州县治理的理想境界。

责任编辑：侯德彤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mplementation Paths and Basic Strategies of County and Prefecture Governance in the Qing Dynasty

Wang Hongbing¹ Ma Fengmin²

1. Institute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2.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Kajang 43000, Malaysi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that counties encountered great difficulties under the imperial power, county and prefecture governance becam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Qing Dynast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county and prefecture governance in the Qing Dynasty had commonalities in terms of basic system design. However, in the vast territory of traditional China,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d distinctiv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governance. As far as the capital region and its environs were concerned, the county-level regime was placed in the center of governance and at the bottom of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However, the county-level regime, which governed hundreds of villages, was the top of rural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ssroots people. The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istic that "the imperial power does not cover the county" and the concept of simple governance in the Qing Dynasty determined the plura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y governance. The Qing Dynasty took the construction of county-level political power as the core task of implement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On this basis, the state will and state power formed the basic strategy of official and peopl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with the help of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s and semi-official and folk governance resources.

Key words: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national governance; county and prefecture governance; rural governance; north China

^① 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2页。

何以为家：新国家与旧礼制和解中的民族复兴

钟艳艳

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苏州 215009

摘要:辛亥革命后,各类塑造独立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此消彼长。新的主权国家如何跳出“中体西用”的纸上谈兵,并建立有效的模仿机制和实用的文化体系,以重塑中华民族的国家气象与文明血脉,是摆在时人面前的急题。进而,民族主义在政治、知识、社会各界被全方位推广,最终既是意料之外又似情理之中地拉来礼制改革的诱饵,培植出传统中求发展、新学中涤文脉的时代品格。改造礼制与重造国民的民族主义式结合赋予民国礼制现代化内涵,并在知识精英的铺垫下、政治权力的推行下和农村社会的疏离中逐渐落下帷幕,而民族复兴的探索之路仍将在曲折中前进。

关键词:民族主义;国民政府;礼俗;国族

中图分类号: D691;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2-0094-12

旧礼教、旧道德在五四时期遭遇冷冽打击后,于20世纪30年代命运陡转,其背景是急迫的国家情势吞噬了思想武器的脆弱反攻。即便对所谓国民性充满灰色情绪,对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的追求也始终萦绕在国人心头。此间,民族主义的武器成为有力的政治、文化抓手,各界借此以不同思想立场论证着中华民族未曾断裂的千年历史。中国历史的延续性是中华民族赢得世界尊重的文化依托;中华民族的延续性是确证中国生命力的心理支撑。故此,从前被唾骂、被丢弃的孔夫子牌位又重新被迎回社会舞台的一角,任凭装扮。“陈独秀重新拣起‘旧道德的死尸’作为新道德的武器,这新道德便寄寓于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时代性的叙述结构中。新的‘历史’与旧的王朝史找到了共同的事业。”^①杜赞奇在此颇具洞见地点明近代中国政治界、文化界在追求统一的民族主权国家时对过去所谓“故纸堆”的不计前嫌。

政治界重提传统,试图以民族主义的心理亲昵发动民众的政治热情与配合;文化界再张道德大旗,扶起从前嗤之以鼻的宗法、礼教牌位,以便借助传统道德贯通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未来。政治界的民族主义呼吁摘取了文化界的部分道德养分,在传统道德的粉饰下将其政治诉求以文化的、生活的形式推广至全社会。虽然国民政府以民族主义张大、以传统礼制推进的政治野心在广大乡村社会遭遇了改造国民的实际挫折,但在寻求民族复兴的漫漫之路上,新国家与旧礼制似乎仍达成了某种微

作者简介: 钟艳艳,女,新疆乌鲁木齐人,哲学博士,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儒家礼学研究。

^①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

妙的互助式平衡。

以往研究多涉及民国政治领袖的民族主义情结,及其受现实影响的传统文化需求,^①这对今天有关国家形象与民族话语建构的理论研究大有裨益。而礼制作为中华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民国时期遭遇起伏命运的特殊对象,在国家形象与民族话语建构中如何再度引发新旧融通争议,是相关领域未完成的议题,亦可对当下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纵深理解提供新的契机。

一、知识界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退场

如同箭垛式的屈原从“整理国故”到“国故整理”运动中命运的跌宕,以儒家为主脉的传统文化在面临家国凋敝时也被目为“本文化”(stativists),成为知识界从传统中寻找中华民族完整性之历史源自的温床。原本已被推翻的封建成为建构统一民族国家、推行地方自治的旧瓶新酒,为新国家进行的各类话语建构都成为有实现可能的潜动力。于是儒学的境遇也摇身一变,重获时人青睐。但在此之先,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感染的学人群体已经不遗余力的将国家危亡与儒学滞后做因果处理,“由于抛弃了过去的一切,从而使得民族国家的观念本身也成了问题”^②,这也暗示着其后文化心理补缝的发生。

自严复译介《天演论》后,达尔文主义在晚清民初的中国大地获得较多受众。加之胡适等留学归国新青年的推广,社会进化观念一时甚嚣尘上,即便被视为保守主义者的章太炎也曾对社会进化主题大加阐发。“进化论历史一直是优越种族进步的角录。”^③在启蒙史观的名义下,人类社会及文化类型被区分为先进与落后、野蛮与文明,并在特殊时期为帝国主义的资本掠夺提供行动合理性。古代中国的璀璨历史证明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但近代面临民族危机时知识界对中华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读与批判又当作何解?答案或许正如列文森观点所指,由于中国过去采用的文化主义认同方式在民族危机前失效,于是文化惰性就成为危机的来源之一。民国知识界借此对晚清民初国家危亡境遇做历史地解释,从进化视角论证由中国传统文化惰性导致的民族静止,在文化惰性发展的连续性层面指出国家危亡的内生原因。正如民国学人陶孟和所说,一切问题都被归因为“社会的”,包括政治之龌龊、教育之不进、文学之堕落、风俗之浇漓等等。而被国人骄傲了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在颓废的社会中也成为罪因魁首,在新旧对立的深处激荡出强烈的文化危机。不过民国学人并未将儒学连根拔起,而是指出汉唐之后的儒学偏离了儒家圣谛,表面标榜儒学实际倡导黄老与清谈,加入佛教后中国学术与文化遂成为浪漫主义的大本营,一转变为虚渺的学问。这股浪漫主义的潮流与形式化的道德矛盾共生着,孽生出享乐与礼教并蒂的畸形儿。若说异化的礼教将人们束缚在形式主义道德的牢笼中久而不觉其臭,那么由出世的浪漫主义催化的享乐生活模式则在民国时期造就了一批不事生产、不

① 参见张磊:《孙中山的文化取向与“理想国”》; Audrey Wells.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un-yat-sen : Development and Impact, Printed and bound in Great Britain by Antony Rowe Ltd, 2001.*

②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第82页。

③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第8页。

闻国情、不献自力的中国人。

民国学人章渊若指出,中华民族的整体失落在于中国人与中国社会都陷入了严重的病态,不仅自耗且消耗他人、消耗社会。国民生活的病态表现为社会上游荡着三大群体:悲观者、享乐者、因循者。他们不仅不进行社会创造,还分享社会福利,拉低民族元气,使得国民陷入低沉状态进而导致国运悲惨。据民国初年对北京人力车夫所做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即便承担着相当的生存压力、有一定社会创造能力和付出高度体力的人力车夫,也患有享乐主义的病征。调查显示,北京人力车夫日收入大概 50 至 80 枚铜板不等,日工作时长 7 至 10 小时,每日需支付 20 至 40 枚铜钱的赁车费,再扣除生活费后其实所剩无几。即便这样,“大部分之车夫偶有储蓄则常流于怠惰,或营不道德之生活。及至薄蓄荡尽,于是又孜孜劳碌,重新为劳肢体之生活……人力车夫一生为劳苦与不道德之怠惰相交迭相循环者”^①。文中“不道德生活”所指的赌博、嫖妓、酗酒等是当时社会泛滥的娱乐风格,对个人与社会都造成严重的健康与卫生威胁,这为后期国民政府从健康与卫生习惯入手改造国民性的努力预留了契机。

社会的病态表现为一般民众缺乏正确的社会观念,他们既不认识个人与社会的有机关系,也不知道个人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历来处于“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我境界中。这病态的国民中,有一种被称为“新贫民”的群体。新贫民的形成由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女子解放造成的女性消费主义、中国阶级界限不严密等造就,而在章渊若提及的国民病态表现层面,新贫民由消费造就。“在现代社会里别乎流俗是最困难的,大部分的人没有标奇立异的魄力,从俗是最容易做的并且最合算的,标奇立异是危险。人家都是这样打扮,我们自然也就是这样打扮。人家都是这样的娱乐的时候,我们也自然要顺着他们。这种社会的压力是很大的。中等社会在这个压力之下可就变为新贫民了。”^②从俗消费归根究底在于精神上的不独立,个人追逐消费主义难以形成独立价值判断以至精神萎靡,最终拉着整个社会堕入低迷。

“除了人力的消耗外,还有力的相消,尤为中国社会最重病态。”譬如,在当时最受追捧的民族复兴议题下,各种主义积极地实行着,但往往各行其是,既缺乏对社会力量的综合协调,也没有对社会事实进行全面了解。于是,“有人评论中国社会的运动,仿佛是一个人发了‘离魂病’,他虽能从梦中起来做种种动作,却是根本昏迷不清,没有理智的自觉,明天问他他却莫名其妙”。因此,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针对国民与社会的双重病态对症下药,即培养健全的国民生活,“从根本上救济这个严重的社会病态,注重人的训练、人的培养。使人人能从睡眠麻木的状态中觉醒起来,从自我的觉悟,自我的实践,自我的完成,以充进社会的机能,强化民族的生命”。^③

社会的病态根本上是由国民的病态造成或加重的,因此民族活力的恢复要从国民状态的改善入手。在诸多救国主张中,教育救国将国民放置在计划的最中心。教育是传播知识以培养文化创造力的事业。民国教育虽强调知识普及,但基于民众受教育程度的层次不齐,以及国民政府对国民形象与

① 陶孟和:《孟和文存·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23页。

② 陶孟和:《孟和文存·新贫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③ 章渊若:《民族复兴之基本原理》,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41—42页。

民族形象的关联处理,这一时期的教育生态表现出倾向日常生活习惯改造的一面。1923年,晏阳初、陶行知等创办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时,晏阳初就认为,“教育的正当目的,不仅是养成良好的个人,却是养成健全的公民。健全的公民应该有何种知能,公民教育就得包含着何种相当教育。所以公民教育不当单指普通所谓公民科和公民训练说,就是什么生计教育啦,科学教育,卫生教育啦,都应得包括在内”^①。在该会主编的《市民千字课》中提到:“衣服能合身,做事才方便,不必求新奇,只要常洗换,房屋要清洁,窗户要常开,浊气放出去,阳光放进来,街道常修整,家家扫干净,方便往来人,预防传染病,又利己、又利人。”^②1931年,晏阳初应邀赴南京,蒋介石称其定县实验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基本工作;1933年,国民政府以定县实验为蓝本设立了五个实验县;1938年,新都实验以流血事件告终。此后,晏阳初等终于意识到国民精神与民族气质的再造工作无法脱离最根本的乡村经济建设问题,并逐步将目光从改造国民生活习惯转移到发动群众自行开展社会建设上来。这也说明:民族气质、形象、地位的改造与提升不仅关乎上层建筑的事功,缺乏相应经济基础的改造计划只会成为空中楼阁。

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群体在民国舞台的活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英主义。事实上,近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大多对下层社会民众的窘迫生活缺乏切己的感受,他们引入或推广的各类国民性改造计划实际上脱离了民众最低线的生存所需。同时,因他们“广泛撒网”的热切救国心引入的五花八门的救国主张也常常因某一方面的理论迷惑性沦为政治的工具,就如同晏阳初等编著的文字普及教材中还需要不断加入三民主义的宣传一般。进入遗迹的世界,探讨可以观察的过去。在配合政治界追求现代化并主动为中国式民族主义探寻出路时,知识分子在不觉中失去了自身的话语独立与权威。他们在一次次纷乱中“自我剥夺了原本可以从历史和民间文化中找到的道德权威的替代来源”^③。而这,正是近代中国重新寻回民族地位的时代牺牲和现代化特质。

二、政治界与民族主义的扩张

“民族主义是动物界的群居本能的升华。”^④陈旭麓先生将民族主义比为人类兄弟阋墙、血浓于水式的本能而非理性的表现,不过也正是这种非理性的情感激发了民国时期政治界对民族话语的强力篡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思潮发轫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在其离世后由戴季陶等不断扩充,最终在新生活运动、北泉议礼等政治活动与社会运动中付诸实践。虽然国民党人推崇民族主义,但在他们看来,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已经是有效却式微的存在。孙中山就认为“异族”政权消灭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加之新青年们争相追捧的世界主义间接粉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中华大地几乎陷入弱者的绝境而不思抗争。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式微造成相应的民族危机,于是,从源头处探寻民族主义趋弱的原因并寻找解决之道就成为国

① 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术》,马秋帆编:《晏阳初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8页。

②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编:《市民千字课》第1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16—23页。

③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第219页。

④ 陈旭麓:《浮想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9页。

民政府中民族主义者们的救国思路。

首先,民族主义在满人“入侵”后潜伏至下层社会并逐渐隐匿。明末知识阶层中未加入满族政权的遗老收罗社会地位低下、无家可归、知识水平低者转入地下活动,宣传民族主义。这类群体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族主义被视为复明瑰宝。为保存这一“中国的宝贝”,遗老们不得不将民族主义隐藏在鄙陋的下层社会,这直接催生出有清一代名目繁多的会党组织。因为这类民族主义的会党大多知识水平低且活动相对隐秘,所以会党内部多以口头形式讲演思想而非文字传播,这导致民族主义思想逐渐不见于典章。到乾隆时禁提满汉差异后,中国保存在文字里的民族主义逐步被动消失。

其次,中国民族主义意识淡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帝国”,深受天下观和大一统思想的影响,提倡“世界主义”。孙中山就提出:“中国从前也想做全世界的主人翁,总想站在万国之上,故主张世界主义。”^① 孙中山认为,满族对汉人帝国的颠覆也是民族主义发挥了意识优势,是满人以民族主义打败了汉人的世界主义。他还用挑货工人中彩票的故事举例说明中国历史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此消彼长:挑货工人买了张彩票藏在竹竿里,得知自己中奖后喜不自胜地以为摆脱了挑货命运。他将竹竿抛进河里,当反应过来时竹竿早已不见踪影。在这里,彩票是世界主义,可以发财,竹竿是民族主义,只能谋生。中国历史上遇到国势昌盛的时代就扔了民族主义的竹竿,强调天下情怀的世界主义,和万邦,怀远人。当国势不再,可供复起的民族主义之杆也早被大浪淘去。从孙中山的逻辑看,世界主义是帝国进入稳定阶段的理性产物,历史上处于帝国阶段的中国为了进一步扩大国家势力,几度选择了世界主义而抛弃民族主义工具,以至眼下陷入民族绝境。

再次,“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孙中山指出,民族与国家有一定区别,二者的形成动力不同:民族由天然力造成(如语言、宗教、风俗等),国家由武力造就。天然力即中国政治传统所说的王道,武力即霸道。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构成可以发现,中国总人口四万万,“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指蒙、满等),所以中国人主体可以说完全是汉人,是“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② 因此,不论在异族政权形成之前或之中,中华民族都处于国族与民族合一的状态。按发展情势看,国族与民族合一的中华民族应当造就一个兼具王道与霸道的威威大国,但当时的中国却无法与欧美并驾齐驱,反而“处国际中最底下的地位”,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中国的家族与宗族观念根深蒂固且组织力量较强,但始终围绕在血缘与姓氏周围下功夫。和平年代自保一家一姓发展,动乱年代只关心个人生计。当时有人就认为中国百姓只关注辛亥革命后能否吃到便宜的大米,而从不关心革命对国家命运的改写。在家族—宗族—国族的过渡链条上,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与合作精神,这也是国民政府后期推进礼制改革的动因所在。

最后,中国要“在世界上,在国际间,成一独立不可侵犯能完全自由行使主权的民族”^③,就需要恢复民族主义,这也是国民党人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核。国民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多导向世界主义,虽然孙中山认为世界主义使中国失去了民族主义的宝物,但他并不认为世界主义就是不好的,而是

①《孙中山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78页。

②《孙中山选集》下,第640、644页。

③ 蒋介石:《参观江西讲武堂讲话》,中央军官学校编:《蒋介石先生演说集》第一集,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第305页。

认为真正的世界主义应当建基于中华传统的和平主义之上。汪精卫也曾指出人类社会在进化线索中从蒙昧、家族、部落发展至国家时代,此后必须依靠人类的共存观念去克服“人类相斫主义”,最终进入世界时代。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联合视野下,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与世界其他被压迫国家革命有内在一致性且应当互为援助。

那么,如何恢复中国的民族主义?关键在于使民众自知危境并凝成团体意识,形成家族—宗族—国族的大团体,具体手段便是“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进而把“固有的智能”恢复起来,即能知与合群。

关于旧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①道德名目看似是旧的却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例如忠,不再是忠君而是忠于国、忠于民。在中国民众深谙的旧道德体系中,“孙中山明智地注意到他们对家庭的忠诚度是非常可观的利用对象。他还能唤起中国人对这些古老美德和成就的自豪感”,使国人在学习西方时不丢失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优越感,这对历经洋务、维新以及激烈新文化运动的中国而言满足了时人一定的心理需求。“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原创经常被指责过于个人主义,因此经常以发展传统的名义引入新思想。孙中山正是这样将新思想嫁接到一棵老树,同时砍掉它的许多树枝,以便结出新的又并不完全陌生的果实。”^②

关于智能,“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③智能即指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是个人关于国家的观念,尤其强调个人在国家命运中的功能内嵌。由传统政治哲学构成的智能可以推动修齐治平的外化,但,这仅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中国人在修齐治平的第一步——“修”就已落败。孙中山认为中国人的“一举一动都欠检点”,而修身又是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因此中华民族陷入绝境几乎是可预见的。他谈论的“修身”是指身体、仪表、形态、举止等合乎时代文明,要求国人改掉“吐痰、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的身体习惯,是为“诚中形外”。虽然这与儒学传统的修身内涵大相径庭,但不得不说是一种与时代相合的基础性改良。且在孙中山将修身礼仪重整与民族地位恢复相关联后,对身体和生活的改造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政治生活的一大重心,并渐次成为国民政府眼中恢复中华民族自力的重要动力来源。

孙中山在国民政府的后继者在发挥其对身体礼仪与民族形象的逻辑关联时还做了些许有价值的改造——着重培养公共场景中的团体意识。自孙先生 1925 年与世长辞,国民党诸派系常以“遵国父遗教”为名开展一系列政治活动与社会运动。其中,北泉议礼梳理并完善了孙中山关于身体礼仪与民族形象的重要论述并将其体系化。新生活运动则加入了更多的民族主义色彩,在将身体礼仪嵌入具体生活场景时,兼顾培养民众的公共精神和团体意识。整体来看,新生活运动以近代生活图景对民众的一般行为作符合现代礼仪期待的礼制规范,北泉议礼则通过公共性的礼仪规定涤除了古礼中身份性礼仪的正名意涵。前者是后者的实践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经验总结。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①《孙中山选集》下,第 706 页。

② Audrey Wells.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un-yat-sen : Development and Impact, Printed and bound in Great Britain by Antony Rowe Ltd, 2001, pp71,130.*

③《孙中山选集》下,第 710 页。

意义上,二者共同践行着国民政府以民族主义情绪对国民形象进行现代礼仪改造的时代使命。

“新生活运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底破坏运动变成一个建设运动。”^①在正统性上,新生活运动被塑造为总理遗志的接续;在合法性上,新生活运动以蒋介石的政治地位为依托;在政治性上,新生活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对垒,是蒋介石为自身集权政治造势、为传统寻找现代生命、为党派之争树立旗帜的手段。日本学者深町英夫称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为“教养身体的政治”,认为发端于身体礼仪改造的新生活运动从食衣住行育乐的礼乐教化运动一转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对此,深町英夫不禁发问:“面临如此深刻的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何故发动并持续了这种略带肤浅、琐碎之嫌的启蒙运动?……抑或此运动只不过是独裁政党发动的强迫性群众动员而已?”^②

以民族主义与国民改造为出发点理解新生活运动会发现,礼仪与民族的互融是国民政府将国民的生活礼仪与国家的国际地位挂钩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方式。古代中国的身体美学以操纵身体、展现形象来确定与身份相匹配的道德理念,宗法为此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的宗法网络按其结构表象看应当更具备将个人身体礼仪社会化的环境,但这种个人身体礼仪的社会化却未能在实际中培养出个人较强的公共意识。宗族虽然是较大的社会单位,但宗族成员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民在身份属性上仍相差较大。宗族成员身份的局限性导致其礼仪的条件性,社会公民身份的一般性促成其礼仪的公共性。而蒋介石、汪精卫等向来认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不适合团体生活,且中国人缺失的公共意识已经在国际社会留下了负面印象。因此,军事化的礼仪改革不仅能塑造一批适应于战事的高素质国民,还能在打造公共礼仪意识的进程中提升民族形象,这两步同等重要。

从新生活运动的一系列《办法》《须知》可以看出,国民政府首先以工作内容和场景为标准对国民进行社会角色划分,如女佣、职员、社会团体和酒楼、公共汽车、码头等。职业或工作场景都是相对公共的,新生活运动正是要在公共生活中“教养”国人的身体,培养其公共意识。不过新生活运动极强的局限性也正由此蔓延:民国时期的中国毕竟还处在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场景中,职业化的公共规范及服务意识并不适用于广大农民。诚如胡适所说:“提倡新生活的人不可忘记: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要叫人民能生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力,最后一步才是叫他们过新生活。”^③国民政府以礼仪塑造民族形象的努力虽然扭转了传统上礼与正名的绝对勾连,但其试图提升的身体礼仪与生活场景的匹配度,由于战争等诸种原因未能获得深度推行,一段时间内还因过度强硬的推行方式引发民间恐慌。但在礼仪与民族的正向塑造关系上,执礼者的部分政治意图收获了相应的果实,也为此后北泉议礼的礼制总结活动营造了先机。

依据北泉议礼的结晶《中华民国礼制》,恢复礼制的民族情感在于“中国自晋以礼立国”,政治诉求在于“国家独立,而礼制以整饬行动,和齐民族,与扶植抵御不可分离”,社会需要在于“生活不离食

① 贺衷寒:《新生活运动之意义》,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新生活运动》,第198—199页。

② [日]深町英夫:《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深町英夫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3页。

③ 胡适:《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大公报》1934年3月25日,第2、3版。

衣住行育乐六事”，道德渴求在于“道德仁义，非礼不成”。^①总而言之，民国礼制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依据，以“诚敬与公”为守礼标准。十二守则围绕食、衣、住、行、育、乐六大民生要事，以时宜、地宜、人宜、事宜“四宜”为标准对古礼做相应调整，制定出国礼、民礼、国际礼三大场景礼仪。在目次上，《礼制》延续五礼的分篇模式，吉礼主祭祀纪念，嘉礼主崇敬国旗、迎送元首、庆祝、觐谒、集会、燕乡等，军礼主海陆空之礼，宾礼主国际、官吏、学校、国民仪节，凶礼主丧葬恤荒。

《礼制》沿着新生活运动弱化身份性礼仪、凸显场景性礼仪的礼制思路继续对国民的公共意识做集体性塑造，并在诸种礼制中强化了爱国主义情感。首先是祭礼。祭礼分为国祭、公祭、家祭。以国祭为例，包含祭黄帝、国父、孔子等，祭仪都由主祭与陪祭完成，伴有香、乐（国父纪念有献茗），流程基本都为鞠躬、初献（帛）、亚献（花）、终献（爵），祭告文，奏乐，礼成。各祭祀对象的祭品、鞠躬数基本相同，无身份上的仪轨悬殊。家祭在保留私人化礼仪场景的同时对礼的身份性规定也有所弱化，取消了传统上对于大宗、小宗祭祀权的限制。其次是葬礼。《礼制》申明民法中不存在对嫡子与众子的划分，强调本宗与外家没有族源差别，这直接废除了嫡庶与“承重”传统在葬礼中的礼仪表现。在男女平等的主旨下《礼制》还强调夫妻皆为对方守齐衰，仅为父母守斩衰。这不仅废除了旧礼中妻为夫守斩衰，夫仅为妻守齐衰的失衡规定，也符合“不二斩”的礼制古义。

民国礼制在原本家庭礼仪的基础上设置社会礼仪，一切以公共秩序的和谐为主，公共场景也就顺而成为进行身体礼仪教化与礼仪标准检查的最佳场所。当然，“中华民国礼制之目的，在使人民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提高革命精神，发扬民族道德，实行新生活，建设新中国”^②。因此，《礼制》试图将人民生活进行军事化、科学化、艺术化的身体美学改造，不仅是对长达15年的新生活运动的礼制总结，也在制礼作乐与民族国家形象建构过程中对新生活运动的精神进行了最后的延续性雕琢。北泉议礼结束的6年后，新生活运动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退出中国大陆的历史舞台。

国民政府发动的废历运动、新生活运动、北泉议礼等国家活动，无不体现着旧传统被强行打扮出的新模样。国民政府的强硬推行引来部分知识分子的指摘，不过在民族、主权等问题前，此时的指摘强度已经远远不及新文化运动重估一切的魄力与决心。因为在面对国家完整、民族延续的重大问题时，激发全国民的民族意识才是最紧要的。正因此，这类新国家与旧礼制联袂的政治主张与社会运动在当时中国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应。此后，知识界与政治界共同推动着在他们看来易于一般民众接受的礼制改革，并力图借此完成对国家和民族形象的全新建构。

三、社会界与集体主义的膨胀

“民族国家是同时作为权力关系、群体表述以及对超越的追求而存在的。”^③ 权力关系是政治界的追求，群体表述需要知识界的话语助力，对超越的追求则时隐时现地闪现在乡村社会的各类组织中。

① 国立礼乐馆编：《北泉议礼录·中华民国礼制·总纲》，北培私立北泉图书馆印行部，1944年，以下简称《礼制》。

② 国立礼乐馆编：《北泉议礼录·中华民国礼制草案》，北培私立北泉图书馆印行部，1944年。

③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第220页。

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国民政府的多项举措以政令形式下发,但上下仍各行其是,乡村社会在主观上几乎不为所动。例如废历运动的推行在乡村就反应平平(事实上城市居民也对此颇有微词),阳历不仅无法适应其农业生产的节律,也覆盖了依据阴历进行的乡间礼俗活动,还影响着由周期性礼俗活动推动实现的乡村社会的内部整合。

与此同时,随着民国时期的社会分化加强、社会交往扩大、现代官僚政治对乡村控制的强化、革命引起的全方位变革,受孙中山等批判的家族—宗族结构逐步瓦解并向国族过渡,初步形成具有突破传统宗族力量的社会格局。在广大农村社会,贫困、分家析产使个人逐渐从宗族势力中解脱出来,他们大多没有足够财力参与宗族社会性活动,且随着宗族成员共同利益重叠范围的窄化,宗族情感也逐渐淡化。在此背景下,新型的农村社会交往依附在新型的社会生产组织之上,以生产保护组织、平原灌溉组织、村庄自卫组织等内生性权利组织为基础,形成了超越宗族血亲的现代社会交往网络。

由于新型农村社会关系的形成仍是以农业生产为生活主题,因此农闲时节的乡村生活大多仍以与农事相关的宗教民俗与礼俗为主。在教育普及率较低的时代,教化位于教育之先。中国传统上的教化来源一般有二:宗族生活与宗法性传统宗教生活。在宗族的一面,历代持续进行着地方教育与教化的黏合部署,儒家传统美德经由官绅、乡贤传递至民众,教育的知识化基本附着于教化的道德性上。在宗教的一面,教化的推进在强调超世俗维度的同时以发扬劝善力量为主轴,例如民国后期农村社会传播的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在理教都劝诫民众不要吸食鸦片。由此来看,国民政府若要培育与教养代表民族形象的新国民,其工作范围就不能忽略宗族生活与宗教生活。

对宗族生活中民众的教养,经过政府控制与现代性社会组织的自发形成而逐步成型,对宗教生活中民众的现代化教育则并不易成。近代中国民众的宗教生活大体由儒、道、佛、耶、回五大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与礼俗构成。五大宗教信仰在民国农村维持着国人传统的功利性信仰需求与发展模式,国民政府为强化官方在宗教领域的教育力度与话语权,选择了宗教事务管理作为教育管理的突破口,具体来看就是在引导与管理宗教事务时加入了民族独立意识。遗憾的是,这类管理手段后期成为国民政府操控寺院经济与权力的幌子。

首先,国民政府将本土及中国化的儒道佛三家定为合法,喇嘛教与回教教众的世俗权利与义务较少,小刀会、红枪会等有历史反骨形象的民间宗教被定为非法。据1935年内政部制定的《中国佛教会章程》要求,全国佛教徒应加入佛教会,除一般宗教功课外,成员享有会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同时应缴纳会费、捐助事业费。会员分为普通会员(年会费国币两元)、特别会员(年会费国币四元)与基本会员(一次性缴纳会费国币四百元)。除缴纳常规性会费外,《章程》要求各分会与著名寺庙认缴补助费,必要时还需缴纳临时“特别捐”,且特别捐适用于“中华回教师协会”等其他组织。^①

其次,在为基督教专门成立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的管理章程中,民族自决被提升至首要地位。自立会总纲第一条规定:“本会抱定民族自决之心志,遵守信教自由之原则,并本与基督教义及其博爱牺牲救人之精神,阐扬真理,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保教权利,唤起全国民众实现本色之基督教会,以

^① 立法院编译处编:《中华民国法规汇编》第四编,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297—298页。

期适合中国国情、深印人心为宗旨。”^①在华基督教之自立要求实现“自治、自养、自传”，在尊重信教自由的前提下初步奠定了后来“三自”爱国运动的先声。当然，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基督教特权保护的同时，自立会管理章程对在华基督教会收取了更多名目的费用，包括日常会费、筹募基金利息、特别捐、感恩捐、分支支会月捐及其他捐助。所谓“自立”中，寺院经济占据主要地位。

在“正统宗教”之外，民间信仰与礼俗本质上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过在性质上有优秀与糟粕之分。抛开价值判断，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西人尤其是传教士、汉学家认识中国的方式，而这两大群体正是近代西方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媒介。为将民众塑造为符合国际期待的新国民，对民间信仰与礼俗的封建迷信与反政府色彩的批判取缔是国民政府在农村社会的重要工作之一。

以农村生活与农业生产为主题的民间信仰与礼俗现实地反映着农民对农事的高度依赖性。农业生产在部分地区是农民的全部生活来源，尤其在洋纱等进口产品涌入后，传统乡土工业在乡村基本失去发展空间。以1930年辑安县（今吉林集安）为例，该县户籍在册人口两万人左右，全县居民几尽为农。而土地“多硗瘠，耕种不易。且墨守旧法，鲜知改良。终岁劳苦垦殖经营，如无水旱之灾尚能供给充足，一遇歉收之年，且有饥荒之虞”。因此农人有丰富的围绕农事、按照节气进行的信仰与礼俗活动，岁时礼俗也在延续本土信仰与外来宗教相融合的前提下发展出符合农事期待的新礼节。比如在四月初八浴佛节时用风来占卜粮价的涨跌，取“风吹佛谷面，有粮也不贱。风吹佛爷背，无粮也不贵”的美愿。而关于这类信仰与礼俗是否符合政令，《辑安县志》明确说明：“今遂科学昌明，痛斥迷信，惟数千年相沿成风，有非一朝一夕所能破除者，况信仰自由载在宪法。然宗教之于今日仍有存在之价值，可想见矣。”^②可见，农村社会的信仰与礼俗活动虽表面范围缩小事实上仍在进行。

在诸种礼仪之中，最能反映地方礼俗与国家礼制相分离状态的是葬礼。地方丧葬礼俗的特点有二：三教仪式杂糅于葬礼中、厚葬之风延续。以今陕西省介休县为例：“丧礼。父母卒……将葬前数日，遍黏讣纸。先一夕，灵案前盛陈祭品，鼓吹参灵。次晨，发引，诸亲毕集。丧仗繁重，至数里有者。祭筵或至数十桌，远近观者堵墙。富贵之家奢相，尚千金所弗恤，倘财用不足或致停丧。而商贾好侈，亦复相沿。且饭僧忏佛，虽守礼之家，在所不免。”^③传统葬礼的殓葬顺序大致俱在，祭品丰厚，祭仪隆重，保留了厚葬之风。同时，佛道教的拜忏仪式也掺杂其中，并依据丧家财力选用不同的规制。今河南中牟县的葬礼同样是“殓殓从厚”，如该县县志所说：“按礼，典俗均属仪式。惟礼由兴法定，俗生于习惯耳。今也朔改服易，而礼制未须人群沿习之，故事是有未能骤废者。虽或近迷信见恶于时哲，然多人袭用，故宜存之以征习尚也。”^④依据《中华民国礼制草案》与各地县志的对照研究，涉及国家、社会、地方府县的礼节推行较好，且多集中于国家与公共祭祀礼仪。民众日常礼仪与《草案》有较大出入，且多集中于丧葬仪式与民间杂祀。这反映出祭天、祀孔、奠国父等礼仪距离民众日常生活相对较远，也说明在化民成俗的国家建构事业中，社会自发力量具有的顽强生命力。

① 立法院编译处编：《中华民国法规汇编》第四编，第306页。

② 《辑安县志·人事》卷三，影印本，民国十九年。

③ 《介休县志·风土》卷十三，铅印本，民国十九年。

④ 《中牟县志·人事》卷三，石印本，中牟明德堂出版，民国二十五年。

当然,不应忽略的是也有少量地区接受了国民政府推行的文明葬礼,并在遵守古代礼貌的基础上强化了仪式的美感。如新平县(今云南玉溪市下辖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丧礼就依据时风而“改良从俭,非至亲不送孝帛,出殡前一日,遵照《文公家礼》设席致祭,行三献礼,歌《蓼莪》章,不用道士绕棺等旧习”。^①新平县属“汉夷杂处”,且各民族的日常礼仪习惯各行其是,这样的葬礼新制反映出国民政府的礼制改革产生了局部效力。

经过具体宗教法规的制定与出台,国民政府似乎在宗教事务管理上与世界接轨,既确定了本土宗教发展与外来宗教传播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又部分实现了“宗教自由”,同时还加紧了对教界事务的控制。对于管理并引导宗教和民间信仰与礼俗发展的初衷而言,国民政府试图将一般民众从所谓迷信中解脱出来,塑造他们为符合西方标准的科学的、知识化的国民。但在具体实行中不仅违背了行为初衷,还将民众的信仰生活理解为呆板的、停滞的祈望,忽略了艰难求生境遇中信仰之于一般民众的特殊心理价值。大多民间信仰与礼俗习惯处在民国国家礼仪体系之外,但不仅绵延历代,且多与生产生活相关,很难从民众日常生活中连根拔起。事实上,在艰难境遇中,这类民间祭祀礼仪为乡民们一年的农事活动奠定了丰收的心理兆头。当从政者盲目且蛮横地将民众的信仰生活定为非法并加以限制时,事实上也剥夺了他们在苦难中获得新生的希望。随之而来的将是民众对政令的消极配合以及政府与民众的距离疏远,而这对于当日之中华民族地位独立与中国国民形象塑造而言影响无疑是消极的。

结语

民国社会动荡纷杂,对任何主题的结构研究都难免挂一漏万。以民族复兴语境下的新国家建构与旧礼制改造的交互对话为主题勾勒礼制在近代社会的新走向,只是展示民国社会生态的狭小一隅。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洪宪帝制的复辟闹剧加深着时人对礼教的恶感,并波及到“礼”本身。但正同文化、政治运动与乡村社会或多或少的脱节相似,乡村对反礼教运动形成了相对的免疫。进入抗战纵深阶段,知识界与国民政府对传统权威的功利性恢复,推动着礼制的乡土复兴。知识界以礼的德性传统论证中华民族的精神完整与独立,政治界以礼的修身理路号召全体国民的团体意识与自力。礼在此时似乎不仅被塑造为文化的胜者,还是民族的宠儿。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只说儒学的惰性,是百数十年来新旧冲突中新派的通识,其实儒学有其理性的内容,特别是其修补功能。周期性的大动荡之后,都是有赖于儒学的安抚。”^②

礼在时人追寻独立民族国家的路上是一副脆弱的拐杖,它局部支撑着跛行的国家,短暂释放着自身在近代社会的最后一抹余温。在失去相应的施行环境后,重整礼制取得的效果往往与时代脱节,以至演出一幕幕礼制改良绝对化的社会闹剧。试图依赖没落的礼文化恢复低沉的民族自信心,这种

^①《新平县志·礼俗》卷五,石印本,民国二十三年。

^②陈旭麓:《浮想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3页。

努力本身就是脆弱结构的强行结合。作为儒学传统的骨骼,礼的被装饰是无奈的。值得庆幸的是,曾遭遇猛烈棒喝的传统终于在疾风骤雨的时代被功利性地部分找回。

责任编辑:侯德彤

What Makes Home: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New State and Old Rites

Zhong Yanyan

School of Marxism,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various discourse systems of shaping independent nation-states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 How to break out of the armchair concept of "Chinese learning as substance and western learning as function" and establish an effective imitation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cultural system to reshape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cultural co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was an urgent issue facing the people. In turn, nationalism was promoted in all aspects of politics, knowledge and society, which eventually attracted the bait of etiquette reform in an unexpected and reasonable way, and cultivated the character of the era that sought development in tradition and pursued culture in new learning. The nationalistic combination of reforming the ritual system and reconstructing the people endowed the ritual syste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modern connotation, and gradually came to an end after the intellectual elite's way-paving, the promotion of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alienation of rural society, but the road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was still long.

Key words: nationalism; national government; etiquette and custom; nation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制度性困境与对策建议

张 珩

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研究所, 北京 100710

摘 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推动共同富裕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在于通过发展普惠金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辩证统一。中国当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高,重点服务群体的金融素养较低,金融供需存在结构性失衡,政府对普惠金融的支持存在“缺位”。未来构建高效服务共同富裕的普惠金融发展机制,需进一步强化国民金融教育,构建具有高度适应性和竞争力的普惠金融市场体系,建立“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政策保障体系。

关键词:共同富裕;普惠金融;制约因素;制度性困境;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 F83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2-0106-14

2021年以来,党中央就经济社会进入新阶段以来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提出要“不断改善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并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缩小收入差距、遏制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共同富裕,并在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迈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现实途径。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已成为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重要议题。事实上,“共同富裕”中,“共同”更加强调公平,“富裕”更加注重效率,处理好两者关系,实现“重视公平、兼顾效率”是新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中国经济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前所未有的契机。

当前,世界经济正深陷“低增长、高通胀、低利率、高债务、高收入分配失衡”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要“于变局中开新局”。作为经济增长的血脉,金融的任务在于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在2005年的国际小额信贷年年会上,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普惠金融”发展理念,并得到G20、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大力推广,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研究的一大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工作,首次将“普惠金融”纳入党的决议中,并出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普惠金融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一项有责任、有情怀、有温度的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法人治理、产权改革对农村信用社双重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与实证检验”(71903151)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乡村振兴视角下产权改革对农信社使命漂移的影响:机理研究与实证检验”(2023YQNQD0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珩,男,陕西延安人,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农村金融研究。

金融事业,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凝聚力量谋划中国金融新发展,促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谱写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才能为开启从全面小康迈向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贡献金融力量。^①因此,探究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动态变化、把握其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顶层规划构建有利于迈向共同富裕的普惠金融发展机制和政策体系,对持续解决好弱势群体在金融服务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广大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具有重要时代意义。

一、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描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普惠金融不只是一项金融活动,也有一种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根据2016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五年规划,普惠金融被定义为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我国当前和未来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②基于上述定义,可以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个维度理解普惠金融而言:一是“普及”,指的是金融服务的延伸,即金融供给端要尽可能提高金融服务覆盖广度,以满足那些有金融需求的弱势群体;二是“惠及”,指的是金融服务的价格,即金融需求端能以可负担的成本从金融供给端处获得金融服务。事实上,普惠金融的宗旨是以服务亿万人民群众为己任,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覆盖面,让每一个有融资需求且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微弱经济个体能以可负担的成本,以公平、透明的方式享受到金融服务。^③普惠金融所体现的金融公平理念与共同富裕体现的社会公平的理念高度一致,其重点服务人群也正是共同富裕所惠及的主要群体。因此,通过发展普惠金融助力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广大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因此,普惠金融既不是“只普不惠”也不是“只惠不普”,而是在做到“普”“惠”的同时,要兼顾商业可持续性。但当前普惠金融业务仍处于成本高、效率低、盈利微状态,导致其商业可持续性与普遍获得性存在一定的冲突。鉴于此,我们基于省级层面的数据来测算和分析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动态变化。

(一)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评价体系构建

普惠金融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其发展水平的测算。如何构建合理、有效的指标体系对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至关重要。当前,一般研究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渗透度、使用程度、金融产品和服务质量、商业可持续程度等维度构建综合指数衡量普惠金融发展程度。^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权威机构都构建了相应的指标评价体系,例如,普惠金融联盟(AFI)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使用情

① 张全兴:《以普惠金融改革推进共同富裕》,《中国金融》2021年第17期。

② 刘桂平:《关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国金融》2021年第16期。

③ Sarma M., and J. Pais,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1, 23(4), pp.613-628.

④ 焦瑾璞、黄亭亭、汪天都等:《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及实证研究》,《上海金融》2015年第4期;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4期。

况两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标评价体系,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从金融服务使用情况、金融服务可获得性、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质量等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标评价体系。这些指标评价体系跟不上普惠金融的发展,且没有分析每个维度对普惠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贡献。鉴于此,我们借鉴现有研究,并结合当前我国实际发展情况以及央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权威机构提出的普惠金融指标评价体系,在遵循系统性、层次性和导向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基于供给侧维度从普惠金融的渗透度、使用度、效用度和可负担度等四个方面选取评价指标构建中国普惠金融的指标评价体系。此外,由于个人和企业在日常金融活动中不仅需要存贷汇等银行服务,还需要类似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因此,为了能更全面地反映普惠金融,在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时,我们加入了证券行业和保险行业的相关指标,以反映当前出现的多层次性和多元化的普惠金融服务。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没有考虑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主要原因是该指数更多是基于需求侧角度构建的指标体系,而本文的普惠金融指数则是延续已有研究,从供给侧角度构建的指标体系。表1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评价体系。

表1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评价体系

维度	统计指标	方向
普惠渗透度	每百万平方公里所包含的金融机构网点数量(个)	正向
	每百万平方公里所包含的从业人员数量(人)	正向
	每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网点数量(个)	正向
	每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量(人)	正向
普惠使用度	金融机构人均各项存款余额(万元)	正向
	金融机构人均各项贷款余额(万元)	正向
	证券市场人均交易金额(万元)	正向
	保险密度:人均保费(元/人)	正向
普惠效用度	各项贷款余额与当地生产总值之比	正向
	各项存款余额与当地生产总值之比	正向
普惠可负担度	保险深度:保费收入与当地生产总值之比(%)	正向
	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占比(%)	负向

1. 普惠金融的渗透度。渗透度代表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覆盖范围。理论上,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增加可降低普惠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成本,但并不能完全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普惠群体拥有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量,可以代表金融机构给普惠群体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重视程度。

2. 普惠金融的使用度。使用度代表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使用程度。目前,普惠金融群体享受到的是金融机构提供的存、贷款等基础性业务,我们采用金融机构人均各项存款余额和人均贷款余额2个指标反映银行普惠金融的使用度。另外,由于中国普惠金融体系是以银行、证券、保险等多元金融主体为主,所以我们也加入证券市场人均交易金额和保险密度2个指标分别反映证券层面和保险层面的普惠使用度。

3. 普惠金融的效用度。效用度代表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随着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袭击和人口老龄化等新型风险不断涌现,保险在普惠金融领域的作用越发凸显。因此,除

了采用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与当地生产总值之比作为指标外,我们还选择保费收入与当地生产总值之比(保险深度)来反映普惠金融的效用度。

4. 普惠承受度。承受度代表普惠金融群体对金融产品与服务价格的接受程度。利率作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真实价格,其水平高低直接影响普惠群体的价格承受能力。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金融机构可在规定范围内浮动贷款利率,上浮幅度越高,普惠群体需要偿还的贷款利息就越多,普惠的承受度就越低。本文选取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占比来反映普惠金融的承受度。

(二)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分析

1. 总体水平分析

按照上述指标,借鉴谢忠秋提出的 Cov-AHP 方法和张珩等的研究思路^①,我们计算了 2007—2020 年中国 31 个省份(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②,其变化趋势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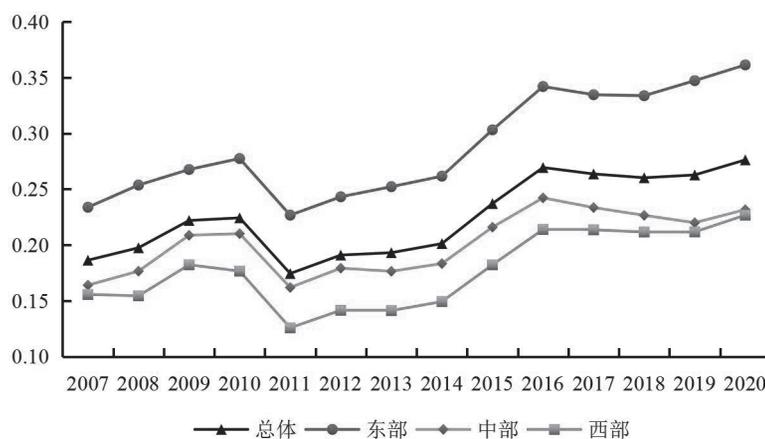


图 1 2007—2020 年中国及各区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变化趋势图

目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从 2007 年的 0.1864 上升至 2020 年的 0.2763,年均值为 0.2257,年均增长率为 3.55%。进一步来看,2007—2011 年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平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平均增长率为 -0.70%),2011 年之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直线上升,平均增长率为 5.44%,这与国家开始高度普惠金融工作密切相关。但从 2020 年的数值来看,其仅为 0.2763,说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还有很大进步空间。不同区域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出由东向西逐级递减趋势。^③具体而言,东部均值为 0.2885,分别是中、西部的 1.43 倍和 1.62 倍,说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从变化情况看,东部从 2007 年的 0.1864 变化至 2020 年的 0.2763,平均增长率为 3.73%;中部从 2007 年的 0.1640 变化至 2020 年的 0.2317,平均增长率为 3.26%;西部从 2007 年的 0.1557 变

① 谢忠秋:《Cov-AHP: 层次分析法的一种改进》,《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 年第 8 期;张珩、罗剑朝、郝一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 107 家农村信用社全机构数据的经验考察》,《中国农村经济》2017 年第 1 期。

②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08—2021)》《中国统计年鉴》以及 Wind 资讯,下不出注。

③ 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11 个省份;中部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9 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11 个省份。

化至2020年的0.2268,平均增长率为3.76%。可以看出,虽然中西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以往有所提高,但与东部仍有较大差距,说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依然存在。

2. 各维度比较分析

为讨论各维度对普惠金融发展的贡献,进行以下分析:

第一,从渗透度看(见图2),其从2007年的0.1562上升至2020年的0.2172,年均值为0.1905。进一步看,东中部的渗透度基本呈上升趋势,西部在2018年之后略有下降;东部的渗透度(均值为0.2766)明显高于中部(均值为0.1529)和西部(均值为0.1352),西部的渗透度最小;东部2020年比2007年提高了8.58%,中部提高了6.95%,西部提高了2.93%。2007年以来,我国金融服务网点和从业人员的覆盖率均有明显提高,特别是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尽可能支持那些具有金融需求的弱势群体,使其金融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居民获得金融的便利度有较大提升。但总体来看,目前的金融资源还是“聚集”在东部。

第二,从使用度看(见图3),其均值从2007年的0.0307上升至2020年的0.2129,年均值为0.1099。进一步看,东中西部的使用度基本呈上升趋势,且中西部发展路径相似;东部的使用度(均值为0.1890)明显高于中部(均值为0.0662)和西部(均值为0.0667),说明东部金融服务使用程度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2020年比2007年提高了27.88%,中部和西部分别提高了12.83%和12.96%,说明使用度存在明显的地区“鸿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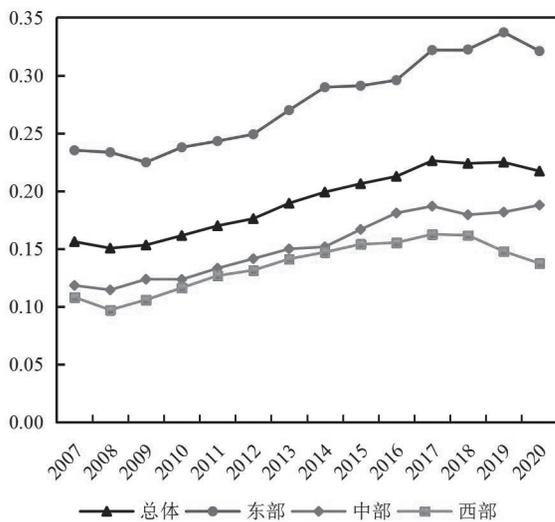


图2 普惠金融渗透度及变化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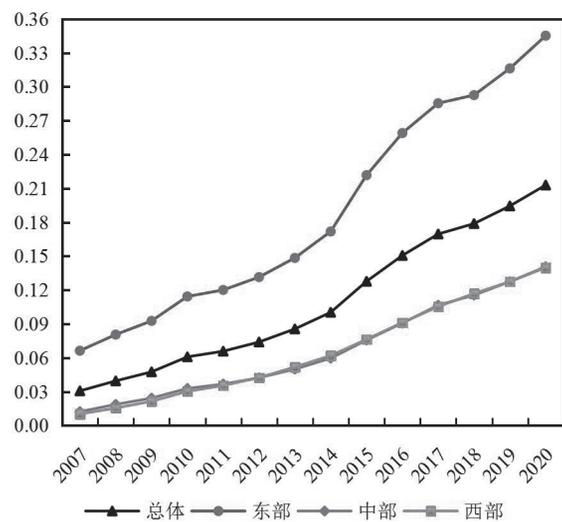


图3 普惠金融使用度及变化趋势图

第三,从效用度看(见图4),其均值从2007年的0.1869上升至2020年的0.4385,年均值为0.3068。进一步看,东中西部的效用度呈现出一致的上升趋势;东部的使用度(均值为0.3627)明显高于中部(均值为0.3010)和西部地区(均值为0.2454);东中西部2020年比2007年分别提高了25.81%、23.66%和26.19%,西部普惠效用度的提升程度最大,说明普惠金融会因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其效用度的提升幅度更明显。

第四,从可负担度看(见图5),其均值从2007年的0.5003变化至2020年的0.2489,年均值为

0.3632。从不同区域来看,东中西部的承受度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东部的使用度(均值为0.3675)明显高于中部(均值为0.4040)和西部(均值为0.3080);东中西部2020年比2007年分别下降了24.40%、21.68%和30.27%,说明可负担度在大幅下降,这主要是由于一些金融机构已利用金融科技等手段,探索建立起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事实上,由于弱势群体的抗风险能力普遍较差且金融需求小而分散,金融机构须在可负担的前提下通过提供一定的金融服务来获取较低收益,不然其风险成本与运营成本将会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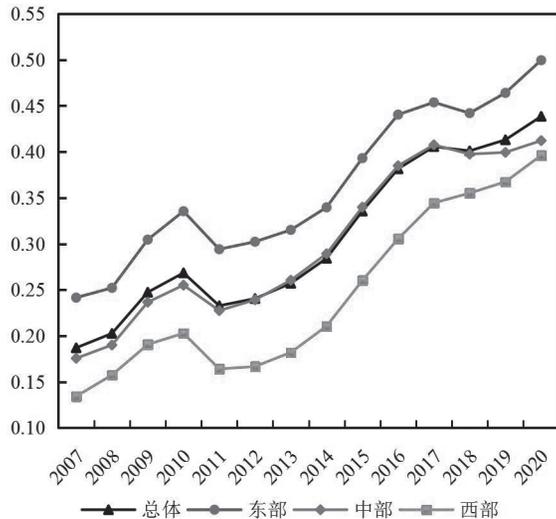


图4 普惠金融效用度及变化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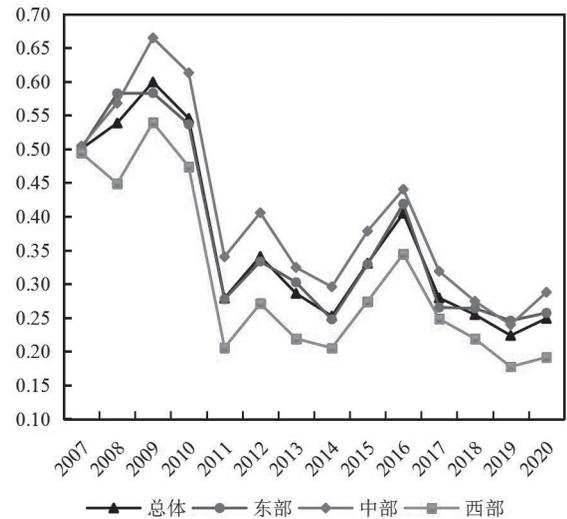


图5 普惠金融可负担度及变化趋势图

二、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制度性困境

(一) 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

1. 软性设施缺乏。缺信息、缺信用、缺担保、缺法律是当前普惠金融工作中的痛点。一是征信体系建设不健全。目前全国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虽收录了个人和企业法人信用数据,但信息并不全面,并且这些信息与蚂蚁金服、京东等第三方平台搜集的信用评分信息并未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信息孤岛、多头借贷等现象时有发生。二是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虽然各地方政府陆续成立了省级农业信用担保公司并依托担保业务支持开展普惠金融工作,但由于其在担保范围、额度、费率等方面均有局限,且多数群体缺乏必要的担保要素,因而无法获得额度较大的信贷支持,只能缓解部分群体的金融约束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惠”的问题。三是市场机制不健全。以农地抵押贷款为例,农地抵押贷款评估价值缺乏公信力、农村产权流转市场不完善,对已确权颁证的农地经营权和其他各类农村资产如何登记、交易尚不明确,导致农地抵押品并不能像正常商品在市场中进行流转、拍卖。四是法律环境欠缺。虽然普惠金融工作开展颇有成效,但与普惠金融相关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农地抵押贷款违约机制、农村信用担保机制等均没有设立对应的法律法规,客户如果违约或发生抵押纠纷,抵押权仍有可能无法实现。五是监管体系不完善。我国尚未形成系统的普惠金融监管体系,当前的监管体系仍建立在原有的分业监管体系上。然而,当前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几乎拥有银行、

基金、保险等金融全行业牌照,形成了事实上的混业经营。特别是一些小微贷款机构也存在大量金融业务交叉,对我国当前分业监管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2. 部分地区硬性设施相对落后。由于部分结算工具的投入较大,回收较慢,金融机构不愿大规模推广,银行网点和结算工具的分布不均严重制约了农村支付服务水平的发展。特别是当前金融科技的发展对网络基础设施与移动终端设备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受限于地区经济差距和个人经济差距,形成了数字普惠金融供给的“天然差距”。随着当前通信技术的发展,基站覆盖范围越来越低,建设成本却越来越高,各类数字金融技术均率先在发达城市应用和普及,使得当前我国城乡地区无论是覆盖范围还是网络传输质量都有较大差距,引致城乡之间的普惠金融出现了新分化,三大差距有扩大趋势。

(二) 普惠主体获得金融服务能力薄弱

1. 缺乏基本金融知识和经验。受历史、风俗习惯以及地区发展因素影响,部分人群不愿也不会获得金融服务。当前,中国金融教育虽做了积极尝试并取得一定成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21)》显示,全国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指数为66.81,与2019年相比,提高了2.04,在全球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尽管如此,普惠金融仅仅刚过及格线,人民群众仍存在金融知识欠缺、信用观念淡薄、风险意识不足等诸多问题,这与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国家依然存在很大差距。一是对多数金融产品缺乏认识。除存贷款外,多数普惠群体对理财、信用卡、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现代化金融服务存在认知障碍,他们不仅不会主动享受这些服务,甚至还会产生心理排斥。二是多数群体对金融基础知识存在盲区。《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21)》中指出,多数普惠群体在选择金融产品和服务时,基本是盲目跟风,对复利和贷款知识、投资风险组合、金融产品的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等最为基础的金融问题几乎不了解。三是普惠群体自我保护和维权意识淡薄。由于普惠群体的教育程度较低,参与金融市场的经验不足,一些金融机构会利用心理账户效应向普惠群体宣传金融产品所给予的便利之处,但不向其揭示存在的风险隐患,这会使普惠群体做出一些使自身收益减少或受损的金融决策,基本权益受到侵害。

2. 无法负担金融服务的成本。总体而言,普惠金融借款利率仍然较高。相较于国有企业和大型股份制企业,普惠金融往往成本高、风险大,金融机构通常以高利率应对高风险,导致普惠融资利率提高。当前城乡之间的公共资源和服务配置尚不均衡,由于农户对于城市消费者需求信息接收的有限性,人才的持续流失增多了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信息屏障,也提高了产品和金融流通过程中的成本。此外,对于农户甚至于小微企业而言,由于气候、劳动力、生产基础、交通运输流程、经济情况等外部风险的不确定性,可能使得收入面临临时减少或延期交付的情况,时空产量的不确定性叠加缺乏投资未来的意识和渠道,导致部分农户或企业并未梳理财务预算或者支出计划,以至于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甚至无法按时支付债务。中国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第2季度,普惠金融发展的主力军——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经超过3.0%,远高于大型股份制银行以及大型商业银行的1.35%。

(三) 金融供给端服务供给能力受限

1. 中小银行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在推进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银行业的经济增

长红利、利差红利和改革红利等已逐步消退,而作为普惠金融供给的主力军,城商行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绩效下滑较为明显,在实现普惠金融业务商业可持续方面仍面临着较大的压力,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对普惠群体亟需精细化管理。中小银行与生俱来的普惠“基因”(机制灵活、决策链条短、地缘人缘优势)决定了其客户群体应锁定在“三农”、小微企业。但因其资本实力有限、业务资质缺乏、科技赋能不足等因素,不可能惠及所有客户,显著影响了银行盈利能力。需将自身经营优势与地方特色结合起来对客户细分并精细化管理,形成更具核心竞争力的发展模式。二是大银行的参与给市场带来了较大冲击。在党和国家的要求下,大银行近年来纷纷成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并利用低利率贷款优势与中小银行争夺优质客户,导致中小银行传统生存空间逐步被压缩,动摇了其客户基本盘。三是银行内部治理有待亟待提升。虽然中小银行按照公司章程建立起了形式完备的治理架构,但在实际运转中存在着明显股权关系混乱、股东出资不实、利益输送等问题。另外,省联社这种“准政府+准行会+准金融企业”的管理体制,不仅会干预农信系统的人事权、主导高管任命,还阻遏了农信机构利用产品研发和科技手段开展普惠业务创新的积极性。

2. 普惠金融供需存在结构性失衡。尽管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是金融市场与生俱来的特质,但新时代下普惠金融供需结构性失衡出现了新的表现,主要有三点。一是普惠金融市场存在结构性失衡。目前,普惠金融市场服务主体多以银行为主,涉及债券、股票和期货、保险等领域的证券和保险行业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层次多样、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尚未形成。二是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市场潜能等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在机构数量、服务人员、网点覆盖率等方面的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失衡,使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相较于城市地区、发达地区,脱贫地区、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仍相对不足,农村金融科技化水平较低,金融账户的普及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三是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结构性失衡。2021年,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30%。创业担保贷款增长幅度高达54%,但实际余额只有2216亿元,远远低于农村“新就业”的需求。当前,已有普惠群体需求除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有所延伸,对互联网消费等新兴领域也产生巨大信贷需求,特别是随着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拓展,新型农业联合还衍生了融资租赁、期货、保险等包含在内的其他金融服务需求;然而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仍以同质化服务为主,真正适应乡村振兴需求、小微企业经营主体特点的创新产品匮乏。金融机构所提供的“小额、短期、分散、同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与新型农业联合体(如家庭农场等)“大额、长期、集中、特殊”的金融需求特点并不匹配。

(四)政府对普惠金融的支持存在“缺位”

普惠金融具有准公共物品特性,若完全依靠市场力量推进普惠金融工作,很难保证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亟需政府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但当前政府的支持还存在明显“缺位”,表现在五点。一是政府数据开放和共享缺乏制度指引。目前政府在数据开放和共享方面缺乏统一的管理标准和指导原则,没有专门的部门进行统筹协调,也没有建立跨部门之间的数据开放和共享机制,导致各个部门之间存在很强的数据壁垒。二是政府对普惠金融政策的宣传不到位。虽然政府推出了大量的扶贫贷款和创业补贴贷款等普惠金融政策,但因宣传工作不到位、信息不对称等,普惠群体即使有需求也没有享受到政策带来的福利。三是普惠金融考核体系有待完善。政府当前制定的普惠金融考核指标并不合理,不仅没有根据银行类型和实际情况制定恰当的考核机制,而且还对银行产生的不良贷

款容忍度较低,这严重影响了银行开展普惠金融工作的积极性。四是地方财政存在“缺位”。地方政府出台的普惠金融政策多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为主,其只针对特定的银行或特定的贷款业务,且在落实过程中并未及时减免银行发放给小微企业、扶贫助农领域的贷款利息的税收;同时,政府也未建立相应的风险补偿基金来帮助银行共担普惠金融贷款所产生的风险,这大大降低了银行开展普惠金融工作的积极性。五是政策性金融的功能发挥较弱。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过于注重对粮棉油等传统农产品产量的支持,忽视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金融支持。

三、共同富裕背景下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着力补齐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短板

1. 硬件设施。当前发展阶段仍应以推进金融广度为目标。推动银行机构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新增实体营业网点,对业务量不足、业务单一、内控难度大的网点进行撤并转移。强化营业网点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积极参与打造公共服务圈,重点提升基本服务便利化水平,推进金融便民服务改革,助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丰富农村服务点业务功能建设具有取款、汇款、缴费、农资购买、农产品网上销售等功能的综合支付服务点,实现综合支付服务不出村。持续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西部等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强化地区、城乡之间的互联互通,弥合普惠金融的“数字鸿沟”。丰富手机应用、小程序等使用场景,打通金融业务线上、线下办理路径,助力实现群众企业办事更方便快捷。特别是要推动金融适老化改造,着力解决老年人在日常使用智能化金融服务或产品时面临的问题,持续推动充分兼顾老年人需求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2. 高度重视信用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推动构建现代化征信体系,重点是推动普惠群体信用建设。全面推动信用镇、信用村、信用户建设,完善小微企业和重点关注群体的信用数据覆盖范围等基础工作。运用数字化技术构建普惠群体综合信用评价体系,提取客户生产生活场景数据作为基本信用要素,并将用户资金流、交易流等多维数据进行大数据整合、动态记录、交叉验证;连通政府与各大银行,形成以政府及银行数据为主体、非银机构特色场景数据为补充的综合数据体系。标准化处理内外部数据,推动数据资产转化为信用信息,作为破解信息不对称的根本手段,为普惠群体融资有效增信。二是努力构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银行以及互联网金融平台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在保证数据安全的条件下允许合规的金融机构低成本加入央行征信系统。协助金融机构对市场用户信用进行准确、全面研判,以此实现降本增效、合理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切实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同时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并通过“信用身份证”来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以此为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塑造诚实守信的契约文化,进而促进广大群众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三是建立复合型信用担保体系。由于农地抵押贷款本身与现行法律的冲突,导致银行决定是否开展普惠金融业务更多取决于贷款群体的个人信用和担保偿还能力。因此,要根本性解决当前弱势群体的金融排斥问题,就必须扭转以往以“人”担保的单一信用担保机制,逐步建立土地等多种抵押担保和以“人”担保相结合的复合型信用担保机制,以此突破部分地区和个人贷款限制,解决农村市场中抵押品不足和法律制度缺失问题。

3. 完善市场体系。模式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已无法解决新时代下经济群体日益出现的综合化、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必须将普惠金融服务从简单的支付、存款、贷款等初级阶段上升到保险和投资等更高级阶段,努力弥合不同区域、群体之间的金融鸿沟,切实解决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一是持续深化银行业数字化运营,加强风险识别和数据处理能力,推出个性化产品,全面提升覆盖广度和用户体验。大型银行应充分运用规模化、多元化经营基础,整合内部资源,不断丰富普惠金融服务内容。互联网金融机构和城市农商行要找准定位,根植现有优势,强化风险管理,与大型银行形成良性互补。二是完善普惠保险保障体系。推动保险服务向优质农业上下游产业链延伸,发展地方优特色农产品保险。提高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覆盖人群,优化提升保险方案和服务水平,探索差别化缴费和保障待遇等功能,推动形成赔付指导清单管理制度和可持续评估机制。扩大保障人群覆盖面,积极争取困难人员参保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支持完善个人养老保险供给,深化加强商业养老保险试点;针对灵活就业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居民等提升养老保险服务,指导保险公司探索灵活就业人员和被征地农民参保,满足养老需求。争取养老理财试点,探索开展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提高居民养老财富储备和养老支付能力。三是促进信托、证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满足普惠群体多元化金融需求。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取长补短,相互竞争,共同形成良性互动、互利合作的生态环境。

4. 监管体系。一是坚持普惠金融监管目标导向,坚守普惠原则。通过规则制定监管,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普惠群体的初衷和使命。金融服务大多拥有普惠性质,然而只有真正针对长尾群体的服务才能称为普惠金融。因此,普惠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规则监管规则,丰富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的法律法规体系,防止普惠金融内生发展的“使命漂移”。二是风险监管。当前我国普惠金融供给主体众多,特别是金融互联网平台的参与使得普惠金融产品复杂程度高、风险外溢性强。当前的监管要强化供给主体信息披露质量,坚持分级分类与持牌经营,按照贡献程度、风险外溢可能性、重要程度的不同实施差异化监管。特别是要加强监管主体数字化建设,以科技监管科技,运用创新型工具防止系统性风险和垄断的发生。此外,在完善监管体系的基础上,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推动银行保险机构建立健全全流程消保工作体系、运行机制和工作制度,做到最大善意服务用户。督促银行保险机构畅通投诉渠道,着力解决消费者反映的金融服务“痛点”“难点”,做到最大诚意化解纠纷。加强行业调解组织建设,探索创新纠纷线上调解模式。

(二) 增强普惠群体服务获得能力

1. 持续深化金融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金融教育既是提高国民金融素养的重要途径,也是普惠金融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对于小微企业、低收入和微弱经济群体而言,获得支付、存款、贷款等基础金融服务只是“临门一脚”,远未“登堂入室”,要持续围绕金融教育深化开展普惠金融工作,从根本上激发出普惠群体的内心认知和造血潜能,改善其生存能力、发展能力和自主创业能力,提高金融福祉。一是强化顶层设计。政府要加强对金融教育的顶层设计,将金融教育上升到国家教育战略层面,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努力将其纳入到国内素质教育体系中,促进人民群众金融素养的全面提升,确保普惠金融作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动力更加强大。同时借助新闻、报纸、短信、微信公众号等多种途径开展全方位、多角度、广覆盖的金融知识教育,从源头上鼓励

和帮助广大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了解金融常识,实现金融教育的常态化。二是金融机构应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定期开展金融讲座,普及基本的金融知识和识别金融风险的常识,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金融产品的理解、强化收益与风险匹配的认知,营造诚实守信、履约尽责和普惠公平的金融环境。三是重点关注老年人、残疾人、青少年特殊群体的金融教育。把能力建设和权益保护等方面作为解决好特殊群体金融素养的重点。要把握好重点群体在不同阶段的财富积累和资金使用特点,准确识别其金融诉求,为其量身定制与其收入水平和风险能力相匹配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如医疗、教育、养老),同时借助金融科技手段,创新推出互动体验宣传模式,对其精准“滴灌”金融知识,实现金融教育的适老化、适少化、适残化。

2. 拓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一是引导大型银行和涉农机构发挥县域服务网点多、触角广的优势,提升农村地区理财金融服务质效。支持探索设立专业、多维的家庭财富管理体系,提供涵盖教育、养老、医疗、投资等覆盖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积极推动“慈善+金融”,促进三次分配体系建设。二是盘活农村存量资产,提升涉农主体融资需求。全域推广落地“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融资模式”,盘活农民“沉睡”资产,持续推进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建档立卡。争取推动开展农房财产权(含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提高农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覆盖面。推动扩大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规模,破解规模化经营涉农主体担保难题。积极参与推进新一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配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制度建设、产品创新和贷款增量扩面。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信覆盖面,探索优化小额融资需求的担保机制安排,推进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关保险。三是助力实施强村富民集成改革,优化农村基础金融服务。以全域创建、培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创新示范区为契机,重点支持集体经济较低的行政村巩固提升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四是建立规范、完善的产权交易和流转市场。加快建立产权交易和流转服务平台,完善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加强省市县乡村五级服务和管理网络,实时、动态关注各类动产和权利担保(如农村产权和农村集体“三资”)变动情况,为交易双方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充分发挥产权交易平台公平、公正、公开的作用,让低收入群体享受到改革的红利。

(三) 优化金融机构服务能力

1. 完善中小银行服务能力。中小银行应明确支农支小、立足普惠的发展定位,通过差异化监管政策等手段引导中小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同时通过窗口指导大型商业银行在县域开展普惠金融业务,防止其业务下沉挤占中小银行优质客户资源。一是坚持普惠金融的发展战略,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中小银行建立之初就与普惠群体有着深刻联系,在服务普惠群体上有天然的优势。面对大型银行业务下沉的现实压力,中小银行要坚持以普惠金融为主线,以促进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软信息”优势对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和微弱经济组织风险评估的价值和作用,完善贯穿中小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产品体系,细分客群,深化线上和线下融合,提供更精细化、量身定制的金融服务。做精做专,形成低成本、高效率、风险可控的业务发展模式,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坚持稳健经营理念,强化存贷款利率定价机制,引入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等市场工具来提高其对利率市场敏感性,进而形成风险转移定价机制,从根本上扭转普惠金融贷款成本高、风险大、利润低的“倒挂”局面。另外,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制定与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战略配套的绩效考核体系,全面落实绩效薪

酬延期支付制度。二是完善中小银行公司治理水平。一方面,要结合公司治理指引已经明确的规范标准、治理框架和主要内容,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在公司治理机制的地位和作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引导中小银行建立包含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和经营层等在内的“四会一层”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切实规范和约束股东行为,做到股东决策的公平合理,严格控制关联交易,防止控股股东不当干预机构经营,侵犯中小股东利益。另外,强化外部力量对中小银行的监督机制,鼓励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机构指导、帮助、督促银行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三是加强普惠金融风险控制能力建设。近年来,数据泄露导致的客户隐私暴露、数据造假导致的财务欺诈、模型低效导致的机构风险积累等传统风险之外的新兴数据风险逐渐显现,对金融机构提高风险控制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课题。要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反欺诈制度建设、模型风控长效机制建设,确保数字普惠金融的行稳致远。四是加快推进省联社改革。建议由国务院牵头制定省联社的整体改革方案,由各省根据实际发展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的操作细则。但是,无论如何改革,都应坚持农信社和农商行服务“三农”、保持其县域法人地位稳定不变的原则,淡化省联社在人事任免、薪酬制定等方面的行政管理职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省联社的“脱胎换骨”。

2. 构建多层次服务体系。打造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系统,加强信息共享运用,打造集企业融资、风险保障、专业咨询等功能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完善信用保险服务,优化承保和理赔条件,扩大小微外贸企业政府统保线上平台试点成果,进一步实现“扩责降费”。精准对接就业创业人群融资需求,补齐新市民金融服务短板,推动高质量就业创业。拓宽个体工商户等吸纳就业群体服务外延,持续扩大普惠型小微企业首贷和信用贷,推进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深化常态化保就业保市场主体融资支持。深化“连续贷+灵活贷”机制,提升“稳定性”和“匹配度”。配合“两进两回”行动,加大对农村电商、青创农场等新型业态的金融支持力度。做好大学生、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创业融资金融服务,通过“融资+融智”帮助提升创业水平。着力补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金融服务短板,研究出台金融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措施。探索跟进农业转移人口场景金融服务,推进开户等环节金融服务均等化,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工资支付和受尊重权。

3. 充分发挥科技赋能。数字化是新发展阶段下普惠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充分利用金融科技,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是克服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推动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细化、优化的重要途径。一是加快引导银行制定数字化转型规划,根据用户需求创新丰富金融服务场景,稳定现有客户,同时通过借助科技手段和信用信息资源对现有的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审批技术和风险管理模型等进行流程改造,解决现存开展普惠金融业务中“卡脖子”问题,发挥“技术+数据”在“提质、降本”方面的双轮驱动作用,实现银行对普惠金融市场的“能贷”“会贷”,为其商业可持续性汲取动力。二是在跨界合作、信息共享、客流共享等方式的基础上,加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和移动互联等对中小银行的技术输出,推进金融科技在金融市场交易、智慧银行建设、支付结算服务等领域应用。同时充分运用物理网点的优势,挖掘分析本地市场可利用的信息,建立形成在获客、风控、增信和资金发放等不同节点上的信用风险识别和管理体系,进而形成节点型金融模式。三是加快金融科技平台治理,坚持规范金融科技监管和促进发展并重,从数据搜集、交互、存

储、自动化处理、管理等方面建立金融科技监管的基本规则和标准,维护金融科技领域的公平公正。

(四)强化政府支持引导作用

1. 优化政策引导。一是引导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金融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体系。当前,由于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人民收入水平和财富投资所得与经济不能同步增长,区域、城乡和行业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为此,要把居民财富增长作为实现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的主要目标,充分调整金融服务准入门槛,提高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财富保值增值功能普惠性,为增加居民资本收入创造条件;同时要引导金融资源流动作为缩小地区差距的新动力。通过政策性引导,不断将金融资源向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倾斜,解决好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不均衡分布问题,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金融的二次分配。另外,要把金融慈善活动作为缩小社会差距的有益补充,鼓励金融行业积极参与和开展慈善等社会责任活动,促进金融资源和财富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合理分配,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先富帮后富,扎实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二是强化政策性金融在普惠金融中的作用,增进民生福祉。强化增进民生福祉的政策性金融功能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也是未来金融经济工作的重点发力方向。增进民生福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既不能等、也不能拖,更不能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平稳有序地围绕公共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优抚安置、残疾人服务等领域,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大对水利、交通、环境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中长期信贷支持力度,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和保障范围,进而从政策性金融角度补短板、解难题、兜底线,努力提升金融增进民生福祉的质量和水平,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使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是强化对制造业金融资源配置,支持制造强省建设。围绕《金融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进一步引导信贷资金向高端制造业领域倾斜,加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加强对制造业企业投资、技改和并购的信贷支持;聚焦各省标志性产业链、先进制造业集群,开展供应链金融机制研究,探索支撑先进制造业的精准化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对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办实事清单》,推进国家、省级名单银企对接,为“专精特新”企业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从供给、需求两侧同步发力。四是引导实现普惠金融支持巩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有效接续。实现共同富裕的金融使命的核心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成果在全社会范围内更加充分、公平、合理地共享。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是这个分享过程的途径之一,而普惠金融实现共同富裕又是其助力乡村振兴的升级和归宿。稳妥推进“两权”抵押贷款,引导金融机构持续提升支持和服务乡村振兴的质量和能,助力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和城乡三次产业融合,以此做好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之间的同频共振,逐步带动低收入群体迈入共同富裕之路。^① 聚焦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支持乡镇地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引导开发性、政策性银行机构、保险机构加大长久期资金支持力度,建立重点项目金融服务对接机制;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加快建立差异化金融服务机制,推动金融帮扶、金融诉求响应等机制落地。围绕乡村“1小时交通圈”建设、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培育、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推动机构加强上下统筹联动、设计专项产品、针对性提供优惠利率(费

^① 弋伟伟:《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人民论坛》2021年第25期。

率)。联动发展改革委、商务等部门为相对落后地区开放平台。

2. 完善财政支持与金融协同。一是建立政银共担的风险补偿机制。持续推动深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改革,丰富完善政、银、保、担合作模式。迭代升级“双保”应急融资模式,推进“双保”助力融资支持机制,积极探索政策性转贷款风险分担机制。根据不同类型的普惠金融贷款,如小微企业贷款、农地抵押贷款、助学贷款等,建立“政银”“政银保”“政银担”等多种风险分担机制,通过企业缴纳、本级财政预算安排、上级财政补助等渠道筹集风险补偿基金,并由政府对定向贷款损失和追偿费用进行分担,以此更好地发挥政府对普惠金融的支持作用,真正为其可持续的开展普惠金融提供风险保障。二是加强财政金融的协同作用。结合现有财政政策工具(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针对不同项目采用不同的政策支持,以此推动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一定领域、一定层次的协同发展,促进形成普惠金融能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更广维度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对不产生收益、依靠项目本身难以实现商业可持续的纯公益类项目,建议以财政政策工具为主;对可产生一定收益、但难以实现商业可持续的项目,建议以财政政策工具为主,货币政策工具为辅;对依靠自身收益且能实现商业可持续的项目,建议以货币政策工具为主。(本文系《中国金融报告 2021: 稳字当头擎画金融发展》中“共同富裕下的普惠金融发展”部分的精编版,作者授权在本刊首发)

责任编辑: 潘文竹

Institutional Dilemma of China's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Zhang Heng

Institute of Financ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China

Abstract: Practicing 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the main strategic direction of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financial level. In order to fully grasp the dynamic changes of inclusive finance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ers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e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based on the constructe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Studies find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e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not hig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extremely imbalanced. Based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main institutional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current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combining the practice of China's financial reform, put forward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policy system conducive to solidly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composi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financial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inclusive finance; constraint; institutional dilemma; countermeasure

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运行效率研究

石宝峰 刘磊 王瑞琪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杨凌 712100

摘要: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对缓解农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同省份运行效率如何尚未得到有效挖掘。利用三阶段 DEA 模型,对我国 33 家省级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 2018—2021 年的运行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研究发现,环境因素对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运行效率影响较大;在剥离外部环境及随机因素影响后,重新测度的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运行效率更加准确,但依旧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整体上看东西部地区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运行效率相对较高,而中部地区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运行效率相对较低,各农担公司运行效率都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运行效率;三阶段 DEA 模型

中图分类号: F83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2-0120-15

一、引言

为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5年《关于财政支持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的指导意见》(〔2015〕121号)提出,以建立健全省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为重点,逐步建成覆盖粮食主产区及主要农业大县的农业信贷担保网络。至此,我国共建立了 33 家省级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基本建立。截至 2021 年 12 月,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共设立自有分支机构 1677 家,累计担保项目 217 万个,累计担保金额超 6892 亿元。^①胡洁等^②学者提出,信贷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农业稳产保供、农民就业增收的影响机制及应对策略”(72273070)和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软科学研究项目“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政策评估研究”(K403022018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石宝峰,男,山西武乡人,工学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普惠金融研究;刘磊,男,重庆北碚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信用大数据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助理,主要从事农村金融研究;王瑞琪,女,重庆北碚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信用大数据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助理,主要从事农村金融研究。

^①数据来自于国家农业信贷担保联盟有限责任公司(国农担[2022]8号文)。

^②胡杰、罗剑朝:《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与农户家庭收入:抑制抑或促进》,《农业技术经济》(2022年3月28日): 1-15[2023-02-22].<https://doi.org/10.13246/j.cnki.jae.20220325.001>;罗剑朝、胡杰:《农业信贷担保、信贷供给与农业经济发展——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财贸研究》(2022年11月8日): 1-14[2023-02-22].<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4.1093.F.20221107.1124.002.html>;魏立乾、王亚平、罗剑朝:《家庭禀赋、政策认知与农业信用担保融资约束——基于陕西、宁夏 765 份农户调查数据》,《农业技术经济》2022 年第 12 期。

约束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普遍面临的问题,而农业信贷担保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究其原因:一方面,担保机制能够弥补农业经营主体缺乏抵押物的不足,降低农业经营主体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门槛,增强农业经营主体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意愿;另一方面,风险共担机制的建立让担保机构与银行间分担信贷风险,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担保机构对贷款人信息进行有效甄别和收集以筛选低信用风险的贷款人,担保机构对信息的有效收集降低了银行的信息收集成本,有助于增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放贷意愿。我国融资担保公司可分为政策性担保公司、商业性担保公司和互助性担保公司三类。政策性担保公司是由政府全资或控股的信用担保机构,其主要目的是为符合政策导向的对象提供贷款担保,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不以盈利为目的,增信能力较强;商业性担保公司是由企业或个人出资设立的信用担保机构,以盈利为目的,有较强的风险管理能力,但其声誉机制和影响力的形成时间较长;互助性担保公司是由会员企业自愿出资设立,主要目的是为融资困难的会员企业提供担保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由此可见,三类担保机构中,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作为为农业贷款提供担保的主要机构,在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鉴于我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立时间较短,各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的发展情况可能因所处环境条件不同而存在差异,且各农担公司注册资本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资金,政府投入的大量资金在不同担保公司发挥了怎样的效果,运行效率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均需给出解答。为此,本文从投入产出视角测算 33 家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的运行效率,旨在通过效率分析找出发展短板,为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提供决策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担保公司效率与绩效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担保公司运行效率进行了大量研究。袁志明通过构建 2 个层面 15 个指标的财政信用担保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对 2003—2004 年浙江省秀洲区的 3 个担保公司以及 7 个被担保工业区的绩效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担保公司层面的绩效良好并且管理机制完善,但被担保工业区层面的绩效差距较大。^①Tunahan 等从文献和国际实践的不同方面对土耳其信用担保基金(KGF)的结构与绩效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在土耳其银行业监管中,KGF 担保价值较低,其平均担保金额高于欧洲平均水平,但违约率较高,杠杆率低于标准和国际惯例。^②Adetiloye 考察了尼日利亚农业信贷保证计划基金(ACGSF)的绩效,发现随着信贷增加,会有更多的担保被发放,更多的索赔得到解决,并且 ACGSF 对畜牧业农民的担保更多。^③张夏青以担保利润率和担保代偿率衡量担保公司的运行效率,

① 袁志明:《财政信用担保资金绩效评价模型及其指标体系探析》,《财经论丛》2007 年第 1 期。

② Tunahan H., Selçuk Ahmet, Dizkirici, "Evaluating the Credit Guarantee Fund (Kgf) of Turkey as a Partial Guarantee Program in the Light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 Social Science*, 2012, 3(9): pp. 79-92.

③ Adetiloye K. A., "Agricultural Financing in Nigeria: An Assess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 Scheme Fund (ACGSF) For Food Security in Nigeria (1978-2006)",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2, 3(1): pp. 39-48.

通过方差齐性检验,对2012年河南省政策性担保公司、商业性担保公司、互助性担保公司的运行效率进行分析,发现这3类担保公司的运行效率存在显著差异,而政策性担保公司适应于经济发达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地区。^①陈菲琼等利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浙江省的担保机构进行研究,发现影响担保机构运行效率的风险水平总体上比较高,且最重要的风险因素来自于担保公司内部。^②文学舟等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对江苏省政策性、互助性和商业性三种担保机构的经营绩效进行评价与对比,发现政策性担保机构在风险管理、盈利能力、社会效益和担保能力方面都有较大优势。^③Li等将层次分析法(AHP)和理想解相似度排序方法(TOPSIS)相结合,对中国北京市的担保公司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宏观环境对我国信用担保行业影响显著,但规模、经验和潜在补偿风险是衡量单个信用担保公司能力或绩效能力的最重要指标。^④Bachas等提出,政府行政干预、多主体合作、信息共享和风险补偿是影响担保效率的关键因素。^⑤

一些研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担保机构的运行效率进行分析。如崔晓玲等为了避免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提出基于DEA模型的粒子群优化(PSO)效率评价方法对信用担保机构的运行效率进行评价,实证发现该方法受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影响程度较小,得到的评价结果更符合客观实际。^⑥王新安等利用DEA模型对“关中—天水经济区”五个代表性地区的政策性、商业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进行效率测度,研究发现2010—2012年两类担保机构的运行效率均有所提高,且政策性担保机构具有较为显著的规模效应。^⑦Ong等利用非参数分析发现,马来西亚信贷担保公司(CGC)运行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整体技术效率水平,而较低的平均效率水平是由纯技术低效略高于规模低效造成的。^⑧文学舟等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江苏省190家融资担保公司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增信的效率进行分析,发现商业性融资担保公司的担保效率高于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和融资担保制度政策均对担保效率产生了显著影响。^⑨徐攀等运用SBM-DEA模型对浙江省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的运行效率进行测算,发现担保机构总体运行效率偏低,且进一

-
- ① 张夏青:《三类担保公司运行效率实证分析——以河南省担保公司为研究样本》,《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年第8期。
- ② 陈菲琼、殷志军、王寅:《影响信用担保机构运行效率的风险因素评估——以浙江省为例》,《财贸经济》2010年第12期。
- ③ 文学舟、梅强:《基于主成分分析的三种担保机构经营绩效比较及评价——以江苏担保实践为例》,《华东经济管理》2013年第6期。
- ④ Li J., Lin X., "Assessing Credit Guarantee Companies in China: Applying a New Framework",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7, 44: pp. 98-111.
- ⑤ Bachas N., Kim O. S., Yannelis C., "Loan Guarantees and Credit Suppl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1, 139.
- ⑥ 崔晓玲、钟田丽:《基于DEA的信用担保运行效率求解方法》,《运筹与管理》2010年第6期。
- ⑦ 王新安、杨学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运行效率研究——以关天经济区为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 ⑧ Ong H., Shah Habibullah M., Radam A., et al, "Evaluating a Credit Guarantee Agenc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a Non-parametric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2003, 30(1/2): pp. 143-152.
- ⑨ 文学舟、许高铭:《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效率研究——以江苏省190家融资担保公司的调查为例》,《金融理论与实践》2021年第1期。

步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能显著影响其运行效率。^①孟光辉等运用三阶段 DEA-Tobit 模型对我国 33 家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 2020 年的运行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担保机构整体运行效率较低,且存在地区差异,担保项目平均规模等因素显著影响其运行效率。^②

(二)三阶段 DEA 模型的应用

三阶段 DEA 模型已被众多学者运用于效率分析,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黄宪等运用三阶段 DEA 模型对我国 13 家商业银行 1998—2005 年的 X 效率进行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 X 效率在样本期间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国有银行平均效率的提高幅度大于股份制银行。^③Shyu 等利用三阶段 DEA 模型对案例银行在台湾 123 家分行的真实管理效率进行分析,发现规模低效是案例银行经营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且大多数分行都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④刘满凤等运用三阶段 DEA 模型研究了 2012 年我国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发现创新效率存在地区差异,尤其是环境因素严重制约了中西部地区高新区的创新效率。^⑤Li 等引入改进的 Malmquist-Luenberger 生产率指数来衡量“十一五”期间(2006—2010 年)中国制造业的绿色生产率增长,采用三阶段 DEA 模型,测度政府措施对绿色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消除环境影响和统计噪声对产出松弛的影响后,调整后的绿色生产率变化较小,而调整后的技术变化大于相应的初始水平。^⑥沈忱采用三阶段 DEA 模型对 2015 年部分中小企业在新三板市场的融资效率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剔除环境变量并调整投入值后更能准确测度新三板企业的融资效率,且规模效率偏低是中小企业在新三板的融资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⑦曾武佳等利用三阶段 DEA-Tobit 分析方法对 2014—2017 年间中国 103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剥离外部环境及随机影响因素后测度的创新效率更符合实际,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而造成这种效率差异的主要因素是高新区内部的资本集聚、企业集聚、人才集聚、产业集聚程度。^⑧于本海等采用三阶段 DEA 模型测算 2010—2017 年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效率,研究表明考虑环境及随机因素后测度的效率更加准确,其中东部地区的综合效率最高,

① 徐攀、李玉双:《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运行效率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浙江省微观调研数据的分析》,《财经论丛》2022 年第 5 期。

② 孟光辉、李永坤、安康:《中国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运行效率研究》,《经济与管理评论》2022 年第 6 期。

③ 黄宪、余丹、杨柳:《我国商业银行 X 效率研究——基于 DEA 三阶段模型的实证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 年第 7 期。

④ Shyu J., Chiang T., "Measuring the True Managerial Efficiency of Bank Branches in Taiwan: A Three-stage DEA Analysis",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12, 39(13): pp. 11494-11502.

⑤ 刘满凤、李圣宏:《基于三阶段 DEA 模型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效率研究》,《管理评论》2016 年第 1 期。

⑥ Li K., Lin B., "Impac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Policies on the Green Productivity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 Evidence from a Three-stage DEA Model", *Applied Energy*, 2016, 168: pp.351-363.

⑦ 沈忱:《中小企业在新三板市场融资效率研究——基于三阶段 DEA 模型定向增发研究》,《审计与经济研究》2017 年第 3 期。

⑧ 曾武佳、李清华、蔡承岗:《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软科学》2020 年第 5 期。

西部地区的较低。^①胡东滨等运用三阶段 DEA-Malmquist 模型对 2015—2018 年 63 家环境服务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生产效率对外部环境较为敏感,验证了考虑环境和随机因素的必要性。^②

(三)分析框架

从上述研究可知,国内外现有关于信用担保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由于我国政策性农业担保体系的建立时间较短,有关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运行效率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现有关于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运行效率的研究较少考虑环境因素对担保公司运行效率的影响。^③事实上,公司所在地宏观环境因素对其竞争力影响显著,已在众多领域成熟应用的三阶段 DEA 模型能够很好地满足本文的研究需求,因此本文利用三阶段 DEA 模型对我国 33 家省级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 2018—2021 年的运行效率进行测度分析,通过剔除环境及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测度更为准确的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运行效率结果。

综上,本文从投入产出视角,首先计算各担保公司未剔除环境影响的运行效率;其次测度环境变量对效率的影响情况,计算剔除环境影响后的投入产出指标值;最后运用剔除环境影响后的投入产出指标重新测算担保公司的运行效率(见图 1),进而分析担保公司运营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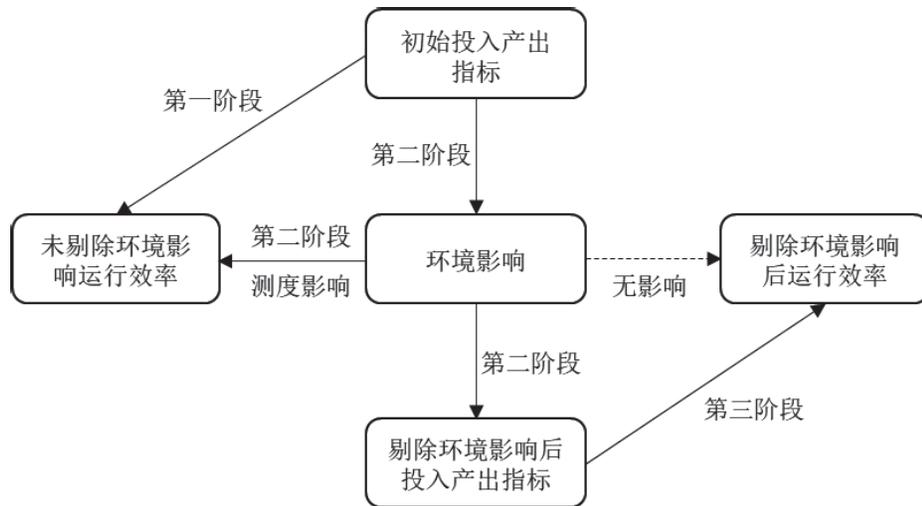


图 1 担保公司运行效率测度分析框架

① 于本海、汪婷、何闯等:《基于三阶段 DEA 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效率测度研究》,《管理评论》2022 年第 12 期。

② 胡东滨、周普、陈晓红:《基于三阶段 DEA-Malmquist 模型的环境服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运筹与管理》2021 年 8 月 12 日。

③ 石宝峰、何继欣、胡振等:《中国上市券商竞争力评价——基于时序动态组合赋权评价模型》,《金融论坛》2018 年第 2 期。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 33 家省级(含部分副省级城市)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业务数据来源于国家农业信贷担保联盟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各省级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的官方网站,宏观数据来源于 2018—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2018—2021 年各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企查查等渠道。

(二) 变量选择

参考 Camanho 等、黄庆安、Shyu 等、崔晓玲等、文学舟等、周四军等、周申蓓等、刘满凤等、胡扬名等的相关研究^①,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的投入产出及环境指标如下。

1. 投入指标。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的运行离不开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所以本文选择注册资本、分支机构数量、专职员工人数作为投入指标。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资金,注册资本的大小一定程度上反映担保公司的规模以及行业内的地位和发展潜力,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越大,银行与担保公司合作需要面临的风险越低,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越小,则银行与担保公司合作需要面临的风险越高;担保公司的分支机构数量关系着担保业务的覆盖范围,业务覆盖的范围越广,担保公司惠及的农业经营主体就越多,同时农业经营主体获得贷款就越容易,获得贷款的成本也越低;在担保业务中,担保公司需要专业的人员对拟担保项目的风险以及客户的信用状况进行调查,所以专职员工数量能够一定程度反映公司的担保能力以及控制风险的能力。

2. 产出指标。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的作用是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贷款担保,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在最大化资金的使用效率时不仅要有效控制自身的担保风险,还需要满足国家的政策导向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基于此,本文选择本年担保项目数、担保金额、担保放大倍数、政策性项目在保余额占比、本年担保代偿情况作为产出指标。担保项目数反映了担保公司惠及更多农业经营主体的能力,担保项目数越多,表明担保公司相应的能力越强;担保金额反映了公司提供贷款增信的能力,担保公司提供的贷款担保越多,表明担保机构的增信能力越强;担

^① Camanho A. S., Dyson R. G., "Efficiency, Size, Benchmarks and Targets for Bank Branches: an Application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1999, 50(9): pp.903-915; 黄庆安:《农村信用担保机构的运行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DEA-Tobit 两步法的实证分析》,《东南学术》2011 年第 3 期;崔晓玲、钟田丽:《信用担保运行机制效率指标体系构建》,《财会通讯》2012 年第 22 期;文学舟、梅强:《我国不同模式担保机构的市场定位及协同发展研究——基于江苏担保机构的实证分析》,《预测》2012 年第 6 期;周四军、胡瑞、王欣:《我国商业银行效率 DEA 测评模型的优化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12 年第 6 期;周申蓓、张俊:《我国三类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实证分析——基于三阶段 DEA 模型之应用》,《金融与经济》2014 年第 4 期;胡扬名、李涛:《基于面板三阶段 DEA 模型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运行效率评价研究》,《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9 年第 6 期。又,Shyu 等(2012 年)、刘满凤等(2016 年)、文学舟等(2021 年)、于本海等(2021 年)、孟光辉等(2022 年)文献,已在前文引用,此处不再详列。

保放大倍数是在保余额和注册资本金之比,担保放大倍数关系到担保公司资金运用效率以及风险情况,担保放大倍数越大,担保机构运用资金的效率越高,其对社会做的贡献就越大,但也要承担的更大的风险;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在提供贷款担保时要以政策性业务^①为目标导向,政策性项目在保余额占比表示政策性项目在保余额与总在保余额的比,反映了担保公司政策性业务目标的完成情况,政策性项目在保余额占比越高,担保公司的政策性目标完成越好,实现的社会效益越大;担保代偿率表示本年度累计担保代偿额与本年度累计解除的担保额的比,担保代偿率越高,表明担保公司的经营风险越大。为了满足投入指标与产出指标的“同向性”假设,本文用1-代偿率表示当年担保代偿情况。

3. 环境指标。环境变量需要选取影响决策单元效率但决策单元不可控的因素。^② 本文选择省级人均GDP、省级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率、省级消费者价格指数、公司成立年限作为环境指标。人均GDP反映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越高,一方面有利于担保公司的人才引进,提高公司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刺激了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增加担保公司的担保规模。但较好的外部环境,也可能导致公司的竞争压力减小进而导致公司内部管理松懈,降低公司资源配置效率。

$$\text{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率} = \frac{\text{当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 \text{上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text{上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率越大,表明当地的农业发展速度越快,农业经营主体对融资的需求也越大,担保公司的担保规模也相应增大。消费者价格指数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消费品及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的重要宏观经济指标。一般来说,国家会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的高低来实施相应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如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等。^③ 同时,消费价格指数也会带动农产品价格上涨,政府将根据农产品价格波动出台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生产的规模和资金需求,进而影响担保公司的资源配置。公司成立年限表示公司自成立起到样本数据所属年份的时间。一方面,公司成立的时间越长,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水平可能越高,公司的声誉也会随时间积累,公司的运行效率就会越好。另一方面,随着公司成立时间的增加,公司内部的管理水平可能退化,从而导致公司的运行效率降低。

投入指标、产出指标、环境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

① 政策性业务是指单户担保金额在100—300万元(含)的项目,其中2020、2021年政策性业务含300—1000万元(含)的生猪养殖项目。

② Simar L., Wilson P. W., "Estimation and Inference in Two-stage, Semi-parametric Models of Production Processe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7, 136(1): pp. 31-64.

③ 胡冰川:《消费价格指数、农产品价格与货币政策——基于2001~2009年的经验数据》,《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12期。

表1 指标数据描述性统计

指标类别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投入指标	X1 注册资本(万元)	183646.97	145904.10	4000.00	658000.00
	X2 分支机构数量(个)	45.67	59.14	0.00	501.00
	X3 专职员工人数(人)	95.70	79.88	2.00	432.00
产出指标	Y1 本年担保项目数(个)	15495.91	25185.51	15.00	142879.00
	Y2 本年担保金额(万元)	483921.97	624048.08	3000.00	5299400.00
	Y3 担保放大倍数(倍)	2.84	2.07	0.23	14.64
	Y4 政策性项目在保余额占比(%)	90.18	13.37	36.80	100.00
	Y5 担保代偿情况(%)	98.46	1.94	84.04	100.00
环境指标	Z1 人均GDP(万元)	7.59	3.32	3.13	18.40
	Z2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率(%)	6.24	7.21	-17.25	21.83
	Z3 消费者价格指数(%)	102.07	0.80	100.10	103.70
	Z4 公司成立年限(年)	5.80	3.31	2.00	16.00

(三)分析方法

Fried 等最早提出了三阶段 DEA 模型。^①该方法能够在测度效率时将各决策单元调整到一个假定的相同外部环境,以剔除外部环境对效率的影响,使测度的效率更加客观、准确。其具体模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运用 BCC 模型进行第一步效率分析。DEA 模型可分为 CCR^②和 BBC^③两种类型。CCR 模型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而 BCC 模型放宽了这一假定,可以测算规模报酬可变条件下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其中,投入导向的 BCC 模型是研究产出不变时如何最小化投入。因此本文选择投入导向型 BCC 模型作为第一阶段的基础模型,使用原始的投入、产出数据测度各个决策单元(即各省级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的初始效率值以及投入松弛变量。设有 K 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有 n 个投入要素和 m 个产出要素,则投入导向型 BCC 模型表示如下:

$$\begin{aligned}
 & \min_{\theta, \lambda} \theta_k - \varepsilon \left(\sum_i^n s_{ik}^- + \sum_j^m s_{jk}^+ \right) \\
 & s.t. \begin{cases} \sum_{k=1}^K \lambda_k x_{ik} + s_{ik}^- = \theta_k x_{ik}, i=1, 2, \dots, n \\ \sum_{k=1}^K \lambda_k y_{jk} - s_{jk}^+ = y_{jk}, j=1, 2, \dots, m \\ \sum_{k=1}^K \lambda_k = 1 \\ \lambda_k \geq 0, s_{ik}^- \geq 0, s_{jk}^+ \geq 0, k=1, 2, \dots, n \end{cases} \quad (1)
 \end{aligned}$$

① Fried H. O., Lovell C., Yaisawarng S., "Accounting for Environmental Effects and Statistical Noise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2002, 17(1-2): pp. 157-174.
 ② Charnes A. W., Cooper W. W., Rhodes E L.,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79, 2(6): pp. 429-444.
 ③ Banker R. D., Cooper A., "Some Models for Estimating Technical and Scale Inefficiencie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anagement Science*, 1984, 30(9): pp. 1078-1092.

其中, θ_k 表示第 k 个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 λ_k 表示权重, x_{ik} 表示第 k 个决策单元的第 i 项投入要素, y_{jk} 表示第 k 个决策单元的第 j 项产出要素, s_{ik}^- 、 s_{jk}^+ 分别表示第 k 个决策单元的第 i 项投入要素和第 j 项产出要素的松弛变量, ε 表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此时, 若 $\theta_k=1, s_{ik}^- = s_{jk}^+ = 0$, 则决策单元是 DEA 有效; 若 $\theta_k=1, s_{ik}^- \neq 0$ 或 $s_{jk}^+ \neq 0$, 则决策单元弱 DEA 有效; 若 $\theta_k < 1$, 则决策单元非 DEA 有效。

第二阶段, 运用 SFA 模型剔除统计噪声和环境因素对效率的影响。前述 Fried 等认为, 第一阶段 DEA 得出的松弛变量由环境因素、管理无效率和统计噪音三项因素构成。通过 SFA 模型可以将投入松弛变量 s_{ik}^- 分解为三种因素, 进而在此基础上剔除统计噪声和环境因素对效率的影响。SFA 模型如下:

$$s_{ik}^- = f_i(Z_k; \beta_i) + v_{ik} + u_{ik} \quad (2)$$

其中, Z_k 表示环境变量向量; β_i 表示待估参数; $f_i(Z_k; \beta_i)$ 表示环境因素对投入松弛变量 s_{ik}^- 的影响, 通常取值为 $Z_k \beta_i$; $v_{ik} + u_{ik}$ 表示混合误差项; v_{ik} 表示随机误差项, 且服从正态分布 $N(0, \sigma_{vi}^2)$; u_{ik} 表示管理无效率项, 且服从截断正态分布 $N^+(\mu_i, \sigma_{ui}^2)$; v_{ik} 与 u_{ik} 相互独立不相关。

用统计量 $\gamma = \sigma_{ui}^2 / (\sigma_{ui}^2 + \sigma_{vi}^2)$ 来检验管理无效率和随机误差所占比重。若 γ 趋于 1, 则表明投入要素冗余主要是由管理无效率引起; 若 γ 趋于 0, 则表明投入要素冗余主要是由随机误差引起。根据 SFA 回归结果, 对各决策单元投入要素进行调整的方程如下:

$$x_{ik}^* = x_{ik} + [\max(Z_k \hat{\beta}_i) - Z_k \hat{\beta}_i] + [\max(v_{ik}) - v_{ik}] \quad (3)$$

其中, x_{ik}^* 表示第 k 个决策单元的第 i 项投入要素经调整后的值。

第三阶段, 用第二阶段得到的调整后投入要素 x_{ik}^* 代替原始投入要素 x_{ik} , 再次利用 BCC 模型进行效率测度, 得到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后的各决策单元效率值。

四、实证分析

(一) 第一阶段 DEA 结果分析

在三阶段 DEA 模型的第一阶段, 运用 Deap2.1 软件对我国 33 家省级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 2018—2021 年的运行效率进行测度分析, 结果如表 2 所示。在不考虑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的影响情况下, 我国 33 家省级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综合效率均值为 0.719, 纯技术效率均值为 0.817, 规模效率均值为 0.888。其中, 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河南、贵州 6 家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处于综合效率前沿面上, 其资源配置和技术管理相对有效; 另有 17 家公司综合效率低于整体均值 0.719, 其中综合效率最低的为湖南省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为 0.366), 其综合效率较低是由于纯技术效率偏低。

表2 2018—2021年33家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运行效率

序号	公司所处省(市)	调整前			调整后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1	北京	0.910	0.915	0.993	0.966	0.977	0.989
2	天津	0.482	0.492	0.974	0.898	0.963	0.932
3	河北	0.430	0.718	0.605	0.935	0.972	0.962
4	山西	0.479	0.665	0.801	0.933	0.981	0.952
5	内蒙古	0.912	0.912	1.000	1.000	1.000	1.000
6	辽宁	0.702	1.000	0.702	0.972	1.000	0.972
7	大连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8	吉林	0.513	0.555	0.914	0.918	0.936	0.981
9	黑龙江	0.607	0.643	0.963	0.838	0.843	0.993
10	江苏	0.947	0.976	0.969	0.992	0.995	0.997
11	浙江	0.912	0.988	0.923	0.997	0.997	1.000
12	宁波	1.000	1.000	1.000	0.995	1.000	0.995
13	安徽	0.504	0.504	1.000	0.903	0.906	0.997
14	福建	0.690	0.918	0.757	0.974	0.995	0.979
15	厦门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6	江西	0.852	0.909	0.943	0.969	0.980	0.989
17	山东	0.636	1.000	0.636	0.817	1.000	0.817
18	青岛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	河南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0	湖北	0.448	0.476	0.941	0.917	0.925	0.991
21	湖南	0.366	0.435	0.894	0.887	0.896	0.990
22	广东	0.775	0.950	0.806	1.000	1.000	1.000
23	广西	0.434	0.436	0.996	0.899	0.907	0.992
24	海南	0.625	1.000	0.625	1.000	1.000	1.000
25	重庆	0.624	0.640	0.977	0.966	0.971	0.995
26	四川	0.700	0.852	0.829	0.903	0.954	0.948
27	贵州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8	云南	0.762	0.895	0.864	0.976	0.989	0.987
29	陕西	0.613	0.830	0.743	0.959	0.988	0.971
30	甘肃	0.778	1.000	0.778	1.000	1.000	1.000
31	青海	0.792	0.844	0.936	0.988	0.992	0.996
32	宁夏	0.404	0.573	0.730	0.974	0.993	0.981
33	新疆	0.821	0.821	0.999	0.970	0.978	0.992
	平均值	0.719	0.817	0.888	0.956	0.974	0.982

本文按公司所在省(市)分区域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①来分析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运行效率的区域特征(见表3)。在不考虑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影响下,东部地区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的综合效率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且中部地区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综合效率最低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偏低。

^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大连、江苏、浙江、宁波、福建、厦门、山东、青岛、广东、海南共14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共8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11个省市。

表3 分地区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运行效率均值

地区	调整前			调整后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东部地区	0.794	0.925	0.856	0.967	0.993	0.974
中部地区	0.596	0.648	0.932	0.920	0.933	0.986
西部地区	0.712	0.800	0.896	0.967	0.979	0.987

(二) 第二阶段 SFA 回归分析

在三阶段 DEA 模型的第二阶段,将 3 个投入指标在第一阶段测算出的松弛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人均 GDP、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率、消费者价格指数、公司成立年限作为解释变量,借助 Frontier4.1 软件,运用 SFA 考察环境变量对投入松弛变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见表 4。

表4 基于 SFA 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

参数	注册资本	分支机构数量	专职员工人数
	松弛变量	松弛变量	松弛变量
常数项	-262687.660*** (2.697)	-955.538*** (344.110)	610.923 (507.939)
人均 GDP	559.505 (2186.079)	-1.165** (0.550)	-0.490 (1.551)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率	1110.308 (809.214)	-0.037 (0.265)	1.009* (0.582)
消费者价格指数	2076.537*** (247.204)	9.452*** (3.363)	-6.101 (4.967)
公司成立年限	3673.059*** (531.060)	0.583 (0.683)	1.292 (1.630)
σ^2	7934560000*** (1.000)	3584.539*** (1338.913)	6231.734*** (1322.474)
γ	0.610*** (0.051)	0.908*** (0.035)	0.785*** (0.061)
LR 单边误差检验	32.563***	35.282***	48.269***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从表 4 可以看出,3 个投入松弛变量对应的 LR 单边误差检验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本文使用 SFA 模型是合理的。此外,3 个投入松弛变量对应的 σ^2 和 γ 值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 γ 值均趋向于 1,表明管理无效率和随机误差对投入松弛值均有影响,且管理无效率对投入松弛变量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在分析环境变量对投入松弛变量的影响时,当环境变量回归系数为负值,表示该变量的增加会使投入松弛变量减少,即该环境变量有利于促进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运行效率的提升;反之同理。^① 值得一提的是,当 t 值检验不显著时,环境变量对投入松弛变量仍存在方向性影响。

从环境变量对投入松弛变量的影响来分析,得出下列结论:

1. 人均 GDP。回归结果表明,人均 GDP 与注册资本的松弛变量回归系数为正值,与分支机构数

^① 李然、冯中朝:《环境效应和随机误差的农户家庭经营技术效率分析——基于三阶段 DEA 模型和我国农户的微观数据》,《财经研究》2009 年第 9 期。

量的松弛变量回归系数为负值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与专职工工人数的松弛变量回归系数为负值。表明随着人均 GDP 的提高,有助于分支机构与人力的有效利用,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力、物力成本较高,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出于成本考虑会有有效的控制分支机构与员工数量,但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更大,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资金的利用率降低。

2.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率。回归结果表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率与注册资本的松弛变量回归系数为正值,与分支机构数量的松弛变量回归系数为负值,与专职工工人数的松弛变量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地区农业发展越快的地区,农业经营主体对资金的需求也相对更大,财政支持力度也相应增大,但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的担保能力还未能适应当地农业的快速发展,并且分支机构的建立需要一定时间,所以为了及时服务更多的农业经营主体,公司加大了在人力方面的投入从而造成人力投入的冗余。

3. 消费者价格指数。回归结果表明,消费者价格指数与注册资本和分支机构数量的松弛变量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与专职工工人数的松弛变量回归系数为负值。表明消费者价格指数越高的地区,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越容易出现投入要素冗余的问题。

4. 公司成立年限。回归结果表明,公司成立年限与注册资本的松弛变量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与分支机构数量和专职工工人数的松弛变量回归系数为正值。这表明,随着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成立时间的增加,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能力容易出现退化,导致公司资源配置效率降低。

(三) 调整后的运行效率分析

在三阶段 DEA 模型的第三阶段,再次运用 Deap2.1 软件,使用经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调整后的投入数据和原产出数据,重新测算我国 33 家省级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 2018—2021 年的运行效率结果如表 2、表 3 所示,各担保公司 2018—2021 年运行效率变动如图 2 所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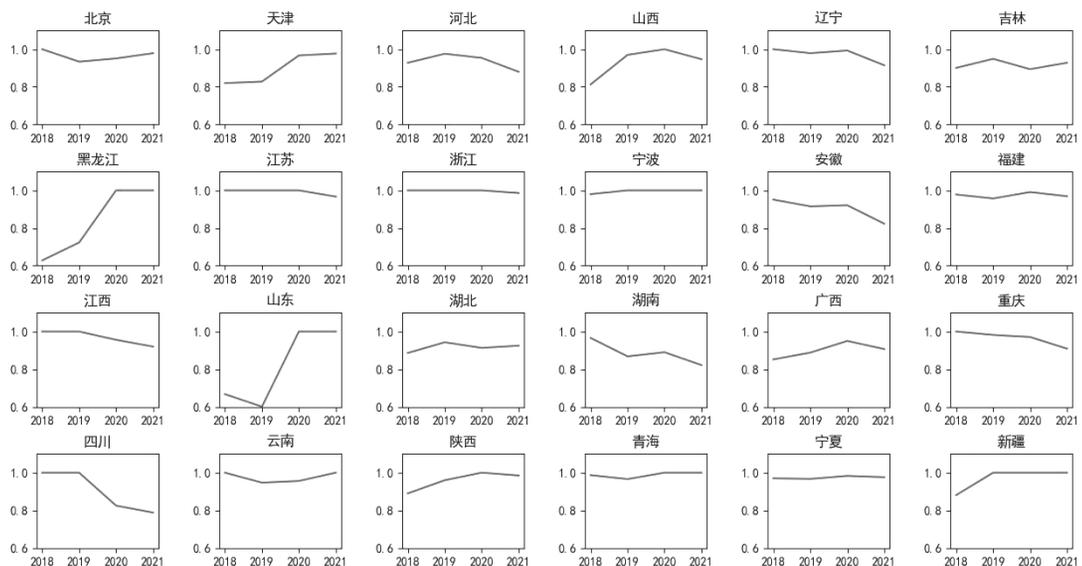


图 2 2018—2021 年各担保公司运行效率变化

^① 其中内蒙古、大连、厦门、青岛、河南、广东、海南、贵州、甘肃等 9 家担保公司各年效率值均为 1, 未在图中展示。

结果表明,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的影响后,调整前后的效率测算结果有一定的偏差,具体的对比结果分析如下:

1. 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的综合效率分析。在剔除了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的影响后,我国33家省级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综合效率均值由0.719提高到0.956,处于综合效率前沿面上的担保公司有第一阶段的大连、厦门、青岛、河南、贵州的5家公司,调整后宁波市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不再处于综合效率前沿面上,但增加了内蒙古、广东、海南、甘肃等4家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调整后,共11家公司综合效率低于整体均值0.956,较第一阶段减少了6家,并且调整后除一直处于综合效率前沿面的担保公司和宁波市担保公司的综合效率有小幅度下降外,其余担保公司的综合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宁夏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的综合效率提升幅度最大,由0.404提高到0.974,这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提升幅度较大。上述分析表明,环境因素对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综合效率影响较大,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影响后的效率更能真实反映公司的运行效率。

2. 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的纯技术效率分析。调整后,33家省级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纯技术效率均值由0.817提高到0.974,处于纯技术效率前沿面的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由10家上升为12家,除了调整前辽宁、大连、宁波、厦门、山东、青岛、河南、海南、贵州、甘肃的10家公司,调整后还增加了内蒙古、广东2家公司。调整后共有10家公司纯技术效率低于整体均值0.974,较第一阶段减少了1家。调整后除一直处于纯技术效率前沿面的担保公司外,其余担保公司调整后的纯技术效率都有一定幅度的提高,表明不考虑环境因素与随机干扰情况下,我国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的纯技术效率将被低估。

3. 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的规模效率分析。33家省级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规模效率均值经调整后由0.888提高到0.982,处于规模效率前沿面的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由8家上升为10家,调整前包括内蒙古、大连、宁波、安徽、厦门、青岛、河南、贵州的8家公司,调整后宁波、安徽的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不再处于规模效率前沿面上,但增加了浙江、广东、海南、甘肃的4家公司。调整后除一直处于规模效率前沿面的担保公司外,北京、天津、宁波、安徽、广西、新疆等地区的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规模效率有小幅度下降,其余地区的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规模效率均有所上升,表明不考虑环境因素与随机干扰情况下,我国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的规模效率大部分将被低估。

4. 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运行效率的区域特征分析。经过对环境影响因素和随机干扰的调整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有显著提高。调整前,东部地区的综合效率最高,但调整后西部地区综合效率与东部地区相等,中部地区的综合效率提升幅度最大;此外,调整前后东部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均最高,中部地区的纯技术效率提升幅度最大;调整前后东部地区的规模效率均最低,但各地区规模效率差距不大。上述分析表明,东西部地区

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的资源配置水平以及技术水平都处于较优水平,而中部地区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以提高投入资源的使用效率。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对缓解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建立健全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的进程中,研究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注册资本、分支机构数量、专职员工人数作为投入指标,本年担保项目数、担保金额、担保放大倍数、政策性项目在保余额占比、担保代偿情况作为产出指标,利用三阶段 DEA 模型对我国 33 家省级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 2018—2021 年的运行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1. 在不考虑环境及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时,只有 6 家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处于综合效率前沿面上,且有 17 家公司综合效率低于整体均值 0.719,超过总样本数的一半,表明我国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运行效率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综合效率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

2. 在考虑环境因素及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时,人均 GDP、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率、消费者价格指数、公司成立年限等 4 个环境变量对投入指标的松弛变量具有较大影响,表明测度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运行效率时剔除环境及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是必要的。

3. 在剔除环境及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后,处于综合效率前沿面上的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增加至 9 家,且有 11 家担保公司综合效率低于整体均值 0.956,较调整前减少了 6 家,表明环境及其他随机因素对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运行效率影响较大,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影响后的效率更能真实反映公司的运行效率。分区域来看,东西部地区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的综合效率相对较高,中部地区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的综合效率相对较低。

由于我国政策性农业担保体系的建立时间较短,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整体的运行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为进一步优化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资源配置,推进建立健全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 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应根据现有资源状况,充分考虑所处地区经济水平、农业发展情况等影响因素,合理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在扩大业务规模以及范围时,要结合实际情况,不能盲目为扩大业务覆盖范围而建立大量分支机构、投入大量工作人员,造成资源的浪费。为此,各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要加强担保机构培训平台建设,强化担保专业人才培养,促进担保品种更好地设计和开发,促进担保业的理念更新与创新能力的形成,提高担保公司的业务水平和能力。

2. 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工具,降低业务发展与主体融资成本。担保公司

为了降低担保风险将耗费大量人力财力进行信用信息收集,而用好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将线上管理和线下调查充分结合,建立一套本地完备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数据库,以此借助信息优势增强与银行体系合作关系和竞争力,降低主体的融资成本。

3. 各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应积极沟通交流,取长补短。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的运作虽然受环境因素的制约,但是可以通过借鉴其他担保公司具有启发性的发展经验来增强公司内部的优势,进而抵消外部环境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责任编辑:潘文竹

Research on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Policy-based Agricultural Financing Guarantee Companies

Shi Baofeng Liu Lei Wang Ruiq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Policy-based agricultural financing guarantee compani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lleviating agricultural financing difficulties and expenses, but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provinces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explored. This paper uses the three-stage DEA model to measure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33 provincial policy-based agricultural financing guarantee companies from 2018 to 2021.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factors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policy-based agricultural financing guarantee companies. After stripping out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random factors, the re-measured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policy-based agricultural financing guarantee companies is more accurate, but there is still significant regional heterogeneity. On the whole,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policy-based agricultural financing guarantee companies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is relatively high, while that of policy-based agricultural financing guarantee companies in the central region is relatively low.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each agricultural guarantee company has room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Key words: policy-based agricultural financing guarantee company; operating efficiency; three-stage DEA model

杜夫海纳情感先验与存在的现象学阐释

张云鹏

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 为了回答“审美经验如何可能?”这个问题,杜夫海纳借鉴并改造了康德的“先验”概念,提出了“情感先验”这样一个存在论概念。情感先验既是审美经验乃至审美对象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同时又是审美经验和审美对象的构成因素。作为存在的一种属性的先验,既先于主体又先于客体,并使主客体的亲缘关系成为可能,所以它同时是主体和客体的一种规定性。情感先验在对象身上体现为“情感特质”,在主体身上体现为情感能力,而对情感先验的存在性认知则为“情感范畴”。在海德格尔思想情调的基础上,杜夫海纳论证了情感对于存在的归属;借助于情感范畴的感性显现,进一步论证了情感与存在的同一——“情感先验—存在”。作为与纯粹感觉相应的情感,在审美经验中向我们揭示了存在的完满。

关键词: 杜夫海纳;情感先验;情感特质;情感范畴;存在

中图分类号: B83-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2-0135-12

一、情感及其地位

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对知、情、意这三大人类心灵能力或机能之间关系的定位,是对应于或者说服从于人类的三种高级认识能力——知性、判断力、理性之秩序的。正如同判断力是处于知性和理性之间的中介环节一样,情感能力也是认知能力和欲求能力之间的中间地带。尽管知、情、意心灵能力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康德人类学的意向,但一旦把知、情、意纳入认识能力的秩序中,他所更强烈表明的是—种理性批判的意向。结果竟是这样,情、意与知—样被理性化了。现象学对意向性的发现,尤其是海德格尔把胡塞尔的纯粹意识意向性转变为生存意向性———种比纯粹意识更为本源的生命体验本身的结构时,情、意回复了它们的感性面貌,知、情、意之间所具有的纵向层次结构关系得以显示出来。“情”处于底层,“意”在中层,“知”处于上层。这意味着“情”比“意”“知”更为原初,从而也更为根本。当然,这种认识在现象学内部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最终,在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现象学中得到最终和根本性的表达。

胡塞尔(Edmund Husserl)把称谓的和陈述的意识行为划作客体化行为,而把情感、评价、意愿等价值论、实践论的行为划作非客体化行为。非客体化行为是原意识,而客体化行为则是后反思,原意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杜夫海纳审美知觉现象学之现象学阐释”(15BZX125)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张云鹏,男,山东潍坊人,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象学美学研究。

识与后反思之间的关系在于原意识是一种原初的意识并且构成后反思的基本前提,这就是说,原意识为反思意识奠基。但基于认识论的立场,胡塞尔主张非客体化行为奠基于客体化行为之中。由此他也就把情感现象排除在它的纯粹意识现象学之外。

舍勒(Max Scheler)针对胡塞尔现象学偏于认知的倾向,建立了情感现象学。他明确指出:“与认知和意愿相比较,性情更堪称作为精神生物的人的核心。它是一种在隐秘中滋润的泉源,孕育人身上涌现出来的一切的精神形态。尤有进者,性情规定着这个人最基本的决定要素:在空间,他的道德处境;在时间,他的命运,即可能而且只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东西的缩影。”^①“‘对某物’感兴趣和‘对某某’的爱才是为一切其他行动奠基的最基本、最为首要的行动,我们的精神在这类行动中才能把握某种‘可能的’对象。它们同时为针对同一对象的判断、感受、观念、回忆和意义意向构成了基础。”^②舍勒所说的情感,泛指人的一切感官的、机体的、心理的以及精神的感受,这四种感受之间存在着深度层次的差别,越往后深度层次越高,越能体现人之为人的本质,其中“爱”在人的存在中起着根本性的奠基作用。在舍勒看来,爱是一种原-行为,它倾向于将每个事物引入价值完美的方向,并完成它。“在人是思之在者或意愿之在者之前,他就已经是爱之在者。”^③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存在与时间》中,把情绪看作是先于一切认识和意志的此在的源始存在方式,它表现为此在之“此”的生存论建构的“现身情态”——“我们在存在论上用现身情态这个名称所指的东西,在存在者层次上乃是最熟知和最日常的东西:情绪;有情绪”^④。这里所谓“情绪”是指作为一种基本生存论现象的情绪,而不是作为心理现象的情绪。情绪作为此在的源始存在方式先于一切认识和意志,且超出二者的展开程度而对它自己展开了。现身情态具有如下的存在论性质:第一,此在被抛状况的开展。此在存在着,但这个存在着是“它在且不得不在”,这个“它存在着”是这一存在者被抛入它的此的被抛境况。“被抛”就是说这个此不是此在所能决定的,它被交付给了这个“此”,存在成为此在不得不承受的负担。因此,此在带着情绪现身于它的被抛境况中:或者是直面它的存在,或者是回避它的存在。第二,整个“在世界之中”的当下开展。存在论情绪要比通过内省发现的摆在那里的现成的“体验”或“灵魂状态”更为源始,所以,它在此在无所反省地委身任情于它所操劳的世界之际袭击此在。情绪既不是从外也不是从内到来的,而是作为在世的方式从这个在世本身中升起来的。而在世是一整体结构。世界是此在在其中的先行开展了的意蕴整体,所以“情绪一向把在世作为整体展开”,其中要素如世界、共同此在(他人)和生存(在其中)同样原始地以情绪的方式展开。这就是情绪展开的整体性。第三,世内存在者的牵连性。此在在世存在必然与世内存在者打交道,与事物发生牵连。这种在世界之中与事物相遇的“可发生牵连的状态”奠基在情绪之中。“是现身情态把世界向着可怕等等展开了。只有现身在惧怕之中或无所惧怕之中的东西,才能把

① [德] 马克思·舍勒:《爱的秩序》,孙周兴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2页。

② 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799页。

③ [德] 马克思·舍勒:《爱的秩序》,孙周兴等译,第105页。

④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56页。

周围世界上手的东西作为可怕的东西揭示出来。现身的有情绪从存在论上组建着此在的世界的敞开状态。”^①在上述性质中,情绪在被抛状况中的展开具有核心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弥漫于世界、他人、他物以及此在的具体生存中,其基本现身情态就是“畏”。

经过了思想的转向,在《哲学论稿》中,人作为生存的“此在”转变为人凭借跳跃而进入的“此-在”。其基本情调是:惊恐、抑制、畏惧、预感、猜-度。所谓情调,是对此-在思想的雕刻和调谐,因此,它是思想的基本情调或风格。这当然是从此-在与存有的关系而立论的,所以说,“情调乃是作为本有的存有在此-在中的颤动的消散”^②。消散不是消失和熄灭,而是在“此”之澄明意义上的保存。惊恐,是人由表象活动回行到思想直面存在者存在时所产生的情绪。抑制,是此在向本有之转向的克制着的先行跳跃,是作为赠予的拒予(遮蔽者本身)的期备状态的先行情调。它调谐着作为从第一开端向另一开端过渡的六个关节(接缝)之一的建基,建基的基本意思是在存在(存有)之真理与人之存在(此-在)之间的关联中,让存有之真理得以本现和建立。因此,抑制构成了建基的基本情调,并规定着另一开端中的开端性思想的风格。畏惧,不是胆怯而是接近于最遥远者本身并保持这种切近的方式,通过这种切近这个最遥远者变成了最切近者。预感,是对整个时间性——“此”之时间-游戏-空间的测量和衡量,它揭示了被指派的和被拒绝的东西的遮蔽的广度。因此它也是遮蔽者本身(即拒予)的解蔽的庇护。这些基本情调尽管是多名称的,但是多名称性并不否认这种基本情调的单义性。因而,任何一种情调也都会折射并蕴含着其他情调,由此构成思想的基本风格。与第一开端的基本情调——惊奇相比,另一开端在面对存在的遗忘时,在“惊奇”中渗透了克制、抑制、期备、庇护、虚怀敞开与泰然任之的情感基调,从而表现为带有惊恐、抑制、畏惧、预感、猜-度等复合性因素的思想风格。由于西方哲学理性传统的深刻影响,海德格尔在对原初思想的追溯中,尽管已经到达了比思想更原初的情感,但在后来他向后退了半步,把情感依附于思想,将其规定为思想情调和思想风格。

萨特(Jean-Paul Sartre)一方面接受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观点,把情感看作不是我们头脑的内在状态,而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方式;另一方面运用胡塞尔“意识都是对某物的意识”的现象学方法,对情绪的本体地位和先验本质进行证明。他指出:“情绪意识首先是非反省的,就这一意义而言,它只有在非位置的意义上才是对自身的意识。情绪意识首先是对世界的意识。”^③情绪对世界的位置性意识同时就意味着对自身的非位置性意识,作为反思前的我思,情绪属于第一等级的意识。因此,情绪的主体与情绪的对象就统一于一个不可分割的综合体中。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认为身体不是客观的身体,而是现象的身体。作为现象的身体,“灵魂和身体结合不是最终地和在一个遥远的世界中完成的,这种结合每时每刻在心理学家的思维中重新出现,不是作为重复的、每次都能重新发现心理现象的事件,而是作为心理学家认识到它的

①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第160页。

② [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4页。

③ [法]萨特:《情绪理论纲要》,转引自涂成林:《现象学的使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

同时也在他的存在中了解到的一种必然性”^①。显然,梅洛-庞蒂是在将情感划归灵魂的古希腊哲学的意义上,提出“身体是一个有感情的物体”这一命题的。他虽然没有对思想、欲望和情感进行层次划分,但联系到他将人定位于“身体主体”和“可感的感受者”就可以推断出,如果说“身体主体”是在对纯粹意识的排除之后,作为有性别的身体,作为表达和言语的身体;那么,“可感的感受者”则是在对身体的欲望排除之后,作为“情感-感觉”的可感的身体。梅洛-庞蒂所说的“可感的-感受者”就是说出我们生活经验的、歌唱我们生活和我们世界的艺术家。

英加登(Roman Ingarden)认为审美经验中的情感是一种“原始情感”。为什么称之为“原始情感”呢?他的解释是:“因为它是审美经验这一特殊事件的实际起点。”^②它的产生来自被感知对象打动我们或强加于我们的那种性质的兴奋,其中包含着通常令人愉快的惊奇因素。在转化为一种更连贯、轮廓更清晰的情感经验中,它包含着以下一些原始要素,“(a)同所接受的性质发生情感的、直接的交流,这种交流仍然在发展过程中;(b)拥有这种性质以及强化直观地拥有它所允许的快乐渴望;(c)不断增长地从这种性质中获得满足和继续拥有它的努力”^③。从它的这些要素中,可以进一步发展出它的意向性关联物即审美对象的构成。在笔者看来,仅仅从结果来解释情感之为“原始”是不充分的,更为重要的是,审美经验即情感经验产生于现象学的还原,即英加登所谓的“以前经验的‘正常’过程以及对现实世界中围绕着他的对象的行为方式的某种停顿”,而不是他所错误地解释的原始情感造成了这种“停顿”。正是在这种对我们关于世界存在的信念(包括智性的理解、之前所热衷的事关利害的事情等)的悬置或排除中,作为基底的“原始情感”产生了,并必然地包含着上述原始要素。

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所谓的“情感”是一个与“感觉”相对应的概念。现象学的还原是一个感觉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理性(知性、理性)—感性(感性欲望)—纯粹感性(感觉、情感)。在审美经验中,感觉就是感到一种情感。回归的感觉,一方面悬置了理性意识的抽象性,另一方面悬置了感性意识的功利性,最终建构了审美意识的自由性,感觉成为自由的感觉。自由的感觉融自然与文化于一体,构成审美感觉的整体结构:五官感觉(外觉对象之感性形式,内觉自身为“悦耳悦目”)、心理感觉(外觉对象之意蕴,内觉自身为“悦情悦意”)、精神感觉(外觉由对象所显现的形上观念,内觉自身为“悦志悦神”)。五官感觉、心理感觉、精神感觉是审美感觉整体的三个垂直层次。与纯粹感觉相应的“情感”,超越了原始感性中的情绪和欲望,成为纯粹感性中的自由情感。这个自由的情感,一方面是审美经验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另一方面又是审美经验中的构成因素,杜夫海纳称之为“情感先验”。杜夫海纳认为,审美经验处于根源部位上,处于人类在与万物混杂中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亲密关系的这一点上,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而“情感先验”作为一个本源性的概念,就是要去回答如下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审美经验如何可能?审美经验普遍性的根据何在?我们如何通达存在?

①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3页。

② [波]英加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陈燕谷、晓未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197页。

③ [波]英加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陈燕谷、晓未译,第198—199页。

二、作为存在属性的情感先验

(一) 情感先验的结构及其意义

杜夫海纳从主体与客体相关联的方式提出了“情感先验”的结构性问题,他说,“主体联系于客体有多种方式,客体向主体显示也有多种方式。主体至少在三个方面是构成因素:第一,在呈现阶段,通过梅洛-庞蒂所说的肉体先验,这种先验勾画出肉体自身所体验的世界的结构。第二,在再现阶段,通过那些决定对客观世界的客观认识的可能性的先验。在这里,我们又和康德相会了。第三,在感觉阶段,通过那些打开深层的我第一个体验和感觉到的一个世界的情感先验。在每个阶段,主体都呈现出一个新面貌:在呈现阶段,他是肉体;在再现阶段,他是非属人的主体;在感觉阶段,它是深层的我。主体就是这样先后承受着与体验的世界、再现的世界和感觉的世界的关系”^①。审美知觉三阶段——呈现、再现、感觉是意识还原所体现的倒置结构,它所体现的是审美知觉的三个层次。与此相应,“情感先验”也具有同样的结构层次:肉体先验、再现先验、情感先验。这就是说,情感先验融肉体先验、再现先验于一身,构成结构性的情感先验,如同深层的我融肉体主体、非属人的主体于一身而构成结构性的具体主体一样。由情感先验的结构性,我们可以读出情感先验观念的多重意义。

首先是先验的逻辑意义。杜夫海纳的“先验”概念受到康德的启发,康德的先验观念指的是逻辑上在先从而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东西,“我把一切与其说是关注于对象,不如说是—般地关注于我们有关对象的、就其应当为先天可能的而言的认识方式的知识,称之为先验的”^②,“先验……这个词并不意味着超过一切经验的什么东西,而是指虽然是先于经验的(先天的),然而却仅仅是为了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东西说的”^③。由于康德哲学的立足点是认识论,因此他的先验概念虽有感性先验、知性先验和理性先验之分,但它所标志的仅仅是人类认识能力的不同层次或阶段而已。总之,康德的先验是认识先验。杜夫海纳在康德的基础上扩大了先验的范围,提出了与人的不同活动层次相应的三种先验:肉体先验、认识先验、情感先验。如果说康德的知性先验是一个对象被给予、被思维的条件,那么杜夫海纳的情感先验则是一个世界能被感觉的条件。

其次是先验的经验意义。先验不仅是经验和经验对象可能性的条件,而且是经验和经验对象的构成因素,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通过后天经验认识先验。杜夫海纳说:“凡是使对象成为对象——不是使对象自身成为对象,而只是使它属于经验范围,使主体得以与它进行联系——的东西都是构成因素。”^④先验既是对象的构成因素,即情感特质;又是主体的构成因素,即主体的存在态度、存在方式及情感能力。在这里,杜夫海纳与康德存在着区别,康德认为,先验之所以先于经验,是因为它属于主体,它是认识的一个结构。他说:“使物质空间成为可能的是存在于我们思想中的空间。它不是

①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第484页。

②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③ [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72页。

④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482页。

万物自身的一个属性,只是我的感性再现的一种形式。”^①杜夫海纳则认为,先验既表征主体(“存在的先验”)又表征客体(“宇宙论的先验”),同时还说明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情感特质作为审美对象的构成因素和价值属性,使对象成为辉煌的感性;而主体则以感觉勾画出肉体自身所体验的世界的结构。

再次是先验的认识意义。先验可以成为一种认识的对象,这种认识本身也是先验。杜夫海纳把这种以先验为认识对象的认识本身称之为“情感范畴”。情感范畴的实质是作为先验的情感特质对自身的认识,或者说,是情感特质自身对自身关系的认识论转化。杜夫海纳说:“情感特质确实还有一个方面,……这些特质不但构成我们所是的先验,而且构成我们所认识的先验。更加概括地说,什么是肉体先验、智力先验或情感先验,这一点我们总是早已知道的,并依靠这种早于任何学问的学问而生活。我们在所有经验以前认识这些先验。”^②把情感范畴规定为认识的先验,仿佛又回到了康德的知性先验,但与康德不同的是,情感范畴不是诉诸知而是诉诸感觉,“情感范畴存在于感觉之中。这些范畴构成的知是有感觉能力的深层的我的装备的一部分。感觉使这种知复活;这种知使感觉具有智力”^③。因此之故,杜夫海纳把情感范畴又称之为“先知”“原知”。

最后是先验的本体意义。情感先验既是宇宙论现象,又是存在现象;既是客体的构成因素,又是主体的构成因素;情感特质既是对象中的主体特性,又是客体属性中的价值。“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对另一方面都没有主动性或优先地位,那它就应该作为在规定这两个方面之前的东西来把握。”^④杜夫海纳把这种主体和客体之前的东西称之为“原始现实”,也即是存在。由此,“先验的逻辑意义滑进了本体论的意义,可能条件变成了存在的一种属性。先验只是因为它是存在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既先于主体又先于客体,并使主客体的亲缘关系成为可能,所以它同时是客体和主体的一种规定性”^⑤。

(二)情感先验归属存在

情感先验的本体论意义,是杜夫海纳对情感先验归属于存在的一种证明。这种论证虽有理据可循,但不免过于简单,这就留下了进一步论说的空间和必要性。无论是思想与存在,还是情感与存在,探讨的都是人与存在的关系。按海德格尔的看法,存在是对我们隐匿自身者,但它恰恰通过隐匿牵引我们同行。当我们被牵引至自行隐匿者之际,人就成为了对自行隐匿者而言的显示者。“只要人存在于这种牵引中,他就作为这样一个牵引者显示着自行隐匿者。作为如此这般的显示者,人就是显示者。但在这里,人并非首先是人,此外和偶尔还是一个显示者,而毋宁说,被牵引至自行隐匿者那里,在向自行隐匿者的牵引过程中,因而显示着隐匿,人才是人。人的本质就在于成为这样一个显示者。”^⑥这里的问题在于,是思想还是情感,或者说是思想者还是感觉者能更充分、更根本地显示存在这个自行隐匿者?人的本质是在于成为一个可思的思想者还是成为一个可感的感受者?当然,思想

① [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转引自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482页。

②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503页。

③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510页。

④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494页。

⑤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495页。

⑥ [德]海德格尔:《什么叫思想》,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页。

与情感,思想者与感觉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交织。但是,是情感依附于思想?还是思想融化为情感?这个问题在“情感及其地位”中,笔者已经做出了回答。我们的意图是,既然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巴门尼德箴言——“必须去道说和思考存在者存在”的阐释,证明了思想与存在共属一体;那么,我们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证明情感与存在的相互归属。

巴门尼德箴言的两种排列和解释——

“必需的:既道说又思想:存在者:存在。”^①

“需用既让呈放又留心:存在者存在着。”^②

其中“必需的”即是“需用”,作为无主句,它强调了存在对于存在者(包括人这个存在者)的召唤和指令。“道说”即“让呈放”,表达的是存在的言说和对存在者而言的存在之让。“存在”表达的是存在者的“在场”。这些词语的含义,对“思想与存在”和“情感与存在”都是基本相同的,不同的是“思想”和“存在者”,因此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海德格尔把“思想”解释为“思想、留心”,我们把“思想”置换为“情感”,并将其解释为“感觉、情感”。海德格尔把“存在者”解释为“言说、置放”和“思想、留心”所关涉的东西,我们把“存在者”解释为“言说、置放”和“感觉、情感”所关涉的东西,这个存在者并非一般的存在者,而是蕴涵着情感特质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存在者。于是,巴门尼德的箴言在我们这里就变成了“需用既道说又感觉:存在者存在”。

情感先验既体现在主体方面又体现在客体方面,体现在主体方面的是“感觉、情感”,按杜夫海纳的表述是“存在现象”或“存在先验”,存在先验就是我通过自己的所有活动直接的我之所是。体现在客体方面的是蕴涵着情感特质的存在者,按杜夫海纳的表述是“宇宙论现象”或“宇宙论的先验”。兹分别从不同层面对“存在现象”和“宇宙论现象”作一论述。

在经验的层面上,情感先验是主体的构成因素,这显现为三个层面:与身体相应的是肉体先验(生命先验),与智性相应的是再现先验(认识先验),与既是肉体又是精神的具体主体相应的是融肉体先验和认识先验于一体的情感先验。情感先验既是主体的存在态度——“以情观之”,又是主体的存在方式——“感-情”,同时更是主体的情感能力——情感本身、情感观念、情感感觉。在逻辑的层面上,主体的情感先验既是审美对象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又是审美主体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合而言之则是一个世界能被感觉的条件。杜夫海纳就先验的存在方面说:“先验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也是一个具体的、因而也是独特的主体的特征。”因为正是作者通过作品表现的世界表现自己,所以,他说应该把这种先验赋予主体意识。“先验表示一个主体在万物面前所处的绝对地位,以及主体瞄准、体验与改造万物的方式和主体联系万物以创造自己的世界的方式,就如同肉体先验是一个独特的肉体根据自身结构的迫切需要与自己的环境联系的方式一样。实际上,先验就是一个具体主体借以构成自己的、萨特的存在精神分析应该找出的那种不可还原的东西。”^③这个东西不是萨特所谓的绝对自由的自我选择行为,而是一个具体主体对世界所保持的独特的感觉。叶秀山对此评论说:

① [德] 海德格尔:《什么叫思想》,孙周兴译,第 210 页。

② [德] 海德格尔:《什么叫思想》,孙周兴译,第 268 页。

③ [法] 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 487 页。

“为了回答审美经验如何可能的问题,杜弗朗区分了三种类型的先天性,因为没有先天必然的形式规则是不可能形成统一的‘经验’的。杜弗朗说,有存在性的先天性,有思想性的先天性,也有情感性的先天性。存在性的先天性使人的实际生活成为可能,思想性的先天性使人的知识成为可能,情感性的先天性则使人的深层交往成为可能,……思想性的先天性涉及事物之‘表象’,而情感性的先天性涉及主体的深层结构。”^①从本体的层面上看,主体的情感先验并不是凭空生起的对于存在者的把握或被动的接受和反应,而是存在的“需用”和“道说”让主体去“感觉”和体会(心情)存在者之存在。

审美对象的存在,作为与“既道说又感觉”相接合的顺应,在经验的层面上,情感特质是客体的构成因素,它同样显现为三个层面:体验的世界、再现的世界和表现的世界,这三个世界分别对应于肉体先验、认识先验和情感先验。尽管我们曾说主体的情感先验是审美对象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审美对象与情感无关,恰恰相反,作为对象的构成因素,它首先是指审美对象所显现出来的情感特质。“感觉就是感到一种情感,这种情感不是作为我的存在状态而是作为对象的属性来感受的。情感在我身上只是对对象身上的某种情感结构的反应。”^②其次是指审美对象通过情感特质所孕育的一个世界,海德格尔所说的“物物化世界”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最后是指审美对象的一种存在方式,即情感性质是对象中的主体特性,是客体属性中的价值。例如,博希的可怕、莫扎特的欢乐、麦克白的悲惨和福克纳的嘲讽,如此等等。在逻辑的层面上,构成审美对象因素的情感特质就是自身的先验。杜夫海纳说过:“并非任何情感特质都构成一种先验,它只有被审美化时才能如此。”^③这里的意思无非是说,作为普通的存在者,它就是一个物;而作为审美对象的存在者,则是一个物化之物,即开显出一个世界的物。“当作品表现的情感特质成为审美对象的世界的构成因素,因而——因为这是成为构成因素的证明——它能够像我们——如同康德所说——可以设想一个没有对象的空间或时间那样独立于再现的世界之外被我们感觉时,情感特质就是一种先验。”^④从本体的层面上看,审美对象不是一个现成的、是其所是的物,而是一个正在生成……的事情。存在者存在着,在场者在场。存在让其是,让其存在;存在者显现存在。

以上我们对情感先验的存在现象和宇宙论现象分别作了描述,但两者相关,主体的感觉与对象的情感特质是统一的。情感特质既构成主体又构成客体,它同时是客体和主体的构成因素。杜夫海纳对此所作的表述是:“主体的一个世界的概念应该倒转过来,用世界的一个主体的概念来补偿。‘世界’和‘主体’应该处在平等地位。尽管像我们以前所做的那样强调情感特质对一个主体而言是世界的特质,那也不应该忘记它对一个世界而言同样是一个主体的特质。换句话说,一个主体一定要有一个世界,因为主体联结到一个世界时才是主体;同样,一个世界一定要有一个主体,因为有了见证人世界才是世界。作者通过作品的世界表现自己,作品的世界也通过作者表现自己。”^⑤主体与世

① 叶秀山:《思·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7页。

②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481页。

③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479页。

④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485页。

⑤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493页。

界的相互规定意味着有一个超出两者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存在。情感先验只是因为它是存在的一种属性,所以它既先于主体又先于客体,并使主客体的亲缘关系成为可能,所以它同时是客体和主体的一种规定性。

从存在现象、宇宙论现象以及两者的关系三个角度所作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个结论:情感与存在相互归属。

三、情感中的思想

在一般意义上,称情感特质为思想或说情感中的思想似乎是一个悖论,但理性回归感性的现象学还原并没有排除理性,而是把理性意识融入感性之中并超越感性转化为纯粹感性中的理性能力。这种纯粹感性中的理性能力,表现在情感特质身上,就构成了杜夫海纳所说的认识的先验。情感特质,一方面构成我们所是的先验,另一方面构成我们所认识的先验。我们所是的先验与我们所认识的先验是同一个先验吗?胡塞尔曾区分过“原意识”与“后反思”,“原意识”意味着对在进行之中的行为本身的一种非对象性的意识到,而“后反思”则是在每一个行为进行之后对这个行为的当下化,即反思性的再造。显然,原意识与后反思不属于同一个层次上的意识活动。萨特区分过“自身意识”与“自身认识”,“自身意识”就是他所谓的“前反思的我思”;而“自身认识”则属于“反思的我思”。情绪作为对自身的非位置性意识属于第一等级的意识。梅洛-庞蒂在“沉默的我思”的意义上说过,“什么是欲望,不就是意识到一个对象是有价值的(或者其价值是因为在欲望倒错的情况下,对象是没有价值的)吗?什么是爱,不就是意识到一个对象是可爱的吗?既然关于一个对象的认识必然包含认识本身的知识,否则认识就可能消失,就不可能把握其对象”^①,那么据此所得出的推论是欲望和知道本身有欲望,爱和知道本身在爱就必定是同一种行为。“爱就是爱的意识,欲望就是欲望的意识。没有意识到本身的一种爱或一种欲望可能是一种不在爱的爱,或一种没有欲望的欲望,正如一种无意识的思维可能是一种不进行思维的思维。”^②按照以上诸家对不同层次意识的区分,按照杜夫海纳对情感特质作为认识先验的整体论述,可以断定,我们所是的先验与我们所认识的先验是同一个先验。但情感与情感对自身的意识毕竟是有区别和差异的,在情感自身的层面上,杜夫海纳认为,无论是呈现的先验、再现的先验还是情感先验,都完全是不可把握的。但在情感对自身意识的层面上,我们却能够对这些先验有所认识,譬如“我们之所以能够感觉拉辛的悲、贝多芬的哀婉或巴赫的开朗,那是因为在任何感觉之前,我们对悲、哀婉或开朗已有所认识,也就是说,对今后我们应该称之为情感范畴的东西有所认识”^③。

(一)情感范畴

情感范畴作为情感特质的先验“观念”,同情感特质一样具有两面性——宇宙论方面和人的方

①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第474页。

②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第474页。

③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504页。

面,即它既体现为一个世界的特征,也体现为一个主体的特征。在世界方面,由于物的世界和人的世界的丰富性和多侧面性,它体现为审美范畴(或审美类型、审美价值),如美、崇高、悲、滑稽、漂亮、雅致、壮烈、盛大、讽刺、哀伤、荒诞等。与价值哲学所谈论的“价值”相比,杜夫海纳认为“唯有美可以称为价值——但它必须是出类拔萃的,必须与其他范畴没有公度,表示某些审美对象具有的那种获得成功的特权,亦即充分表现这样或那样的情感范畴,毋庸置疑地显示出一个世界的真实性的特权”^①。在此,杜夫海纳强调了情感范畴的独特性以及显示世界真实性的特权。在主体方面,情感范畴表示自我向一个世界开放的某种方式,即某种“感”,譬如说悲感、滑稽感、荒诞感等。“情感范畴表现的情感完全可以称为人的范畴,而情绪却只是些偶然的東西。这些范畴是存在先验,因为它们本身是先验地被认识的。它们表示一个人在与自己感受的一个世界的关系中所持的根本态度。”^②悲与悲感,滑稽与滑稽感,崇高与崇高感,如此等等,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有关世界的种种面貌的先知也是有关人所持态度的一种先知,因为世界是人的世界而人是在世界之中的。从现象学的角度看,感觉回归的结果,就是情感融认知和意愿于一身,认知、意愿被情感化,形成根源性的情意或情思。所谓“情感范畴”,体现在宇宙论方面就显现为具体感性事物的存在风格;体现在人的方面就显现为一个具体主体的生命情调。事物的存在风格是为人的,而人的生命情调则是缘于事物的。

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怎样知道这个“先知”?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证明情感范畴的先验性?杜夫海纳提出了两项证明:一是先知直接内在于感觉;二是它并非出于一种经验的概括。关于第一项证明,他说,“知不是在感之后。知不是对感的一种思考,不是感借以从某种盲目状态向某种知性状态,从参与走向理解的那种思考。感觉是立刻是有智性的”^③;“情感范畴存在于感觉之中。这些范畴构成的知是有感觉能力的深层的我的装备的一部分。感觉使这种知复活;这种知使感觉具有智力”^④。归纳起来,无非是说,知是感觉的灵魂,是感觉对自身的理解。至于这个先于“感觉”的认识从哪里来,杜夫海纳没有作出说明。关于第二项证明,他认为情感范畴是一般性的,但它不是一种概括的结果,这个一般不是一种抽象。他称这个一般为“与人性有关的一般”,以此区别于“与事物有关的一般”。他说:“与事物有关的一般是从模仿我们对事物可能产生的影响开始的,因为事物确实受我们的影响。与人性有关的一般总包含着某种有关人类整体的观念,以及任何人与我们都有亲属关系的这种感觉。如果这种一般是先验,就是说,如果人的这个观念由于是我身上的、我的人性的保证,在任何模式构成之前就已出现,那么情况就更是如此。”^⑤与事物有关的一般是经验概括的结果,与人性有关的一般则是经验可能性的条件。因此,莫扎特的欢乐与一般欢乐的关系就不同于种与属的外部关系,而是完全等同于在人自身内部所体现的人与人类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对于思考它的人来说,就是在人身上发现人性。其实,所谓“先知”“原知”,不是与存在相对的知性认识,而是与存在同

①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505页。

②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515页。

③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510页。

④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510页。

⑤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512页。

一的存在性认知。叶秀山对此所作的评价是：“杜弗朗在论述审美范畴时，明确地把胡塞尔的这种早于各门具体科学之知识与康德的先天范畴论联系起来，具体运用于情感的问题上，认为在具体的情感可以分别出来之前，对于情感必有一个先天的、普遍的观念——范畴，因而这种‘前科学’之知识也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即不仅有‘纯粹科学’（纯粹知识），也有‘纯粹美学’（纯粹审美）。在这里，杜弗朗承认，他所运用的是比康德本人还要彻底的康德原则。”^①

（二）情感范畴的感性显现

在“情感范畴的有效性”的题目下，杜夫海纳所要谈论的是作为一般性的情感范畴与作为个别性的作品的关系，或者更具体地说，“一般怎样能应用于独特，独特又怎样在我们身上提示那个阐明独特的一般呢？我们怎样通过范畴认识独特作品、通过观念认识具体事实呢？”^②如果我们站在海德格尔的立场看，那么上述问题就变成了此在如何通过存在者追问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如果我们立足于康德的立场，那么上述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如何把普遍和特殊连接起来的反思性判断力的问题。

在把情感范畴确定为“一般、普遍”，把审美对象或艺术作品确定为“特殊、个别”，把人确立为具体主体之后，杜夫海纳指出了两个寻找普遍的途径，“一方面，如果我们转向已被认识的东西，那就应该指出独特本身含有一般，这样才有理由使用具有一般意义的范畴。……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转向认识者，那么就该指出，这些范畴之所以有效，只是因为先验，是因为人自身原来就带有人的观念，又因为这些范畴同时构成一种特殊类型的、前概念的又像是潜在的知。所以，正是这些范畴的不确定性使之适用于独特”^③。他所谓的“两条途径”，其实只是同一条途径的两个方面，这条途径就是：“认识者—被认识的东西—情感范畴”，即欣赏者（认识者）在静观个别的审美对象（被认识的东西）时，审美对象（或艺术作品）以自己的独特性显现着情感范畴的一般和普遍。所以根据康德，它不是从一般到个别的规定性判断，而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反思性判断；或根据海德格尔，它不是此在直接追问存在，而是此在通过存在者领会存在。

艺术作品的一般性，不是指门类（包括材料、创作方式、创作规律等）的一般性，而是指寓于作品独特之中的人的本性——自由。“作品的情感特质在展现以我为灵魂和关联物的这个世界时，它概括和表现的正是在艺术作品中表现的这个深层的我。然而，或许当我们最深刻地成为我们自己时，我们与别人最为相近。这不但说明这时我们能够与别人沟通，成为别人的知己或榜样，而且还说明我们是与别人同体的、相象的：我们在自身深处又找到了人性。”^④这表明作为情感范畴的人性既是一般又是独特。作为知，它是一般的；作为我所是的知，它是独特的。独特当中包含着一般，一般当中包含着独特。“艺术作品是这种因为它走到自己的独特性的尽头而达到普遍性的独特本质。所以作品孕育着普遍性而又不失为独一无二的东西。”^⑤

① 叶秀山：《思·诗·史》，第339页。

②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515页。

③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516—517页。

④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519页。

⑤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521页。

不仅被认识的东西——作品是一般与独特的统一,作为认识者——人同样也是一般与独特的统一。但人对自身人性——存在性自由的认知需要对象化,没有作为中介环节的存在者,没有审美对象或艺术作品,存在或情感范畴就不可能显现。“当先验用于独特时,我身上的人性就与对象中的人性会合。”^①但这种会合是这样实现的:一个非属人世界的情感范畴转化为一个属人世界的感性观念,一个非属人主体的知转化为一个属人的具体主体的感觉。论述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海德格尔思想情调的基础上,杜夫海纳往前推进一步就达到了情感对于存在的归属,借助于情感范畴的感性显现再进一步就达到了情感与存在的同一。因此,他才说,“哲学家也许会看到,任何思想,一旦克服了妄想,就意味着情感,任何与世界的关系意味着对世界的这种情感”^②。如果说思想带有疑问,而情感则是揭示,“在自然的审美经验中,情感向我们揭示了存在的完满”^③。

责任编辑:冯济平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Dufrenne's Affective A Priori and Presence

Zhang Yunp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nswer the question "how is aesthetic experience possible?", Dufrenne borrowed and reformed Kant's concept of "a priori" and put forward an ontological concept of "affective a priori". Affective a priori is not only the condition that makes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aesthetic object possible, but also the constituent factor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aesthetic object. As an attribute of presence, a priori precedes both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and makes possible the relation of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so it is at the same time a specification of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Affective a priori is embodied in the object as an affective trait, the subject as an affective ability, and the cogni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affective a priori as an affective category. On the basis of Heidegger's ideological mood, Dufrenne demonstrated the attribution of emotion to presence. With the help of the perceptual appearance of affective category, the identity of emotion and presence is further demonstrated: "affective a priori - presence". Affection, which corresponds to pure feeling, reveals to us the fullness of presence in aesthetic experience.

Key words: Dufrenne; affective a priori; affective trait; affective category; presence

①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第522页。

② [法]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1页。

③ [法]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第48页。

罗杰·弗莱与英国现代主义运动中的 中国风话语建构

谢雅卿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深受中国古典艺术的影响,他对中国艺术的介绍与阐释也将其引入了英国现代主义的话语范畴。在弗莱等现代主义文化精英的引领下,20世纪的中国风经历了多维度的话语转型,它从文化物质和视觉艺术转向了精神和审美维度,又被纳入了比较文明的讨论之中。弗莱将中国古典艺术阐释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典范艺术,而注重艺术形式与生命精神相结合的中国古典美学理念也反过来影响了弗莱的现代主义美学。

关键词: 罗杰·弗莱; 中国风; 中国艺术; 现代主义; 布鲁姆斯伯里

中图分类号: B83-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2-0147-10

英国艺术批评家、画家、布鲁姆斯伯里小组核心成员罗杰·弗莱(Roger Fry)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他的形式主义美学受到了中国古典艺术的深刻影响,他也积极推进了中国艺术在西方世界的话语转型,并将其引入了英国现代主义的话语范畴。本文认为,弗莱与数位英国汉学家、艺术史家、艺术评论家结成紧密关系网,与艺术经销商、收藏家和鉴赏家达成合作,以《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等出版物和出版社为发声渠道,以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和高等教育院校等文化机构为实践阵地,将中国早期艺术阐释为具有“有意味的形式”的典范艺术,提升了其经济和象征价值,并将其内在审美理念与精神内核引入了英国现代主义。他对中国艺术的跨文化阐释促进了中国风在20世纪初的话语转型,也为西方世界理解中国早期艺术和古代文明提供了范式。

一、中国风与英国现代主义

“中国风(chinoiserie)”这一概念最初指的是盛行于17—18世纪的欧洲、在装饰艺术和视觉艺术中的一种“中国式”审美模式。17世纪,进口至欧洲的中国商品不断增多,许多欧洲人也开始仿制具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0批面上项目“跨文化的现代主义:布鲁姆斯伯里小组与‘中国风’”(2021M700479)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基金项目“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中国书写研究”(2021NTSS3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谢雅卿,女,山东青岛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及文化研究。

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商品和艺术品,于是,一个原本存在于想象中的“中国”开始在欧洲装饰艺术和家庭艺术中变得实体化和具像化。许多艺术史学家已对中国风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做了概述,他们大都认为这种艺术风格的诞生和发展有几个重要节点: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唤起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迷恋;1600年东印度公司的成立,让大量中国商品进入英国市场,从而影响了欧洲人的艺术品味;17世纪盛行欧洲的巴洛克艺术提倡繁复的装饰、宏大的形式和富丽堂皇的气派,它成功吸纳了中国艺术品的风格;18世纪,洛可可艺术也融合了中国风,因为二者都摆脱了古典主义的克制与对称风格;而在19世纪,由于科学、技术和理性精神的盛行,欧洲和中国之间关系的恶化,中国对西方商业利益的威胁以及欧洲消费者对日本艺术的兴趣,中国风渐渐不再流行^①。

17—18世纪的中国风已受到了中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世界对中国古代文物的殖民掠夺、中亚考古大发现、中国艺术品在西方博物馆、美术馆的展览等活动,中国风再次风靡于西方世界。然而,这场与现代主义运动并行的跨文化实践在西方批评话语中并未受到足够重视^②,其原因之一在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传统西方学界往往关注现代性如何从西方“中心”单向度地传播到东方“边缘”,却忽视了二者之间更为复杂、微妙、多方向的文化流动。其实,在许多英国现代主义文化精英的眼中,20世纪初中国风在西方的再度风靡不亚于一场“文艺复兴”,例如,罗杰·弗莱在1910年写道:

令人好奇的是,西方曾有多少次转向东方艺术,以寻求创新、活力和灵感。在我们的艺术史中,东方文艺复兴几乎和古典主义一样普遍。有迹象表明,与以往任何阶段的东方主义相比,当前正在迅速增长的对东方艺术的关注将会日益强烈,并对我们自身的观念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传统已愈发失望,愈发厌倦。^③

弗莱的好友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另一位艺术批评家,同样认为由于远东文明带来的影响,“一场精神上的文艺复兴或许就在眼前”^④。美国学者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则在1920年指出:“这场现代文艺复兴是由中国绘画和陶器的发现引起的。”^⑤

① 参见 Hyatt A. Mayor, "Chinoiserie",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vol. 36, no. 5 (1941), pp.111-114; Hugh Honour,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 London: J. Murray, 1961; Dawn Jacobson, *Chinoiserie*, London: Phaidon Press, 1993; David Beevers (ed.), *Chinese Whispers: Chinoiserie in Britain, 1650-1930*, Brighton: Royal Pavilion & Museums, 2008.

② 相关的研究包括: Anne Witchard, *British Modernism and Chinoiseri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Patricia Laurence, *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 Bloomsbury, Modernism and China*, Columbia: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3; 杨莉馨、白薇臻:《“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陶家俊:《跨文化的文学场:20世纪中英现代主义的对话与认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

③ Roger Fry, "Oriental Art",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vol. 17, no. 85 (April 1910), p.3.

④ Clive Bell, *Pot-Boiler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18, p.143.

⑤ Frank Harris, *Contemporary Portraits*, New York: The Author, 1920, pp.149-150.

20世纪初中国风再度兴起的物质原因在于大量的中国早期艺术品、绘画和书法作品在这段时间内被掠夺至西方世界。与18世纪中国出口的商品或欧洲仿制的中国艺术品不同,这些珍贵的早期古董珍品,如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汉代石器、魏唐宗教艺术、宋代瓷器、绘画、书法等,都在形式上更加简单、典雅,也更具创造精神和审美价值。这些古董珍品进入英国市场后,许多艺术经销商为收购它们展开了激烈竞争,他们以伦敦新邦德街为据点,与各个博物馆和美术馆合作举办展览,以增加藏品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相关领域的鉴赏家和批评家被邀请为这些展览提供评论、目录和介绍,以此来推介、宣传、售卖它们。此外,在这段时期,一批活跃在英国的汉学家,比如赫伯特·翟里斯(Herbert Giles)、劳伦斯·宾扬(Laurence Binyon)、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和沃尔特·珀西瓦尔·耶茨(Walter Perceval Yetts)等人也在积极译介中国典籍,将中国传统美学理论、艺术理论和哲学思想引入西方。所有这些相关文本和书写实践逐渐形成了一套关于中国古典艺术、文化和文明的特定话语,一种独特的阐释体系,以及一系列价值判断的标准,它们逐渐渗透于英国现代主义文化场域和文艺实践之中,折射出英国现代主体自身的品味和审美变革、文化立场和身份认同等问题。如果说18世纪的中国风主要是为感官愉悦或异国情调而服务的,那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开始对现代性话语的核心——科学、技术、理性、进步等价值理念产生怀疑,对以“模仿论”为基础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西方文艺传统发起挑战,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以简洁、生动、典雅的形式传达神韵的中国古典艺术,以天人合一、物我合一、“气韵生动”等理念为标志的中国美学思想和以人的精神、道德、伦理为本质关怀的中国古代文明。

罗杰·弗莱对中国古典艺术的兴趣得益于中国风在20世纪初的再度兴起。他认为,尽管中国的装饰艺术已“遍布我们的客厅”,但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尤其是早期的宗教艺术,仍因其“异质性”受到英国大众的排斥^①。于是,他致力于探索中国早期艺术的巨大美学价值和深厚文化底蕴,连同多位汉学家、艺术批评家、鉴赏家及艺术经销商对中国艺术进行了多方位的鉴赏与推广。他对中国早期艺术的形式主义美学阐释将其从装饰艺术提升至美学、文化和文明的范畴,他对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和美学理念的关注使其得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他对东方文明的探索间接影响了诸多英国现代主义文化精英的精神化运动与跨文化实践。

二、弗莱对中国艺术形式的评鉴

罗杰·弗莱对中国艺术的评鉴有很大一部分发表于《伯灵顿杂志》,该杂志创刊于1903年,目的是补充英国现代艺术界的权威性和批判性声音。在弗莱担任编辑期间(1909—1918年),《伯灵顿杂志》成了英国现代艺术批评的新权威之一,该刊物不仅关注欧洲现代艺术,还放眼于东方各国的艺术创作和美学理念。在弗莱的组织下,该刊物还特别出版了一部专门介绍中国艺术的专著:《中国艺术导论:绘画、陶瓷、纺织品、青铜器、雕塑、玉器等》(*Chinese Art: An Introductory Review of Painting, Ceramics, Textiles, Bronzes, Sculpture, Jade, Etc.*)。为《伯灵顿杂志》撰写艺术评论的学者大都注重实

^① Roger Fry, *Transformations: Critical and Speculative Essays on Art*,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6, pp.67-68.

证考察,在对中国艺术的鉴赏中,他们提供了较为专业、准确的考古信息以及学术的、科学的分类。然而,弗莱却独辟蹊径,采取了一种不强调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形式批评方法,这使他对中国艺术的阐释更具审美性和现代性。他着重强调中国艺术的形式特征和审美理念,比如其色彩、线条、轮廓和结构等,部分原因在于忽略特定的文化和历史差异能使西方观众更易接近东方艺术,忽略艺术品的实用功能更能将其纳入“高级艺术”的范畴。

弗莱在《伯灵顿杂志》上发表的《玉蟾蜍》(“A Toad in White Jade”)一文可作为典型例证,体现了他独特的形式主义批评方法。与这篇文章同版发表的是艺术史学家尤纳·蒲伯-亨内斯(Una Pope-Hennessy)对同一件中国玉雕蟾蜍的鉴赏评论,这两篇文章鲜明地呈现了他们不同的视角。弗莱在他的评论中指出,艺术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创作中寻找“生命与形式的结合(synthesis for life and form)”,而这件玉蟾蜍完美展现了此种结合:它栩栩如生,“表面质地”与活物无异,带有“斑点”“癞”和“松弛的皱纹”,然而,它的设计形式却是“象征性”的而非“自然主义”或模仿性的,因为它只有三条腿。在弗莱眼中,这只玉蟾蜍是一件杰作,因为它具有“不对称的身体造型”、独特的“形式设计”和“节奏感(rhythm)”,以及“一种能够拥抱生命的自由和精致”,而这种生命力和表达形式的结合与平衡才是中国艺术最重要的特征^①。弗莱对于这件玉蟾蜍的文化象征意义和历史背景并不十分了解,他的视角是“纯艺术的”,“(我)不知道它是如何或何时来到英国的。但幸运的是,我可以让更多有能力的人去讨论它的产地和时代。但从纯艺术的视角来看,它非常有趣”^②。与弗莱的“纯艺术视角”形成对比的是尤纳·蒲伯-亨内斯的考古学方法。亨内斯在他的评论中指出,这件玉蟾蜍是“用山西本土的玉石雕刻而成的”,制作于“周朝早期”,据他所言,这是一个燃烧香料的容器,是中国古代人在春分和秋分祭拜月亮的仪式上使用的。他强调了这只物件的宗教和祭祀意义,在中国道家文化中,“玉蟾蜍”是月亮的别称,它是“在每年特定时期”用于“调和阴阳两种原始元素”的灵物^③。的确,很多中国早期的“艺术品”往往与各类仪式有关,它们都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意义,因此很少作为纯粹的艺术形式存在。它们的形态特征多是为了某种功能或理念而服务的,而非弗莱眼中“纯粹的审美形式”。

其实,弗莱并非没有能力对中国艺术的历史背景、文化意义或实用功能进行讨论,他与许多汉学家和艺术史家私交甚好,当时也已有一些相关的英文文献可作参考,但他还是有意识地、策略性地选择了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弗莱曾在他早期最重要的美学理论宣言《美学随笔》(“An Essay in Aesthetics”)一文中为自己辩护:“当我们生活中的一件物品只为了被看而存在,我们才会真正去看它,就像去看一件中国饰品或一块宝石,对于这样的物品,哪怕是最普通的人,也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一种艺术态度——将必需品抽象化为纯粹的视觉画面。”^④弗莱认为,忽视一件物品的使用功能

① Roger Fry and Una Pope-Hennessy, "A Toad in White Jad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vol. 41, no. 234 (September 1922), p.103.

② Roger Fry and Una Pope-Hennessy, "A Toad in White Jad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vol. 41, no. 234 (September 1922), p.103.

③ Roger Fry and Una Pope-Hennessy, "A Toad in White Jad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vol. 41, no. 234 (September 1922), p.103.

④ Roger Fry, *Vision and Desig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0, p.16.

和历史背景或许有利于观者采取纯粹的抽象视角,去体验艺术激起的深层审美情感。为了唤起审美情感,艺术家必须赋予作品某种形式特征,比如节奏(rhythm)、对称(symmetry)、平衡(balance)、和谐(harmony)等,这便是弗莱的形式主义美学的核心理念——“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有意味的形式”由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艺术》(*Art*)中正式提出,但弗莱比贝尔更早论述了类似的概念。在1911年的评论文章《后印象主义》(“Post-Impressionism”)里,弗莱便指出,后印象主义者发现了“一个由有意味、有表现力的形式组成的新世界”^①。在他们的阐释中,中国艺术(比如“中国地毯”和“魏唐名作”)常被当作“有意味的形式”的典型例证,它“没有再现,没有技术上的炫耀,只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式”^②。

弗莱对中国艺术形式的鉴赏与强调有利于向西方观众介绍中国艺术并减缓其“异质性”的冲击。在他看来“整个中国的象征系统”和中国早期艺术的“内容”是西方世界无法理解的,但其“形式特征”并未对“欧洲人的鉴赏力带来特别的困难”,他认为“一个人不必是汉学家才能理解一件中国雕塑的审美情趣”^③。因此,他在多篇论文中强调了中国艺术的形式特征,比如构成轮廓的“线条节奏”、设计中的“流动连续性(flowing continuity)”、“塑形感(plasticity)”、“部分与整体的协调统一”等。弗莱的形式主义美学方法补充了其他艺术鉴赏家和批评家的考古学或民族志方法,将中国古典艺术建构为统一了形式与情感的纯艺术典范。

三、弗莱对中国古典艺术“现代性”的阐释

除了将中国古典艺术阐释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典范艺术,弗莱对20世纪中国风的话语建构的第二大贡献便是将其纳入现代主义的话语范畴,为其赋予“现代性”。在评论汉学家劳伦斯·宾庸的《远东绘画》(*Painting in the Far East*)时,弗莱认为宾庸“很好地描述了……中国艺术家们极致的现代性”^④;而在为亚瑟·韦利的《中国画研究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ainting*)写的书评中,弗莱又高度称赞了古老的中国文化“卓越的自我意识”“精妙绝伦”的艺术和非凡的“现代性”^⑤。在弗莱眼中,具有“现代性”的艺术或文明必须具备两个因素,一是创造性的审美情感和精神灵性,二是高度发达的艺术自觉和批判意识,而中国古典艺术两个要素都具备,因此,弗莱指出了西方现代主义者与中国古代艺术家相互认同的可能性:

这些中国艺术家,哪怕是最早期的艺术家,或多或少都是我们同类。他们已经是完全拥有自我意识的艺术家;他们的语言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障碍。……我们感到我们分享了这些艺术

① Roger Fry, "Post-Impressionism", *Fortnightly Review* (May 1911), pp.856-867.

② Clive Bell, *Art*,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47, p.69.

③ Roger Fry, *Transformations: Critical and Speculative Essays on Art*,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6, pp.67-77.

④ Roger Fry, "Oriental Art: Review of *Painting in the Far East* by Laurence Binyon", *Quarterly Review*, vol. 212 (January 1910), p.228.

⑤ Roger Fry, "Review of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ainting* by Arthur Waley",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vol. 44, no. 250 (January 1924), p.47.

家自身的喜悦,我们可以与他们的精神世界建立一种交流。他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向我们诉说了那种与大自然保持联系的模糊意识,而这种意识早已被我们的祖先遗忘了。^①

弗莱将中国古典艺术编码为现代艺术的话语策略之一是将与其与他推崇的后印象主义绘画相提并论,他曾多次指出后印象主义与东方艺术(尤其是中国艺术)之间的相似之处——后印象派绘画“就像东方艺术的杰作”,因为它们不追求三维的逼真感,而是“隐秘地暗示一些视觉画面”^②。此外,他还经常提到马蒂斯(Matisse)、高更(Gauguin)、梵高(Van Gogh)的作品与东方艺术的相似性。例如,在《线条作为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段》(“Line as Means of Expression in Modern Art”)一文中,弗莱将后印象派艺术家的线性绘画与中国书法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都拥有“一种让人震颤的生命力和一种节奏上的和谐(a tremulous intensity of life and a rhythmic harmony)”^③。他还指出,马蒂斯的色彩明显受到“东方影响”,他“通过节奏线条的连续性和流动性,通过空间关系的逻辑,以及最重要的是,通过全新的色彩运用,让我们相信他的形式的真实性”,因此,马蒂斯非常“接近中国艺术的理想”^④。与弗莱的观点相似,克鲁顿·布罗克(Clutton-Brock)也曾将后印象主义与中国艺术进行比较,“后印象派画家的目的是用更深层、更持久的情感兴趣来代替好奇心的兴趣。像伟大的中国艺术家一样,他们在开始作画之前就试图彻底了解他们所画的东西,并在他们丰富的知识储备中只选择对他们的情感有吸引力的东西”^⑤。

弗莱大力提倡后印象主义绘画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具有表现情感的形式和力量,而非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启蒙理性以降,逼真性逐渐成为判断艺术价值的主要标准,艺术受制于客观现实、科学唯物主义和技术实践。为了打破以“模仿论(mimesis)”为基础的西方文艺传统,弗莱认为西方现代艺术有必要向东方艺术和原始艺术学习。他在评论1910年第一次后印象派画展时指出:“为什么艺术家要将文艺复兴和随后几个世纪的……科学肆意抛弃?为什么他们要任性地回归到原始的,或被人嘲讽为野蛮的艺术?答案是,如果要把艺术从它自身的科学积累那无望的束缚中拯救出来,如果艺术要重新获得表达情感的力量,这种做法既不是任性的,也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需的。”^⑥这段话反映了弗莱对艺术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看法:艺术史并不遵循一种进步的或进化的模式,它是循环往复的,有时还会回到起点,以重新获得“必要的”和“情感的”力量。正如他所言,后印象主义并不完全是一种全新的、属于现代的创新,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原始”甚至“野蛮”艺术的回归。这也解释了为何第一次后印象派画展会引发西方公众的惊愕和不满,因为它激起了人们对于文明正在退化的恐惧。弗莱在其他评论中也常常提到这种“回归”的观点,他认为“现代派运动本质上是对形式设计理

① Roger Fry, *Transformations: Critical and Speculative Essays on Art*,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6, p.79.

② Roger Fry, "The Grafton Gallery-I", *Nation* (19 November 1910), pp.331-335.

③ Roger Fry, "Line as a Means of Expression in Modern Art",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vol. 33, no. 189 (December 1918), p.202.

④ Roger Fry, *Vision and Desig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0, p.158.

⑤ Arthur Clutton-Brock, "The Post-Impressionists",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vol. 18, no. 94 (January 1911), pp.216-217.

⑥ Roger Fry, "The Grafton Gallery-I", *Nation* (19 November 1910), pp.331-332.

念的回归,在人们狂热追求自然主义再现的过程中,它们几乎被忽略了”^①。克莱夫·贝尔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事实上,后印象主义是一种回归,是对造型艺术伟大传统的回归。”^②

然而,如果弗莱将现代艺术理解为对原始的造型艺术或情感表现力的“回归”,那么他所欣赏的其他原始艺术类型(例如意大利原始艺术、儿童绘画、古代美洲艺术和非洲雕塑等),为何没有像中国古典艺术那样,成为他心中的具有现代性的艺术典范呢?在《非洲雕塑》一文中,弗莱作出了解释,他认为高级的艺术依托于高度的文明,而高度的文明必须具备两个因素,一是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二是“有意识的批判欣赏和比较的力量”。正是由于缺乏第二个因素,尽管非洲在原始时代拥有许多伟大的艺术家,却未能拥有“高度的文明”,而“中国人自远古时代就拥有批判鉴赏的能力……非洲人未能创造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之一,是由于他们缺乏有意识的批判思维和比较、分类的智性能力,而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创造性的审美情感或细腻的鉴赏力和良好的品味”^③。

弗莱对许多非欧洲和原始艺术都很有兴趣,但他只对中国古典艺术表示出强烈的认同,他在《中国艺术面面观》中再次强调,中国艺术与其他非欧洲早期艺术的区别在于一种“高度发达的艺术自觉”,而相较于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忽视了精神灵性的欧洲艺术,中国艺术依然保留了某种对世界的“原始理解”^④。这种双重特点符合弗莱对后印象主义或现代主义的评价:所谓的“现代艺术”其实是高度文明的现代人对于原始艺术的自觉吸纳与批判鉴赏。通过这些类比,弗莱将中国艺术和美学纳入现代主义的话语场中,将其视为既拥有“原始的”情感力量又拥有“现代性”的典范艺术。在弗莱眼里,中国古代文明的自觉性主要体现于其精妙、丰富、深刻的艺术批评,这是它区别于其他原始文化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使中国古典美学具有“现代性”的重要原因。

四、弗莱的现代主义美学与中国艺术批评

罗杰·弗莱对中国艺术批评和文艺理论的认识主要依赖于日本学者和西方汉学家,比如冈仓天心(Kakuzo Okakura)、翟里斯、劳伦斯·宾扬和亚瑟·韦利等人的译介作品,其中,冈仓天心和劳伦斯·宾扬对弗莱的影响尤为深远。冈仓天心曾在《东方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一书中着重介绍了中国南朝画家谢赫的“绘画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他将第一法“气韵生动”解释为:艺术就是“宇宙的精神,它穿梭于和谐有序的事物之法则——节奏(Rhythm)——之中”^⑤。经由冈仓天心的介绍,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理念“气韵生动(rhythmic vitality)”开始引发了西方学界的关注。劳伦斯·宾扬、赫尔伯特·翟里斯(Herbert Giles)、斯蒂芬·波

① Roger Fry, *Vision and Desig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0, p.192.

② Clive Bell, "Post-Impressionism and Aesthetics",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vol. 22, no. 118 (January 1913), p.228.

③ Roger Fry, *Vision and Desig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0, p.67.

④ Roger Fry, *Transformations: Critical and Speculative Essays on Art*,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6, p.79.

⑤ Kakuzo Okakura, *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 of Japan*, California: Stone Bridge, 2007, p.37.

西尔(Stephen Bushell)和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等人都曾讨论过“气韵生动”的内涵^①。冈仓天心认为,“六法”的精髓在于,当“创造精神降为一种图像概念时,必须赋予自身有机结构。这种富于创造性的结构便形成了作品的骨架,而线条就是神经和动脉,整个作品又被色彩的皮肤所覆盖”^②。冈仓天心将中国艺术阐释为一个有机整体,它融合了形式(“骨架”“线条”“色彩”)与“创造精神”,这与“有意味的形式”所强调的形式与审美情感的统一是一致的。宾扬同样强调“气韵”并非“对自然的模仿或忠实”,而是“万事万物内在的生命精神”,是“精神的节奏与生命运动的融合”,当真正的艺术家在创作时,他们会与这种“创造性能量直接连接”,艺术家“作为媒介或工具,在他的笔触中注入真实的生命”^③。宾扬对“气韵生动”的阐释将其置于西方传统文艺核心理念“模仿论”的对立面,为艺术作品赋予自给自足的独立性和生命力,这恰恰是旨在与西方传统决裂的现代主义能与中国古典艺术产生共鸣的根本原因。

如上文所述,罗杰·弗莱阅读过宾扬的《远东绘画》并撰写了一篇书评,称赞宾扬对中国艺术的“现代性”的描述。根据弗莱的书信集主编丹尼斯·萨顿(Denys Sutton)的说法,这篇书评“对于(弗莱)的思想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显示出弗莱正处于发现‘大量的新的审美经验’的震荡中,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中国和日本艺术的欣赏”^④。或许是受到宾扬的影响,弗莱在评论中国艺术时也常常使用“线条节奏(linear rhythm)”或“生动的节奏(vital rhythm)”等词汇。另外,与宾扬推崇的“绘画六法”相似的是,弗莱也在自己的美学宣言中提出了六种能够唤起审美情感的设计元素(“线条的节奏”“团块”“空间”“光与影”“色彩”和“平面视角”),他的第一个元素(the rhythm of the line)同样将“节奏”作为关键词,其意为“一种姿态的记录,这种姿态是被艺术家的情感修饰过的,因而能直接传递给我们”——这再次彰显了形式与情感的结合^⑤。对弗莱而言,“节奏”既是艺术作品的形式设计,又是艺术家精神性灵和创作精神的体现,二者的结合构成了“有意味的形式”,也决定了中国艺术的“现代性”。

除了冈仓天心和劳伦斯·宾扬,弗莱对中国艺术理念的认识还得益于他与美国学者登曼·沃尔多·罗斯(Denman Waldo Ross)的交流^⑥。罗斯是美国最重要的亚洲艺术收藏家之一,他与冈仓天心和菲诺罗萨等学者都是好友,在他的著作《纯粹设计理论》(*A Theory of Pure Design*)中,他多次称赞了中国和日本绘画在形式设计上的平衡,他的艺术理论深受中国道家美学的影响,他经常使用“道”

① Laurence Binyon, "A Chinese Painting of the Fourth Century",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vol. 4, no. 10 (January 1904), pp.39-49; Herbert Allen Gil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 London: Kely & Walsh, 1905, p. 28; Stephen W. Bushell, *Chinese Art*, London: Wyman and Sons, 1905, p.211; 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 Note on the Six 'Methods'",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vol. 37, no. 213 (December 1920), pp.309-310.

② Kakuzo Okakura, *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 of Japan*, California: Stone Bridge, 2007, p.38.

③ Laurence Binyon, *Painting in the Far Eas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Pictorial Art in Asia, Especially China and Japa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08, pp.8-9; Laurence Binyon, *The Flight of the Dragon: An Essay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rt in China and Japan, Based on Original Sources*, London: John Murry, 1911, pp.15-21.

④ Denys Sutton (ed.), *Letters of Roger Fry*, London: Chatto & Windus Ltd., 1972, p.37.

⑤ Roger Fry, *Vision and Desig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0, p.25.

⑥ Denys Sutton (ed.), *Letters of Roger Fry*, London: Chatto & Windus Ltd., 1972, p.135.

(Tao)这一概念来阐释艺术形式和精神的融合,并将“道”字印在了他的自传笔记的封面上^①。据学者玛丽·弗兰克(Marie Frank)所述,弗莱和罗斯的美学理论都试图“平衡形式主义的客观性和艺术家个人感受的主观性”^②,这与前文所讨论的“气韵生动”或“有意味的形式”的深层内涵再次相吻合。的确,道家思想为中国古典美学奠定了基础,其核心理念主张审美主体与自然外物的合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主体能够超越理性、逻辑和语言的障碍,通过直觉参悟自然之美,而自然也可在人的感知中保持其生动性和独立性。道家思想渗透在中国传统艺术和美学中,尤其是在中国山水画中,人从主体地位退却,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不去妨碍大自然的自主运作。这种理念将艺术从模仿自然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赋予其独立性与灵动性,将其与人的内在生命、精神境界、甚至自然宇宙的流动运转紧密结合起来。自十九世纪下半叶起,詹姆斯·利雅各(James Legge)、赫伯特·翟里斯、亚瑟·韦利陆续将《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译介到英国;冈仓天心把谢赫和他的“绘画六法”放在了道家哲学的章节里,宾扬也强调道家哲学代表了中国人“富有想象力的一面”,它使“中国绘画和文学最光彩夺目、最鲜活的东西”诞生^③。

通过这些文艺理论和哲学思想的译介,弗莱认识到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精神内核和艺术家高度的自觉意识,这使他对中国艺术的认识与讨论上升到了文明的维度。正是由于这些艺术批评,“中国”不再只是由西方建构的异国他者或镜像,它被赋予了历史、自知自觉的文明以及一种批判、比较和分类的能力。弗莱对中国文明、文化以及古代艺术的赞扬促进了其在20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化场域的传播。从1930年代开始,一些英国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将中国艺术设置为一门正式课程。1930年,沃尔特·珀西瓦尔·耶茨被任命为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讲授中国艺术和考古学的第一位讲师。1934年,弗莱被聘任为剑桥大学斯莱德教授,开设中国艺术的相关课程,他的课程讲稿被汇编成了《最后的讲稿》(*Last Lectures*)一书。在讲稿中,弗莱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人类文明的想法:他把希腊文明和中国古代文明视为文明的两极,但他也“见证了将两个极点连成一个世界体系的过程——事实上,这可能是属于未来的伟大的希望”^④。弗莱指出两个文明中心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拥有“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和“理解外部现实的科学态度”^⑤。但在中国古代文明中,他发现了更多的灵性、生命力、表现力、情感以及人与自然之间更融洽的关系。弗莱认为,理想文明的希望在于“理性”和“情感”、西方和东方的融合。在《艺术》中,克莱夫·贝尔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强调了东西文明融合的可能性,“世界各地最早期的整个艺术史……看起来就像一幅地图,几条溪流从同一山脉流向同一片大海。他们从不同高度出发,但最终都到达了同一水平线”^⑥。在对中国文明、文化、艺术的跨文化表述中,弗莱和贝尔发现了东西文化之间的亲和力,也表达了他们的世界主义理想。

在弗莱等现代主义文化精英的引领下,20世纪的英国现代主义运动中的中国风话语经历了多层

① Marie Frank, *Denman Ross and American Design Theory*,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11, p.174.

② Marie Frank, *Denman Ross and American Design Theory*,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11, p.127.

③ Laurence Binyon, *Painting in the Far Eas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Pictorial Art in Asia, Especially China and Japa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08, p.55.

④ Roger Fry, *Last Lec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9, p.97.

⑤ Roger Fry, *Last Lec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9, pp.97-98.

⑥ Clive Bell, *Art*,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47, pp.121-122.

次、多维度的建构,它从视觉艺术转向了考古领域,又成为了形式美和“现代性”的典范,它从物质维度转向了精神、性灵、审美和生命关照,又携带了一种文明反思和救赎意识。在很多英国现代主义者的笔下,“中国”似乎变成了一种非历史性、非时间性的建构,它从一个空间意义上的文化对照变成了一个时间轴上的代表了古老秩序和诗意感性的文明他者,它代表了西方已逝的过去,也映照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病。罗杰·弗莱受到中国古典美学的启发,呼吁将艺术从技术、科学、模仿等桎梏中解救出来,回归生命的内在节奏和“有意味的形式”,他把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东西文明的融合上,他对中国艺术的种种话语实践促进了20世纪初“东方文艺复兴”和英国现代主义的合流。

责任编辑:冯济平

Roger Fry and the Discourse of "Chinoiserie" in British Modernism

Xie Yaq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British art critic Roger Fry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His int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rt brought it into the discursive field of British modernis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ry and other modernist intellectuals,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oiserie had moved from the realm of cultural materiality and visual arts to the realm of spirituality, aesthetics, and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 Fry interpreted early Chinese art as an ideal art which possesses a "significant form", and he incorporated Chinese art criticism into the discourse of English modernism. In turn,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 ideas which emphasize the combination of artistic form and life spirit also influenced Fry's modernist aesthetics.

Key words: Roger Fry; chinoiserie; Chinese art; modernism; Bloomsbury Group



王洪兵,1978年生,山东五莲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副院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明清史、中国社会史的教学与研究。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员、中国社会史学会慈善史专业委员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鉴定评审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青苗会与近代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主持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冲突与融合:青苗会与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治理研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礼制文化与国家治理研究”。在《史学月刊》《清史论丛》《中国社会历史评论》《人文论丛》《历史教学》《东岳论丛》《江西社会科学》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近年来,着力于清代乡村治理的研究,以华北青苗会组织为突破口,尝试梳理清代华北乡村治理、州县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脉络,在学术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石宝峰,1984年生,山西武乡人,工学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信用大数据应用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研究青年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会等。主要从事普惠金融、农村金融改革和“三农”政策评估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课题20项。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Nature Food》《Omeg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等期刊发表论文70多篇,相关研究得到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经济参考报等权威媒体报道转载;另外,1篇被《Nature》以“Research Highlight”专题报道,5篇入选ESI前1%高被引论文。部分成果荣获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管理科学》最具影响力论文”等。



来稿须知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山东省教育厅主管、青岛大学主办、公开发行的社会科学类综合性学术期刊。我们一贯秉承学术办刊宗旨,立足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关注学科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注重学术创新。本刊辟有哲学研究、经济研究、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工商管理、政治学、公共管理等栏目。欢迎海内外学人惠赐佳作。

一、本刊面向国内外学者公开征稿,来稿应主题鲜明、内容详实、观点明确、资料翔实、论证充分、逻辑清晰、语言文字合乎规范,有独到创新,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实践借鉴价值,字数 10000 字以上为宜。具体格式及参考文献注释规范见《东方论坛》官网(<http://dflt.qdu.edu.cn>)。

二、为便于匿名审稿,来稿请在正文中隐去作者姓名、单位等有关信息。投稿时请注明作者简介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作者简介包括:姓名、籍贯、所在单位、职称、学历、学位、主要研究方向、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和邮箱。同时附上中英文题目、中英文摘要(含关键词)。基金项目请注明项目级别、项目名称和编号。以上内容请单独放在一页,置于正文前面。

三、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通联费等任何名目的费用,一旦采用作者稿件,会支付相应的稿酬。

四、著作权使用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五、本刊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同行专家审稿制度。

六、本刊审稿周期为 60 天,若作者投稿 60 天后未收到本刊编辑部的任何通知,可自行处理稿件。

七、作者文章一旦被录用发表,作者须拥有所投稿件的版权,并将其转让给本刊,版权包括本刊纸质出版、发行的权利,网络出版和文摘、转载和汇编的权利。

八、投稿方式:

本刊采用电子邮箱接受来稿。各责任编辑投稿邮箱为:

孙继国(理论经济、应用经济、工商管理、旅游管理) qddxsjg@qdu.edu.cn

冯济平(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语言学、艺术学) dfltfengjiping@qdu.edu.cn

侯德彤(历史、法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社会学) dflt-houdetong@qdu.edu.cn

潘文竹(哲学、古代文学、文化研究、民俗研究、体育学) panwenzhu-dflt@qdu.edu.cn

编辑部电话: 0532—85953730

联系邮箱: dflt@qdu.edu.cn